

教化与礼仪学术
第5卷

科学技术
第7卷

宗教与民俗
第9卷

中外文化交流
第10卷

历代文化沿革
第1卷

地域文化
第2卷

民族文化
第3卷

文化制度
第4卷

中华文化
通志

第8

【艺文】

新闻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谷长岭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8 典
【艺文】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闻志



中华文化通志·艺文典 (8-078)

刘梦溪 主编

新闻志

谷长岭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70毫米 32开

字数 221,000

印张 9.25

插页 1

版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208-02331-X/K·550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FS12/01

新闻志

作者简介

谷长岭,1943年生。北京大学肄业。1978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1981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新闻史教研室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长。著有《中国新闻事业史》等。

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报纸的国家,官报在中国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本书以丰富的资料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古代新闻活动的发展情况,梳理了官报的发展轨迹,揭示了民办报纸的萌芽。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中国新闻事业有了新的起点,在近一百年中,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本书详尽介绍了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报业的发展脉络和状况。本书还介绍了近代通讯社和广播事业的发展,新闻法规的建设和历代有代表性的报案,近代以来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和新闻教育的开拓。对于新闻业中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本书设专章予以介绍。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总 决 审	陈 昕				
总 顾 问	余志明				
总 监 制	郁椿德				
编辑部主任	朱金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棠				
责任编辑	王有为	王界云	孔令琴	叶亚廉	朱子恩
	朱金元	汤中仁	苏贻鸣	杨承纮	李 卫
	李文俊	李远涛	吴书勇	宋慧曾	张 玫
	张 臻	张美娣	陆凤章	胡小静	郝盛潮
	秦建洲	顾兆敏	夏绍裘	唐继无	曹文娟
	曹培雷	屠玮涓	虞信棠		
责任决审	王有为	王树鸣	王界云	宋 存	严忠树
	吴慈生	张 玫	张满鸿	周琪生	柳肇瑞
	胡小静	钱雪门	高登瀛	夏国智	黄行发
	魏允和				
装帧设计	吕敬人工作室				
美术编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 弘				
技术编辑	沈树德	吴 坚	何永康	姜华生	曹伯祥
责任校对	王秀菊	张新宇	陆永洲	陆秉熙	顾伟民
	唐毓华	谈 维	陶雪英	龚养耿	
编 务	朱玉堂	张大潮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与报纸报业	6
第一节 官报产生前的新闻传播活动	6
一、口头新闻传播	6
二、文字新闻传播	8
第二节 唐代的进奏院状	13
一、唐代著述中的有关记载	14
二、现存的唐代进奏院状	16
三、唐代官报的基本情况	18
第三节 宋代的官报和民报	20
一、邸报、进奏院状报等官报	20
二、单状、内探录、小报、新闻等出版物	25
第四节 明代的邸报	28
一、官办邸报	28
二、民办抄报行	30
三、现存明代邸抄的抄件和实物	31
第五节 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报纸	34

一、提塘官报和小报	34
二、民间报房发行的京报	36
三、辕门钞等地方官报	38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	40
第一节 国门开启与近代报刊的出现	40
一、鸦片战争前在东南亚出版的中文刊物和在 华南沿海出版的中外文报刊	40
二、鸦片战争后外人在香港出版的报刊	44
三、鸦片战争后外人在上海出版的报刊	47
四、鸦片战争后外人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版的报刊	51
五、外人报刊的作用与业务状况	54
第二节 社会变革与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	58
一、香港的早期国人报刊	59
二、上海的早期国人报刊	60
三、广州、汉口的早期国人报刊	61
第三节 维新运动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	63
一、维新派的第一批报刊	63
二、变法运动高潮中的主要报刊	65
三、戊戌变法时期的其他报刊	70
第三章 中国近代报业的拓展	74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	74
一、海外保皇报刊	74
二、国内改良立宪报刊	77
三、香港和海外革命报刊	80
四、国内革命报刊	85

五、清末近代官报	91
第二节 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报刊	95
一、民国初年报业的发展	95
二、“五四”新文化报刊	97
三、无产阶级报刊	101
四、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报刊	108
五、民营报业的发展	110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报刊	114
一、国民党报刊	114
二、共产党报刊	119
三、民营报业的发展	128
四、抗日救亡报刊	131
第四章 中国近代通讯社与广播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137
第一节 通讯社的产生和发展	137
一、清朝末年通讯社的萌生	137
二、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通讯社事业的初步发展	139
三、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民营通讯社	141
四、国民党的官办通讯社	146
五、中国共产党的新闻通讯社	149
第二节 广播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152
一、广播事业的发端	152
二、国民党的广播事业	155
三、共产党的广播事业	159
四、民营广播事业	164
五、日伪广播宣传	166
六、外国人在华广播活动	168

第五章 新闻法规与报案	170
第一节 新闻法规	170
一、新闻法萌芽.....	170
二、最早的一批新闻法规.....	171
三、民国初年的新闻法制.....	173
四、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法规.....	176
五、沦陷区的新闻法规.....	179
第二节 报案	182
一、古代报案.....	183
二、近代报案.....	184
第六章 新闻学研究	202
第一节 新闻学著述	202
一、新闻著述的发轫.....	202
二、近代新闻理论著述.....	207
三、新闻业务著述.....	210
四、新闻史著述.....	212
五、新闻学刊物.....	215
六、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著述.....	217
第二节 新闻教育	222
一、新闻教育的发端.....	222
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教育.....	223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教育.....	227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闻教育.....	232
第七章 新闻界人物	235
王 韬 陈 霭 亭 严 复 裘 可 桴 陈 范 汪 康 年 彭 翼 仲	

谭嗣同	英敛之	唐才常	蔡元培	章炳麟	陈少白	刘少少
孙翼中	杭辛斋	徐 勤	狄葆贤	梁启超	林白水	包天笑
陈独秀	于右任	秋 瑾	史量才	郑贯公	胡石庵	章士钊
宋教仁	朱执信	黄远生	邵飘萍	胡文虎	陈景韩	张竹平
詹大悲	柳亚子	董显光	张季鸾	徐凌霄	李大钊	胡政之
严独鹤	戈公振	任白涛	何海鸣	陈布雷	李 达	陈博生
戴季陶	胡 适	萧楚女	俞颂华	潘梓年	徐宝璜	邓中夏
萧同兹	孙伏园	潘公展	恽代英	蔡和森	向警予	邹韬奋
周瘦鹃	高君宇	胡愈之	陈铭德	谢六逸	顾执中	成舍我
瞿秋白	张友渔	朱惺公	羊 枣	王芸生	李公朴	何 云
赵敏恒	张友鸾	杨 刚	章汉夫	恽逸群	陆定一	博 古
杨 松	萨空了	徐铸成	廖承志	黄天鹏	范长江	浦熙修
赵超构	向仲华	邓 拓	沙 飞	胡乔木	乔冠华	钱 毅

参考文献.....	276
-----------	-----

后 记.....	277
----------	-----

导 言

“新闻”是个多义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所指的对象并不相同。狭义的“新闻”指的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如消息、通讯等。这种报道反映社会万象,绝非某一领域的专史、专志所能包容。因此,新闻史、志所记述的,主要并不是历史上的这种具体的新闻报道,而是人们的新闻报道活动,即新闻事业。所以,“新闻志”中的“新闻”一词,指的是新闻事业。

新闻事业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及其各项业务活动的总称。它是一种社会事业,是社会舆论工具,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中国的新闻活动历史悠久,早在 1300 年前就产生了报纸。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

关于中国报纸的起始,中外新闻史学者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始于周朝,有的说始于汉代,有的说始于东晋,有的说始于唐代。这些说法虽然各有理由,但周朝说、汉朝说、东晋说目前都嫌根据不足,而唐朝说则有众多的史料佐证,已成为一种较为公认的说法。

唐代的报纸更确切地讲是一种“新闻信”,而且这种“新闻信”是由各地派驻朝廷的进奏官自行向各地传发的。发送对象是地方的军政主官,形式上还只是手抄品,没有固定的发送周期,没有报头,是一

种带有浓厚的官文书和情报色彩的萌芽状态的报纸。而到了宋代,既有官报,又新出现了非官方的私办的小报。从北宋到南宋,日益盛行,“京城印行”,“沿街叫卖”。出现了印刷的报纸,发行面比唐代大为广泛。报纸的发报周期,也日趋固定。明代中期以后,直到清代,在上述基础上,又出现了民间合法经营出版的报纸——报房京报。这种报房出版发行的报纸,大多已使用印刷,且很快发展为活字印刷,同时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名,公开售卖,读者面进一步扩大。

作为一种社会事业,新闻事业的发展受社会结构制约,由社会制度所决定。中国古代的报纸,从唐至清,始终是中国特定的封建社会结构的产物,始终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掌握,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信息舆论工具。在君主专制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下,中国古代的报纸,不论是官方的邸报,还是民办的小报和报房京报,内容始终局限在简单地传送朝廷政治信息的状态,没有时事评论,更不反映民情、民意,和近代报纸相比,还相去甚远。

比起古代报纸,近代报纸具有报道消息和发表评论的自由。近代报纸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十六世纪最先在欧洲产生的,并在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对华入侵,传入中国。在这方面,一些来华的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的澳门、香港和上海、广州、宁波、福州等地,创办了一批中外文近代报刊,以服务于列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扩张。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外人办报的影响,在汉口、香港、上海、广州等地出现了少量中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1895年甲午战争后,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觉地利用报刊宣传来推动维新变法

运动的发展。在他们的带动下,短短两三年中,近百种近代报刊在各地接踵而出,掀起了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这些报刊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宣传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启蒙,提高了近代报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开启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办报,清廷也广出官报,新办报刊 1400 余种,形成了中国近代报刊出版的又一个高潮。

北洋军阀统治初期,因北京政府的压制,报刊数目一度有所减少。但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高涨,中国资产阶级民营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型报刊大批出版,通讯社也有所增多,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开始发端,中国新闻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9 年到 1949 年的三十年内,全国报纸总数由 550 家发展到 1024 家,一度达到 1781 家。通讯社由 20 余家增加到 1947 年的 647 家。萌发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广播电台,到 1947 年时也增加到 131 座。

在上述新闻事业中,中国无产阶级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是一支最富活力、最为进步的力量。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始于 1920 年。最先产生的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理论刊物和工人报刊。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9 年新中国诞生,中国共产党在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国民党统治地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创办了大量公开和地下报刊,代表性的有《向导》、《布尔塞维克》、《红色中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主要新闻机构有红中社、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对旧中国新闻事业改造的同时,迅速建立起了全国性的人民新闻事业,到 1957 年,全国共有报纸

364种,广播电台61座,县广播站1700个。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更宣告了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引下,中国新闻事业更有了迅猛的发展。到1993年年底,大陆报纸达2039家、期刊7099种,广播电台987座,特别是电视事业,发展更是迅速,到1994年底,大陆的电视台就已达980座,有线电视台1200座。

台湾的新闻事业从1988年报禁解除后也有较大发展,到1993年年底,已有报纸335家,期刊约4000家,广播电台33座,电视台3座。而作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源地的香港和澳门,多年来新闻事业一直较为发达。截止1993年,香港有报纸70余家,期刊800余种,广播电台4座,电视台3座;澳门有中文日报8家,葡文日报5家,广播电视台一座。

悠久的历史,长期的实践,使中国新闻事业的内容十分丰富。在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回顾过去,总结和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新闻宣传活动的优良传统,是极为必要和有益的。

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1873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就是有关中国新闻事业较早的专论。进入二十世纪后,开始出现中国新闻史专著,最早的一部,是1917年问世的、姚公鹤撰写的《上海报纸小史》。从那之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十多年中出现了五十多部中国新闻史专著。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黄天鹏的《中国的新闻事业》、林语堂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等。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颇有学术价值,1927年问世后,曾多次重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新闻教育单位,出于教学的

需要,编印出版了一些中国新闻史教材,如《中国现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等,面向社会出版的新闻史专著较少,只有方汉奇的《报刊史话》等。此外还出版了一些资料性的新闻史参考书,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也出版了一些新闻史专著,如《中国新闻史》、《宋代新闻史》、《清代官报兴起之研究》等。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蓬勃发展,中国新闻史研究空前繁荣。新闻史教学与研究队伍迅速壮大,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成果迭出,十数年间,仅专著和教材就出版了数十种。如《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现代广播史》、《中国电视史》、《大公报史》、《新华日报史》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新闻志、报史、台史等。尤其是方汉奇、宁树藩、陈业邵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迄今中国新闻史著述中内容最为丰富翔实的力作,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水平。

新闻作为一门科学,有它的特殊性,与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等各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其他学科的发展,新闻这门科学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与报纸报业

第一节 官报产生前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口头新闻传播

新闻传播,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性活动。人类最早最基本的新闻传播,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口头传播。口头传播产生于距今4万年前至1.4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是随着人类清晰的思维能力与连贯的有声语言的形成而形成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证明,距今1.8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能够用连贯的有声语言和百余里以外的沿海居民进行交往。

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口头传播是唯一的新闻传播手段。流传至今的许多中国远古传说,如有巢氏架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结网捕鱼,神农氏种植五谷百草,黄帝大战蚩尤,尧舜禹禅让等,推源溯始,大多肇端于远古的口头传播。

夏商周三代,随着国家的产生,宗教、政事、征伐、生产活动的频

繁,新闻传播日益活跃。尽管这时已经产生了文字,但文字记事费时费力,因此,口头传播仍是新闻传播的主角,连国家重大政务活动,也多是以口头进行传告的。《史记·周本纪》记述:武王率师讨伐商纣王前夕,曾“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告于众庶:‘……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

除了国家政事主要靠口头传播外,国与国之间的消息传递也主要靠语言交流。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派往他国的说客、使者风尘仆仆,不绝于途。据先秦典籍记载,各国每有要事发生,都要传告给相关国家;受到别国侵扰,要向友国告急求救,如“宋华元如晋告急”(《左传·成公十八年》);战事获胜,要向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告庆”,如“晋克楚于鄢,使郤至告庆于周”(《国语·晋语》);国内发生动乱,要向他国“告乱”,如“卫人来告乱”(《左传·隐公七年》);动乱平息,则向他国“告宁”,如“卫侯告宁于齐”(《左传·昭公二十年》);国君死亡,向他国“告丧”,如“王人来告丧”(《左传·僖公八年》);发生灾荒,向他国“告饥”,如“京师来告饥”(《左传·隐公六年》)。这些频繁的传告活动,虽然都是带有特定目的的外交活动,主要不是为了传递信息,但所传告之事,都是当时新近发生的,尚不为别国所知的重大事件。在传告过程中,尽管不排除奉命传告的使者携有某种文字材料,如证明身份和使命的公文、书信等,但现存先秦典籍表明,使者即便带有文字材料,也是极其简略的,详细情况还是要靠使者口头陈述。

春秋战国时期,民众间的口头新闻传播也很活跃,以致典籍中对某些口头传播活动都有所记载。《墨子·明鬼》篇记道:“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其三年,周宣王会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衣朱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

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弑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吕氏春秋·节丧》中也写道：“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麟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奸人闻之，传以相告。”这两则记载说明，周宣王狩猎时突然被刺客射杀和贵族之家厚葬死者之类的事件，曾被“传以相告”，“远者莫不闻”。

在中国古代，即使在封建官报产生之后，由于这种报纸的信息量、传播时效、传播面都相当有限，口头传播仍然是最基本、最主要的新闻传播方式。

二、文字新闻传播

中国是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文字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录和传播新闻的国家之一。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先民就创造了结绳、刻木等记事方法。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山西峙峪人住地，就曾出土许多有刻痕的骨片。尽管“契木为文”、“结绳记事”是相当原始的记事手段，还不能独立、完整地记录和转述事件，但可以帮助传播者记忆，是文字记事的始祖。

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代，中国已经有了文字，并且已经用文字记言记事，曾产生过《夏书》、《夏训》等文献。由于年代久远，这些文献早已失传，但其部分内容曾被一些先秦典籍所征引。从征引的内容来看，《夏书》、《夏训》等夏代文献所记之事相当广泛，不仅有政务、生产活动，还有天文、历象等。《左传·昭公十七年》就征引了《夏书》对于一次日食的记载：“《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次发生于房宿位置的日食，和日食发生时民众的惊恐表现，无疑是当时的一件重要新闻事件，《夏书》的这则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也是最早的文字新闻之一。

甲骨文是存留至今数量最多的商代原始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商王朝的统治者在进行占卜时刻写的卜辞,刻写的材料是龟甲和牛羊肩胛骨。这些甲骨每片刻写着一则卜辞,每则卜辞从十几字到四五十个字不等,词义清楚,语意连贯,是一事一文式的实录。卜辞有一套固定的体式,较完整的通常包括四部分:一是占卜举行的日期及卜官的名字,二是所要卜问的事由,三是卜兆结果,四是占卜后应验的情况。在商代的神权政治下,一切国之大事及商王的活动都要卜问吉凶。占卜是“国之大事”,每次占卜本身都是一次国事活动,因此,许多卜辞实际上是一则记事。

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商代,盛行于西周,所铸刻的文字被称为金文或钟鼎文。商代铸造青铜器具,是为了使用,上面的铭文字数寥寥,一般只有几个字,主要是用来标识器物主人的族氏。西周时,铸造青铜器具已不再是为了使用,而完全是为了记事。铭文字数少则几十,多则数百,内容详细,涉及面广泛,举凡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国家或家族大事,都要铸器勒铭。因此,这些铭文有不少是当时重大事件的记录。例如利簋铭,该铭文刻在带方座的两耳簋上。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临潼的两耳簋,是西周初期铸造的。该铭文共32字,记述了周武王灭商的史实:“珷(周武王)征商,唯甲子朝(甲子那天早上),越鼎(夺得了鼎),克昏(打败了商纣王),夙有商(推翻了商)。辛未,王在阑师则有事利金(周武王在阑师这个地方把铜赏给了有事利。有事:官名;利:人名)。用作檀公宝尊彝(用来制作了这件祭祀檀公的宝器)。”

甲骨卜辞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能见到的人极少,传播意义甚微。而铭文是“因文而见器,藉器以传文”,其铸刻在宝贵的铜器上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尽管这种传播以垂之永久的纵向传播为主,但在铸毕问世之初,陈于廊庙厅堂之上时,也起到了一定范围内的横向传播作用。

甲骨文、金文材料来源有限,且制作不易,因此,在纸张推广使用前,更为常用的文字书刻材料是竹木、石、帛等,形成了简、策、牍、刻石和帛书。

简是只写一两行字的长条竹木片,许多条简用编绳连起来则为策,牍是写有多行字的宽木片。简、策、牍至晚在西周已经产生,帛书则始于战国时期。从春秋到魏晋,简、策、牍、帛书是大部分公私文字的载体。在这些公私文字中,有不少是对当时新发生的事件的记录,特别是史官的记事。中国从夏代起就设立有史官,史官的主要职责是随时记录王侯的言行和国家政事。但史官记录国家政事和王侯言行的主要目的是资政、存史,大多数并不对外公布。春秋以后,宣示于外、最有大众新闻传播性的,是某些悬书和露布。

悬书即悬挂宣示的简牍或帛书。悬书的作者有私人,也有官府。现在已知的最早的私人悬书出现在春秋时期。据《史记·晋世家》载,晋文公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后,随其流亡的五大臣中,唯独介子推未被封赏。介子推的门客愤愤不平,在街上张挂出匿名“悬书”：“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这则悬书用的是隐晦的借喻,但所指明确,起到了宣传和煽动作用,颇类后世的揭帖。

私人悬书自始就遭到官府的查禁,而官府为了布法令、行教化,却经常将一些官文书悬挂于通衢和宫门两侧。据《礼记》、《尔雅》等书记载,春秋时,周王室和诸侯国就经常把一些法令和公文悬挂于“象魏”、“观魏”上。“象魏”、“观魏”又简称为“观”,是宫廷门两旁的望楼。《礼记注》在注释为何将宫门两旁的望楼称为“观”时说:“宫门双阙,旧章悬焉,使民观之,因谓之观。”

在宫门双阙上悬挂法令、文书,以“册告天下”,“布之于百姓”,不仅见于春秋,至南北朝时仍有记载。这些悬书的内容,大量的律令,不是记事,但也有一部分是新近发生的事件。《汉书·萧何传》记载,

汉武帝元狩年间,武帝感念宰相萧何之功,封萧何的曾孙萧庆为食邑2400户的酈侯。为了让此事全国皆知,汉武帝特地“复下诏御史”,命将此事“布告天下,令明朕报萧相国德也”。

除了中央政府悬挂文书、公告外,地方官府也经常向公众发布文告。南北朝时期,这种地方官府的悬挂文书被称为“教”或“榜”,悬挂地点大多在官府大门或城门旁。如《北史·杨津传》载:“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又如《周书·韩褒传》也记载,韩褒出任雍州刺史时,为整治当地盗贼横行的状况,曾悬“榜”勒令盗贼自首:“因大榜州门曰:‘自知行盗者,可急来首,即除其罪,尽今月不首者,显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赏前首者’。”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地方官府悬挂公布的文书,有些(如前者)也有一定的新闻性。

除了悬挂示众外,另一种以简牍、帛书形式广泛传播消息的是露布。露布又称“露版”,指的是不加缄封的官文书,主要用于传檄、报捷或传报一些紧急事件。

据《文心雕龙·檄移》记载:“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檄文既然是“威让之令”,“文告之辞”,传发的目的是“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那么,在传送过程中,也就不仅不需要保密,反而要尽量扩散。因此,《文心雕龙·檄移》中又记载道:“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尺二”是一尺二寸长的竹简,“明白之文”即不加缄封。可见春秋战国时,已经在用不加缄封的简传播檄文了。

汉时,露布的应用范围有所扩大,不仅在军事上用于“征天下兵”,而且不少皇帝的“敕书”和臣民的上行文书也都采用露布。东汉时,地方官就曾露布向朝廷报告地震灾情。

从三国至南北朝,征战不断,露布被大量用于宣扬战绩和传递捷

报。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板’。”据记载，为了达到更大的宣传效果，这时的露布已不再是竹简，而是大幅的帛书，且将帛书高悬于漆竿之上，由将士高擎，骑马向朝廷传送，沿途招摇，中途休息时，则将之插于地上，任百姓观看。北魏时，对露布在战争中鼓舞士气、瓦解敌军的重要作用，从皇帝到将士都很重视。对此，《魏书·韩显宗传》中有生动传神的记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大将韩显宗在赭阳之战中斩敌上将一名。韩颇自矜，不屑于将此小胜以露布向正在新野攻城的孝文帝报捷。孝文帝事后竟为此责怪韩显宗：“卿破贼斩帅，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也？”韩回答道：“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晒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

由于石材来源方便，刻石更便于永久存留，因此，自秦代刻石大兴后，刻石又成为记事传播的重要手段。

刻石起源很早，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刻石是在安阳出土的刻有 12 个字的殷商石簠，其后还有战国时的石鼓文。

从秦代开始，刻石大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志得意满，五次出巡。在盛大的出巡中，多次在名山留下巨大刻石，计有：峯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碣山刻石、会稽刻石等。这些刻石，主要是宣扬始皇帝的文治武德，以期万世相传。虽然其文大而空泛，但在当时还是向国人传播了秦始皇的出巡和新朝的重大法令等信息。

秦之后的汉代，刻石更加风行，凡“国之大事，史之大支”均勒石树碑，成为记事和传播的重要角色。刻石的内容更加丰富，主要有两

类：一类是公牒刻石，如需要百姓周知的皇帝诏令或地方衙署的告示；二是记事刻石，如皇帝巡幸畋猎、颁布律令、会盟立约、征伐交战、修建重大工程，甚至包括一些地震、水文、天文的记录。这些刻石，尤其是第二类记事性刻石，有不少带有新闻传播的色彩。

此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些近似新闻传播的事物，如情报信、某些被传抄的官文书、烽火报警等。烽火报警至迟出现于西周，本属于军事情报，是通过燃点一定数目的烟火，迅速传报敌人来犯的消息。点燃烽火由于是公开进行的，因此，烽火一起，实际上也向周边的民众发布了战争消息。

正因为中国古代有着频繁的传播活动，在春秋战国的典籍中不仅有大量的传播活动的记载，而且还有不少传播的理论观点。现存的儒法墨道纵横及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就有不少关于传播功能、传播效果、传播技巧、传播心理、传播道德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

第二节 唐代的进奏院状

公元618年，李渊建立了唐朝。唐朝到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的时期。由于国家政务日趋殷繁，加之造纸业的发展和用纸书写的便捷，于是从开元年间起，出现了用纸书写、按日记事、连续向外通报朝廷政事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唐朝后期，由于藩镇势力的发展，更加活跃。各藩镇、各道长驻首都的进奏官，以手写的“进奏院状”的形式，向各地主官随时传报朝廷政事与动态，成为地方官员获悉政治信息的重要途径。这种用纸书写传播的“进奏院状”，实际是一种新闻信或情报信，是一种萌芽状态的报纸。

一、唐代著述中的有关记载

对于唐朝的这种萌芽状态的报纸，现存唐代著作中有所记载。其中最详细、最具体的是收入孙樵所著《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一文：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甃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址，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戎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所仰给耶？北虏惊啗边甍，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警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咋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乎？安有廷奏争事焉？”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事，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正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孙樵，字可之，在唐晚期唐宣宗、唐僖宗时，曾任中书舍人、职方

郎中等职。他的这篇文章写于大中五年(851年),即在他中了进士、初到长安作官之时。这篇文章以亲见亲历,具体而又真实地记述了唐朝开元年间“条布于外”的朝廷公报和大中年间在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的情景。

另外一部对唐朝萌芽状态报纸记述较多的著作,是崔致远所著的《桂苑笔耕集》。崔是晚唐人,唐僖宗年间曾任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桂苑笔耕集》中收录的有一些是由崔代笔的高骈给皇帝的贺表。而上贺表的因由,又多是高骈通过“进奏院状报”及时获知的一些可喜可贺的喜讯。例如:

《贺改年号表》:“今月某日,得进奏院状报:奉十一日宣下,改广明元年为中和元年。”

《贺通和南蛮表》:“臣得进奏院状报:入南蛮通和使者刘光裕等回云南通和,兼进献国信、金银器物、匹段、香药、马等者。……”

《贺封公主表》:“臣得进奏院状报:奉去年十月十四日敕旨,皇帝第十一妹封遂宁公主,长女封唐兴公主,次女封永平公主,待收复京阙,备礼册命者。……”

《贺杀黄巢徒伴表》:“臣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宣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又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排仗受宰臣及百僚贺礼毕者。……”

《桂苑笔耕集》中,也有一些不是贺表而是奏状书信。这些奏状书信,也往往和从进奏院状中获知的消息有关。例如:

《谢除侄琼官状》:“前守京兆府鄠县尉高琼。右件官,是臣侄男。今得进奏院状报,伏蒙敕旨,除授彭州九陇县令,仍赐绯鱼袋者。”

《致海陵镇高霸书》:“报高霸:得进奏院状报,知转授右散骑常侍。”

《致淮口李质书》：“报李质：得进奏院状报，知质转授右卫大将军。”

类似的记述，《桂苑笔耕集》中还有一些。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进奏院状报是节度使高骈获知朝廷信息的重要途径。进奏院传报的这些信息，相当广泛，从更改年号、通使外邦、册命公主、封赏官员、战事捷报，到皇帝、朝廷的活动、皇帝的敕旨等。其中有些是动态性的，有些录自敕旨等官文书。所涉及的事件大多与高骈没有直接的关系，按正式的奏报系统，高骈是不可能直接得知的。

此外，还有一些唐代著作对唐朝的萌芽状态的报纸有所记载。如唐武宗对担任过宰相的李德裕的文集《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中载：“臣伏见报状，见幽州雄武军使张仲武已将兵马赴幽州雄武军。”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樊川集·与人论谏书》中也提到：“前数月见报，上披阅阁下谏疏，赐以币帛。”唐朝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在《刘梦得文集》中记载说：“又得进奏官裴遵状报，伏承圣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师报者。”

二、现存的唐代进奏院状

除了文字记载，现今还存留有两份唐代进奏院状报的原件。这两份进奏院状报原件都属于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敦煌文物。

1900年6月22日，主持莫高窟千佛洞香火的道士王圆篆，在偶然中发现了一个被封闭了近千年的秘密石窟，即现今的莫高窟第16号窟，在窟中发现了数万件经卷等文献。这些珍贵文献后来多半流失到国外，其中包括两份唐进奏院状报。这两份唐代的进奏院状报，现在分别收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

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那一份，大约抄发于唐僖宗乾符五年

(876年),是一份写有47行毛笔字的纸制品,是当时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派驻首都长安的进奏官(该进奏官姓南公)从长安发回沙州的。部分原文如下:

上都进奏院 状上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奉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犛牛尾一角,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到院。二十九日进奉讫。谨具专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及于灵州勒住人数,分析如后:一十三人到院安下,押衙阴信均、张怀普、张怀德,衙前兵马使曹先进、罗神政、刘再升、邓加兴、阴公遂、阴宁君、翟善住,十将康文胜,长行王养养、安再晟。一十六人灵州勒住,衙前兵马使杨再晟,十将段英贤、邓海君、索赞忠、康叔达,长行十一人。一、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信二角。王相公、卢相不受,……右谨具如前。其敕书牒并寄信匹段,并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领。四月十一日离院讫。到日伏乞准此申 上交纳,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

年 月 日

谨状。

这份进奏院状所传报的,是归义军节度使派出的向朝廷贺年的使团到达长安后的活动情况。

藏于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的那份进奏院状,是一张高28.5公分,宽97公分的横幅白色纸卷,写有进奏院状的一面共60行毛笔字,全文未完,是一份后半部分已佚的残卷。其头7行的文字是:

进奏院 状上

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左: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衙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十八日使进奏。十九日对。廿日参见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其日面见军容、长官、宰相之时,张文彻、高再盛、史文信、宋闰盈、李伯盈同行,……

据史家考证,这份进奏院状,是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前后,由归义军节度使常驻首都的进奏官张义则发回沙州的。当时,唐僖宗正在兴元(今汉中)返回长安途中。这份进奏院状发自凤翔。其内容是报告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往朝廷的第三批专使在凤翔活动的情况。主要是专使们如何数次面见宰相等朝廷大员,苦苦请求朝廷赐给张淮深旌节,以及朝廷大员对此事的推拒和使团内部的分歧与争吵。旌节是古时要臣出使或出行时表示身份的仪仗,唐时专以赐给各地节度使。张淮深实任节度使已经多年,但一直未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与赏赐旌节,故多年来数次遣使入朝活动。

这两份唐代进奏院状,是仅存的中国最早的报纸。

三、唐代官报的基本情况

综合唐人记述和现存实物,以及其他相关史料,唐代进奏院状报的基本情况是:

1. 这种状报盛行于唐朝后期。现存实物上的名称是“进奏院状”,在唐代的文字记述中,有时也被称为“条报”、“杂报”、“状报”、“报状”、“报”、“留邸状报”、“上都留后状”、“邸吏状”、“朝报”(后唐时出现)等。进奏院状是用纸手写的。“状”在唐代是指一种上行官文书,敦煌“进奏院状”带有明显的上行官文书色彩,其开端和结尾的格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再者,由于其发报的形式是由驻首都的进奏官直接发给行政长官,属于单向、双边对口传播,所以带有明显的情报信的性质。但是,从《桂苑笔耕集》的记述来看,其传报的大多是与该地行政长官没有直接关系的朝政信息,这样的进奏院状已不同于一般的官文书和情报信,而带有传报新闻的报纸的性质。孙樵所说的“开元杂报”,更非上行官文书,是在京城发布的朝政信息,与进奏院状有所不同,是一种性质更接近报纸的事物。

2. 进奏院状传报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朝政信息。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皇帝、朝廷的动态信息。二是皇帝的敕旨,如前述唐人著作中所记的奉旨更改年号、册命公主等。三是臣僚的奏章所报告的军政事件,如定难军节度使和保大军节度使所奏报的杀死黄巢起义军二万余人的消息等。四是与本地行政首长直接有关的事宜,如现存的两件进奏院状,所报告的便是使者在京城为首长活动的详细情况。这些内容,有不少是进奏官们自己采集的,有的是他们从朝廷有关部门“谍布于外”的信息中筛选出来的。

3. 进奏院状是由进奏院的进奏官负责传递的。进奏院原称邸。唐初,不少京外道、州在京城设邸,主要供各地长官进京“朝宿”之用。唐代中期以后,随着藩镇的出现,各藩镇也纷纷在京设邸。由于藩镇势力的增长,这些邸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待朝宿”的居停之所,而成了各节度使在京的办事机关,称呼上改为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邸务留后院。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后,又改称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或留邸、邸。进奏院的负责人原称上都邸务留后使,后改称上都知进奏院官,简称进奏官。进奏院与进奏官均系地方在京自行设立和委派,因此只对所派遣的地方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唐朝后期,随着节度使的跋扈,各藩镇的进奏官往往由节度使的亲信大将担任,成为节度使的驻京代表。他们“历闾阖,登太清”,“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十分骄横。除了代表节度使与朝廷联系、交涉各种事宜外,也随时搜集情报,向节度使报告朝廷的各种政事和动态。他们传报进奏院状,虽然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还只是一种地方政府行为。

唐代的进奏院状,是一种正在从官文书中游离出来的萌芽状态的官报,尽管还带有浓厚的官文书和情报信的色彩,但却是后来的邸报的开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除进奏院状之外,唐代起着新闻传播作用的还有某些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谍布于外”的杂报、条报、册命、制书、敕、牒、谱、状

等官文书。如“开元杂报”、政事堂牒和观察使牒等。类似于春秋时的“悬书”等传播形式也继续存在。据《唐会要》记载,唐朝时,对需要传播的政府文告,各州县长官则“选其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或“以版榜写录”,“悬示百姓”。不加缄封地传发檄文之事也有发生,著名的骆宾王《讨武曌檄》就曾广泛传播。

第三节 宋代的官报和民报

公元960年,宋朝大体结束了唐末至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宋朝统治者接受地方割据的教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皇帝。为分散官员的权力,在政府机构的设置上叠床架屋,致使官僚队伍空前庞大。同时,宋朝还实行了广泛的科举制度,官僚中文人大增,并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士大夫阶层。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于唐代的进奏院状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从面向个别地方军政大员发展到面向广大官员,从不定期发行变为定期发行,封建官报的特征愈加明显。同时,又衍生出受官方查禁的民间小报。

在宋朝的报纸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官报。

一、邸报、进奏院状报等官报

邸报是宋代公私文献中对宋代官报的最常用的称谓。在现存的宋人诗文和书信中,有很多关于邸报的记载,如《长水日抄》卷一所收的范仲淹致韩琦的信:“顷接邸报,某有恩命改职增秩,诚为光宠。”此信写于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上距北宋开国仅82年。再如《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中收有司马光的一封信:“光顿首再拜,比见邸报,闻

先大资少保违去盛世，惊怛惋痛，恋怀如割。”不少名人甚至还将邸报入诗，如《王荆文公诗》中收有王安石写的《读镇南邸报》诗。南宋时期，邸报一词在当时人的文集和书信中出现的次数更多，使用得更为频繁，已约定俗成地为朝野人士所接受，成为社会上对封建官报的一种习惯性的称呼。因此，《宋会要辑稿》对邸报作了明确的解释：“恭维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

宋代官报的另一个较为常用的称谓是进奏院状报。如宋祁《景文集》：“臣某言：今月八日得进奏院状报，圣体康复，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亲见群臣者。”“臣某言：得进奏院状报，十月七日，温成皇后大葬礼毕者。”

宋代官报的又一个较常用的称谓是“朝报”。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一日，二人阅朝报，见苏子由自中书舍人除户部侍郎。”赵升《朝野类要》：“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由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

此外，宋代官报的称谓还有邸状、邸吏状、邸吏状报、报状、进奏院报状、进奏院递报、进奏院报、进奏官报等多种。

宋代官报的称谓尽管杂乱，但大都离不开“进奏院”、“进奏官”及其俗称“邸”、“邸吏”等字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朝的官报仍然和唐代一样，是由进奏院的进奏官传发的。从宋初到宋末，进奏院、进奏官在归属、权限等方面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宋朝建国之初，依唐、五代旧制，各州仍在京自行设置和管辖进奏院，数目多时达 200 家左右。这时的邸报，由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编发。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之一，朝廷开始对进奏院及进奏官进行整顿和统一管理，取消各地自行设立的进奏院，成立全国统一由中央政府管辖的都进奏院（全称“钤辖

诸道都进奏院”。都进奏院在门下省的给事中领导下，负责收受和传递官文书和在政府机构内部传播信息，即《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书中所说：“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局司符牒，颁于诸路。凡章奏至，则具事目上门下省，若案牒及申禀文书，则分纳诸官司。”“总天下之邮递。……凡朝廷政事施設、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眷报。”

在都进奏院的管辖下，各地进奏官由中央任命，地位降低，人数逐渐减少，从宋初的 200 余人递减至南宋的 60 余人。各进奏官虽然仍旧负责向各地的官员传发邸报，但传发的内容都是公开发布的官文书，并且事先要经过枢密院或门下省的审定，或由这些部门提供。各进奏官只能在枢密院门下省指定或审定的文稿中进行选择抄录，“报行天下”。

根据宋代公私文献的有关记载，宋朝邸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的诏旨，如《东坡奏议》卷七所载苏轼元祐五年六月初九的一份奏状：“臣近者伏睹邸报，以诸路旱灾，内出手诏两道。”

第二，皇帝的起居。如宋祁《景文集》所述邸报对宋仁宗健康情况的报道。

第三，官吏的任免。如《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

第四，臣僚的奏章。如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是月地震，手诏求言，胜非欲以三事应诏而未敢遽上。有自行朝至湖者，为胜非言大臣无所论，胜非始不信，后数日邸报论地震一疏云，应天以实不以文。”

第五，战报。如陆佃《陶山集》卷八所记神宗时期和西夏作战的情况：“伏睹进奏院状报，泾原路城西安州毕功者。灵旗所指，一方尽平。”这种战报，大多来自驻军将领的报告。

第六,处罚。如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阅邸报,吴侔兄弟以左道伏诛。”

此外,还有新制定的法令条例,三省枢密、六曹、寺、监、司的宣札符牒等。

宋朝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邸报的发行,部分地满足了统治阶级间通信息的需要,有利于庞大帝国统治机器的运转。宋朝最高统治者发行邸报的目的,是使“朝廷命令之出,天下通知”和“勉励天下之为吏者”,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对邸报内容的控制。邸报上所反映的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上情,体现的是封建王朝当权者的意志,凡涉及机密或有损朝廷形象的,都禁止传发和泄漏。其中严格禁止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朝廷机事。宋代各朝严禁“妄行传报”朝廷机事。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〇载:“仁宗皇祐四年九月十七日诏,访闻诸州进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誉报煽惑人心,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如获,进奏官不候年满,优与授官出职,余递迁职掌。”同书刑法二之四一载:“哲宗元符元年五月十七日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并许人告,赏钱三百贯,事理重者,奏裁。从之。”

2. 不利于当朝的军情。对涉及军事失败、兵变、农民起义、少数民族武装反抗官军等军事消息,朝廷往往命令进奏院“毋得辄报”。

3. 灾异。对水、旱、蝗灾,日食、地震和异常天象等,一般均不报或迟报。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九载:“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将灾异之事悉报于天下,奸人黠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欲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其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

4. 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奏章。规定臣僚奏章只有经皇帝批阅画

押后,方准报行。

为了加强对邸报传报活动的管理,继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建立都进奏院和对进奏官欲发报的文稿由枢密院审定之后,对邸报文稿的审定愈来愈严。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开始实行“定本”制度,即规定:“进奏院所供报状每五日一写,上枢密院定本供报。”(《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五)“定本”制度曾因“颇属繁文”,使邸报“止传常程文书”,丧失时效性,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被两度取消,但不久又恢复。

由于宋代印刷技术发展较快,朝廷拨给进奏院的经费中有一项“镂版纸墨之费”,所以很可能有一部分邸报或邸报中的一部分材料,是雕版印刷的。

邸报的读者,主要是中级以上官员。其传递途径,主要是通过驿递,如步递、水递、马递等。邸报发出后,允许传抄和复制给有一定级别的官员阅读,并允许让这些官员的座上客(下级官吏和士大夫阶层)阅读。进奏院每日公开发布的“朝报”,类似明清时代的“宫门钞”(邸报的主要内容之一),则允许民间复制,由“供朝报”的店铺或卖朝报者在社会上公开发售。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朝的邸报比唐代的进奏院状有了很大发展,有了更多的大众传媒特征和官报的色彩。

首先,唐代的进奏院状是进奏官只向地方首长报告新闻或情报的新闻信。而宋代邸报是一种在朝廷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一式多份地向地方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官报,其读者已逐渐扩大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和士大夫。

其次,宋代的邸报是定期连续发行的。据有关文献记载,其发行的周期各个时期虽不相同,但在某一段时间里,又基本是固定的,或“每日”(朝报),或“每五日”、“逐旬”、“每月”(发往外地州军的邸报)。

总之,宋代的邸报等官报,信息量较大,时效性较强,定期连续发

行,且不具备官文书的法律效应,已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纯粹的新闻传播工具。

二、单状、内探录、小报、新闻等出版物

由进奏官非法编制的朝报,在宋真宗时代已经出现。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记载,是《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五与刑法二之一七中的两段文字:“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诏:不得非时供报朝廷事宜。令进奏官五人为保,犯者科违制之罪。”“仁宗天圣九年闰十月十五日诏:如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三司开封府在京诸司亦有探报,妄传除改,至惑中外。”到了北宋末年,出现非法朝报在市场上公然出售的情况,《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四中有如下记载:“徽宗大观四年十月六日诏:‘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并进奏官密切觉察。’”

南渡以后,关于非法朝报的记载更多,这种以朝报形式出现的非法出版物,由民间私人所办,传播范围相当广,且有约定俗成的称谓——“小报”。下面是两则大臣章奏中关于“小报”的记载:

周麟之《海陵集》卷三《论禁小报》中说:“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行之时,不无小人诤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竟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但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三记载:“光宗绍熙四年十月四日臣僚言:……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至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播远近,

疑悟群听。且常程小事，传之不实，犹未害也；倘事干国体，或涉边防，妄有流传，为害非细。乞申明有司，严行约束，应妄传小报许人告首，根究得实，断罪追赏，务在必行。又言：朝报逐日自有门下后省定本，经由宰执始可执行。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者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阁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赏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

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宋代小报实物，但宋人的记载已经比较清楚地描述出这种报纸的大致情况。

南宋时，小报风行，提供内部消息的人不仅有进奏官，还有政府部门的中下级官员，由印刷作坊和书肆主人复制出版。他们发行的小报在社会上又被称为“新闻”。为了获得内部消息，他们高价雇人访录朝廷政事信息，于是产生了在皇宫大内、三省六部等中央机关和寺监司等衙门为小报刺探消息和偷录公文的“内探”、“省探”、“衙探”等“诸路割探人”。这些探报人多是下级官员或“阁门院子”之类的胥吏，也包括一些出入官禁和官府的“师尼之辈”和“国宗之臣”。

“单状”、“内探录”、“小报”、“新闻”等是不定期发行的，其内容主要是“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之类的任免消息，以及皇帝的谕旨诏令和“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之类的时事政治材料。这些内容从类别上和朝报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属于朝廷政事。但是，由于无须经过主管部门的审定，而且又往往是“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或“每遇批旨差除，朝殿未退已传播”，因此，信息性、时效性较强。

由于小报所发表的大多是政府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或是“朝报未报之事”和“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其来源或是“省院之漏泄”，或是“街市之剽闻”，因此，难以完全准确，存在着“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真伪亦不复辨”的情况。此外，有些小报还曾“伪撰诏命”，有意识地制造一些假新闻。

小报有些是手写的，也有不少是印刷的。无论手写还是印刷的，都没有固定的报头和报名。这些报纸的发行目的，多是为了赚钱，“坐获不赏之利”，因此从北宋末年起，社会上已有一些人“专以探报此事为生”。但在宋王朝内部的党争和派系斗争较为激烈的时候，这种报纸也常为在野的一派所利用，借以披露对当权派不利的材料和消息，成为党同伐异的宣传工具。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抗金斗争中，主战派官员和社会上的爱国士大夫，也曾利用小报公布抗金活动的消息和主张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惩治奸臣的奏疏。

这种民办报纸，突破了官报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垄断和封锁，满足了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朝廷政事信息的需求，颇受读者的欢迎。读者中既有省寺监寺之类的朝士，也有各州郡的地方官，和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甚至还有皇室成员。

小报随意披露朝廷政事，触犯了封建专制王朝的言禁，不为当朝所容，一再申令禁止。北宋时期，各朝统治者就以“非时传报朝廷事宜”、“妄传除改”、“肆侮时政、摇动众情、传感天下”等罪名，申令“严行根捉”，并悬立赏格，鼓励人们检举揭发。宋真宗时还“令进奏官五人为保”，以违者连坐的办法使进奏官们互相监督。南宋时期，当朝对小报的查禁更加严厉，陆续颁布了不少严禁小报的规定，对揭发有功人给予“三百贯”的重赏。对小报发行人惩治越来越重，从“编管五百里”，提高到“流二千五百里”，而且增加了“杖八十”、“杖一百”等刑罚。但是，禁者自禁，出者自出，终宋之世，小报不仅未被禁绝，反而越出越多。

宋代除了邸报、小报等外,从京城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还常以张“榜”的形式向民众公布某些法令、诏旨、章奏、朝廷政务及战讯。这些榜大部分是手写的,也有一部分是雕板印刷的。在京城榜往往张贴在皇城的东西垛楼和宣德门外;在地方则张贴在州县城廓、乡村要会处,即过往行人较多的城门口或市政繁华地区。这些榜文中,有的信息量较大,新闻性和时效性较强,如北宋末年,金兵屡次兵临开封城下时,当局就一再出榜,向民众通报“金人游骑已及郊畿”等信息。

第四节 明代的邸报

1279年,元灭宋,统一了全国。元朝的国家机构和官制比较紊乱,官文书由政府机关直接收发,没有出现类似宋朝邸报那样的官报,但曾出现过类似宋朝小报的民间私办的“小本”。小本是雕版印刷并发卖的,内容主要是诏旨、章奏及官吏任免等消息。此外,元朝还存在印卖新科进士名录的活动和传播经济信息的商业广告印刷品。

元朝国祚不长。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王朝。明朝恢复了宋代的诏令章奏传报制度,不仅重新发行官报,而且还产生了民间抄报行业,使中国古代报纸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官办邸报

明朝虽然恢复了官报,但没有承袭宋朝的进奏院制度。明朝的官报是由提塘官负责传发的。提塘官简称提塘,由各省派驻京师,实际职责是负责朝廷与各省间的公文的下达上呈并负责抄传邸报,因此,各省报房又称提塘报房,有时冠以地名称“湖南报房”等。

明朝朝廷负责向外公布诏旨和臣僚章奏等文书的是隶属于通政

司的六科。各省提塘从六科等处抄出谕旨、章奏和某些朝廷政事信息后,经过编选、复制,通过塘兵和驿站传送给各省主要官员,然后再通过层层传抄,传发给省城一般官员和直至府县一级,邸报发行范围比宋代更宽。

明朝的官报虽然不再由俗称邸吏的进奏官传发,但在社会上依然按习惯被通称为邸报。此外,也被称为邸抄、钞报、科抄、阁钞、朝报、除目、京报等。

明朝的邸报往往是日刊,字数有所增加,每期一般三五千字,个别达六七千字。因此,邸报已完全脱离了单张的书信和官文书形式,成为书册形式,每期一小本。通过各地传抄,每期全国总发行数估计约为五千至一万本左右。

官办邸报的内容,大体上和宋朝邸报相似,但更加丰富,主要有:

1. 皇帝的谕旨。既有皇帝为某人或某事直接颁布的谕旨,也有批示在大臣奏章上,随奏章一起发布的硃批旨意。

2. 皇帝的起居以及有关皇家的各类信息。如明末邸报上对梃击事件和红丸事件的报道。

3. 官吏的任免。如《明人尺牍选》卷一载《王鏊与陆冢宰书》:“得邸报,知已正位冢宰,甚盛,甚盛。”这种官吏任免消息往往是邸报上最受重视的内容,因此邸报也被人称为除目。

4. 臣僚的奏疏。如《瞿式耜集》所载的一则奏疏中称:“臣读邸报,见户部侍郎吴贞疏。”这种臣僚的奏疏,在邸报上往往占很大篇幅。

5. 军情。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代王传炯的奏疏称:“日接邸钞,省会失守,传闻贼拔已过雁门、直抵云中地界。”

值得注意的是,官办的邸报还出现了报道奇闻异事的社会新闻。如陆燾《庚巳编》载:“弘治末,随州应山县女子生髭,长三寸余,见于邸报。”又,胡侍《真珠船》载:“嘉靖戊申七月,邸报云:大同右卫参将

马继宗家舍人禄之女,年十七,嫁,化为男子。”冯梦龙的《古今新谭》中还记载了一则中央银库被盗的消息:“太仓库于万历戊戌中有偷儿从水窠中入,窠隘,攒以首,无完肤矣。亦得一大宝,置顶际,如前出。至窠之半,不意复有偷儿入,俱不能退,两顶抵,槁死,而宝在其中。久之,拥水不流,治涑始见。见邸报。”这些社会新闻,可能都来源于臣僚的奏章。

官办的邸报,大部分仍是手抄品,少数为印刷品。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开始,部分官办邸报已采用活字印刷。

对官报的发报内容,明朝虽未实行宋朝时的审查与定本制度,但明朝废除了宰相,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切臣僚章奏,必须经皇帝批阅认可,才由六科等部门抄发,供邸报抄传。凡留中不发的章奏,严禁邸报抄传。崇祯年间,因连年军事失利,几乎一切涉及军事的章奏、边报均不许在邸报发表。

二、民办抄报行

由于提塘报房发布的邸报数量有限,只面向各省巡抚、提督等军政大员,而大批州县一级官员也需要获知朝政,因此,明朝中叶以后,在北京等地出现了一批为各府、州、县抄写邸报的贫苦知识分子,称为“抄报人”或“京报人”,雇佣和组织这些人抄报的民间组织称为“京报房”或“抄报行”。据《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记载,万历年间,在京师所属的大兴、宛平两县,有132种民间行业,其中就有“抄报行”。而且,这种“抄报行”与“豆粉行、杂菜行、豆腐房”等30余种行业一样,因为本小利微,还得到了皇帝减免税银的恩准。

对于这种民办报房的起始,目前尚未发现明确记载。可能是因为京城和各地邸报需要量很大,从提塘报房中分离出来,自立门户,为中下级官员抄报。邸报抄好后,除本地由报房直接送达外,外地则由

各省塘兵递送。邸报的抄送费用是京官和外地州府一笔不小的开支。民间未入仕的士绅，可以托人从县衙中抄出邸报来阅读，至于一般庶民是否可公开订阅邸报，尚无确切的记载。

民办报房除了抄录邸报，还利用得信息之先的有利条件，兼营报录、印刻，发卖缙绅录、鼎甲单和报贴。所谓报录，是指派人将中举、升官等类信息写成报贴，直接送至当事人家中，报喜讨赏，这在明人的笔记、小说中，有许多生动的记述。

在京城以外的一些省城和较大的府县所在地，如江陵、苏州、杭州、绍兴等地，明代中叶以后，也出现了民间抄报人和报房。这些地方中下层官员较多，邸报由北京抄送费用过高，只好将寄到的邸报就地复制。

民办报房的产生，大大地扩展了邸报的发行面，无疑是中国古代官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三、现存明代邸抄的抄件和实物

清朝初期，明代邸报还很多，今天已成了稀有的文物。现存与明代邸报有关的实物资料只有三种：一种称为《万历邸抄》，另一种名为《崇祯年章奏残册》，还有一种为《急选报》。

《万历邸抄》原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所藏，系手抄本，共32册。后由古亭书屋影印，分上中下三册出版。这本书虽然名为《万历邸抄》，但并非录自邸抄的原件，而是后人根据万历年间邸报材料编的史书，它的格式类似《崇祯长编》。为了说明问题，把《万历邸抄》第一页全文录下：

万历元年癸酉卷

春正月庚子，乾清宫门，伪阁章龙伏诛。

是日早，乘輿出乾清官。有男子伪著内使巾服，由西阶下趋向前，为守者所执。索其衣，得刀剑各一，且缚腋下。诘之，供道其姓名为王大臣，系武清人，余无言。司礼监太监冯俊奏状，奉旨下东厂究问，的名章龙。[野史]此即冯琦所不道，而欲诛之以灭其迹者。时章龙狱兴，诬连高拱，居正密为书，令拱勿惊死。已又为私书安之云。

户科左给事中冯时雨，陈言六事，报闻。

一、笃考恩，二、广延纳，三、重题[奏]，四、黄传奉，五、释幽怨，六、宥罪言。奉旨：本朝事体与前代不同。今在官妇女，不过千数，侍奉两宫，执事六局，尚不够多；又多衰老，出无所归。狂悖诬上，念系言官，姑从轻处，如何与他伤词求用，这两件不准许。三月，迁时雨参议去。

在一些记事后面，注有“野史”、“附录”、“外史云”等的补充和述评，显系编撰者引用邸报以外材料增补进去的。即使没有加以任何注释的记事，也不全是邸报原文，冯时雨所陈言的六事，在邸报中决不会只是六个标题，“三月，迁时雨参议去”，显然是编撰者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补充进去的。可见《万历邸钞》中只留下当年邸钞的部分史实，而无法看到当年邸钞的模样。

《崇祯年章奏残册》现存12册，为内阁大库所藏的档案。每天一册，不下万言，册前首页有月日和简目，重要章奏全钞，例行章奏摘钞事由及奉旨情况，此外尚有“朝仪”、“任免”等要闻简报。这也不是真正的邸报，而是六科每日抄录的存档科钞。据《明会要》载：“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章，逐一抄写成册，五日一送内阁，以备编纂。”这类书册，送存内阁大库收藏，原是为了编写崇祯朝实录用的。后来崇祯国破身亡，皇史宬也被烈焰吞灭，这些残册便成了劫后余烬。它虽然不是邸报，但邸报的内容便是据此而来。现摘录其中首页，亦可想见当年邸报的大致内容：

六月十九日

目录

学士张	臣病不假
兵部	急缺守备
尚书仇	恭谢天恩
吏部	飞报大捷
尚书张	遵旨平心
户部	陵运最重
巡抚宋	酌议调用

奉

圣旨兵部知道

朝仪

原任遵化县知县藩世奇候考到

见朝

直隶保定等府同知等官李在公等俱赴任

辞朝

吏部上本

升刑部山东司郎中设之煜

授大名府通判陆世濂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明代邸报除了大臣奏疏、各部院题本和明发谕旨外,还有相当于朝报的“朝仪”一项。从内容来看,并没有超出宋代邸报所传报的信息范围。

《急选报》是尹韵公博士近年在北京图书馆发现的明代报录实物,原件系黄纸为封书的小册子,高 24.6 公分,宽 14.4 公分,出版于万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正文共六页。内容为被吏部“急选”的 162 名官员的姓名、籍贯和被任命的官职。用雕板印刷,类似宋代的“除日报状”。

另外,叙述明熹宗天启六年北京“天变”的《天变邸抄》也被某些学者认为是明代邸报的一份证物。

第五节 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报纸

清王朝 1644 年入关后,迅即取代明王朝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清代的政府机构和官僚士大夫队伍比明代更为庞大,为了传知政事,不仅清代初年就存在着官报和小报,而且从乾隆中叶开始又出现了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不仅京城有报道朝政、向全国范围发行的官报,而且不少省会还有报道地方政事的省报;到清代中期,民间报房已有多家,印刷出版各种不同版本的京报,接受私人订阅,并送报上门。

一、提塘官报和小报

从清初顺治年间起,清王朝就仿照明代的制度和办法,继续发行官报。

清代的官报,也是由提塘向各地传发的。清代的提塘分京塘和省塘,京塘是驻京的提塘,省塘是驻各省省会的提塘。在官报的发行中,京塘处于龙头地位,起着关键的作用。按照清制,京塘一般每省 1 名,人员由各省督抚从本省武进士或候选守备中选送,但归朝廷兵部管辖。他们一共 16 人,计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浙江、江南、四川、广东、广西各 1 名,陕甘新疆 1 名,云贵 1 名,漕河 1 名。京塘的任务,一是负责朝廷与各省之间的公文的下传与上呈,二是向各省传发官报。由于朝廷下发的公文并非天天都有,而官报的传发却逐日不断,再加上发行官报有额外收入,京塘往往把发行

报纸放在日常工作的首位,投入很大的力量。同时,发行报纸要经过誊录、抄写或刊印、付驿等多道程序,工作量很大,京塘从清初起,就自行设立了雇人抄发刊印报纸的报房。这种报房被称为提塘报房,在乾隆年间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具有了官方的性质。

提塘报房发行的官报,只面向各级官员,通常被读者称为邸报,有时也被称为邸抄、阁抄、科抄、京抄、朝报、京报等。其中,京报这一称呼在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流行。

提塘报房发行的官报,内容主要为三部分:一是皇帝的起居和朝廷的活动等动态消息,如皇帝召见、祭祀、赏赐等,又称宫门钞;二是皇帝的明发谕旨;三是可以公开发布的臣僚章奏。限于篇幅,臣僚章奏中只有少数是全文,其余大多是目录。

和明代一样,提塘官报的上述内容,主要来自六科,是从六科公开发抄的明发谕旨和常程章奏中选录的。清代的皇权更加集中,谕旨和臣僚章奏,哪些应发抄,哪些不能发抄,往往由皇帝最后决定。被允许发抄的臣僚章奏,通常只是全部奏章的三分之一左右。

清代六科的发抄,是每日进行的,因此,官报的发行一般也是逐日的,有的民办报房规模较小,两日或多日发行一次。

提塘官报起初手抄与印刷混用,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雍正、乾隆以后已经大部分采用印刷。

由于官报的内容只是六科公开发抄的明发谕旨和常程章奏,因此,从清初顺治年间起,提塘报房就超出正常制度,将一些未经六科发抄的章奏私下抄传,这种私抄件被称为小报或小抄。小报起初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从康熙末年起,直到雍正、乾隆年间,因为多次发生传报不实消息和泄漏机密等情事,当局一再发布禁令,对小报加以限制。雍正年间,还曾出现将小报刊行者处以极刑的事件。在当局的严禁下,乾隆以后,提塘报房发行小报的活动基本上被禁绝。

二、民间报房发行的京报

清代传递官报的塘务机构弊端很多,官报传发速度缓慢,经常延宕,再加上只向各级官员发行,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很难看到,而他们也需要了解朝廷政事。在这种情况下,早在清代初年,北京城内就出现了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活动的人。他们多数是衙门中的低级胥吏,在本职工作之余,以“刷写报文”为副业,但也有少数是以抄报为生的专业人员。这种私人的抄报活动,是清代民间办报的先声,在清初顺治、雍正等朝和乾隆初年,庶民向抄报人订阅邸报曾一再遭到当局查禁。

乾隆中叶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始出现了合法的、专以刷印报纸为业的民间报房。这种报房的经办人和六科及提塘报房有密切的关系,最早是从提塘报房衍化而来的。

荣禄堂和公慎堂是有字号可考的最早的两家清代民间报房,两家报房都在北京。公慎堂诞生于乾隆中叶,该堂在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六年出的报纸,有一些存留至今。在公慎堂之后,到清朝末年,其他见于记载和有原报可查的北京民间报房,还有十余家,如聚兴、公兴、聚升、合成、集文、同顺、天华、聚恒、洪兴、永兴、同文、信义、连升等。其中聚兴报房的历史最长,从咸丰年间一直延续至1921年,长达50余年。这些报房大多设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铁老鹳胡同(今铁鸟胡同)一带。

民间报房一般雇佣数名至十数名抄刻工人,备有印刷设备,主要以抄录、刊刻、印卖京报为业。有的还兼营递信和印刷《谕折汇存》、《上谕奏折》、《邸报全览》、《邸抄汇编》等等业务。

清代民间报房发行的京报,有不少保存至今。这些京报基本上是印刷的,既有泥版印刷的,也有泥活字或木活字印刷的(光绪末年大

多又改为铅印)。京报通常是日刊,个别情况有两日刊或多日刊,最初并没有固定的报头,个别的曾在版心印有“题奏事件”字样,因此常被读者称为邸报或邸抄。同治年间以后,民间报房出版的京报形式比较固定,用纸捻装订,每册均加上了封面,封面一般为黄色连史纸,左上角往往用木戳盖印红色“京报”二字,右下角则是红色的报房字号的戳记。也有用白纸为封面的,但上面印有“一品当朝”或“指日高升”、“天官赐福”、“加官晋禄”等红色图案和“京报”二字与报房字号。因为有了固定的报头和报头,又大多用黄色封面,民间报房的报纸常被称为“黄皮京报”,民间报房则被称为“黄皮报房”。

黄皮京报内文一般用廉价的薄竹纸单面印刷,纸质很差。所用的墨汁质量也很差。内文全部为竖排,每行约 22 个字左右,每页 14 至 18 行,对折后装订。

黄皮京报的内容基本由宫门钞、谕旨、章奏三部分组成。宫门钞是朝廷政事活动的报道,如某某衙门轮值值班、某某官员被召见,某某衙门奏事,以及皇帝参加的祭典,皇帝的出巡、驻园、还宫等,文字很简略,基本是一句话新闻。谕旨则为新传出的明发上谕。章奏则主要是京中各衙门及各省督抚将军们的题奏,包括皇帝简短的批示,一般也均原文照登。黄皮报房自己不采写新闻,更不撰写任何评论。

黄皮京报以接受订阅的方式发行,总发行数最多时达万份左右。各报房雇有专人送报上门。这些送报人身穿蓝布长大褂,肩上搭着两头有兜的蓝布搭包,搭包上钉着白布,写有黑色的“京报”二字,走街串巷,每天定时将报纸送至各订户。他们各人有各人的区域,同一报馆的送报人,不许越界送报。

黄皮京报每月的报费不一,光绪年间一般每月报价为三百文,即每份十文。清末,这笔费用已成为大多数京官每月的固定开支。连一些目不识丁的财主,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也订阅黄皮京报。对此,社会上曾流行一首竹枝词加以嘲讽:“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

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请亲朋念我听。”

三、辕门钞等地方官报

除京城北京外，在督抚所在的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大的州府，也有省报发行。这些地方的报纸发行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官方身份的提塘，一种是民间的“卖新闻人”和“刊卖告示及捏写谕旨报单之人”。

清代各省省会和一些大的州府也有负责塘务的提塘。驻在省会的提塘又称省塘。省塘由兵部委派，受兵部和督抚双重管辖，主要任务是传送公文和官报。为了传送来自北京的官报，各省提塘大都自行设立报房。在传送官报的同时，省塘报房还翻印北京民间报房的黄皮京报，在地方官绅中公开发售。黄皮京报由于通过北京附近的良乡民办信局寄递传至各省的速度比官报快，又称“良乡报”，成为地方官绅尽快获知朝政的主要渠道和省塘报房翻印京报的范本。

清代各省会和一些大的州府，除提塘外，还有一些以抄写或印卖报纸为业的人。他们除了抄写、翻印北京的京报，还发行报道督抚衙门政务信息的辕门抄，辕门钞又称省报为单页小报。

辕门抄的信息主要是省内官员的差委任免、请假销假、禀到辞行、丁忧起复之类。辕门抄为印刷品，每二、三天或四、五天才出一期，每期为一单张。例如现藏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张光绪十年的江苏苏州的辕门抄载有：“初七日，同知施晋大老爷谢委署常总捕通判事。又王俨大老爷销假，即辞赴江浦县勘估驿站工程差。……候选司同知沈以熊大老爷由嘉定等处来。……补用都司沈春山大老爷辞回沪。”由此可见：(1)辕门抄都是简讯；(2)信息来自督抚衙门的牌示和采访所得；(3)以编印人口吻撰稿；(4)编印人均为听差、杂役一类角色，由称九品小官为大老爷即可想见。有的辕门钞还署有编印人的

姓名,如上引的辕门抄即署有“陆懋德呈”字样。

单页画报出现于清代中叶以后,其内容主要是社会新闻、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和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一事一报,单页印刷,没有报名,没有固定刊期,每份售价一至二文。主要是根据新闻绘成的图像,并配有文字说明。这类小报主要流行地区为北京,其他地区出现重大新闻事件,也会有人编印出版,但往往只有文字没有图画。因所报消息及时、重大,售价甚廉,很受社会欢迎,虽然还不完全具备近代报纸的条件,但已经突破了邸报、京报、辕门抄等官报只报道官场信息的模式,成为中国人自己办近代报纸的先声。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

第一节 国门开启与近代报刊的出现

一、鸦片战争前在东南亚出版的中文刊物和在华南沿海出版的中外文报刊

近代报刊，即用机器印刷、广泛刊载各类新闻和时事评论、面向大众发行的报刊，是比古代报纸先进得多的新型报刊。近代报刊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十六世纪在欧洲最先产生的。

从 1815 年到 1839 年，西方人在东南亚和中国的澳门、广州，先后创办出版了六种中文报刊，在澳门、广州出版了十余种葡萄牙文、英文报刊，将近代报刊传入中国。

（一）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出版的中文刊物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文月刊，1815 年 8 月 5 日创刊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刊物。该刊以传教为宗旨，所载多为《圣经之大意》、《神理》等布道文字。此外，也刊载一些《论仁》、《忠人难得》等宣扬伦理道德和《论日食》、《论行星》等介绍天文

学知识的文章。后期增辟专栏,介绍世界各国概况,开始涉及时政。文章体裁上既有论说、短论、杂句、书信、编者按、插图,又有故事、寓言和七言诗。该刊没有新闻专栏,但个别短文具有新闻性,如第二期题为《月食》的短文,预告了一次即将发生的月食,是中文近代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该刊系雕版印刷,装订类似传统的线装书。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者是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主编者是米怜。该刊初印 500 册,后增至 2000 册,在东南亚华人中免费散发,少量由商船捎带进中国。1821 年,该刊因米怜病重停刊。

《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中文月刊,1823 年创刊于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由曾经协助米怜编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主编。该刊从内容到形式均仿《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稍增加了些地理、历史知识。出至 1826 年停刊。

《天下新闻》,中文月刊,1828 年在马六甲创刊,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吉德主编。内容除传教外,增加了较多的时事政治,包括多则欧洲新闻和中国新闻,并采用散张白报纸铅活字印刷,比前两个刊物更近代化。1829 年停刊。

(二) 鸦片战争前在澳门出版的近代报刊

早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就窃踞澳门。十九世纪初,随着澳门葡人的活跃和英、美等国人士的抵澳,澳门先后出现了一批葡萄牙文、英文和中文报刊。

《蜜蜂华报》,葡文周刊,1822 年 9 月 12 日创刊,是在中国领土上出版的第一种外文报刊。创办者是以巴波沙为首的澳门土生葡人立宪派。该报除新闻外,大量刊载政治性材料,鼓吹立宪派的主张,猛烈抨击以澳门天主教为首的保守派。1823 年底,澳门保守派发动政变,查禁了该报。

《蜜蜂华报》终刊后,澳门葡人又陆续出版了八种葡文报刊,主要

有《澳门公报》，1824年创刊；《澳门钞报》，1834年创刊；《帝国澳门人》，1836年创刊；《澳门政府公报》，1838年创刊。

这些葡文报刊大都是时政性周报。由于澳门葡人当政者奉行专制政策，加之党派斗争激烈和办报者经济拮据，这些报刊多数寿命甚短。这些报刊主要服务于葡人内部政治、经济活动，不大反映中国事务，对外界影响不大，但在近代报刊出版方面，具有带动作用。

除了葡文报刊，鸦片战争前，英美人士在澳门也办了两种中英文报刊。其一是1833年出版的英文周报《澳门杂文篇》，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创办，主要是基督教、政治和商业等内容。每期刊有一篇中文稿。出至第4期，即遭澳门天主教势力反对而停刊，其二是1828年前后创刊的一份中英文对照刊物《依泾杂说》。因有助于学习中、英文，受到欢迎。出版未久，因讥刺官府陋规被查封。

（三）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出版的近代报刊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中国对西方的唯一贸易口岸，设有专供西方商人居留的商馆。在华英美鸦片商、传教士在广州商馆区先后出版了五种英文报刊和两种中文报刊。五种英文报刊是：

《广州纪录报》，1827年创刊，初为双周刊，由英国大鸦片商马地臣主办。1833年出《广州物价报》增刊。

《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英文周报，1831年创刊，美国商人伍德创办。

《广州周报》及其附刊《商业行情报》，英文周报，1835年创刊，由英国大鸦片商颠地支持创办，代表英商自由贸易派利益。1939年出《商业行情报》增刊。

《广州杂志》，英文月刊，1831年创刊，由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印刷发行，一说由东印度公司主办。作者大多为英国的学者和作家，装帧精美，出版5期停刊。

《中国丛报》，英文月刊，1832年创刊，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

裨治文创办,美商奥立芬和 1830 年成立的广州基督教联合会提供经费支持。一度迁澳门、香港,1851 年 12 月停刊。

上述英文报刊中的周报,以很大篇幅刊载商业新闻与行情。而另外两种月刊则是综合性杂志。但无论商业报纸还是综合杂志,都很注意刊载中国新闻与材料,尤其是篇幅较多的《中国丛报》更突出。该刊虽由传教士创办并主编,但所载传教文字甚少,而是大量刊载有关中国的各种资料,从历史、地理、物产、政治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直至军事实力、海防现状,广泛详细,并大量译载中国官方有关禁烟的函牍文电。

这些英文报刊,尽管代表不同国家、不同商业派别,相互间出于各自的商业利益,不时发生争吵,但在对待中国的态度方面,却相当一致,都大肆嘲笑中国的落后、官吏的昏聩,侮辱中国人野蛮愚昧,攻击中国的禁烟政策,讨论对华方策,批评西方政府对中国的软弱,主张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甚至公开鼓吹武力侵华。

这些英文报刊,除在广州、澳门发行外,还发往东南亚、印度和欧美,但发行量每期只有数百份。1839 年 3 月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后,仍在出版的三家报刊迁往澳门。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出版的两种中文月刊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于 1833 年 8 月,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创办者是普鲁士籍伦敦会传教士郭士立。该刊的形式和内容结构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许多相似之处,雕版印刷,中国线装书式,内容也由传教、伦理、科学知识三部分组成。但该刊的宣传方针有重要变化,置于首要地位的已不是阐释基督教义,而是回答推行侵华政策中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因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传教文字比《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所减少,而增加了许多科技知识内容。科技知识着重介绍的是火车等西方的实用科学技术,

以及欧美等国的天文史地。伦理道德部分则大谈“四海之内皆兄弟”、互通有无等。该刊还增设了“新闻”和“论”专栏,每期均刊载中外新闻,“论”的针对性很强,如鼓吹中国应学习他国所长,并极力粉饰西方人来华意图。该刊第五期曾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近代报刊的产生、功用和出版自由观念,是中文报刊中的第一篇新闻学专论。因郭士立忙于为鸦片商当翻译和向导,刊物两度休刊。1835年2月,广州外国人联合组织的“对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为保证该刊的出版,接办了该刊。1837年2月,该刊随该会的出版机构迁至新加坡。1838年10月停刊。

《各国消息》创刊于1838年10月,传教士麦都思创办。该刊取消了传教内容,主要刊载以亚洲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的人文、史地、时事,也刊载少量中国消息。印刷上改用石印,是第一份石印的中文报刊。该刊还附出行情货价表。约出至次年5月,因局势紧张停刊。

鸦片战争前,近代报刊在澳门、广州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

二、鸦片战争后外人在香港出版的报刊

香港是个天然良港,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强占。英国殖民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这里移植了英国的制度。与之相适应的英文报业,在香港迅速发展起来。

(一) 英文报刊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香港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英文报刊,主要有:

《香港公报》,1841年5月1日在澳门创刊,旋即迁香港,半月刊,每期4页,创办者是英军翻译马儒逊,主要刊登英军的告示,也报

道一些港、澳新闻,是英国侵略军的喉舌,1842年3月27日与《中国之友》合并。

《中国之友》,1842年3月17日在澳门创刊,4版周报。由英商奥斯威尔德创办,杰姆士·怀特等人主编。第二期起迁至香港,与《香港公报》合并为《中国之友与香港公报》。两年后恢复本名,单独发行。支持香港政府。1850年台仁特取得产权并任主编。论调改变,同情太平天国运动,披露亚罗号船事件真相,对清政府时有批评,曾两度休刊。1860年迁广州,后又迁上海,1869年停刊。

《德臣报》(又译《中国邮报》),1845年2月20日创刊,英国商人肖德锐创办并任主笔。英人德臣1856年成为该报股东并任主编,1858年更获得报纸产权,报名由此而来。初为晚周报,1862年2月改为晚刊日报,出至1974年8月18日终刊,是外人在华出版的时间最长的报纸。曾有多种中、英文附刊。该报以刊载商品行情、船期、广告等商务信息为主,也重视新闻与评论。1871年3月起,出版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次年4月改名《香港华字日报》独立发行。

《孖刺报》,1857年10月1日创刊,是香港第一家英文日报,由英国商人孖刺和美国商人赖德创办,后归孖刺独有。该报注重刊载商情、船期等信息。早期以敢言著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是香港又一家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英文报纸。

《士蔑西报》(又译《香港电讯报》),1881年6月15日创刊,英国人士蔑主笔,1916年并入英文《南华早报》。

这些报纸都是私人创办的商业性报纸,但和港英当局关系密切。《香港公报》、《中国之友》、《德臣报》等还因早期承办过港英当局的公告,而带有明显的官报色彩。不过,在维护港英当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中国之友》、《德臣报》、《孖刺报》、《士蔑西报》等对港英当局的一些举措偶有批评,各报之间还不时展开争论。《孖刺报》的主笔孖刺、《中国之友》的主笔台仁特,曾因抨击港府高级官员,而分别于1858

年和 1859 年以诽谤罪被判入狱。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报纸的增多，各家英文报纸间竞争日趋激烈，大部分报纸的产权都发生过转移，有的曾数次易手。为求生存和发展，各报都很注重经营，发展广告业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香港的多数英文报纸已由周刊改为日刊，主编也由原来多为商人担任转为由专职新闻人员担任，报纸的业务水平有较大提高。

（二）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后，在英文报刊的带动下，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外国人还在香港陆续创办了几份中文报刊，主要有：

《遐迩贯珍》月刊，1853 年 8 月 1 日创刊，是香港第一种中文报刊。由马礼逊教育会主办，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奚礼尔、理雅各先后主编。除刊载少量传教文字外，主要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重视新闻报道，设有《近日杂报》专栏，其中大部分为港、澳及中国其它地区的新闻，涉及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时人行踪、市政建设等。广载太平天国的消息。曾刊载新闻图片，为中文报刊之首创。1855 年随报附刊《布告篇》，专载商情和船期，开中文报刊设立广告专版的先河。1856 年 3 月，该刊出至 33 号，因编撰人员事务纷繁而停刊。

《香港船头货价纸》，1857 年 11 月创刊，是英文《孖刺报》发行的中文附刊。每周 3 期，主要刊登船期、商情和广告，也刊有少量新闻。以香港各店铺为发行对象。1864 年末易名《香港中外新报》，成为独立的报纸，但仍附属于孖刺报馆，由广东人黄胜、伍廷芳等编辑。《香港中外新报》四开四版，以船期和广告为主要内容，也刊载新闻。另出附张《行情纸》。1873 年改为日报。其产权约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转归中国人所有。

《香港华字日报》，1872 年 4 月由《中外新闻七日报》改名而来，

周三刊,仍由《德臣报》印发,但编辑工作已由中国人独立负责,陈蔼亭主编。该报出版一年后改为日报,商情、船期、广告仍然占主要篇幅,但新闻已占一个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左右,该报产权转归中国人所有,一直出版到1941年停刊。

《近事编录》,1864年创刊。初刊期不详,后改日刊。英国商人罗郎也主办,中国人王韬编辑。除行情、广告外,刊载以社会新闻为主的中外新闻。1883年产权由华人购得。销路不好,不久即停刊。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香港创办的这些中文报刊,使香港的近代中文报业走在了中国各地的前列。这些报刊的办报模式,对尔后广州、上海等地的中文近代报业,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三、鸦片战争后外人在上海出版的报刊

上海是中国长江流域的经济门户,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开辟为通商口岸,且出现了外国人强行建立的“国中之国”租界。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上海租界开始出现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取代香港、广州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全国工商业中心,外人在租界出版的报刊也迅速增多,数量和影响很快超过了香港。

(一) 外文报刊

和香港一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外国人在上海办得最早、最多的,是外文报刊。其中主要是英文报刊,达三十余种,主要有:

《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创刊,是上海最早的近代英文报刊。英商奚安门创办并主编,后归字林洋行所有,是一份以货价、船期、广告等商务材料为主、也有新闻和言论的综合性周刊。1856年为及时报告船期,增出每日发行的附刊《每日航运新闻》。《每日航运新闻》随后又增加了货价等内容,更名《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

《字林西报》，1864年7月1日创刊，前身是《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字林洋行主办，詹美生、巴尔福、李德尔、哈维德等先后主编。《字林西报》是一份综合性日报，行情、船期、广告等商业材料仍占主要篇幅。但该报有很强的时政性。创刊不久，即被英国驻沪领事馆和商务公署指定为各项公告的发表机关，并得到租界工部局的经济资助及优先刊载工部局文告、付费广告的特权。因此，被视为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的喉舌，被上海的外国人称为“英国官报”。该报很重视新闻报道，设有中外新闻和本埠新闻等栏目，为及时获得国际新闻，1872年与路透社上海远东分社签定了在中国独享该社电讯的合约。为获取中国新闻，在中国各地城乡，包括边远地区，广泛聘请在当地的外国传教士等担任通讯员，大量收集中国各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情报。因此，该报以消息快捷、材料丰富著称，受到中外人士的注意。该报也重视言论，经常就中国政局、中外关系等问题发表评论。其言论虽标榜“公正的，但不是折中的”，实际总是站在英国在华势力的立场，维护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利益，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一向持反对态度。《字林西报》出至1951年停刊，是上海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外文报纸。

《上海晚差报》，1867年10月创刊，是上海第一份晚报，由英国人琼斯和罗扎利欧创办，嗣由琼斯单独经营，1871年停刊。

《上海差报》(俗称《晋源报》)，1868年10月1日创刊，由英商休·郎创办和主编，评论多出其手。受上海英国总商会控制，以广告、船期为主，也刊中外新闻，巴尔福、开乐凯等人所有。1871年增出《上海锦囊与每周差报》，1875年与英文《上海晚报》合并，更名《上海差报与中国报》，1890年并入英文《文汇报》。

《华洋通闻》，1874年4月创刊，周报，葡萄牙人陆芮罗创办，不久转归巴尔福，注重介绍有关中国的政治、贸易、语言、文学、风俗等。1890年为开乐凯收购，成为《文汇报》的航邮版。

《文汇报》，1879年4月17日创刊，英商开乐凯创办，是一份晚报。创刊不久，即与《上海差报与中国钞报》展开竞争，并于1890年将其兼并。《文汇报》于1922年开乐凯死后转归日本人所有，1930年又被售予英文《大美晚报》。

除英文报刊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外人还在上海出版了一批葡萄牙文、法文、德文、日文等报刊，主要有：

《上海新闻》，1870年12月5日创刊，法文周刊，法国人比尔主编，1872年停刊，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法文报刊。

《德文新报》，1886年创刊，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德文报刊，初为周刊，后改日报，德国人纳瓦拉创办。该报曾自称“远东德国人之声”，1917年被中国政府查封。

（二）中文报刊

继外文报刊之后，甲午战争前，外国人还在上海出版了20余种中文报刊，较有代表性的是：

《六合丛谈》，1857年1月创刊，月刊，是上海第一份中文期刊，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在上海设立的墨海书馆主办，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内容除传教外，也有中外新闻和商业材料，还有科技知识，出版年余停刊。

《上海新报》，1861年11月创刊，初为周刊，不久改双日刊，1872年2月改为日刊，是上海第一份中文日报。由《北华捷报》主办，传教士华美德、傅兰雅、林乐知等主编，内容主要是行情、船期、广告等商业材料，也有新闻和时论，1872年停刊。

《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创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编，是一份宗教性周刊，以传教为主，也有部分介绍物理、化学和医学等知识的文章，还有新闻和广告。1872年8月改名《教会新报》，变更体例，增加时政和知识性内容，传教文字退居第二位。1874年9月更名《万国公报》。

《申报》，1872年4月30日创刊，初为双日刊，旋改日刊。英国商人美查兄弟等4人集资创办，具体编撰工作由中国人担任。该报以赢利为目的，注意经营管理，除大量招登广告外，极力以新闻、言论、文艺作品等吸引中国读者，大量刊载猎奇性的社会新闻，注重报道重大事件，曾派记者现场采访日本侵台和中法战事，率先用电报传送北京顺天乡试榜文等中国新闻，言论上以有利于中国国计民生相标榜，广泛征集和发表竹枝词、戏评、八股范文等。1872年增出文艺月刊《瀛环琐记》，1876年附出口语化通俗报纸《民报》，1884年出版时事画报《点石斋画报》。为扩大发行，《申报》还在上海和外埠广设代销点和代派处，半年内发行份数即由初创的数百份增至数千份。1909年该报产权转归中国人席子佩所有，后又转归史量才，1949年5月停刊。

《万国公报》，1874年9月由《中国教会新报》改名而来，将读者对象由教众扩大到中国官绅和知识分子，刊物内容发生明显变化，传教性内容大减，中外新闻、时评和西学知识大增，出至1883年8月，因主编林乐知忙于他务休刊。1889年2月，基督教在华文化出版机构同文书会（后更名广学会）将《万国公报》作为机关刊物复刊，改为月刊，仍由林乐知主编，李提摩太等多名传教士参与编撰。以中国上层官绅和知识分子为宣传对象。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时期，大量发表主张革新中国的文章，刊物发行量曾达数千份，1898年销售38400册，有广泛社会影响。1907年2月因林乐知病逝停刊。

《格致汇编》，1876年2月创刊，初为月刊，后改季刊，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编，是一份介绍数、理、化、生物、医学等知识的科普刊物，是上海最早的科学杂志，约于1892年后停刊。

《益闻录》，1879年3月正式创刊，初为半月刊，不久改周刊，后再改为周二刊。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主办，以报道时事为主，也有少量传播天主教教义的文章。1898年与《格致新报》合并，在时政之外，增

加科学知识内容。

《沪报》，1882年4月创刊，日报，73期起改名《字林沪报》，是字林洋行主办的商业报纸，版式、体例和《申报》相仿，编撰人员也大多为中国人。因与《字林西报》一起独家享有路透社电讯，并经常刊载电传上谕，故消息较为快捷，也发表文艺作品，1888年曾另纸连载长篇小说，随报附送，开中国报纸连载长篇小说之端。1897年11月出版副刊《消闲录》，专载文艺作品，成为我国最早的报纸副刊。1900年《字林沪报》因经营不善，被日本东亚同文会收购，更名为《同文沪报》。

《新闻报》，1893年2月17日创刊，日报，初为英商丹福士、中国人张叔和等多人合股创办，不久转归丹福士独有，1899年又转归美国人福开森。版式、体例和《申报》、《字林沪报》相仿，内容侧重经济。1906年6月该报改组成股份公司。1929年产权全部转归中国人所有，1949年5月停刊。

从1850年到1894年，外国人在上海出版了约80余种中外文报刊，其中有数种后来发展成全国性报纸，影响较大，初步奠定了上海的中国近代报业中心的基础。

四、鸦片战争后外人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版的报刊

从鸦片战争到1894年，内地许多城镇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在开埠较早的一些通商口岸，如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天津、汉口等地，外人都出版了一些报刊，总数近50种。

在广州，外人出版了10余种中英文报刊。其中，英文报刊主要有《中国丛报》和《中国之友》。前者战后由澳迁港，1845年又由港迁穗，出版几年后，因销数不畅停刊。后者1859年在港停刊后，次年在穗复刊，对太平天国持支持态度，出版年余后迁往上海。其余英文报刊大

多为广告和航情等商业信息报纸。

中文报刊主要有《中外新闻七日报》和《广州新报》。前者创刊于1865年,是传教士在中国办的第一份中文周报,英国传教士查美司是第一任主编,嗣由丹拿、丕思业先后任主编。内容是以粤、穗新闻为主的中外新闻,也刊有不少科普文章,还有少量的传教、时事评论和文艺作品,曾极力诋毁太平天国,吹捧曾国藩等清廷官吏,出至1870年停刊。《广州新报》亦创刊于1865年,创办者是美国传教士,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查美司参与编辑。内容与《中外新闻七日报》相仿,科普文章中侧重介绍西方医学知识,出至1871年停刊。

在天津,外人出版了五种中英文报刊,影响较大的是中文《时报》,英文《中国时报》和《京津泰晤士报》。

《时报》是天津第一种中文报纸,日报,1886年8月创刊,由天津海关英籍税务司、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创办,得到怡和洋行资助和李鸿章支持。内容为谕旨、言论、京津新闻、外省和外国新闻、广告和少许文艺作品。新闻以京津新闻为主。1890年由英国人李提摩太任主笔后,每日撰论说一篇,大谈效法西方,实行新政,前后共达200余篇,引起较大反响。该报1890年附出周刊《直报》,选录《时报》一周的主要内容,向外埠发行。《时报》出至1891年6月因李提摩太赴上海任广学会总干事而停刊。

《中国时报》是英文周报,1886年创刊,亦由德璀琳创办,英国人宓吉主编,主要刊登京津等中国北部地区新闻,重视论说,经常评论中国时政,业务水平较高,出至1891年3月因销数甚少,难以维持而停刊。

《京津泰晤士报》创刊于1894年3月,英国人贝令汉创办并主编,周刊,着重报道中国北方新闻,政治上持英国政府立场,有英租界资助,是半官方报纸。该报出版时间较长,1902年改为日报,1941年停刊。

天津是中国北方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是北京的门户,在天津办报,可就近报道和评论中国中央政治,甚为外国在华上层人士重视与支持。所以,外国人在天津办的上述报刊,政治色彩浓厚,业务水平较高,报馆的设备条件好,影响较大,是外国人在中国北方的报刊宣传舆论中心。

在福州,外国人出版了十种左右报刊。最早的是1858年12月创刊的英文《福州府差报》。英文报刊中以同于1873年创刊的《福州捷报》和《福州每日回声报》体例较为全面,其余多为广告、船期报。中文报刊多为传教士所办,第一种是1868年创刊的《中国读者》,其余有1874年创刊的中国第一种儿童刊物《小孩月报》等。

厦门最早的英文报刊是1872年创刊的《厦门航运报道》,后改《厦门公报和航运报》,最早的英文报刊是传教士1886年办的《厦门新报》。

在宁波,美国传教士1854年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鸦片战争后全国第一批中文报刊之一,初为半月刊,后改月刊,载有新闻、宗教、科学、文学和商业材料,出至1861年停刊。1881年2月,英国传教士在当地中国官员支持下创办了中文月刊《甬报》,由中国人主笔,以新闻为主,也有言论、文艺和广告,1882年停刊,曾发表《新闻纸论》等新闻学专文。

汉口最早的近代报刊是1866年创刊的英文《汉口时报》。中文报刊有1872年创刊的《谈道新编》月刊,和传教士创办日报《昭文日报》等。

此外,从1885年至1894年,外国人还在台湾、九江、烟台、汕头等地出版了一些报刊。

在非通商口岸,外国人最先办报的地方是中国的首都北京。由在京外国传教士成立的对华实用知识传播会,1872年在北京创办了中文月刊《中西闻见录》,主编是传教士丁韪良。该刊以介绍水利、医学、

数理化等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知识为主,也有少量西方科技新闻和寓言等文艺作品,不涉及宗教和时政,每月印刷 1000 份,免费分送京城官绅、士大夫,部分发往外埠,出满 3 年停刊。1891 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在北京又创办了一份中文刊物《华北新闻》。

上述地区的外国人报刊,除少数几种,大部分出版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文报刊大部分为商业性报纸,中文报刊大多为传教士办的期刊。

五、外人报刊的作用与业务状况

从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 180 余种中外文报刊。这些报刊,在标榜其办报目的时,大都侈谈为公众通信息、报新事的旨趣。特别是其中的中文报刊,因以中国人为读者对象,更一再宣传其宗旨是广见闻、传播知识,以使中国摆脱贫弱等。但是,这些报刊的实际表现说明,它们总体上始终是为西方列强对华扩张服务的,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信息舆论工具。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为列强武力侵华和政治讹诈提供情报,进行舆论准备。在这方面表现最露骨的是外文报刊。这些报刊上刊载的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设施、防务能力、沿海地理的调查材料,远远超出了正常新闻报道的范围。这些报刊发表了许多在华西方人士的文章,讨论对华政策,大多都敦促西方政府加快侵华步伐。每次中外战争爆发前,这些报刊都颠倒黑白,为列强武力侵华编织理由,煽动反华情绪,误导西方舆论。在平时,它们也始终是扩大列强在华势力的积极鼓吹者,动辄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爱国斗争,干预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企图使之纳入为他们利益服务的轨道,使中国进一步西方化、殖民地化。

第二,为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经济掠夺提供信息和广告宣

传。商品行情、航运消息、广告是外人报刊的重要内容。而十九世纪时的实际情况是,行情、航运信息的主要需求和受益者是外商,广告推销的基本是洋货。此外,外报还以新闻和言论等形式,为鸦片贸易、中外不平等贸易辩护,报道贸易动态,分析市场形势,帮助外商开展业务。

第三,为列强对中国的思想征服和文化渗透服务。在这方面,传教士报刊尤为明显。这些报刊大多以征服中国人的思想、信仰为目的。《万国公报》编撰者李提摩太在《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就曾向其国人宣传:只要控制了中国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国家的头和背脊骨”。这些报刊还往往借助传播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炫耀西方的文明,兜售西方中心论和崇外、媚外、惧外等殖民主义思想。

不过,外报是远较中国古代报纸先进的现代化大众传媒,其本身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表征和现代文化的载体。它们在充当列强侵略工具的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它们为被封建统治长期禁锢的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睁开眼睛看世界、认识中国落后的窗口,从而促使了这部分中国人的觉醒。它们所刊载的商业经济信息,也部分地为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利用,它们所介绍的文化科学知识,也被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所吸收。这些知识分子活跃了思想,增长了见识,进而开展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斗争。

反映在新闻事业方面,近代报刊由外人引入中国,起到了示范效应,成为中国现代化新闻传播活动的最初诱发和刺激因素。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通过与外报的接触,逐渐认识到近代报刊的功能、作用,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借鉴外人报刊的经验,自己创办近代报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篇章。

在报刊业务方面,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直接运用了西方现代的办报模式,在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大体上随着西方报刊业务

的发展而发展。当然,由于社会条件和读者对象的不同;具体表现不尽一样。而中文报刊,则没有全盘照搬西方报刊的业务方法和模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中西结合、逐渐进步的过程。

在印刷上,从1815年到1894年,中文报刊经历了一个从雕板印刷到石印和铅印的发展过程。最初的中文近代报刊大多是雕板印刷的,少数使用铅印或石印。其中,第一个使用石印的是1838年创刊的《各国消息》。第一个使用铅字印刷的是1853年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鸦片战争后,铅印的中文报刊逐渐增多,到七十年代前后,大多数报纸已用铅字印刷,但直到九十年代,仍有部分报刊采用雕板印刷。至于印刷机,长时期是用畜力和手摇的平板印刷机,每小时仅出报数百张。直到1881年,申报馆才在中文报馆中第一个使用煤气印刷机。

在版式上,鸦片战争前后,中文报刊多是线装书式用中国土纸单面印刷。1828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天下新闻》,最早采用散装式。六十年代,上海和香港才出现几家单张的报纸。其中有的仿照了外文报纸的版式,用进口白报纸双面印刷,每版分为几个横栏。但七十年代《申报》创刊后,却出现了倒退,即改用中国土纸单面印刷,每张四页(版),每页(版)大小如同一页书,整张报纸可裁叠装订成类似线装书模样。这种书本式的版式,迎合了中国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又可使用低廉的中国土纸而降低报纸成本,故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后,为香港以外的内地报纸普遍仿用。

在单张报纸的版面编排上,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中文报纸流行的格式是: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辕门钞,再次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这种编排是一种简单的分栏,但20多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谓首论说,即这时期多数报纸都有报纸主笔撰写的言论,且将之置于文字版之首。这虽然是搬用了西方近代报刊天天有社论的模式,但由于大多数主笔人胆识才气有限,常常将论说视为例

文,敷衍成篇,故所撰论说大多内容空洞,绝少涉及政治,对官场中人从不敢有所批评。加之为当时统治文坛的八股文所束缚,论说的写作形式也很呆板。所载上谕或宫门钞、辕门钞,即选录或全录北京和各省报房印行的《京报》和《辕门钞》,它们成为中国的政治新闻的主要来源。至于各省各埠要闻、本埠新闻,起初多为向社会广泛征集、选译外报和各报间相互转载,后来则逐渐以记者采写为主。当时,记者被称为访员、访事、通信员等,有本埠、外埠之分,多数是招聘的兼职人员。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个别报纸已派出自己的访员赴现场采访,并为此发行号外。并且,随着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从七十年代起,中文报纸上开始刊登电讯,八十年代初始有专电。

在新闻文体与写作上,七十年代前,由外人编撰的一些中文报刊,其新闻虽然还写得不够完备,还常与评论相混淆,但都较为纪实、简洁,有些新闻已经五要素俱全。但从七十年代起,随着中文报纸的增多,一批中国旧式文人参加了报纸编撰工作,他们不懂报纸和新闻,往往混淆新闻与文学的界限,喜欢以文学描写取代对事实的报道。于是,大量谈神说鬼、离奇故事被当作新闻,充斥报端。反映在新闻标题上,开始流行优美典雅、但千篇一律的四字标题,如什么“上林春色”、“禁苑秋声”、“西湖棹歌”、“鹤楼留韵”之类,用这些标题,将各省、地新闻区分开来。到九十年代,渐有改进。但新闻稿件总体上质量都不高,尚未形成稳定的新闻文体,报馆的中国从业人员大多素质不高,社会地位低下。

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上已出现新闻画,最早见于1854年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该刊曾配合一则战事报道,配发了一幅军事形势图。后来,其他报刊也陆续刊载新闻画,但新闻性不强。七十至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画报,其中以《点石斋画报》新闻性最强。

这一时期的中文报刊,大都刊登文艺作品,主要是竹枝词、戏评、八股范文,有的已开始连载小说。

此外,七十年代后,各报日益重视经营。各报广告数量增多,所占版面从三分之一增至二分之一,广告费在报纸收入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

第二节 社会变革与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主权开始遭到破坏,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一步一步地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中国的门户向资本主义世界敞开了,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逐渐地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兴起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产生了一批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中国第一批民族近代报刊。

积极主张并率先创办民族近代报刊的,主要是一些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数兼有买办或洋务官员的经历,他们都和西方人及西方事物接触较早、较多,有的还到过欧美游历、留学,深感中国的落后,要求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参与了洋务活动。但他们和洋务派上层官僚不同,不仅要求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求学习某些西方的政治、文化制度,仿效西方出版近代报刊就是他们的一个具体要求。他们大多参加过外人在华所办报刊的编辑、撰稿工作,初步了解近代报刊辟商途、得敌情、彰公道、广见闻、通民隐、达民情、助学业等功能,强烈呼吁政府允许国人办报,并积极参与了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活动。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中国人自办了约 20 种近代报刊。除福州、厦门各一种外,主要集中在香港、上海、广州和汉口。

一、香港的早期国人报刊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香港一些熟悉近代报刊出版事业的中国人,受内地洋务运动的影响,开始投资报业,到甲午战争前,先后创办或盘进了6种中文报刊:

《循环日报》,1874年2月4日创刊,由中国人王韬、黄胜合伙创办,王韬主笔。该报是中文日报,每期两小张四版,白报纸两面印刷,另外附出用土纸印刷的船期时刻表。白报纸第一版为商品行情,第二版为新闻,第三、四版为航运信息及广告。商业材料占主要版面,是一份商业报纸。第二版设有《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3栏。《羊城新闻》栏除广州新闻外,常刊载王韬等人撰写的野史掌故。《中外新闻》栏的首位是论说,大体每日一篇,初期大部分论说系王韬执笔。为扩大影响,每月还出版中国线装书式月报一册,单独发行,汇编日报的要闻与论说。

《循环日报》的论说,以“强中以攘外,诚远以师长”为立论宗旨,鼓吹向西方国家学习,变法自强,抵御外侮。许多论说通过评论时事,陈述中国任人宰割的危险,主张造舰制炮、开矿办厂、兴商富国,同西方进行商战。还宣传“变古通今”的变革思想,反对泥古不化,介绍并赞许西方的议会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度。非议科举制度,主张培养真才实学人才,要求革除官场积弊和陋习,对洋务运动的一些弊端也有所批评。这些论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是报刊宣传变法维新的先声。在王韬任主编阶段,这些论说大都为王韬执笔,思想和学识水平在当时均堪称一流,经常被内地报刊转载,产生过一定影响。所以,《循环日报》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纸,王韬是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76年后,王韬将报纸编务交与洪干甫等人。《循环日报》后来几经易手,断续出版至1959年

终刊。

《维新日报》，1880年创刊，出版商陆骥纯创办，陆建康、黄道生等编辑。该报的体例、编排和《循环日报》相似。在中法战争中，该报大力声援抗法斗争，一时大受欢迎。1912年停刊。

《粤报》，1885年创刊，香港汇丰银行买办罗鹤鸣创办，以经营不振，未及一年售与罗敬之，1888年停刊。

除上述报纸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原属外国人所有的《近事编录》、《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等3家中文商业报纸，也陆续转归中国人所有。这样，甲午战争前，香港成为国人自办日报最集中的地方。香港的这些国人报纸，都很注意刊载广州新闻和商业材料，除香港外，还向广州发行。

二、上海的早期国人报刊

上海是洋务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内地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也较早出现了国人自办报刊，到甲午战争前，先后出版了七八种。主要有：

《西国近事汇编》，1873年4月创刊。由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出版，每日从英、德等国报纸上摘译要闻10余条，印送官绅阅看，还汇编成册发行，是中国最早的译报，戊戌变法失败后停刊。

《汇报》，1874年6月16日创刊，日报，在沪广东籍绅商集股万两创办，股东包括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上海县知县叶固之等官员。初由邝其照主持，管才叔、黄子帙、贾季良等任主笔。《汇报》是一份日报，版式与《申报》相似，连史纸印，每日两张8页，广告与文字各占四页。文字页内容有《京报》全录、《辕门钞》、上海新闻与中外新闻。约两天左右发一篇论说，鼓吹发展洋务，措词谨慎，不评点官府政事和臧否官员，但对外人侵害中国的言行常有抨击，主张租界工部局应有

华董参加,对外人在租界的司法特权提出质疑,并常批驳《字林西报》、《申报》的言论。出版不久,因在一则新闻报道中涉及到官厅,引致官方不满,不少股东随之退股,报纸被迫改组,于9月1日更名《彙报》,请英国商人葛理担任挂名发行人兼主笔,增加登载社会新闻,特别是刑事案件新闻,增加艺术作品,并将论说置于首位,常转载《循环日报》鼓吹变法自强的论说,还译载介绍过英国议会制度,与《申报》的斗争更加激烈。因财力缺乏和《申报》的排挤,1875年被迫增招新股,于1875年7月16日改名为《益报》,论说数量锐减,社会新闻和艺术作品进一步增多,维持出版至1875年12月初停刊。

《新报》,1876年11月23日创刊,资金名义上由上海各口商帮集股,实则大部出自道库,是一份官商结合、由上海道台冯焌光控制的报纸。冯焌光是洋务派官员,办报目的是为了拥有自己的喉舌,影响中外舆论。该报曾力图吸引外人读者,一度以中英两种文字刊登新闻。该报主要刊载国内外新闻和中外经济、贸易材料,论说则一味鼓吹洋务。出至1882年2月,因继任道台不愿续办停刊。

此外,甲午战争前,上海还出有国人自办的译报《新闻纸》(1879年创刊)、时事画报《飞影阁画报》(1890年创刊)、文艺期刊《侯鯖新录》(1876年创刊)、《艺林报》(1891年创刊)、《华洋日报集成》(1891年创刊)和《海上奇书》(1892年创刊)等。

三、广州、汉口的早期国人报刊

广州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工商业发展较早,最早出现了国人自办报刊。第一家是1872年创刊的《羊城采新实录》,其后又陆续出现了《述报》、《广报》、《岭南日报》等3家。

《羊城采新实录》因原报早已失存,详情已难考察。

《述报》创刊于1884年4月18日,是我国第一份石印日报,每日

一小张,新闻、言论、广告、科学知识俱全。中法战争期间,曾发表大量专电、消息、通讯和评论,报道和评述了战争全过程,欢呼中越军民的每一次胜利,对《字林西报》、《申报》等外国人办的报刊所宣传的“输金议和”等谬论,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该报一大特色,就是自创刊之日起,每日绘制图画,穿插于文章中,以加深读者对文字宣传报道的理解,出至1885年4月停刊。

《广报》创刊于1886年6月24日,创办者邝其照。最初内容较琐细,后有调整,顺序是论说、新闻、《京报》、《辕门钞》、商情和广告。1891年因刊发参奏某大员的奏折,被两广总督下令查封,报纸迁入沙面租界,改名《中西日报》,请洋人挂名。后又改名《越峤纪闻》,1900年停刊。

汉口也是较早出现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地方,最早的一份是1873年创刊的《昭文新报》,由艾小梅创办,初为日刊,后改5日刊,以刊载奇闻异事为主,间刊诗词、文艺,因销路不畅,未及一年停刊。

诞生于甲午战争前的这些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都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鼓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开矿办厂,并要求重点发展商办企业。它们中的个别报纸,还主张进行政治、文化改革,赞许西方的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

这些报刊大多通过言论和新闻,陈述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要求当局加强武备,抵御外侮。对外人在华的专横行径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经常有所抨击,并宣传抵制列强对华的经济扩张。在中法战争期间,一致谴责法国的战争挑衅,支持中越军民的抗法斗争。

这些报刊的处境十分困难,动辄得咎,经常受到来自中国封建官府和外国人在华势力的两方面的压制和打击。清政府当时实际施行的是听任外人办报而禁止中国人办报的政策,国人办报毫无保障。《广报》只因转载了一份令总督恼火的奏折,就被查封。上海、广州等租界

当局,对刊有反对西方侵略中国的言论的出版物也多方限禁。《岭南日报》只因稿件中称西方人为“夷”,便被租界当局逐出租界。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国人自办报刊有的以外国人为挂名总主笔,有的挂着外商的招牌,有的吸收一些洋务官员入股挂名。而且,在言论方面,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也大多谨小慎微,评论时事时语多婉转,多数仅止于“胥吏行凶”、“考场情弊”之类的细枝末节,很少涉及重大问题。尽管如此,除了在香港出版的几份报纸,国人在内地办的报刊,大多时间不长即告夭折。

在报刊业务方面,早期国人自办报刊大多模仿当地中文外报。少数报纸,如《循环日报》则在政论写作上有所创新。该报在王韬主笔时期,以“强中以攘外,谏远以师长”为宗旨,所载论说较紧密地联系了实际,言之有物,宣传变法图强,文字清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883年王韬将其部分报刊政论汇编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报刊政论文集。

第一批国人报刊,数量不多,寿命不长,只限于香港、上海、广州、汉口等少数地区,而且往往挂着洋牌,托庇于租界,总体上社会影响不大。打破对外人对近代报刊的垄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的国人近代报刊,是戊戌变法时期由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起来的。

第三节 维新运动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

一、维新派的第一批报刊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受到极大的刺激,战前还甚为微弱的变法维新呼声,在甲午战后迅速发展成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并导致了一场维新运动。在维新运动中,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

产阶级维新派,为了传播维新思想,推动变法运动的开展,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报刊宣传,自觉地创办了一批报刊。

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的《万国公报》,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刊。该报由康有为出资,由梁启超和麦孟华编辑。因经费不多,无力自购印刷设备,故该报由京报房代为印刷。该报两日一期,木板雕印,每期10页一册,版式与《京报》相似。每期雇请报房送报人随《京报》免费分送在京官绅。初时每期印1000册,月余增至3000册。

该报主要介绍与变法有关的世界形势和西方情况,如《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通商情形考》、《铁路情形考》、《万国矿务考》、《学校说》、《农学略论》、《报馆考略》等。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是从广学会所出书报中辑录的。

该报出版后,在京城引起震动,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疑谤,但也受到相当多官员士大夫的欢迎,初步宣传了变法的必要性,促进了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成立。强学会成立后,更明确宣布“先以报事为主”,于12月16日将《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学会的机关报。

《中外纪闻》由康有为题写报名,梁启超、汪大燮主笔,仍为双日刊,但改用木活字印刷,内容比前身《万国公报》丰富,册首恭录阁钞,其后依次是路透社电讯、摘录国内外报纸新闻、西学知识、论说等。新闻占二三页,西学知识占大部分篇幅。论说大部分选录自国内外报刊,少数由梁启超等自撰。在所摘登的西学知识文章中,常附有梁启超等人撰写的按语。

继《中外纪闻》之后,1896年1月12日,维新派在上海又创办了《强学报》。该报是康有为领导创办的,是上海维新团体强学会的机关报,由徐勤、何树龄主笔,以发表自撰的宣传变法的文章为主,曾明确地阐述了维新派的一些政治主张。该报系5日刊,铅活字竹纸印刷,每期线装书式一册,免费送阅。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的相继出版及其维新变法宣传,引起了顽固守旧势力的惊恐。1896年1月20日,光绪皇帝在顽固派的压力下,下令封禁了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被一起查封。上海强学会被迫解散,《强学报》随之停办。

《中外纪闻》、《强学报》是带有政党报纸萌芽性质的中国第一批政治团体机关报,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创办的第一批维新报刊。虽然出版的时间不长,但初步宣传了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和主张,也为维新派积累了办报经验和培养、锻炼了办报骨干。

二、变法运动高潮中的主要报刊

强学会被查封后,维新志士们的变法热情并未减弱。经过他们的努力,维新变法运动从1896年夏起,开始逐步走向高潮,并在1898年百日维新时期达到顶点。在这个高潮中,维新志士创办出版了九十余种报刊,形成了一个国人创办出版报刊的高潮。维新派创办的报刊主要有:

《时务报》,该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是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筹办的,目的是使经受了强学会被查禁挫折的维新运动重新走向活跃。办报经费来自黄遵宪的捐款和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创刊后,由汪康年任总理,负责馆务及对外事宜,梁启超任总主笔,负责文字撰述和编辑。此外,另聘有几名英、法、日文翻译。报馆设于英租界,用连史纸石印,每旬一期,每期32页线装书式一册,约3万字。内容首为论说,其后依次是《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第三期起又将《域外报译》分成《英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报译”部分所占篇幅最多,约为全刊的一半以上。该报到1898年8月改名《昌言报》止,共出版69期。

《时务报》是戊戌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维新报刊。其最受读者欢

迎的是梁启超等人撰写的论说。该刊发表的第一篇论说,是梁启超撰写的带有发刊词性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该文将报刊喻为国家的耳目喉舌,极言报刊对于国家的“去塞求通”的重大功用,表明了维新派对报刊宣传的重视。该刊最有影响的论说,是梁启超写的《变法通议》。《变法通议》全文7万余字,从创刊号起连载21期,全面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其余的重要论说还有《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国自强策》、《说群》、《商战论》、《中国除害议》等,是梁启超、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人撰写的。此外,还转载了严复的《辟韩》等其他报刊的一些政论。

这些论说的主要内容是:(1)阐述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列举大量事实,痛陈中国已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已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生死抉择关头,只有主动变法,才能“保国”、“保种”,免于沦亡;(2)宣传“开学校”、“育人才”、“变科举”是当务之急,《变法通议》中对此作了高度概括:“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这段话迅即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言;(3)宣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列强进行“商战”;(4)初步宣传了“设议院”、“伸民权”,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的主张,初步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5)对帝国主义国家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时务报》的变法宣传,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问世不久即风行全国的近代报刊。创刊之初,期印4000份,一年后增至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自办报刊。

封建顽固势力对《时务报》的改革宣传极为恼怒。当时正投机维新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起初对《时务报》曾表示过支持,曾赞扬《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曾下

令所属官学订阅。但随着《时务报》“开议院”、“伸民权”的言论日增，张之洞态度大变，一再以权势压制、干涉，梁启超受到种种牵制。1897年10月应陈宝箴之聘去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欧榘甲、徐勤、麦孟华等康门弟子，也相继离开了报馆。《时务报》从第55期以后，不再发表康门弟子的文章，影响大落。

1898年5月，汪康年在继续出版《时务报》的同时，与曾广铨、汪大钧创办了一份《时务日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下诏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则以《时务报》原系私人资本为由，拒不接受，表示“现既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遂于1898年8月将报名改为《昌言报》，继续在上海出版。《时务日报》也改名为《中外日报》。

《知新报》是继《时务报》之后的又一份著名维新报刊。该报是在《时务报》的带动下创办的，由康有为和澳门富商何廷光动议，因资金大部来自澳门，且澳门为清政府势力所不及，办报受限制少，故决定在澳门出版。出版前，梁启超曾亲赴澳门指导筹办，为该报拟定了章程，并应邀兼任撰述。

《知新报》创刊于1897年2月22日，铅印书册式，初为5日刊，不久改旬刊，后又改半月刊。由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主持，康有为弟子何树龄、韩文举、徐勤、吴恒炜等人任撰述，另聘有英、葡、法、德、日文等多名翻译。原曾拟名《广时务报》。创刊后从版式到内容均模仿《时务报》。重视论说，并注意报道内地维新活动的新闻，刊载了一些《时务报》不便刊载的消息与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此外，该刊也很重视译载“西国政事”和西学知识，所占篇幅达全刊的三分之二。戊戌变法失败后，该刊继续出版，公开谴责慈禧太后等人的倒行逆施，赞颂英勇就义的维新志士，反对慈禧的废立图谋，要求归政光绪，成为保皇会在国内的重要言论机关，出至1901年自行停刊，共出3年133期，是戊戌变法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维新派

报刊。

《湘学新报》是变法高潮中的又一份维新派重要报刊,也是在《时务报》的示范带动下,在维新思潮的鼓动下于1897年4月22日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是湖南的第一份近代报刊。由湖南学政江标、署按察使黄遵宪,继任学政徐仁铸先后督办,经费来自官款,以长沙校经书院名义发行,唐才常任总撰述。自第21期起改名《湘学报》。出至1898年8月28日终刊,共出45册。该刊是一份以推广新学为主的学报,强调“学术为致治之本”,旨在学术上理论上为湖南维新事业开辟道路。设有《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等栏目,着重讲授时事政治、各国兴衰史、地理、数学、中外贸易、外交常识等,也刊载有关维新的上谕、奏折、公牍和维新团体章程,一度也刊载一些选自国内外报刊的新闻与评论。该刊所讲授的社会科学知识,大多与变法有关。尤其是前期由唐才常主笔时,在《史学》、《时务学》等栏目的文章中,曾热情赞美民权,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思想理论先导。

由于《湘学新报》偏重学理,刊期较长,随着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涨,1898年3月7日,湖南维新人士又在长沙创办了一份每日出版的报纸《湘报》。

《湘报》是湖南的第一份近代日报,日出一大张,可裁四页,装订成册。毛边纸单面印刷,内容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省新政、各国时事及广告附张等。该报由维新人士集资而办,初期有政府津贴。报社设有董事会,熊希龄任总董,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为董事,唐才常任总撰述。《湘报》文字浅显,言论激烈,所刊论说,如唐才常的《辨惑》、谭嗣同的《治事篇》、樊锥的《开诚篇》、梁启超的《论湖南应办之事》、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鼓吹御侮救亡,维新变法;宣传开议院、伸民权,发展地方民族工业、推行新政的主张迫切热烈。有些文章大胆斥责秦汉两千余年以来的帝王将相都是“私

天下”的“民贼”(《治事篇》),指出“权也者,我与王臣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存华篇》)。这种敢于向封建专制主义君权政治的挑战精神,为一般维新报刊所不及。

《湘报》还是湖南维新派政治团体南学会的机关报,故大量发表南学会的演说词,湖南各地维新团体的章程、文告,省内外推行新政的新闻,国内外报刊关于维新运动的评论等。该报通过南学会各界分会广泛发行,并四处张贴,发行数达6000份以上。

《湘学新报》和《湘报》的民权宣传,遭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封建顽固势力的一再攻击污蔑。1898年5月,张之洞指责《湘学新报》“谬论”甚多,《湘报》“其偏尤甚”,命令巡抚陈宝箴“阻止”。王先谦等湖南顽固派更群起鼓噪,上呈和刊发《湘绅公呈》、《湘省学约》等,攻击南学会和《湘报》“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并纠集打手捣毁湘报馆,殴打主笔,扬言要杀谭嗣同等人。《湘报》撰述樊锥竟被家乡邵阳的士绅以“乱民”罪开除乡籍。但《湘报》顶着压力,坚持出版。变法失败后,《湘报》于1898年10月15日被查禁,共出177期。

在天津,1897年10月26日,北方的维新人士出版了《国闻报》。

《国闻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版式类似《申报》,文字版内容依次为上谕、路透社电报、论说、国内要闻、天津新闻、北京新闻、北方各省新闻及外国新闻,另出有附张《京报》。同年12月8日另印旬刊《国闻汇编》,只出6期即因销行不广(每期销五百份左右)停刊。《国闻汇编》主要译载西方社会科学论著和外文报刊的新闻与评论,首次刊载严复所译《天演论》部分内容,为变法提供思想理论指导。

《国闻报》的创办者是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内阁中书杭辛斋、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都是主张维新的现职官员。

《国闻报》在发刊词《缘起》中宣称报纸任务：“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所以，该报聘请了多名外文翻译，广译外国报纸的新闻与评论，大量介绍外国的情况。同时，也重视国内新闻，特别是京津和北方地区的新闻，大量报道胶州湾事件、保国会活动和百日维新形势。

《国闻报》于1898年3月曾假作卖给日本人西村博，故戊戌政变后得以继续出版，因而曾报道戊戌政变真相，对清政府屠杀维新志士的暴行也有所抨击。但迫于形势，1899年2月，严复等人终于将该报真正卖给了日本人。约停刊于1900年。

三、戊戌变法时期的其他报刊

戊戌变法时期，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国人自办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形成了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据统计，1895年到1898年（主要在1897年和1898年两年）国人新办报刊达94种，占新出版的中文报刊80%以上。占新出全部报刊（包括外文）的70%以上。中国人自办报刊第一次成为报刊发展的主流。它们分布于20多个城市。其中上海最多，40余种，占第一位。其余依次为浙江、湖南、广东、江苏、北京、四川、天津、澳门、广西、陕西、安徽、江西、香港等地。

这些遍布各地的报刊，种类和体例多种多样，但居主导地位的是时政性综合报刊，主要有：福州的《福报》（1896年创刊），上海的《富强报》（1897年创刊）、《求是报》（1897年创刊）、《译书公会报》（1897年创刊），杭州的《经世报》（1897年创刊），重庆的《渝报》（1897年创刊），成都的《蜀学报》（1898年创刊），广州的《岭学报》（1897年创刊）、桂林的《广仁报》（1897年创刊），芜湖的《皖报》（1898年创刊），西安的《广通报》（1897年创刊）等。这些报刊大多是当地维新派主要

人士创办的,大多和当地的维新团体关系密切,不少是维新团体的机关报。这些报刊有些侧重于时政,致力于宣传“保国”、“保种”、“保教”;有些侧重于介绍西学新政,都从不同角度为变法维新做舆论上的鼓吹。

戊戌变法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国人自办的文摘报。主要有上海的《集成报》、《萃报》,长沙的《博文报》,江西萍乡的《菁华报》等。它们大多创刊于1897年和1898年,内容大多是综合性的,有谕旨、章奏、论说、中外新闻、西学西艺等,这些内容绝大部分都摘自国内其他报刊。对此,这些报刊在发刊词中都作过明确的声明。

这一时期,维新派还创办了一些妇女、儿童报刊。如《女学报》、《蒙学报》、《求我报》等。

《女学报》创刊于1898年7月,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该报是旬刊,每期出一单张4页,石印,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帮助下创办的,编撰者有张蕴华、裘毓芳、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等。该报是上海女学会的会刊和上海桂墅里女学堂的校刊,以宣传变法、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宗旨,有新闻、论说、征文、告白等栏,还有插图,大部分文章是白话文。

《蒙学报》1897年11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蒙学公会的机关报,叶翰主编,每周一期,每期石印线装一册,内容有儒家伦理、史、地、数学、天文、格致等,供5至13岁少年儿童阅读,文言与白话并用,图画与文字并茂。

这一时期的维新报刊中,出现了纯用白话的白话报刊。最早的是在梁启超支持下创办的《演义白话报》。该报1897年创刊于上海,内容以文艺为主,也刊载一些新闻。而影响广泛的则是1898年5月在无锡创刊的《无锡白话报》。该报由维新人士裘廷梁及其侄女裘毓芳编撰,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刊载口语化的新闻、论说、经史和西学知识,也有艺术作品。维新派办这类白话报刊的目的,是在使农、工、

商“人人而阅之”，以“广开民智”。

这一时期的维新报刊中，有数量不少的专业、行业报刊，主要有《农学报》、《算学报》、《利济学堂报》，以及北京《工商学报》（1898）、上海《工商学报》（1898）等。《农学报》1897年创刊于上海，是中国第一份农业刊物。《算学报》1897年创刊于温州，后迁至上海，是中国第一份数学刊物。《利济学堂报》1897年创刊于温州，是专门的医学刊物。在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的热潮中，这些专门化学术报刊的出版，不仅具有科学意义，还与维新变法运动相配合，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在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以上海为中心，还涌现出数种文艺小报，主要有《指南报》、《奇闻报》、《笑报》、《笑笑报》、《游戏报》、《采风报》、《趣报》（以上均在上海），《笑林报》（杭州），《嘻笑报》（广州）等。其中，出版于1896年的《指南报》最早，存世时间较长的《游戏报》影响较大。这两个小报都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主办的。这些小报以刊载文艺小品和社会趣闻为主，主办者大多为有一定爱国维新倾向的落魄文人。它们往往以“讽世”、“觉世”相标榜，刊载了一些嘻笑怒骂、针砭时弊的文艺作品，起到了一定的寓教于乐的作用。但这些小报的消闲性和牟利性也很明显，也刊载了不少格调不高的无聊诗文，甚至还有一些谈风月、说勾栏等柔靡浮艳的文字，造成了颓唐“玩世”的不良影响。

此外，这一时期除上述民办报刊外，还出现了清政府官方出版的近代官报。1896年1月清政府查禁了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后不久，下令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成为官方的出版机构，由大学士孙家鼐管理。该局出版了《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是第一次由政府机构出面办的近代报刊，是中国最早的中国中央政府近代官报。《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样式如同报房《京报》，每期一小册，内容有谕旨、奏折、路透社电讯，外国的新事新艺等，但只是原文照录，而不加议论，并明确宣布拒载议论时事、臧否人物的国内报刊的言论。

北京成立官书局、出版官报后,一些省份也起而仿效。如河南也成立了官书局,出版了《汇报辑要》。该报照录北京《官书局汇报》的原文,刊期也和《官书局汇报》相一致,半月一期。

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政变,扼杀了变法运动。维新派报刊大部分被封禁或被迫停刊。

第三章 中国近代报业的拓展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

一、海外保皇报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逃亡海外,他们以日本为基地,奔走于世界各华人聚居地区,广泛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创办和控制了 30 余种报刊,将海外华文报刊推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海外华文报刊的出版由来已久。鸦片战争前在东南亚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最早的一个。其后,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 1898 年,在美国和东南亚等地,先后出现过 20 多种华文报刊。其中,1854 年在旧金山出版的《金山日新录》(周二刊),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纸。1856 年在美国萨克拉门多出版的《沙架免度新录》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日报。这些海外华文报刊,多数是商业性的,也有宗教性的。主办者有外国人也有华侨,读者主要为当地华人,与中国国内的联系很少。

海外中文报刊的大发展并和国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在戊

戊政变以后出现的。

康、梁等保皇会人士变法失败后在海外创办和控制的报刊,与以前的海外华文报刊大不相同,有很强的政治性,其中在日本和东南亚出版的部分报刊,还大量发行到国内。保皇会在海外创办和控制的报刊主要有:《天南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文兴报》、《新中国报》、《东华报》等。其中,对国内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清议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刊物。该刊刊期、样式都与《时务报》相似,仍是3万余字、线装书式的旬刊,但编辑水平比《时务报》有明显提高,栏目丰富,门类清楚,内容有评论、新闻和小说等文艺作品,其《国闻短评》栏是中文报刊上最早的时事短评专栏。

《清议报》是在旅日华侨的支持下创办的,侨商冯紫珊任挂名的编辑兼发行人,实际主编是梁启超、麦孟华等。梁启超以哀时客、任公、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为《清议报》撰写了30余篇论说及大量诗文,是该报的第一撰稿人。《清议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一方面痛斥慈禧、荣禄、袁世凯等“逆后贼臣”,歌颂光绪皇帝的圣德,在保皇会报刊中掀起了一股“尊皇攘后”的浪潮。另一方面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文化思想,倡导民权,宣传君主立宪。该报每期销行三四千份,通过日本侨民和洋行的协助,大量发行至国内。1901年12月21日出至100期时,因报馆失火、设备焚毁而停刊。

《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创刊于日本横滨,是继《清议报》而起的保皇会主要机关报。编辑和发行人仍署冯紫珊,实际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仍为梁启超。《新民丛报》告别了传统的线装书式,改为用白报纸两面印刷的半月刊,西式装订,封面是套色的雄踞东亚的中国地图,卷首有精致的图片插页,篇幅扩大到五六万字,集中宣传“欲维新

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比《清议报》更深入地阐述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等问题,大力鼓吹“民族御侮”论和“民权救国”论,广泛介绍、征引西方今昔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的思想和学说,痛切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及其恶果,甚至放言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奴隶、没有国民,只有朝廷,没有国家,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畅谈“新民”的文章,代表作是长达11万字,从创刊号起断续连载34期的《新民说》。文中梁启超急切地呼吁国民尽快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养成“进取”、“冒险”、“自治”、“进步”、“自尊”、“尚武”等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梁启超的主持下,《新民丛报》总的来说在政治改革上是主张“导中国当以渐”,宣扬改良的。但1903年以前,该报也曾倡言“破坏”、“革命”、“暴动”甚至“暗杀”。1903年冬梁启超从美国返回日本后,政治态度大变,公开宣布与共和“永别”。《新民丛报》从此日益反对和攻击民主革命,宣扬“预备立宪”、“开明专政”等倒退言论,遭到《民报》等革命派报刊的批驳,双方曾展开激烈论战,《新民丛报》销数锐减,1907年11月20日出至第96期自行停刊。

《清议报》和早期的《新民丛报》尽管在改革主张上没有站在时代前列,但它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思想文化道德的介绍,以及对提高民族素质的倡导,在当时仍具有积极意义。《新民丛报》创刊不久,即风行海内外,不到一年,期发数就从创刊号的2000份增至9000份,最高曾达1.4万份,代销处达90余个,连国内云、贵、甘等边远省份也有代派处。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的论说,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过渡时代说》等,充分施展时务文体自由恣肆、生动流畅、热情奔放的特点,使众多的知识青年为之倾倒。时务文体这时亦被称为“新民文体”,风靡报界和文坛。

二、国内改良立宪报刊

戊戌政变后,慈禧以“莠言乱政”等罪名,下令查禁报馆,捉拿主笔,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就此被扼杀。但是,经过维新运动的洗礼,近代报刊的功能与作用已为政学界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不久,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订立,民族危机加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开展的政治文化斗争更加激烈。清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也被迫逐步推出所谓的“新政”,放宽了对报刊出版的限制。近代报业从政变后的谷底逐年回升,其规模大体上在1902年以后就超过戊戌时期,开始形成一个近代报刊出版的新高潮。据有人统计,从1899年至1911年,内地累计出版中文报刊至少有1139家。其中,1899年为16家,1902年为46家,1906年为120家,1911年高达200家。

这次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出版高潮,呈现出内容多元化和发展分流的倾向。以内容分类,大致可分为官报、政党和政治性报刊、商业报刊、科学文化报刊、文学与消闲性报刊等种。其中政党和政治性报刊最为活跃,影响最大。改良派或政治上倾向改良派的报刊中,著名的有《大公报》、《时报》、《京话日报》、《北京日报》、《京报》、《政论》、《时事新报》、《国风报》、《预备立宪公会报》、《国民公报》等。

《大公报》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法租界,1906年迁入日租界,由满族爱国人士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序》称该报的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并以“敢于替穷苦大众说话”为标榜,鼓吹社会改良,宣传君主立宪,以敢言著称。经常揭露和抨击京津官员的劣行和弊政,点名批评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抨击列强侵略,受到读者欢迎,创刊3个月销数即达5000份,成为京津和北方地区的著名报纸。1916年9月,该报售与王郅

隆,影响大落。

《时报》1904年6月创刊于上海,是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直接出资在国内创办的日报。梁启超曾秘密赴沪参与筹办,为报纸拟定报名及发刊词,报纸初期的不少论说,也是梁从横滨写好寄来的。长期在沪主持报务的,是奉康有为之命从日本返回上海的康门弟子狄楚青,总主笔罗孝高,主笔陈冷。《时报》主张君主立宪,是保皇会在国内的主要喉舌。该报创刊后,即和上海《申报》等老牌报纸展开竞争,在业务上锐意革新,版式、版面新颖,注重新闻时效,首创日报“时评”,并大量刊载知识性强、品位较高的小说、诗词、笔记,受到知识界的欢迎,迅即成为上海著名报纸。

《京话日报》1904年8月创刊于北京。该报是爱国知识分子彭翼仲为“开民智”而创办的,以中下层市民为读者对象。报纸开张小,报价低,全用白话写作,但内容又有别于简单启蒙的白话报刊,《发刊词》称“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从洋人手里“争回说话的权柄”。创刊后,热情宣传反帝爱国,提倡社会公益事业,大胆揭露官府积弊和豪门黑暗,经常为下层民众鸣不平。为使众多不识字、买不起报的下层市民也成为报纸的读者,该报在京城各街巷广设阅报牌,在各茶馆设立了数十个讲报处、阅报社,大大地扩大了报纸的社会影响。只一年多,报纸销数即从初时的千份增至万余份,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销数逾万的报纸。因得罪了许多官僚权贵,1906年9月29日,《京话日报》被京师警察厅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莫须有罪名查封,彭翼仲被捕,并被判流放新疆。

《北京日报》1904年创刊于北京,初名《北京报》,1907年改此名,文言大报,朱琪创办,朱通儒等编辑,注重反映政界活动,和京中大员颇多联络,1931年产权售出,是北京报纸中出版时间较长的一家。

《京报》1907年3月18日创刊于北京,大型文言日报,汪康年创办并主编。标榜监督政府,监督社会。以登载政治新闻和言论为主,

在清廷权贵中倾向尚书瞿鸿禛一派,创刊不久,即揭载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贿赂求官一案,攻击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一派,在京城引起轰动。因汪康年是资深报人,致该报在国内报界也有一定影响。不久,瞿鸿禛以“暗通报馆,授意言官”等罪名被慈禧罢黜,该报遂于8月23日被勒令停办。

《政论》1907年10月7日创刊于日本东京,1908年2月迁至上海,是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月刊。该刊是清末立宪派重要团体政闻社的机关刊物,由梁启超领导创办,蒋智由主编,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为宗旨,鼓吹速开国会,指陈内政外交的利害得失,在建立国会制度、地方自治以及外交、财政等方面积极向清政府提出劝告或建议。1908年8月因政闻社被清政府查禁而停刊。

《时事新报》1907年12月9日创刊于上海,初名《时事报》,汪剑秋主编,1909年4月与狄葆丰主编的《舆论日报》合并,改名《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改用《时事新报》,汪仲阁主编。初创时提倡立宪,与梁启超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成为研究系的机关报。1928年冬,该报出售给张竹平、汪英宾等人。1935年由孔祥熙强行收买。抗战期间在重庆出版。1946年10月迁返上海。1949年5月停刊。是旧上海出版时间较长的一份著名报纸。

《国风报》1910年2月20日创刊于上海,编辑兼发行人何国楨,梁启超筹办并实际主编,每期稿件均由他在日本大体编定后寄至上海印刷出版,其中半数稿件系梁自撰。该刊是一份大型旬刊,每期100余页,8万余字,自称“专以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学理性较强,鼓吹速开国会,为国会请愿运动出谋划策,为清末鼓吹立宪运动的著名理论刊物。1911年7月16日停刊,出52期。

《预备立宪公会报》1908年2月创刊于上海,是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该会由江、浙、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张謇、郑孝胥、汤寿

潜等人倡办,在国内立宪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主编孟昭常及编撰者大都是原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该刊着重介绍宪政知识,对立宪所涉及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展开讨论,站在张謇等上层人士的立场上发表宪政主张,廉价广为发行。

《国民公报》1910年10月8日创刊于北京,是一份大型综合性日报,是全国性立宪团体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报。文实权任社长,徐佛苏主编。日出两大张,用文言文写作。以鼓吹提前召开国会为宗旨,撰稿者多为立宪派著名人士,成为立宪派的宣传重镇,1911年5月转归徐佛苏个人经办。民国以后曾宣传研究系主张,1919年10月遭北洋军阀政府封禁。

上述改良和立宪报刊政治上都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革命,对清政府态度都很温顺,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改革政治,尽快实行君主立宪,防止革命的发生。但随着一次次国会请愿活动的失败,特别是1910年10月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它们对清政府态度激烈起来,斥责清政府为“麻木不仁之政府”、“误国殃民之政府”,谴责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和借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的阴谋。

三、香港和海外革命报刊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在国内外创办了200余种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制造革命舆论。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是从香港和国外开始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这时,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檀山新报》的主要成员均被吸收参加兴中会,报社成为兴中会活动机关。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由此起步。但是,当时的《隆记檀山新报》尚不能担负革命宣传的任务。自1900年起,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广泛开展,至1911年在香港和海外

所出主要报刊计有：

《中国日报》，该报 1900 年 1 月 25 日创刊于香港，是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机关报，是中国第一份资产阶级革命派机关报。孙中山指导并直接参与了报纸的筹办工作，确定报纸出版地点，在日本采购办报设备、物色记者，派陈少白前往主持，并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为报纸确定了名称。

该报由孙中山的战友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每日出大小两张，大张为正张，小张载货价船期。版面编排上借鉴了日本报纸的版式，每版均分为 6 个横栏，使字行缩短到 15 个字，便利阅读。此外还兼出《中国旬报》杂志，刊载每旬重要中外新闻、言论和文艺作品。出至 1901 年 2 月停刊，该刊的文艺作品栏目初名《杂俎》，后改为《鼓吹录》，以岭南说唱文学等形式宣传革命。《旬报》停刊后，该栏转入《中国日报》，成为日报的文艺副刊。

《中国日报》创刊半年后，言论渐趋激烈，大力宣传爱国救亡，揭露和谴责列强的侵华罪行，抨击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昏庸腐败，曾详细报道并赞扬义和团运动，声讨广西巡抚王之春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积极报道和宣传拒俄、拒法、拒约等运动；鼓吹反清，报道和声援留日学生、会党和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如革命党人、会党发动的惠州起义等历次反清起义，1902 年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的纪念会，1903 年的“苏报案”等；发表《论民权》等文章，宣传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思想，赞美共和制度，并号召“流血以争”。创刊不久，逐步摆脱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展开了对保皇党和保皇谬论的揭露与抨击，1903 年后曾与保皇党的广州《岭海报》、香港《商报》进行论战。

《中国日报》与武装起义等革命实际斗争结合得非常紧密，报馆还是兴中会在华南地区的党务、军务总机关，担负着组织联络、策划起义、制造储藏军火等任务。

《中国日报》三分之二以上销往广州和东南亚,受读者欢迎。1905年10月,该报转为同盟会香港分会机关报。1906年转为同盟会南方支部机关报,由冯自由、谢英伯先后接任社长兼总编辑。1911年广东光复后迁至广州,转为广东国民党机关报,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军阀龙济光查封。前后共出版14年,是辛亥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革命报纸。

《开智录》,约在1900年秋在日本横滨创刊,为油印本。同年12月22日,出版“改良第一期”,铅印。该刊是第一份留日学生刊物,是一份时政综合性半月刊,由郑贯公、冯自由、冯斯栾等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开智会主办,郑贯公主编。因当时郑贯公任《清议报》助理编辑,该刊由清议报馆印刷发行。宣称以“开民智”为宗旨,介绍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学说,赞扬义和团“有功于中国”,抨击侵略中国的列强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强盗主义”,公开提出了“革除野蛮政府”等反清革命的主张,受到孙中山的鼓励和经济支持。由于刊物日益明显的革命倾向,郑贯公被清议报馆解职。该刊约在1901年春停刊。

《译书汇编》,1902年12月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是一份铅印月刊。为我国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的部分成员所办,由戢翼隼、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留日学生主持,初以刊载欧美等国法政名著译文为主,曾译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著作。1902年12月起,改变体例转为主要发表自撰文章,宣传民主共和和反帝爱国,1903年4月改名《政法学报》,1904年1月15日停刊。

《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创刊于日本东京,秦力山、冯自由、沈翔云、戢元丞、王宠惠等留日学生编撰,在孙中山资助下出版,时政性月刊,设社说、纪事、译编等栏目,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痛斥清政府的专制腐败,鼓吹革命。第四期发表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批驳梁启超的所谓革命就是仇满的论调,是最早与改良派进行

论战的文章。1901年8月出至第四期因经费困难停刊。

此外,在日本东京还出版了一批革命杂志,主要有《游学译编》(1902年12月14日创刊)、《湖北学生界》(1903年1月29日创刊)、《浙江潮》(1903年2月17日创刊)、《直说》(1903年2月创刊)、《江苏》(1903年4月创刊),这几份刊物都是综合性月刊,分别由湖南、湖北、浙江、直隶、江苏等省的留日学生同乡会创办,留学生主编。这些刊物的出版,是1902年留日学生激增的结果。也是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的产物。创刊之初,这些刊物均从爱国爱乡土出发,大量介绍包括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在内的各学科知识,同时大力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痛陈国家危急形势,宣传地方自治、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救国方案,并为开发家乡经济、文化事业进行一些专项调查。1903年5月以后,因清政府压制留日学生的拒俄活动,这些刊物开始激烈地鼓吹反清革命,猛烈抨击甘为外人傀儡的清政府,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批判保皇党人的保皇言论。由于缺乏经费和编撰人员流动性大,这些刊物1903年年底大多停刊。

革命报刊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民报》。该刊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日本联合组成了中国同盟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进入高潮,革命报刊宣传随之进入普遍开展阶段。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在海外又陆续出版了60余种革命报刊,《民报》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家。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是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创办的。他拟定了报名,并口述了《发刊词》。《民报》前期的不少文章,也是他确定题目,口授大意,由胡汉民、汪精卫执笔撰写的。

《民报》是一份综合性期刊,每期150余页,六七万字,设有论说、时评、纪事、谈丛、译丛、小说、图画等栏目,原定为月刊,但因经费短缺,经常脱期。1908年10月出至24期后,因日本政府刁难而被迫休

刊。1910年1月又秘密恢复出版了两期,前后共出26期和一册增刊《天讨》。先后由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主编,其中以章太炎主编的时期最长(6至24期)。撰稿者有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汪东、廖仲恺、黄侃等数十人,大多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员。

孙中山写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刊物以宣传“三民主义”为中心任务,并强调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统治为奋斗目标。该刊广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想流派,赞扬法国大革命和俄国1905年革命,声援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报》创刊后,还主动向《新民丛报》发起挑战,第3期以号外的形式,列举了双方12个根本分歧问题,声明将就此与《新民丛报》进行辩驳。陆续发表论说数十篇,就要不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等问题展开了论战。

因站在了时代思潮的前沿,《民报》迅速成为进步舆论的领导中心,受到海内外革命人士和进步读者的欢迎。创刊号先后印刷6次,发行6000余份,以后各期也经常再版,最高的一期发行1.7万份。《民报》大部分发往国内,在北京设有秘密发行处,读者不仅有知识分子、学生,还有新军士兵。在《民报》的宣传鼓动下,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会员人数就增加到1万人。

在东京,继《民报》出版的还有一批革命报刊,其中《云南》创刊于1906年10月15日,初为月刊,后改双月刊、季刊,由云南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创办,赵伸任发行人,李根源任编辑主任,张耀曾、席聘莘等任编辑。设有论著、译述、时评、传记、小说、文苑、调查、杂纂等栏目。注意报道国内革命党人的活动,大力揭露英、法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是这一时期创刊的留日学生革命报刊中出版时间较长的一种。除了云南革命留日学生外,其他省的革命留日学生也在同盟会成立后创办了类似刊物,数目多达30余种,

如《四川》、《河南》、《夏声》等。这些刊物有不少是以地方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出版的,但主持者大多是同盟会员。和《云南》一样,这些刊物从刊名到内容大多有明显的地方性,主要面向家乡发行。在内地不少地区难以出版革命报刊的情况下,这些报刊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东南亚、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华侨聚居地区也办起了一大批报刊,数目达30余种,改变了此前保皇报刊在这些地方占主要地位的情况,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这30多种报刊,有的是当地同盟会分会的机关报,有的是当地同盟会员自发创办起来的,还有的是同盟会员参与创办或编撰的洪门致公堂系统的报纸。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兴日报》。

《中兴日报》是1907年8月20日在新加坡创刊的一份单张日报,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机关报,由华侨同盟会员陈楚楠、张永福等创办。1908年,孙中山率同盟会骨干在新加坡一带活动时,胡汉民、汪精卫、田桐、居正等曾为该报撰稿,与当地保皇报纸《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论战。孙中山、黄兴也撰文参战。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论惧革命招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文章,批驳保皇派对革命的污蔑。1910年初停刊。

四、国内革命报刊

与海外的革命报刊相呼应,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国内创办了110余种报刊,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推动了内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内地革命报刊的出版,稍迟于海外,始于1902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数目较少,还不普遍,但趋势是逐年增多。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党人开始更多地致力于国内民主革命的发动,革命报刊宣

传的重心逐渐由海外移向国内。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革命报刊宣传活动已在国内普遍展开。其中,上海由于有租界可做缓冲,又有较便利的印刷出版条件,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数目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其次是广州、武汉、京津等地,也有较多的革命报刊。

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出版的革命报刊主要有:

《大陆》,这是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革命刊物,1902年12月9日在上海创刊。由原在东京出版《国民报》的戴元丞、秦力山、杨廷栋等人主持。宣称痛于大陆之事,特大声疾呼,“以觉我大陆者也”。设有社说、论说、学术、史传、实业、中国纪事、外国纪事等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广开民智,鼓吹改革,批判康梁,抨击外国侵略。报中常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注意宣传方式方法,1906年1月停刊。

《苏报》,原本并不是革命报纸,是1896年6月26日,由一个叫胡璋的人在上海创办的,挂名发行人是胡的日籍妻子生驹悦。那时的《苏报》,与日本外务省和黑龙会关系暧昧,且大量报道桃色案件并借机敲诈事主,弄得声名狼藉,于1900年卖给了退職官员陈范。他接办之初,《苏报》政治上倾向改良,经营无大起色。

1902年秋,南洋公学的学生,因不满学校的封建守旧教育,起而集体退学,在上海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大力支持下,退学学生自办学校——爱国学社。学社因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人,充满了革命空气。《苏报》特设了一个《学界风潮》专栏,报道这次学潮,与学社师生联系密切,1903年春节前后,又与爱国学社师生约定,由学社师生每日轮流为《苏报》撰写一篇论说,《苏报》则每月资助学社百元。从此,《苏报》接连发表学社师生撰写的《释仇满》、《汉奸辩》等公开宣传反清革命的文章,引起社会瞩目。1903年5月27日,陈范又聘请爱国学社学生领袖章士钊担任主笔。《苏报》的革命言论愈为激烈,《哀哉无国之民》、《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倡言革命的文章每日不断,公开号召国内青年学子不怕流血,起而推翻清政府,痛斥慈禧太后等是

“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的大仇敌”，明确宣布“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6月9日、10日，连续发表《介绍革命军》、《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章，向读者热情推荐邹容新撰的革命宣传小册子《革命军》，盛赞《革命军》是“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是“雷霆之声”。6月29日，又在显著位置刊出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严厉批判康有为的保皇论调，轻蔑地称光绪为“载湉小丑”，指出光绪与慈禧一样，都是“汉族之公敌”。

《苏报》如此毫无顾忌地倡言革命，为国内前所未有的，清政府极为惶恐恼怒，6月29日向租界当局指控《苏报》。租界当局随即于当日和次日派出巡捕，在苏报馆和爱国学社拘捕了章太炎等人，并于7月7日无理查封了《苏报》。

《国民日日报》，1903年8月7日创刊于上海租界，主编章士钊，编撰有张继、陈去病等革命党人。该报是为继承《苏报》的事业创办起来的。创刊后，大力声援因苏报案被捕的章太炎、邹容等人，鼓吹民族民主革命，被称为“《苏报》第二”。因遭到清政府禁售，发行难以出租界，致使经费不足，加之内部纠纷严重，出至同年底停刊。

《警钟日报》，1903年12月15日创刊于上海，初名《俄事警闻》。初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提倡种族光复，保存国粹。由蔡元培、汪允宗、林白水、刘师培等先后任主编。1905年3月因揭露德人侵占山东权益被查封。

《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19日创刊于上海，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办的影响较大的报纸。林獬创办并主编，初为半月刊，后改旬刊。以浅显的白话文，向社会底层群众宣传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1904年10月8日停刊。

《女子世界》，1904年1月17日创刊于上海，丁初我主编，在提倡女学、女权的同时，号召读者“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1906年出至第17期停刊。1907年2月再办一期。

《安徽俗话报》，1904年初创刊于安庆，后迁至芜湖，是安徽第一份革命报刊，陈独秀创办并主编，以“三爱”的笔名发表文章数十篇。32开一册，半月刊，以通俗的口语，宣传反清和民主革命，1905年出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后被查封（一说自动停刊）。

《重庆日报》，1904年9月创刊于重庆，卞小吾主办，鼓吹民主革命，1905年4月以“老妓颐和园之淫行”为题，报道慈禧在颐和园行乐的消息，引起轰动。该报的宣传，遭清政府仇视，1905年4月29日被封。卞小吾被捕，后被杀害。

《中国女报》，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创刊，是由秋瑾创办的著名革命妇女刊物，每月一期，设社说、演坛、译编、文苑、新闻等栏目。陈伯平主编（实由秋瑾主持编务）。该报把提倡女权和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号召妇女既作女权运动的先锋，又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仅出两期即因秋瑾被捕就义而停刊。

《神州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于上海，是革命党人在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每日出3大张12版，文字版和广告版各一半。设有社论、本馆专电、译电、要闻、各省通信、杂俎、沪事评论、本埠新闻、商业新闻、余录、文苑等栏目，内容丰富，新闻数量较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纸”，标志着革命报纸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之后创刊的革命报纸所仿效。该报由于右任主持，杨毓麟等编撰，不用清帝年号纪年，但比较注意宣传策略，对清廷的抨击多取旁敲侧击的方式。在新闻报道方面，借口“有闻必录”，大量报道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等活动，大量刊载暴露清廷腐败、残暴的新闻，对帝国主义侵华活动也及时加以揭露和抨击，同时，作为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也很注意经济新闻的报道与评论，成为上海有影响的报纸。1907年6月于右任离去，由杨笃生、汪彭年、叶仲裕等主持。1908年4月后，由汪彭年主持，辛亥革命后继续出版，一度被袁世凯强行购买，成为其御用报纸。后几经变化，抗战胜利后一度复刊，共出8352号。

《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创刊于上海。《神州日报》创刊后不久，因报馆失火等原因，于右任离开该报，筹办新报。在柏筱鱼、沈绶云、张静江等资本家支持下，筹款6万元，创办了《民呼日报》。对开4大张，于右任任社长。

《民呼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革命色彩比《神州日报》鲜明。它以报道灾荒为重点，大量报道在清政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种种事实，造成清王朝气数已尽的舆论，特别对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情况，陕西、甘肃官吏横征暴敛的恶行，进行了集中的揭露。陕甘和上海一些官员深为衔恨，串通一气，向上海租界法庭诬告《民呼日报》侵吞捐款和“毁坏名誉”。公共租界巡捕房于8月2日拘捕了于右任，虽查无实据，仍久拘不放，致使《民呼日报》于8月14日被迫停刊，前后只出版92天。

《民吁日报》，是于右任被释后，利用《民呼日报》的原设备，更换报名，重新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创刊于1909年10月3日，由范光启出面任社长，于右任实际主持。该报日出4大张，创刊后集中报道和声援正在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猛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久，发生了日本前首相、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事件。《民吁日报》对此连续加以报道和评论，盛赞安重根的英雄壮举。《民吁日报》的反日宣传，使日本当局极为恼怒。11月初，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道蔡乃煌施加压力，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两国邦交”为词，蛮横要求惩处该报。蔡乃煌会同租界当局，于11月19日查封《民吁日报》，并无理判决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得作印刷报纸之用”。《民吁日报》只出48天又告夭折。

《民立报》，于右任等人在《民吁日报》被封后，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10年10月11日又在上海法租界出版了大型报纸《民立报》，于右任任社长。该报创刊时，清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该报的革

命宣传也日益激烈，曾详细报道广州黄花岗起义等各地反清斗争，批判清政府在对外关系、预备立宪等方面的倒行逆施。武昌起义前夕，曾以通栏大标题直斥清政府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公开宣告“民党”即将“战胜政府”，备受社会瞩目，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纸。该报报馆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联络机关。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决定以《民立报》为该会机关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一脉相承，又均以“民”字打头，因此在历史上有“竖三民”之称。

同盟会成立后，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还在广州创办了《南越报》、《平民日报》、《可报》、《人权报》等18种革命报纸，在湖北武汉创办过10余种革命报纸。其中，《可报》、《大江报》均因宣传革命被查封而名闻全国。

《可报》，1911年3月30日创刊于广州。陈炯明创办，朱执信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邹鲁等。该报以广东省谘议局为掩护，实则致力于鼓动起义，免费向军界发行，受到军人欢迎。1911年4月22日，因鼓吹革命被查封。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受到全国关注，成为苏报案后又一个革命报刊被迫害的著名案例。

《大江报》，1910年12月14日创刊于汉口，初名《大江白话报》，胡为霖主办，后由詹大悲集资接办，改名《大江报》，成为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詹大悲任经理，何海鸣、梅宝玘、查光佛等编辑。该报非常注意面向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行宣传，不仅向各营免费赠报，在各标营广设分销处，还在军营中聘请多名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经常反映士兵的疾苦，向士兵传播革命思想。7月17日，该报发表何海鸣的短评《亡中国者和平也》，驳斥立宪党人的谬论，26日又发表黄侃以“奇谈”为笔名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鼓吹中国应进行“激烈之改革”。该报因此于8月1日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鸣被捕。此事也轰传全国，成为清末又一著名报案。

在京师北京,1909年以后,也陆续出现了《帝国日报》、《国风日报》、《国光新闻》等几家革命党人创办的报纸。

此外,武昌起义前,全国大部分省区都出现了革命报刊,连新疆惠远也有革命党人主办的《伊犁白话报》。从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北方,革命报刊宣传已普遍展开,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区播撒着民主革命的种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原有革命报刊和新办报刊掀起了一个革命宣传高潮。上海《民立报》在起义的第二天,就用头号大字刊出报道起义的专电,以后又和《神州日报》等一起,开辟专版,连续报道起义的进展。在首义之区武汉,革命党人在起义后的几天内,即出版了《大汉报》、《中华民国公报》等5种报纸,及时发布战报,在群众中进行战争动员和宣传鼓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大汉报》创刊一周,每期发行即达4.8万份,创造了中国报纸发行的新记录。北京的几家革命报纸,也千方百计地报道起义消息。这些革命报纸把胜利喜讯传遍全国,推动了由武昌起义引发的革命浪潮,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五、清末近代官报

近代报刊出现后,清政府官方也开始利用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陆续创办了百余种近代官报。

最早的一份近代官报,是1873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1876年出版的上海《新报》,也主要是上海道台用公款创办的。但它们都还没有以官府名义出版。最早以政府名义出版的近代官报,是《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

《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1896年创刊于北京,是清廷查禁强学会后,在原强学会书局的基础上创办的,隶属于由工部尚书孙家鼐

为管理大臣的官书局。《官书局报》每日一刊，以黄纸为封面，书册式，形式与民间报房所出《京报》相似。经费由总理衙门拨付，内容主要是路透社电讯等新闻和外国新事新艺的译文，大多选译自海关总署收藏的外报，只照录原文，一无自采新闻，二无时评与论说，三不代表政府发布命令和文告，还只是一种参考读物。

1897年创刊于长沙的《湘学报》，经费出自学政的官款，也带有一些后来的省级教育官报的性质。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西国近事汇编》、《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湘学报》均被停办。

不久，出于商务上通信息的需要，一些地方、商务机关率先创办了商务官报。如：

《湖北商务报》，1899年4月创刊于武昌，张之洞创议，汉口商务局主办。

《江南商务报》，1900年3月在上海创刊，江南商务局主办。

这两个官报都是线装书式旬刊，内容都是该局收发的文牒，省内及国外商情，外报商务材料的摘译，以及商务知识。发行以派发为主。如《江南商务报》就札发江宁、江苏、江西、安徽布政使所属州县，规定大县12份，中县8份，小县6份，报费由布政使在各属养廉项下按季扣解商务局。

二十世纪初，随着慈禧许诺实行新政，从1902年到1905年，为了装点门面，先是一些省及省级部门，接着是一些中央部门开始出版官报，如《湖南官报》、《北洋官报》、《江西官报》、《四川官报》、《秦中官报》、《河南官报》、《南洋官报》、《山东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南洋日日官报》、《晋报》、《成都日报》、《北洋学报》、《四川学报》、《湖北教育报》、《商务报》、《训兵报》、《兵学白话报》、《湖北警务杂志》等。这些官报可分为普通和专门两类，那些由一级政府出版的，内容比较宽泛，包括政务、学务、军务等；那些由某一职能部门出版

的,内容比较单一。

在地方性官报中,《北洋官报》、《湖北官报》最有代表性。

《北洋官报》,1902年12月25日创刊于天津,是清末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地方政府官报,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创办,直隶省督办政务处主编。初为双日刊,1906年改日刊,每期1册,每册8页,铅活字印刷。自称以“讲求政治学理,破锢习,浚智识,期于上下通志,渐致富强”和“宣德通情,启发民智为要义”,表示要抵制“私家之报”的“诡激失中之论”。内容首为圣谕广训直解、上谕,余依次为本省政治、学务、兵事、近今时务、农学、工学、商学、兵学、教案、交涉、外省新闻、各国新闻,还刊有广告和时事风景画。报社在总办之下,设总纂、翻译、绘画、印刷、文案、收支六处,机构庞大。每期向各府厅州县及各学堂派发。还附带发行《北洋学报》、《北洋政学旬刊》。该报出版后,其他各省纷纷仿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该报出至1817期停刊。

《湖北官报》,1905年4月5日创刊于武昌,是清末又一有影响的地方官报,由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张之洞创办,江汉关道梁嵩生任总办,任承纪为总纂述。线装书式铅印半月刊。体例由张之洞亲拟,设有圣训、上谕、官门钞、要电、要闻、政务、科学、实业、杂纂、图表、论述、国粹、新说、纠谬等14个栏目,国粹、新说、纠谬等几个栏目是前此的其他官报所未有的,大大加强了“正人心”、维护封建道统方面的说教。每期发行达2万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停刊。

在部门官报中,《商务报》影响较大。

《商务报》1903年12月创刊于北京,由吴桐林、吴兆鉴“奉商部谕办”,名为官商合办,实为官办,北京商务报馆编辑,工艺官局印书科刊行,铅印旬刊,设有论说、实业、丛谈等栏目,除刊发商部一些公牍外,论说中提倡振兴商业、实行商战、挽回民族权利,实业、丛谈等栏目介绍了许多西方经济贸易、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以及国外对中国

商务的评论等,1906年1月停刊。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官报的出版更为频繁,从1906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新出70余种,一时称盛。其中,不仅有各地普通官报,还有各地各部门的部门或专门官报,如教育、商务、警务、法政、实业、军事、农务、禁烟等,特别是清政府中央和中央各部也纷纷出版官报,如《商务官报》、《学务官报》、《交通官报》、英文《北京日报》等各部官报以及《政治官报》和《内阁官报》等中央官报。

《政治官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央政府直接出版发行的机关报,1907年10月26日创刊于北京,书册式日报,由考察政治馆奉旨创办,自称办报目的是为了“使绅民明悉国政预备立宪之意”,主要刊登国家政治文牍,分为谕旨、批折、宫门抄,电报奏咨,奏折,咨札,法制章程,条约合同,报告示谕,外事,广告,杂录十类。并明确表示“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馆内办事人员分为编辑、校对、印刷、发行四种。发行以派销为主,每大省销报300余份。

《内阁官报》系1911年8月24日由《政治官报》改名而来,隶属也发生变化,由原属考察政治馆改为直接隶属内阁印铸局,被明确授权“为公布法律命令之机关”,凡谕旨、章奏及颁行全国之法令,统由该报刊布,不再另行下文,各部门各地区见报后“一体遵守”,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官报。

1902年以后近代官报的发展,是辛亥革命时期报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上起到了提高近代报刊的社会地位的作用。但由于封建专制体制所决定,这些官报内容普遍官气十足,形式呆板,报馆衙门化,编撰人员官僚化。因此,普遍不受欢迎,自愿购阅者甚少,只能靠行政力量层层派发,又往往被“束阁不观”,经营上因各地拖欠报费,极端困窘。如《政治官报》存世不满4年,无法回收的报费即已累积达9万元之巨。

第二节 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报刊

一、民国初年报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使腐朽的清王朝顷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诞生。2月12日,清帝溥仪被迫退位,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起义胜利后和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在新闻出版方面,基本上遵循资产阶级的民主原则,推行言论自由政策,在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中,列入了有关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庄严宣告“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些都为革命胜利后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与法律基础。

(一) 民初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武昌起义胜利后,随着民主热潮的高涨与言论出版自由政策的实施,中国新闻事业得到了一次短暂的飞速发展机会。旧报刊大部分照旧出版,新报刊不断涌现,一时报纸数目有了很大增加。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纸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整个新闻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和清末比较起来,民初的报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较突出的变化之一,是新建政权的各级机关报取代前清官报,大量出版。其中最早的是1911年10月16日在武昌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的官办言论机关报。

此后独立的一些省的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也有些出版了机关报。如大汉成都军政府的《四川都督府公报》、重庆蜀军政府的《皇汉大事记》、浙江军政府的《浙江军政府公报》、广西军政府的《广西公报》、山西军政府的《山西民报》、云南军政府的《云南政治公报》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于1912年1月29日出版了《临时政府公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关报。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政府于次日出版了由原《内阁官报》改头换面而成的《临时公报》,南北统一后,又改名为《政府公报》。这些机关报,以公布法令、发表政事为主,是主管当局的喉舌,除官文书外,也刊函电、评论、记事与广告,发行较广,尤其是革命政权的机关报,带有明显的民主色彩,形式也和民办报纸一样,官办气味不浓。

比较突出的变化之二,是鼓吹“实业、教育救国”的经济报刊、教育报刊,以及要求女子参政的妇女报刊大量出版。在经济报刊方面,有上海民国铁道协会的《铁道》月刊、湖北工业总会的《工业世界》、北京的《商业日报》、武昌的《民国经济杂志》、济南的《中华民国实业协会鲁支部杂志》等,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发展实业,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教育报刊方面,主要有上海中华书局主办的《中华教育界》、上海中华通俗教育会的《通俗教育研究录》、北京的《中国学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言治》、杭州浙江教育会的《教育周报》、济南的《山东教育报》等,这些报刊宣传提倡教育改革,对推动民初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妇女报刊方面,主要有上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神州女报》、《女子共和日报》和《中华女报》、长沙的《女权日报》、成都的《女界报》、北京的《女学日报》、天津的《女子国学报》等,这些报刊提倡女学、女权,宣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参政。

(二) 政党报刊的蜂起

民国初年,政党报纸发展迅猛。

同盟会在革命胜利后,成为最大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一些

小党,改组成国民党,声势更浩大,它的报刊宣传活动也极为活跃。由于历史的原因,《民立报》这一时期被公认为同盟会的总机关报,这一时期,该报日出对开三张半,14版,除社论外,大量刊载述论、译论、时评等言论,消息灵通,在社会上很有影响。该党其他比较著名的报纸还有:上海《天铎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北京《国风日报》、《亚东新报》,天津《民意报》等,该系统的报纸总体上均真正地拥护共和,反对专制,对袁世凯、黎元洪等军阀官僚破坏民主共和的行为,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抵制与斗争,表现出一定的民主革命精神。

进步党成立于1913年5月,主要成员是立宪党人、旧官僚等,领导人有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该党派报纸在政治上拥护袁世凯,得到袁的资助。该系统报纸遍布全国,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北京《国民公报》,天津《庸言》等。《申报》言论亦倾向该党。这些报纸实际上都敌视孙中山和国民党、袒袁拥袁、为袁的强权统治张目。

由于政见不同,两党派报纸争论不休,相互攻讦,互骂对方为“贼党”、“贼报”。不仅两党报纸之间大搞意气之争,就是同一党内的报纸之间,也经常因意见不同发生争吵,展开笔战。甚至同一个报纸,也常因内部意见相左,闹出一些笑话。结果是,进步党报纸,因吹捧袁世凯、贬抑孙中山,反对共和,遭人们唾弃,国民党报纸,由于妥协色彩日浓,沉湎于议会党派之争,也为人们所不齿。政党报纸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一落千丈。

二、“五四”新文化报刊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青年》杂志

的创办揭开了新时期的新篇章。

（一）《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著名刊物，是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的杂志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用本名。《新青年》是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出刊9卷54号。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兼主编，同时也是主要撰稿人。他于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刊物随之迁往北京，并改组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后来刘半农、鲁迅、周作人也参加了编辑工作。1919年冬刊物经过整顿后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编，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1号起，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刊物。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新青年》向封建主义思想、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的抨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宪法与孔教》、《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文，阐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观念，把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与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宣传。另外，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今》、《新的！旧的！》等一系列文章，反对安于现状，反对尊孔复辟，抨击专制政治，呼唤青春的中华的到来。鲁迅、易白沙、吴虞等也用小说与论文鞭挞封建主义，痛斥尊孔复辟势力。其次，《新青年》积极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文学革命的序幕，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鲁迅以其杰出的小说与杂文，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再次，《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所谓“灵学”，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进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宣传，并进而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

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的偶像破坏论，提出要打破一切“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

“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将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并为专号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而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这一时期，在形势的鼓舞下，陈独秀也开始倾向社会主义，把批判的矛头初步指向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他又将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这些表明《新青年》已在思想上由激进的民主主义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转变。

（二）《每周评论》等新文化报刊

为了加强对时事政治的报道与评论，及时进行政治宣传鼓动，1918年12月22日，小型4开政治报纸《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至1919年8月31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刊37期。该报是由《新青年》同人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合办的报纸，前25期由李大钊、陈独秀负责主编。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李大钊离开北京，改由胡适主编。编撰者还有高一涵、张申府、周作人等。

《每周评论》的主要栏目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通讯”、“读者言论”等，在陈独秀主持下，它着重介绍新思潮和反映现实斗争，大力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时事报道评述，在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发动舆论，推动爱国运动，传播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不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鲜明色彩，而且显示出社会主义倾向。在胡适主编时，该刊发表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

谈些“主义”!》一文,引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919年1月,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同时创办了两份著名的学生报刊:国民杂志社的《国民》月刊和新潮社的《新潮》月刊。它们在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推动下,亦站到新文化运动一边。此外,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和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也不同程度的加入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行列,形成强大阵线,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

(三)《湘江评论》和《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的革命报刊不断涌现,著名的有瞿秋白编辑的《新社会》旬刊、学生报国会办的《国民》杂志、少年中国学会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孙中山指导国民党在上海办的《建设》月刊、《星期评论》、恽代英主编的武汉《学生周刊》等,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有的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于长沙,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对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指导作用。毛泽东主编,文章也大部分由他撰写。

《湘江评论》以报道评论政治时事为主,辟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专栏,大力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揭露巴黎和会的分赃实质,揭露封建军阀的统治“名为共和,实则专制”。它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斗争结合起来,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反对旧伦理、旧道德,有力地鞭挞了尊孔复辟的逆流。该刊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把传播、研究世界革命的新思潮作为根本的任务。该刊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发了“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思想,提出全国工人、农民等各业民众从“小联合”入手,进而组

成各界“大联合”。该刊的宣传内容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掺杂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1919年8月上旬出第5号,但未及发行即被查封。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周恩来主编,他为创刊号写了题为《革新、革心》的社论,阐述革命者既要改造社会,又要改造自己思想的正确主张。后以“飞飞”的笔名写了许多评论,议论精辟、文笔犀利,富有战斗性。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设有“主张”、“要闻”、“时评”等10余个栏目,大量报道学生运动,工人罢工斗争,本着民主主义精神,密切配合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宣传鼓动。被赞为“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出版仅两个多月,9月22日就被反动当局查封。

三、无产阶级报刊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向共产主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1920年8月,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接着,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有自己阶级的新闻舆论工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常识,发起和组织工人运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应运而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报刊。其中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是其代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报刊蓬勃发展起来。以《向导》、《新青年》、《热血日报》、《中国青年》等为代表的

党团报刊相继创办,并发挥了充分的舆论导向作用。

(一) 改组后的《新青年》与《共产党》月刊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由民主主义性质的刊物改组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刊物。由陈独秀主编,中共上海组发起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为编辑。在编排形式和宣传内容方面,较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增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译载介绍苏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刊登列宁著作的译文。为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提供了丰富材料。

为了向革命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推进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半公开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为16开本,每期50页左右,李达主编,编撰者多为上海发起组成员,有陈独秀、沈雁冰、李达等。所有文章均不署作者真实姓名,刊物不具体标明编辑、印刷、发行地点。创刊号发表陈独秀执笔的《短言》,表述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中心思想。《共产党》月刊大量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策略,报道国内工人运动发展情况,批驳无政府主义思潮,刊登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社会革命商榷》等重要的译著、文献与政论。《共产党》月刊至1921年7月止共出6期,最高发行数达5000份,对筹建中国共产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劳动界》等第一批工人报刊

1920年下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创办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工人报刊。

《劳动界》是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工人刊物。192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32开本周刊,每期16页,1921年1月23日停刊,共出24期。由中共上海发起组出版,陈独秀主编。该刊用浅

显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解释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以及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前途。广泛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和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鼓动工人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榜样,联合起来,为改变被压迫的地位而团结斗争。该刊是先进知识分子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尝试。该刊广泛发表工人的作品,成为当时报刊界的新气象。

《劳动音》,1920年11月在北京创刊,由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办。主要编辑人员有邓中夏(笔名“心美”)、罗章龙等。内容以反映工人受压迫的悲惨生活为主,偏重于对实际工人运动的指导,以很大的篇幅报道“唐山煤矿瓦斯爆炸五六百工人死难”的惨案。南京万余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的斗争。在长辛店等工人聚集地区广为流传。后来改为《仁声》继续出版了几个月。

《劳动者》,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3日创办。目前所见最后一期为1921年1月2日出版的第8期,该刊揭示工人悲惨的生活、报道各地工人斗争和工会组织情况,向工人宣传推翻现存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以《劳动歌》为题最早译载了《国际歌》歌词。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该刊也存在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倾向。

(三) 《向导》等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着手创办了一批报刊,以指导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

《向导》,周报,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1927年7月18日,出至第201期被迫停刊。《向导》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出版的。蔡和森长期担任主编,1925年10月后,彭述之、瞿秋白先后继任主编。陈独秀为之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本报宣言》,制定编辑方针,总结办报经验,撰写各种政论、专论200余篇。《向导》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后合并为“时事评论”)、“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寸

铁”、“外患日志”、“什么话”等栏目,着重报道评论国内外政治时事。

《向导》一创刊就集中全力阐释贯彻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宣传和实现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政策,批驳与此对立的敌对宣传和各种错误思想。它用大量的典型事实报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揭露各帝国主义竞相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操纵军阀内战,压榨中国人民的真相;揭露各派军阀依附帝国主义,以“武力统一”或“联省自治”为旗号,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黑暗统治。《向导》大力宣传各个革命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和巩固国共合作。《向导》报道支持各地的工人罢工斗争和农民运动,推动全国工农运动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向导》的宣传,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认清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推进中国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读者称赞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前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3年7月1日创刊于上海,1924年2月1日出至第3期后停刊。该刊重视调查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它积极宣传中共三大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全面分析,论证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剖析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共同本质和不同手段,揭露军阀政府的独裁统治,介绍苏联的建设和亚非殖民地状况,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新青年》,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1923年6月15日创刊于上海,1924年12月出至第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1926年7月出至第5号后停刊。瞿秋白主编。刊物以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为任务,大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注重从理论上探讨论证中共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主张,广泛译载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和中国思想界的唯心主义进

行斗争。

（四）《中国青年》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各地团组织的发展，创办了一批地方团组织的刊物，主要有，天津团组织的《劳动》，成都团组织的《人声》，广东团组织的《青年》，北京团组织的《先驱》半月刊。

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构建立，已迁至上海出版的《先驱》正式改组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施存统、蔡和森、高尚德等先后负责编辑。该报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1923年8月15日出至第25期后停刊。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1923年10月在上海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32开本，周刊，恽代英主编，主要编撰人有邓中夏、张太雷、萧楚女、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等。1927年10月出至第8卷第3期后停刊，共168期。

《中国青年》设有“社评”、“时事述评”、“寸铁”、“书报评论”、“文艺”、“通讯”、“我们的时代”等栏目，它从青年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报道评述国内外政治时事，配合《向导》等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它解答青年的各种疑难问题，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学习、工作、恋爱、家庭、修养等问题；它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各种侵蚀青年的反动、错误思想。该刊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发表大量读者来信来稿。平时发行1.2万份，最高达3万多份，成为大革命时期最出色的刊物之一。

另外，共青团旅欧支部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法国巴黎办有油印的《少年》月刊。该刊创刊于1922年8月，共出13期。1924年2月，改出《赤光》半月刊。

（五）《劳动周刊》等工人报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成立了领导

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加强对工人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共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等地新出版了一批工人报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劳动周刊》与北京的《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报纸,主编先后有李启汉、李震瀛。它创刊于1921年8月20日,在上海出版,1922年6月3日出至第41号后被勒令停刊。该刊以“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为宗旨,广泛报道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总结经验,启发工人觉悟,被人们称为“教育训练劳工们的一个最好的机关报”。

《工人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1921年7月在北京创刊,历任主编有罗章龙、吴汝铭、李善元。1924年一度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刊物。1926年迁天津,同年底停刊,共出150期以上。该刊报道了1922年到1923年间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高潮,反映了中国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组织上已经转入了日趋成熟的时期,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此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分部还办有一批工人刊物,如济南的《劳动周刊》、武汉的《劳动周报》、长沙的《劳动周刊》、香港的《劳动周刊》等。在各地工人运动中,出版有汉口《真报》、《陇海路总罢工》、《京汉铁路日刊》、《唐山潮声》、《安源旬刊》等。

(六) 五卅运动中的《热血日报》

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为了加强在五卅运动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国共产党除了强化《向导》的宣传外,特地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

《热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1925年6月4日创刊,出版至6月27日停刊,共出24期。该刊由瞿秋白负责筹办并主编,设有“社论”、“本埠新闻”、“国内要闻”、“国际新闻”、“紧要消

息”、“舆论之批判”等栏目。副刊“呼声”，主要刊载小言论、杂文、小通讯及文艺等，是一张4开4版，内容丰富的通俗政治性小型报纸。

在五卅运动中，《热血日报》打破舆论的沉寂和封锁，以发扬“民气”、“作被压迫民众的喉舌”为职责，及时报道评论运动发展形势，创刊号《发刊辞》表达了中国人民凭着沸腾的满腔热血敢与帝国主义搏斗的正气，发表长篇综述《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并依据中国共产党《告民众书》精神撰写社论《外人屠杀之反抗运动方针》，提出8项要求。《热血日报》的报道与评论阐明了“五卅”惨案的性质，指明了民众斗争的方针和要求，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暴行、阴谋和军阀政府的媚外行径，反映了世界进步力量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具有政治鼓动性和群众化特色。

（七）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团报刊的创办

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前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团的各级地方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又独立创办了一批地方党团报刊，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共党团报刊网络。

《政治生活》是北京地方委员会的机关报，创刊于1924年4月27日，赵世炎主编，主要撰稿人有李大钊、蔡和森、罗亦农、陈为人等。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政治生活》就成为区委的机关报。该刊报道评论政治时事，阐明中共方针政策，宣传介绍马列主义理论，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和阴谋，批判国民党右派、研究系、国家主义派、现代评论派破坏革命的言行，被誉为北方军阀黑暗统治下的一颗“明星”。

《战士》，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1925年12月创刊于长沙，出至1927年4月停刊，共出了42期。主要撰稿人有李维汉、毛泽东、谭平山等。该刊是政治理论性刊物，宣传鼓动当时蓬勃发展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它的中心内容，首次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人民周刊》，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出版的机关刊物，1926年2月7日创刊，至1927年4月30日停刊，共出50期，张太雷主编。该刊宣传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报道评述全国和广东的革命形势，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胜利进行北伐作出了努力。

其他各地区委的刊物也陆续出版。如豫陕区委的《中州评论》、湖北区委的《群众》、江西的《红灯》周报、浙江的《火曜》、福建的《革命先锋》等。此外，毛泽东领导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出版了《新时代》月刊。

共青团中央在上海先后出版的刊物，有《平民之友》、《青年工人》、《劳动青年》。五卅运动后，各地共青团组织出版的刊物有广东的《少年先锋》，北京的《烈火》、《北方青年》，湖南的《湖南青年》等。

四、国共合作期间的国民党报刊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随之，革命报刊也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统一战线报刊，日益兴旺，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一）国共合作后国民党报刊的发展

广州《民国日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起着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它是在广州《新民国报》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新民国报》创刊于1918年，至1923年停刊，改出《民国日报》。1924年10月，收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此时正值北京政变，冯玉祥邀孙中山北上之际，《民国日报》连续发表孙中山北上宣言、讲话，阐明北上的目的和意义。

同时国民党中宣部还改组了上海《民国日报》，使其成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报。该刊综合性副刊《觉悟》由邵力子、陈望道编辑，一批共产党员为其撰稿。《觉悟》坚持国共合作立场，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还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情况的文章。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都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宣传部有《政治周报》、农民部有《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工人部有《革命工人》、青年部有《革命青年》、军人部有《军人周报》、妇女部有《妇女之声》等。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也都出版了报刊,如湖南长沙的《民国日报》、《湖南工人》、江西南昌的《民国日报》、《贯彻日报》,湖北的《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北京的《民国日报》、《国民新报》等。

国民党还创办了一批军人报刊。黄埔军校出版了《军人周报》、《黄埔日刊》、《黄埔潮》半月刊等。该校的进步军人团体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了会刊《中国军人》、《青年军人》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出版有《革命军日报》、《政治工作周刊》、《军人俱乐部》、总司令部学生兵团出版有《学兵日刊》。据统计从1925年初到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前,仅在广东出版的军人报刊就有30多种。

(二) 《政治周报》与汉口《民国日报》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出版。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初由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主编,后由共产党人沈雁冰、张秋人接任主编,至1926年6月停刊,共出14期。该报主要刊载国民党中央和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要会议、文件、报告、知名人士的专稿,有部分新闻报道材料,辟有《反攻》专栏,刊发短小犀利的时评。该刊通过大量事实报道和评论,宣扬广东革命政府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成就,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业绩,揭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阴谋活动,揭示右派分裂的必然性,反击敌对宣传势力的反革命宣传,为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汉口《民国日报》是北伐军攻占武汉后,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北伐军总政治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合创办的,于1926年11月25日正式在汉口出版,1927年3月又确定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

后兼作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言论机关报。董必武主持创办，总主笔有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等，连同几名编辑，大都是共产党人。汉口《民国日报》刊载国内外重要新闻及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发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省党部、省政府的公报性消息、决定、指令等。着重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它的编辑方针、宣传计划、经营管理均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

(三)《中国农民》与《农民运动》

《中国农民》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主要撰稿人大多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有毛泽东、李大钊、彭湃、林祖涵、李立三等。该刊于1926年1月在广州正式出版，是理论性刊物，以农民干部为对象，主要刊载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介绍各地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和工作经验的文章，对农民运动的理论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1927年6月迁汉口，出版有《土地问题》专号。毛泽东发表的《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此外，该刊发表的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也都是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章。

《农民运动》是一份通俗刊物，1926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后迁武汉，1927年6月出版的第29期是现存的最后一期。该刊发表关于农民运动的政论文章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宣传材料，揭露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他们的武装势力残害农民的暴行，驳斥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同时广泛报道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的农民运动情况，反映各地农民对北伐战争的支援。

五、民营报业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给私

营报业的成长带来了有利条件,使得私营新闻事业出现了较大的发展。

(一)《申报》的发展

史量才独资接办《申报》后,1912年的发行量仅7000多份,经过他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50周年时已增加至5万份,资金积累成倍上升,发展成为实力雄厚的现代化企业报纸。

《申报》的迅速发展,首先得利于大力开展广告业务。史量才聘请擅长经营的张竹平任经理,在馆内创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很受工商界的欢迎,使得报上广告大为增加,从1910年前广告占版面的十分之五六增至1910年后的十分之六七。其次是重视发行工作,改进发行环节,设立报纸推广科。在稳定本地订户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外地订户,使外埠长期订户达1万多户。报纸销数,1917年2万份,1920年增至3万,1922年接近5万,1926年超过10万。

再次,引进先进技术,不断更新设备,创造迅速发展的物质基础。1918年建立电报大楼,接着又从美国购进最新的印报机,并添置配套的制铜板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最新、最完备的报纸。

《申报》为了避免在政治动乱中遭受摧残,标榜不偏不倚,实行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对一些政治问题,只报道、不评论,或多报道、少评论。聘陈景韩任总主笔,聘黄远生、邵飘萍任北京特派记者,在欧美各国首都,聘有特约通讯员。报社增设《星期增刊》、《常识》等多种专刊、专栏,加重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申报》是一家民族资产阶级报纸,具有一定的爱国性,在五四运动中,它真实报道、支持学生运动。它还同上海《时事新报》等联合拒登日商广告、拒绝采用日本人经营的通讯社的华文稿件。

（二）《新闻报》的兴旺

《新闻报》在汪汉溪任总经理后，苦心经营，报纸销数由1914年的2万份增至1921年的5万份，与《申报》并驾齐驱。

《新闻报》的重要做法，其一是以商为主，以经济新闻为重点，以工商界为主要读者对象。该报辟有经济新闻专栏，1922年又将之扩为专版，重金聘请经济学家主持，派专门记者采访，以快速准确地报道金融、股票、粮食、花纱等方面的市场消息，兼顾国际经济动态，深受工商界人士欢迎。《新闻报》还注意适应市民需要、扩大社会新闻报道，设有《快活林》等知识性、趣味性副刊、专栏多种。其二是借鸡生蛋、自我完善。开初，资金短缺，汪汉溪借款购进大量纸张，伺机出售，从中发了一笔大财。由此，他摸索出借款——还债——再借再还，以加快资金周转、加快事业发展的生财之道。其三是开拓广告与发行业务，更新技术设备。购进轮转印报机，设置无线电收报台等，都增加了《新闻报》的竞争实力。同时加强对广告的招揽和设计，甚至常刊登一些黄色下流的广告，《新闻报》广告发展的速度与刊载的篇幅比《申报》更快更多。

在业务言论方面，《新闻报》也标榜“无党无偏”，设有“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等言论专栏，用短评代社论。在五四运动中，该报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但当运动深入发展，上海出现罢工高潮，危及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时，当时主要产权仍属美商的《新闻报》，表现惊恐不安，并持反对态度。

（三）上海的其他民营报刊

《商报》。1921年元旦创刊，首创《商业金融》栏，刊发商业金融的评论和阐发经济思想的文章。它所刊载的国际总汇、贸易、国内行情市价消息，很受商界欢迎。主笔陈布雷以“畏垒”笔名撰发的评论，受到广泛注意，该报逐渐成为上海大报之一。

《时报》，1921年出售给房地产商黄伯惠后，发生了一些变化。首

先是注重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的采访报道,对画家刘海粟在“上海美专”选用裸体女模特等社会新闻,不遗余力,大肆渲染,以此招揽读者。其次是加强图片新闻。1920年,该报编辑戈公振创办一种《图画时报》,后来又加强摄影报道,增加图片新闻,做到图文并茂。再次是扩建设备,改进技术。黄伯惠投资建起了四层报馆新厦,购进新式印刷设备,发行《时报晚刊》,一度出版《时报》京杭版,从多方面增强竞争能力。

(四) 京津地区的民营新闻事业

在北京,邵飘萍于1920年7月复刊《京报》,并使之努力向现代化报纸方向改进。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派驻访员,设立分馆,创办昭明印刷局,建起2层楼新馆舍。努力改革业务,力求多发新闻,并讲求时效,加强对时局和战事的报道评论,鲜明支持人民爱国反帝斗争。先后办有《京报副刊》等13个副刊、专刊,日销数平时有四五千份,多时达6000余份。

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1925年2月创刊于北京,曾得到军阀政府资助。在此之前,还出版有《世界晚报》和《世界画报》。该报内容以政治、军事新闻为主,兼重教育新闻。注重业务改革,严格管理,创办多种专刊、副刊,连载长篇言情小说,吸引众多市民阶层读者,报纸日销最多达四五万份。

在天津,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天津《大公报》。此前天津《大公报》在安福系资本家王郅隆手中,成了亲日卖国的安福系言论机关报,声誉日降,销数惨跌,终于在1925年11月27日停刊。新记公司接办后,《大公报》由吴鼎昌出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复刊号发表《本社同仁之旨趣》一文,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办报方针,并以此形成特色。1927年,发行量由初期的2000份增为6000多份,成为北方大报之一。

此外,这一时期,也是都市小报发展较快的时期。以上海的“四大金刚”——《晶报》、《金刚钻》、《福尔摩斯》、《罗宾汉》为代表。这些小报,以刊登大报不载或不详载的社会新闻、奇闻轶事、内幕秘闻、街谈巷议为主,适应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报刊

一、国民党报刊

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积极兴办党营新闻事业,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新闻事业网,其骨干是以《中央日报》为首的各级党报。除了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国民党党报不占优势外,其他地区和城市的国民党党报都依靠执政党的权势取得了当地报界的领导地位。通过这张覆盖全国的党报网,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各地的新闻舆论宣传阵地。

《中央日报》1927年3月创刊于汉口,后于1928年在上海复刊,次年2月迁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傖兼任社长。《中央日报》创办初期设备简陋,人员很少,新闻仅依赖中央社和路透社的稿件,很少独家采访,所以读者不多,至1929年发行量仅2万份,远不及京沪一些报纸。1932年《中央日报》实行社长制企业化经营,程沧波出任社长。由于着意在编辑和经营方面加以改进,加之国民党中央在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扶植,《中央日报》有所起色,先后创办发行了《中央夜报》、《中央时事周报》,并引进新式轮转机和其他印刷设备,报纸销数很快增至3万份,为南京各大报之首,成为国民党内实力最雄厚的党报。

三十年代初期,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南昌行营政训处于1931年5月创办了《扫荡三日刊》，这是一份32开的小册子，对象为“剿共”前线作战的军队官兵，由军内政工系统发行。一年后，《扫荡三日刊》改名为《扫荡日报》，发行范围不再限于军队内部，还附带发行《扫荡旬刊》、《扫荡画报》，另外编印了《扫荡丛书》13种。《扫荡日报》积极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它的编辑方针明确提出“在军事方面是：激励士气”，“在政治方面是：阐扬三民主义，宣传政策政纲”。1934年10月，红军撤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扫荡日报》结束了南昌时代，1935年迁往武汉改名《扫荡报》继续出版。《扫荡报》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强新闻报道，扩充各种设备，加之该报在军事报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使《扫荡报》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大报。抗战胜利后，《扫荡报》一度发行8个地方版，形成一个庞大的报团。该报规模之大，历史之久，发行网及社会影响之广，不仅在军队系统报纸中独一无二，而且几乎可以与国民党最大的党报《中央日报》并驾齐驱。

在国民党兴办中央新闻事业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党报也纷纷创刊。各地党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区性的重要报纸，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辖；另一类是由地方党部管辖的报纸。

前一类报纸主要有：

《华北日报》，1929年元旦创刊于北平，由李石曾、段锡朋、沈尹默、肖瑜等人组织委员会主持。日出三大张，版面编排新颖，比较重视吸收北平各大学学生参加工作，委托国外留学生发国际新闻。该报还办有学术月刊和画刊，在北平文化界有一定影响。

英文《北平导报》，国民党人士购买美国人柯东文的英文《北京导报》后改名所办，1930年1月10日创刊。该报是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唯一的外文报。创办不久即逢军阀混战，北方政局变动，一度停刊，9月又复刊。1932年，该报因刊登高丽独立党宣言，得罪日本侵华势力，被封禁停刊。经疏通后改名《北平时事日报》复刊，聘英国人李诒

为总编辑,在外国人旗号下出版。

《天津民国日报》,原为河北省党部创办的《河北民国日报》,在北平出版。国民党中央以北平已有直属的《华北日报》,而天津无直属报纸为由将《河北民国日报》迁至天津,1930年11月1日正式改名出版。

《武汉日报》,前身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所办之《湖北民国日报》,国民党中央加以改组,1929年6月10日正式出版《武汉日报》。该报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国民党党报,社长由中宣部部长兼任。该报比较重视新闻、广告和发行,发行点远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

《西京日报》,1933年3月10日创刊于西安,该报是国民党在日本侵华势力加紧向华北渗透,全国建设西北的呼声日高的形势下创办的。在“西安事变”中,该报一度被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接收。

《福建民报》,原为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在北伐战争中所办,先后易名为《福建新报》、《新福建报》、《福建民国日报》,1934年3月恢复原名,归属国民党中央宣部管辖。

《广州中山日报》,原为1924年10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广州民国日报》,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屡易其主,主要为粤方喉舌。1936年7月,蒋汪合作之后,该报改此名并归国民党中央宣部管辖。

后一类报纸大都由国民党省、市、县各级党部所办,数量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一般在省会所在地以及重要城市都有国民党党报,而且这些报纸几乎都采用“民国日报”的统一名称,如《山东民国日报》、《河南民国日报》、《绥远民国日报》、《宁夏民国日报》、《甘肃民国日报》、《云南民国日报》、《杭州民国日报》等等。

除了以党营名义强化中央各新闻机构、军队系统的报刊外,国民党内其他政治派系也先后创办或控制了若干报刊。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CC系依仗执掌国民党党务大权,通过各地骨干主持着一大批报刊,主要有上海的《晨报》、《朝报》、《社会新闻》,南京的《政闻周

刊》、《民意周刊》，浙江的《东南日报》，湖北的《武汉日报》等等。各地党部所办的《民国日报》，也多半由CC系分子把持。

《晨报》是CC系的一家重要骨干报纸，创办于1932年，该报在新闻业务上比国民党其他报刊更胜一筹，重视言论，编辑精湛，其发行量一度达到5万份。《晨报》坚持拥蒋反共的立场，详细报道蒋介石指挥军队“围剿”根据地的情况，并发表社论为蒋介石出谋划策。该报办有众多副刊并发行《晨报晚刊》、《儿童晨报》、《图画晨报》。

国民党内一些反蒋介石的政治派别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进行反蒋活动，扩大政治影响，也出版过一些报刊。其中以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出版的报刊声势最大，最为系统。改组派的主要宣传阵地 在上海，出版的报刊有《革命评论》周刊、《前进》月刊、《民意》周刊、《中华晚报》等，改组派还出版有南京《夹攻》周刊、成都《社会日报》，以及《新创造》、《民主》等刊物。

《革命评论》创刊于1928年5月，由陈公博主持。《革命评论》积极宣传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宣扬既不要共产党，也不要蒋介石，以把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恢复民众运动”，实行“党的民主化”，反对个人独裁等相标榜，同蒋介石争夺党权、政权。该刊一度发行1.5万份，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和一些大学里流传颇广。为此，刚创刊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连续几期发表文章，批判《革命评论》，指出反共反对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主张“党外无党”，就是维护现行国民党统治。1928年9月《革命评论》因国民党查禁被迫停刊。

《前进》创刊于1928年6月，由顾孟余主持。《前进》的论调比《革命评论》更右，虽然也反对蒋介石，但也反对阶级斗争和民众运动，该刊的影响比《革命评论》小得多。

三十年代初期，希特勒鼓吹的法西斯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国民党内也掀起一股法西斯理论热，出版了一批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南京《中国日报》和上海《社会主义月刊》。

《中国日报》，1932年1月创刊，主持人康泽。该报版面严肃，头版一般不登广告。新闻采取混合编辑法，按重要程度依版排列。该报对副刊很重视，最多时有7个副刊，一周轮换一次，每天一个，内容十分广泛。《中国日报》明确地表现了忠实于蒋介石统治的政治倾向，在新闻报道中有选择地刊登维护蒋介石中央的消息，宣扬国民党军队在“剿共”前线的“胜利”，以及分化瓦解地方势力的成就。在言论上千方百计地为国民党“攘外安内”政策作辩解，并宣扬法西斯理论，鼓吹“一党独裁”、“领袖中心”，赞扬希特勒在德国取得的“成就”。该报还专门创办《挺进》副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法西斯主义，主张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

《社会主义月刊》于1933年3月发刊，创办者为国民党内一群骨干组成的“社会主义学会”。该刊奉各国的法西斯头目为英雄，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他们在本国的“成就”，探讨法西斯和中国的关系，论证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的必要。并提出要建立一个领袖、一个法西斯党、一支别动队，以此来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

由于战争的需要，国民党还着力创建与发展战时军队报纸，这个时期的军报系统主要包括《扫荡报》、《阵中日报》和《扫荡简报》三大类。《扫荡报》是这个军报系统的中心，抗战爆发后，该报除坚持在武汉出版外，还在内地一些重要城市创设了分版，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报系。《阵中日报》系统在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开始发展起来，最初由国民党中央军委会主办，分为北战线版和南战线版。在全国分为10个战区后，《阵中日报》也增加到10个分版，由各战区司令部主办，以所辖战区军民为读者对象，除军中发行外，兼向社会发行。《扫荡简报》是一种流动性的小型油印战地军报，由各集团军主办，先后约出有50种。

二、共产党报刊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宣布取缔共产党及其活动。共产党的报刊以及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任何报刊,或被查封,或被改组,或被迫“自动”停刊,无一例外。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并重建自己的报刊系统,秘密出版地下报刊。但是,由于国民党严厉的新闻统制,以及中共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共产党的报刊处于极其艰难的境地,以至于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及时转向农村,并创建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的报刊也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不仅求得了生存,而且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在全国占据了统治地位。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出版中心,在这里出版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报刊,也有各个革命团体的中央机构的报刊,还有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地方组织的报刊,以及工厂、学校出版的油印报和墙报等。

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秘密报刊主要有:

《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24日创刊,由瞿秋白主编,这是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办的第一份秘密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以评述国内外形势、政治经济问题为主要内容,集中抨击国民党叛变革命,并批驳了国民党改组派和托陈取消派的言论。但是《布尔塞维克》也宣传了“左”倾盲动主义,片面强调革命高潮的到来,主张以城市为中心举行暴动,给当时的革命斗争带来了损失。

《红旗》,该刊是中共中央地下政治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初为周刊,1930年8月15日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红旗》创刊初期,强调发挥政治鼓动作用,把重点放在评述“国家大事”上,同现实的革命活动联系较少;数期后,强调发

挥指导作用,大量刊载文件,内容枯燥;从第40期起,该刊明确为“全国政治机关报”,面向全国,既指导实际斗争,又评述变化中的形势。

《上海报》(初名《白话日报》),1929年4月17日创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的一份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报纸,1930年8月并入《红旗日报》。《红旗日报》以新闻报道为主,还采用读者来信、问答、诗歌、照片插图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一般日销3000份,最多时销到8000份,被称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唯一的报”。

大革命时期共青团中央办的《中国青年》(先后改名《无产青年》和《列宁青年》)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办的《中国工人》,这时也先后秘密复刊。

此外,一些地方党团组织也出版了地下报刊,这些报刊都在城市出版,以油印的不定期小报居多,也有铅印的报纸和刊物。共产党影响很大的武汉、广州等城市,是秘密报刊出版最快最多的地方。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统治区(除上海外)在1930年出版的革命报刊有12家。但是到1932年前后,随着共产党在国统区工作的全部丧失,共产党的地下报刊也全部停办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根据地初期的斗争,基本上是红军的武装斗争。在红军的宣传活动中,出现了一批根据地报刊,最早的是古田会议后出现的《时事简报》。

《时事简报》是手抄壁报,它的内容主要是报道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和红军工作情况,一般每周编写张贴一张。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签发了一份《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知,并附有《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要求红军和地方工农民主政权普遍创办这种壁报,认为它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时事简报》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根据地被封锁,消息不灵

通、群众见闻狭隘的状况。

创建根据地初期,在攻占一些城市后,红军创办了一些以工农兵为对象的报纸,一般为油印石印,少量铅印。这些报纸计有红五军的《工农兵》报、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八军的《工农兵》报、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中央军委的《红军报》等。

《红军日报》是红军报刊中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铅印对开大型日报,1930年7月29日创刊于长沙,8月4日停刊,共出版6期。它是红军夺取敌人的印刷设备出版的,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立即接收国民党的长沙国民日报社的房屋、印刷厂等全部设备,出版《红军日报》,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张报纸面向工农兵大众,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还出有综合性副刊《红军》专页。

《红军报》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办,大约创刊于1930年9月,这张报纸消息丰富,除发给红军外,还发给江西苏区各级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为遍布苏区的《时事简报》提供材料。

到193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先后创建了10多块根据地,建立了各级工农政权,并创办了大量报刊。1933年秋,仅中央苏区就有各种大小报刊34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红色中华》报。

《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初创时为周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第50期以后,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同时改出三日刊,至第148期又改为双日刊。《红色中华》为铅印4开报纸,一般出4版到8版,发行量最多时达到4万份,并出版不定期副刊《赤焰》。1934年暂时停刊,1936年在陕北瓦窑堡复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色中华》报为适应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势,改名为《新中华报》,作为陕甘宁政府的机关报,迁至延安出版。

《红色中华》报是根据地第一张出版时间较长的中央级铅印报纸,它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帮助政府进行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该报还大力宣传贯彻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种种罪行,抨击国民党的政策,宣传报道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消息。

在根据地出版的中央一级报刊还有:

《斗争》周刊,创刊于1933年2月,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每月约出3期,发行2.7万份,在根据地内部发行。它的内容主要是登载中共中央的决议、指示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毛泽东写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典型性调查报告,就发表在《斗争》上。

《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1933年8月以后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主持过该报的编辑工作。《红星报》是工农红军出版的第一张铅印报纸,在瑞金出版的3年中,该报办得丰富多彩、图文并茂、通俗生动,每期发行1.7万份。在长征途中,《红星报》代替了《红色中华》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宣传机关,一直坚持出版。

《青年实话》,1931年7月创刊,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该刊具有鲜明的青年报刊特色,编排形式和内容多样活泼,文字通俗生动,在红军青年战士中很受欢迎,其影响仅次于《红色中华》。

《苏区工人》,1932年5月创刊于瑞金,是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该报的任务是指导与推进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着重反映报道苏区职工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报刊有了很大发展,延安成为当时革命报刊的中心。特别是从1939年到1941年,延安报刊有了一个大发

展,创办了一批重要报刊,主要有:

《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1月15日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编委会由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等组成,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主编。毛泽东为它写了发刊词,指出该刊出版的意义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1942年停刊。

《中国青年》,1939年4月16日出版,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主办,胡乔木主编。该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青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无产青年》和《列宁青年》的继续,1941年3月停刊。《中国青年》曾发表毛泽东的《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两篇文章,为青年运动指明了道路。

《中国妇女》,1939年6月1日创刊,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毛泽东为该刊的出版题了词,强调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意义。1941年3月停刊。

《共产党人》,1939年10月20日创刊,是中共中央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党内刊物。1941年8月停刊。毛泽东为该刊写了发刊词,指出这个刊物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发刊词还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三条根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指出这三者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中国工人》,1940年2月7日创刊,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毛泽东在为该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工人》的任务就是“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发刊词还论述了如何办好报刊,指出办一个刊物,“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中国工人》在边

区的工厂、学校、商店,普遍建立了通讯小组或设有通讯员,为该刊的各个栏目提供稿件。

《中国文化》,1940年2月15日创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1941年8月20日出至第三卷第3期终刊。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首先登载在该刊上。

这个时期,其他解放区也创办了一些党委机关报,主要有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山东解放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晋西北解放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晋察冀解放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华中解放区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等等。

从1941年开始,由于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普遍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为了战胜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和发展经济等各项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根据地的报刊进行了调整和精简,停办了一大批报刊,集中力量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此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延安出版的报刊主要就只有《解放日报》和《边区群众报》。

《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是中共中央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的《今日新闻》合并后创办的,1947年3月停刊。《解放日报》是在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报纸。毛泽东经常亲自指导《解放日报》的工作,为它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论、新闻和文章。《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宣传贯彻共产党的总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经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解放日报》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创造了丰富的无产阶级报刊工作经验,而且推动了解放区整个新闻工作的改革。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中共党报史上的一件大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党的机关报中普遍存在的报风不正

的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3月16日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改革党的新闻工作的具体意见。3月底毛泽东亲自参加《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改版宣言《致读者》,开始了整风改版,直至1944年3月才告结束。《解放日报》改版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调整了版面编排,打破了过去那种“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的框框,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报道放到重要地位;第二,改变了党八股的腔调,树立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和言之有物的文风;第三,贯彻了“全党办报”的方针,从中央到各级党委都建立了党报委员会,经常研究报纸的工作,报社则取消了个人负责的主笔制,成立编委会进行集体领导,并在各级党组织建立了通讯网;第四,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进行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建设,使之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边区群众报》创刊于1940年3月25日,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大众读物社主办。创刊时由谢觉哉任社长,胡绩伟任主编。该报是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后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1948年1月该报改为《群众日报》,1954年10月又改为《陕西日报》。《边区群众报》是延安创办的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最广的一种报纸。它主要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对象,是一张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小报。它一方面要做到正确地宣传重大的政治任务,一方面又要做到通俗、明白,去适合文化比较落后的边区群众。该报在通俗化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识字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读者称赞它“念着顺口,听着顺耳”。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先后出版了公开机关报刊《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

《群众》周刊于1937年12月11日创刊,至1947年3月2日,上海版出至第14卷9期后被迫停刊。该刊是由《新华日报》的编辑人员负责编辑的。

《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底迁至重庆出版,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新华日报》前期由中共南方局(最早为长江局)领导,1946年春以后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兼任《新华日报》的董事长。

《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的出版,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改变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公开出版的机关报的状况,从此中共可以更直接、更迅速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自己的主张。《新华日报》和《群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宣传了持久战的思想 and 中共全面抗战的主张,反驳了亡国论、速胜论以及国民党片面抗战的主张。毛泽东曾赞扬《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它的作用抵得上一个方面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在这里出版了许多进步报刊,这些报刊在争取人民民主和全国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报刊主要有:

《华商报》,该报1941年4月创刊,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停刊。1946年1月4日复刊,复刊后的《华商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的报纸。董事长是香港爱国人士邓文钊,总编辑是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总经理是民盟负责人萨空了,共产党的负责人是章汉夫。复刊后,该报主张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大量刊登新华社电讯和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本报言论也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针。1946年6月该报广州营业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遂通过秘密渠道从香港向华南和内地发行。解放战争时期,该报在香港、澳门及东南亚销量达10万份。对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起了良好的宣传作用。1949年广州解放后《华商报》停刊,工作人员撤到广州筹办《南方日报》。

《群众》周刊,它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刊

物,1937年创刊于汉口,香港版创刊于1947年1月。上海版停刊后,该刊曾用各种伪装封面出版后运到国统区发行,1949年10月停刊。

《正报》,1945年11月13日创刊,中共广东省委主办,是抗战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公开出版的第一家小型报纸。该报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对时局的主张,经常刊载中共领导人的言论、《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的社论。《正报》注重登载独家新闻和时事分析,体裁多样,文字简短通俗,富有知识性、趣味性,每期约销8000份。1948年11月13日停刊。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公开或秘密地出版了一些报刊,主要有:

《文萃》周刊,创刊于1945年10月9日,该刊是由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民主人士创办的。起初,它是一份集纳性和文摘性刊物,转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进步报刊言论,1946年初改组为时事政治刊物,成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刊物。1947年3月该刊转入地下,改名《文萃》丛刊。同年7月,该刊被国民党军警查封,主要工作人员共产党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被捕,后遇难,史称“文萃三烈士”。

《解放》报,1946年2月22日创刊于北平,总编辑钱俊瑞。该报是中共在北平创办的一份公开出版的机关报,其发刊词表示,要“致力于和平民主建设为宗旨”。其发行量最高达5万份,超过华北著名大报《大公报》。1946年5月29日,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当局查封了《解放》报,钱俊瑞等30余人被捕。

《挺进报》,1947年2月创刊。它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秘密出版的油印报纸,专门抄收刊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稿。该报后被国民党发现,编辑和出版人员陈然、成善谋被杀害。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办报活动开展得最早、报刊办得最多的地区,中共在上海领导出版的报刊,影响较大的除了《文萃》周刊,还有《联合日报》、《建国日报》、《消息》半周刊、《群众》等。此外,

还有中共上海“职委”主办的《人人周刊》、“教委”指导出版的《教师生活》、“工委”指导工运的刊物《生活知识》、面向工商界人士的刊物《经济周报》、“学委”出版的《学生新闻》，以及中共领导的《世界知识》、《文坛月报》等。

1947年下半年，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相继攻克一些城市，中共在这些城市创办了一些新的机关报。随着中共战略反攻的不断胜利，解放区新闻事业也开始了由农村向城市的发展。1947年11月，解放军攻克石家庄后出版了《石家庄日报》（初名《新石门日报》），这是关内第一个新解放大城市的报纸。以后又出版了山东的《新潍坊报》、济南的《新民主报》、开封的《开封日报》等等。1949年1月，北平、天津相继解放，《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分别在两地创刊。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迁至北平出版，开始发挥全国性报纸的作用，后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同年6月，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创刊；7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创刊；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于1949年5月创刊于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仅1949年创刊的中央一级、中共中央局以及各省市的报纸就有21家。另外，一些重要的全国性刊物，如《学习》、《中国青年》、《文艺报》等，也及时出版。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型报刊网已经形成，中国的报刊出版业从此跨入一个新时代。

三、民营报业的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事业都有一定发展，民营报业也随之呈现相对繁荣的局面。三十年代是民营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民营报刊数量增加，销行数字迅速增长，一报多馆、报业联合和兼并等现象时有出现，报业托拉斯趋向也在中国开始了。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些报业资本家利用这个时期有利的社会条件,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事业,或是兼并其他报纸,或是在别的城市创设子报,或是几家报纸联营,形成了报团雏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四社,即上海“《时事新报》、《大晚报》、《大陆报》、申时电讯社四社联合办事处”的简称。四社的创始人是张竹平,他于1928年创立申时电讯社后,先后与人合股购下上海《时事新报》、英文《大陆报》,并与他人合办了《大晚报》。1932年,张竹平将他主持或参股的三报一社揉合到一起,成立了四社。四社成立以后,四个新闻机构在新闻报道和业务经营上互通有无,进行合作,在新闻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世界日报》报系,成舍我继创办北平《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之后,又在南京和上海分别创办《民生报》和《立报》,形成了以成舍我为中心的《世界日报》报系。

新记大公报公司,30年代以后《大公报》在经营上、业务上取得很大成就,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先后出过上海、汉口、香港、桂林等版。

在各个报团的报纸中,《大晚报》、《民生报》和《立报》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民营报纸。

《民生报》,1928年3月在南京创刊,社长成舍我,总编张友鸾。《民生报》是南京的第一张小型报,该报按照成舍我的“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的认识,采取“小报大办”、“精选精编”的方针,“重视言论,竞争消息,广用图片”,内容生动充实,印刷精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民生报》最多时发行到3万份,超过了南京《中央日报》的销数。1934年5月,《民生报》因揭露汪精卫部属彭学沛贪污舞弊,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报纸被封。

《大晚报》,1932年2月在上海创刊,1949年停刊。张竹平主办,曾虚白主编。该报初名《大晚报国难特刊》,5月2日改称《大晚报》。

1932年上海淞沪战争之后,市民对于时局的迅速变动甚为关注,日报已显不足,上海报界于是出现“晚报热”,《大晚报》也是在这股潮流中诞生的。该报文字采用白话体,编辑讲究趣味化,特别重视采访战事消息。《大晚报》设有“读书界”、“摄影趣味”、“女性与家庭”、“旅行者”、“侦探秘话”、“游兰座”和“活动增刊”等七大副刊,轮流刊出。1934年7月发行的副刊《火炬》,是30年代上海报界引人注意的文艺副刊之一。《大晚报》销数最高达7万份以上,为上海晚报之冠。

《立报》,1935年9月26日在上海创刊,1949年4月30日停刊。社长成舍我,张友鸾、萨空了先后任总编辑。《立报》以“使每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国家的关系”为办报宗旨,提出“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的办报口号。对国内外要闻进行精编,信息容量大,重视独家新闻的采集,全面抗战爆发后,该报曾刊发大量独家新闻通讯。《立报》重视评论,在言论和新闻报道中始终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立报》着意经营副刊,所办《言林》、《花果山》、《小茶馆》三个副刊各有特色,受到读者欢迎。《立报》是当时著名的小型报,其发行量一度突破20万份,居全国报纸发行之首位。

这一时期其他重要的民营报纸还有:

《新民报》,该报1929年9月在南京创刊,社长陈铭德,后成为拥有五社八版的报团,为旧中国著名的全国性民营报团。创刊之初,报纸主要采用中央社稿,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宣传。“九一八”事变后,该报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生矛盾,宣传抗日救亡。西迁重庆后,宣传长期抗战的观点,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该报曾开辟“延安通讯”专栏,比较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抗战胜利后,该报团的主要报纸南京版晚报和上海版晚报倾向中共,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不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南京总馆、成都馆、上海版晚报被封,多名编辑人员被捕遇害。

《实报》,1928年10月创刊于北京,社长管翼贤。该报采取“小报

大办”、“广采精编”的方针,在读者中获得“消息灵通、报道及时”的称誉。此外,该报开辟有十几种专版、专栏,投合了部分读者的趣味。《实报》最高发行量达到 14 万多份,居华北各报发行之首。“九一八”事变后,该报一度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并组织募集抗日捐款、抗日慰问品等。但北平沦陷后,管翼贤叛国附逆,《实报》也沦为汉奸报纸。

《社会日报》,创刊于 1929 年 11 月,是三十年代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小报,由胡雄飞创办。《社会日报》与旧式小报颇有不同,它注意刊载读者关注的政治新闻和言论,关心政局,言论大胆,很受读者欢迎。《社会日报》除第一版外,其他三版都是副刊,该报打破小报发表旧文学的惯例,刊载了新文艺作家的若干作品。《社会日报》的销量最高达到 2.5 万份,在当时的小报界名列前茅。胡雄飞还创办了《社会日报》的姐妹刊——《社会周报》和《社会月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社会日报》停刊。

《南京人报》,1936 年 4 月在南京创刊,1949 年 1 月终刊。该报是一份小型日报,由张恨水出资创办并自任社长,张友鸾任副社长兼经理。《南京人报》通俗易懂,张恨水在该报发表的章回小说《中原豪侠传》、《鼓角声中》很受欢迎,该报销数最高达 1.5 万份。1937 年至 1946 年间停刊,复刊后由张友鸾任总经理,郑时学任总编辑。

《力报》,1937 年 12 月 10 日在上海创刊,胡力更创办并任经理。《力报》是上海沦陷后,在“孤岛”租界内最先问世的小报,该报日出一小张,以薄利多销、增大报纸容量等手段赢得销路,发行量达 3000 份,在“孤岛”小报中占第二位。

四、抗日救亡报刊

1937 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统治区新闻事业奋起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迅速出现一批以宣传抗日为使命的报刊。抗日报

刊的奋起,是抗战时期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一个显著特点。

“八一三”抗战后,上海率先出现了一大批抗日爱国报刊,成为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救亡日报》。

《抗战》,1937年8月19日创刊。这个在炮火中诞生的刊物,“内容力求适合抗战紧急时期的需要”。该刊系统报道评论国内外时事,宣传反映全民抗战的呼声,曾刊载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朱德、彭德怀联署的抗日通电等文件。在业务上,该刊刊期短,篇幅小,时事性强,信息量大,精心编辑新闻报道,着力发展政论、述评与战地通讯,每期还有《战局一览》的附图。迫于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力,《抗战》从第7号起在上海发行的部分改名为《抵抗》三日刊。从第25号起,该刊又恢复原名,迁往武汉出版。

《救亡日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11月21日上海沦陷后被迫迁往内地出版。该报是一张实行统一战线的报纸,编辑委员会中有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其他抗日人士,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该报创刊伊始即高举团结抗战的鲜明旗帜,以真诚态度、丰富内容、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实地的战事采访,赢得广大读者喜爱。创刊时发行量即达1000份以上,最多时销3500份。《救亡日报》不登中央通讯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只刊登本报记者采写的专稿和讨论,社长郭沫若带头到前线采写稿件。它虽然是一张4开4版的小型报纸,却拥有一支强大的写作队伍,报纸的编辑部由文化名流组成,并团结了一大批著名作家、政界名人、专家教授撰稿,在当时的抗日救亡报刊中,该报的言论具有权威性,号召力强。《救亡日报》还具有文艺性的特点,刊登了大量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戏剧小品、特写等,在当时被称为“报纸杂志化”的典型。

与《抗战》、《救亡日报》奋起的同时,《战时日报》、《呐喊》、《战时联合旬刊》、《文化战线》、《战时妇女》、《战时教育》、《战线》、《前线》、

《救亡漫画》、《救亡周刊》、《战时大学》等抗日报刊也在上海纷纷出版。

《战时日报》创刊于1937年10月5日,该报是由上海10家消闲性小报联合出版的报纸,由冯梦云发起并任主编。该报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发表了国民党部分爱国军队和八路军抗击日军的大量新闻、特写和报告文学,还发表过毛泽东、朱德、丁玲、田汉等人的文章诗作。《战时日报》的出版,不仅表现出小报界的爱国倾向,也表明一盘散沙的小报界的空前团结。

《呐喊》创刊于1937年8月25日,由《文学》、《文季》、《中流》、《译文》四家杂志联合创办,茅盾、巴金任主编,后改名为《烽火》。《战时联合旬刊》创刊于9月1日,由《世界知识》、《妇女生活》、《中华公论》、《国民周刊》四家杂志联合出版,金仲华主编。《救亡周刊》创刊于10月10日,由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主办。这些抗日报刊的共同特点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紧密结合抗战实际。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大中城市中,也创办了一批抗日报刊,主要有:

《老百姓报》,1937年11月12日在西安创刊,教育家李敷仁主编,以工农群众为主要读者对象,文字通俗,发行1万多份,居西安各报之首。

《救中国》周刊,1937年10月在武汉创刊,胡绳主编,供工农兵及一般识字不多的民众阅读。

《星芒周报》,1937年9月18日在成都创刊。

《抗敌导报》,1937年9月25日在厦门创刊,以“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名义出版。

《大公报》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创刊,张季鸾、曹谷冰创办与主持。该报以“统一团结抗战建国”为宣传主旨,鼓励全国军民在失败中奋起,争取最后胜利。

《全民抗战》，1938年7月7日在汉口创刊，由《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而成，邹韬奋任主编兼总发行人。该刊积极宣传全国民众武装抗战的主张，曾出版“战地版”和通俗版周刊，最高销数达30万份。1941年2月22日，该刊因报道“皖南事变”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在沦陷区的一些城市中，新闻界的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出版了一批地下抗日报刊，进行抗日宣传。如天津就秘密出版有《纪事报》、《炼铁工》、《抗战》、《匡时》、《火线上》、《突击》等20多种抗日小报。其中以高仲明个人名义发行的油印《纪事报》，依靠抄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稿件，前后出版了700多期。

英、美、法管辖的上海租界地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未被日军占领，孤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被称为“孤岛”。由于日本侵略者在租界内设立新闻检查所，强令中国报纸接受新闻检查，一些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就利用外国商人的名义，创办了一批中文的抗日报刊，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到1939年，这类挂洋商招牌的“洋旗报”已有15种之多，总销数达20万份左右。

“孤岛”抗日报刊中比较重要的有：

《译报》，1937年12月9日创刊，4开小型日报，夏衍主持。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报纸，其所有新闻和文章都译自外国通讯社和在上海出版的外文报纸。《译报》精心选择材料，揭露日军侵略行径，报道抗日形势，宣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主张，日销万余份。由于日本侵略军和租界当局的迫害，《译报》出版12期就被迫停刊。1938年1月21日，《译报》改出以英商名义发行的《每日译报》，并增加刊登自编的新闻、专栏、专刊和副刊，转载《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等进步报刊的文章，改变了纯翻译外报稿件的性质。1939年5月18日被迫停刊。该报还出版有综合性丛刊《公论丛书》和《译报周刊》。

《文汇报》，1938年1月25日创刊，由严宝礼等爱国人士集资以

英商名义创办。《文汇报》坚持民族大义,大力宣传抗日救国。该报除突出报道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活动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也作了大量的宣传与报道。《文汇报》的副刊、专刊颇有特色,先后辟有《文会》、《世纪风》、《灯塔》等文艺副刊和《读者园地》、《自学周刊》、《法谭》等专刊。其中《世纪风》办得最为成功,是“孤岛”上的一个强大的抗日文学堡垒。

《导报》,1938年4月2日创刊,该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报刊,以英商名义发行。该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鼓舞群众斗志。在1939年5月9日国耻纪念日,《导报》发表大量抗日文字,被租界当局以“宣传抗日、言词激烈”下令停刊一周。《导报》的影响仅次于《每日译报》与《文汇报》。

《每日译报》和《文汇报》的创刊,带来了“孤岛”抗日报刊发展的新局面。《国际夜报》、《通报》、《大英晚报》、《循环报》等英商报纸纷纷创刊,建立起一个以“洋旗报”为主体的抗日宣传阵营。此外,一些国民党报纸也以外商名义在租界创办,如《中美日报》、《正言报》都是由国民党人实际创办并主持。

“孤岛”抗日报刊发展的另一重要现象,是各类抗日期刊与丛刊的大量涌现。1938年后,与“洋旗报”崛起的同时,各类抗日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总数不下数十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华美》周刊,创刊于1938年4月,该刊是以美商名义发行,实际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时事政治性刊物,被当时上海杂志界称为“最精彩、最富战斗力的一个周刊”。

《文献》月刊,创刊于1938年10月10日,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份时事政治性刊物,以发表抗战文献为主,由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发行。

《职业生活》,创刊于1939年4月15日,是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的机关刊物,初以英商《国际日报》增刊名义出版,后因《国际日报》发

行人被汪伪收买而改为独立出版。

《上海周报》，创刊于1939年11月1日，以英商名义出版，实际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机关刊物。

《时代》周刊，创刊于1941年8月20日，是中共以苏商名义发行的时事政治性刊物，内容主要是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情况。

这一阶段，国民党以及其他爱国力量也创办了不少抗日期刊，如《中美日报》、《大美晚报》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也是抗日报刊的重要基地。由于内地大片国土沦陷，许多报纸被迫停办或落入敌手。《申报》、《立报》、《大公报》等著名民营大报先后出版香港版，投入抗日爱国宣传。《星岛日报》和《生活日报》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两家抗日报纸。

《生活日报》，1936年6月7日在香港创刊，邹韬奋任社长，同时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该报以“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宗旨，大力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内战。该报在业务上也有所改革，创造了一种“研究化”的新闻报道方法。为扩大该报在全国的影响，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该报于1936年7月31日在香港自动停刊，拟迁上海出版。《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名为《生活日报周刊》，在香港继续出版，后又改为《生活星期刊》，迁往上海出版。

《星岛日报》，1938年8月1日创刊，华侨企业家胡文虎出资经营，金仲华任总编辑。该报先后创办《星岛晚报》、《星岛晨报》、《星岛周报》，影响十分广泛。著名作家杨潮（羊枣）曾任该报军事评论员，撰写各个战场的军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星岛日报》在金仲华主持的三年中，始终突出了反法西斯的鲜明特点，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坚决批判和揭露汪精卫及其党羽散布的失败主义言论。

第四章 中国近代通讯社与广播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通讯社的产生和发展

通讯社又叫消息总汇,是专门搜集和发布新闻的通讯机构。通讯社是近代报业发展到较大规模的产物。通讯社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新闻事业不断拓展的重要标志。

一、清朝末年通讯社的萌生

在中国出现的最早的通讯机构,是1872年路透社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中国人自办的通讯社,产生于二十世纪初年。从二十世纪初年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是中国民族通讯社的萌生时期,先后产生过4家小规模通讯社。这些通讯社都是私人创办的,但有的完全属于民营,有的具有官方性质,有的带有政治党派色彩,初步显示出中国近代民族通讯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兴通讯社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通讯社,1904年1月诞生于

广州。该社由骆侠挺创办并主持,是一家民营通讯社,社址在广州中华中路回龙里23号,首次发稿日期是1月19日,主要发稿对象是广州和香港的中文报纸。

远东通讯社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二家通讯社。该社1909年成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清政府驻比利时公使的随员王慕陶以私人身份创办的。该社的经费大半来自清政府原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南北洋大臣、东三省总督和外务部,并且由政府暗中主持一切,因此实际上是官办通讯社。之所以由私人出面主办,是考虑到倘若与外国发生纠葛,不至牵及政府。

该社的创办目的,是抵制西方新闻媒介在中外争端中的歪曲宣传与报道,加强对外宣传,以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因此,主要工作是将中国国内新闻稿,由所聘的英文、法文、德文等翻译译成外文,发送给英、法、德、俄、奥、意、荷、比、西班牙、瑞士等欧洲国家的主要报纸,数目达900余家。为保证国内新闻通讯稿件的来源,该社在国内京沪等大城市聘请了一批著名报人担任特约通讯员,如北京的汪康年、黄远生,上海的陈景韩、雷奋等。同时,该社还采集国际新闻,向国内各报提供外国消息,并收集外交、军事、财政、金融等方面的信息和材料,供清政府办理“新政”和对外交涉时参考。为更好地对外宣传,该社在布鲁塞尔还创办出版了法文杂志《黄报》,并一度在上海设立总社等机构。1910年,世界新闻记者公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大会,王慕陶被接纳为会员,并代表中国参加了会议。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远东通讯社停止了活动。

此外,还有1911年2月在广州成立的展民通讯社,是杨实公创办的。

清朝末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宣传民主革命,也曾努力创办通讯社。1908年八九月间,孙中山曾在欧洲与中国留学生计划创办通讯社。1909年11月3日,上海的革命报纸

《民吁日报》还发表了《今日创设通讯部之不可缓》的社论,公开倡议创办通讯社。由于种种原因,革命党人的上述计划未能真正实施。但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革命团体湖北共进会会员胡祖舜,曾以他在武昌的住所为基地,联系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一个专门采访新闻、分送各报的机构。这个未向政府注册登记、未有正式名称的机构,实际上已是带有党派色彩的通讯社。

二、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通讯社事业的初步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后,伴随着空前的报刊出版高潮,也出现了一个创办通讯社的高潮,仅1912和1913年两年里,全国就涌现出数家通讯社,主要有:

公民通讯社,1912年1月成立于广州,杨公民创办。

民国第一通讯社,1912年8月成立于上海,李卓民等创办。

上海新闻社,1912年成立于上海,兼营通信、专电、剪报、译稿等业务。

民国新闻社,1912年成立于杭州,陶望潮创办。

湖北通讯社,1912年5月成立于武汉,冉剑虹等创办。

湖南通讯社,1912年成立于长沙,李抱一、张平子等创办。

湖南新闻社,1912年成立于长沙,社址在长沙中山东路曾公祠,王道南等创办,不到一年停办。

北京通讯社,1913年成立于北京,张珍创办。

在这些通讯社中,民国第一通讯社、湖北通讯社和湖南通讯社人员较多,稍具规模。民国第一通讯社设于上海江西路210号,由李卓民与几个友人共同创办。自称创办缘起,是鉴于西方凡报纸众多之地,必有通讯社。通讯社与报纸“相为表里”,而我国自1911年以来,

报刊纷出,通讯社却“独付阙如”,我国各报仍仰赖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操纵。该社还自称“于京外各埠分驻访员”,“真实新闻多用电传”,在上海总汇后,每日一次或两三次向全国发行,如有要闻立刻印行,“期于至确至速”。每月收费10元。

湖北通讯社政治上倾向同盟会——国民党,是武汉的一些同盟会——国民党人联合创办的,公推冉剑虹负责主持。该社成员分头采写新闻,然后由通讯社集中发出。遇较重大消息,还向外埠报纸拍发专电。

湖南通讯社政治上倾向共和党,和《湖南公报》关系密切。该社由李抱一、唐秀深、蔡子廉、张平子等创办,编辑部先后设于长沙黄泥堰、洪家井湖南公报馆、李晋康家中,以油印方式发稿,大半订户为外省报纸,达数十家,每家订户月缴费10元。成立后不久,李抱一等离社,由李晋康等接办。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大肆摧残新闻事业,全国报纸大半被查封或被迫停办,上述通讯社也大多被查封和停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激烈,报刊数目渐增,一批通讯社又在国内外涌现,主要有:

东京通讯社,1915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邵飘萍等创办。

湖南新闻社,1915年由成嘉森等人在长沙恢复重办。

武汉通讯社,1916年成立于武汉,徐公仆等创办。

中华通讯社,1916年创办于长沙,傅英东等创办。

新闻编译社,1916年8月成立于北京,邵飘萍创办。

岭南通讯社,1916年3月成立于广州,李嵩常等创办。

大中通讯社,1917年成立于长沙,杜启予等创办。

民生通讯社,1917年6月10日成立于北京。

北方通讯社,1917年9月成立于北京。

联合通讯社,1918年成立于上海,李次山等创办。

新闻交通通讯社,1918年成立于北京。

国民通讯社,1918年冬成立于上海,孙中山领导创办,林焕庭主持。

和平通讯社,1919年2月成立于上海。

上述通讯社大都仍然是私人创办的小通讯社,且多数接受官僚、政客的资助或津贴,带有党派和政治色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京通讯社和新闻编译社。

东京通讯社是邵飘萍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避居日本,就读东京政法学校时,与同学潘公弼、马文车共同创办的。该社以中文向国内京、沪、汉等地各大报寄发东京通讯,着重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袁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受到国内读者的好评和新闻界的重视。1916年春,该社因邵、潘等人相继回国结束。

新闻编译社,1916年8月成立于北京,社址在南城珠巢街,由受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的邵飘萍,在抵京后创办的。该社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主要业务是翻译外电和采编北京新闻,每日都有一两篇特殊稿件。每日19时左右,将编译的稿件油印几十份,发往《申报》等外埠报纸和北京各报及外国驻京记者,外埠为邮寄,本地则由工作人员骑自行车分送。由于所发大多为较敏感的中外交涉和中央政府的政治新闻,且时有内幕、独家新闻,故多数为各报采用,颇获好评。邵曾自称创办该社的目的是不满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因此,该社所发新闻带有较强的爱国主义色彩。如曾揭发溥仪逃宫是日本人的阴谋,并对溥仪盗卖故宫遗物事猛烈抨击。1917年张勋复辟时,社务曾被迫停顿数日,张勋复辟失败后恢复。

三、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民营通讯社

五四运动后,通讯社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三十年代,形

成了一个高潮。据统计,1925年全国已有通讯社155家,而到了1936年,全国通讯社更增至759家。通讯社的分布范围,也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报业较发达的城市,而是扩展到甘肃、宁夏、贵州、绥远等边远省区。这些通讯社大部分是民营的,但主办者良莠不齐,成份复杂。有些是革命者或进步人士,他们办通讯社是为了宣传;更多的则是热衷新闻通讯事业且赖以谋生的新闻工作者,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大多接受政界或商界的津贴或资助,其所办的通讯社往往有政治或经济背景;也有少数甚至是社会闲散人员,他们办通讯社,不过是想跻身新闻界,招摇撞骗。这些民营通讯社除个别外,绝大多数规模很小,设备简陋,业务上一般是少数几个记者,每日采编十几条或几十条本地新闻,然后以复写或油印的方式,向订户投寄。

在这些民营通讯社中,影响较大或规模较大的主要有:

平民通讯社,该社是五四运动时期民众团体建立的通讯社,1919年12月成立于北京,创办者是湖南公民驱逐张敬尧请愿团。请愿团是由湖南学生组织联合湖南社会各界组成的。该团于1919年12月到达北京,要求政府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各界同情和舆论支持,该团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社长的平民通讯社,从12月22日起每日发布150余份油印或石印的驱张新闻稿,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纸。这些稿件大多由毛泽东撰写,在各地报纸刊载后,产生广泛影响,对驱张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4月毛泽东离京后,平民通讯社宣告结束。

国闻通讯社,该社1921年8月成立于上海,9月1日正式对各报发稿。创办人是知名记者胡政之。创立之初,该社接受孙中山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等的资助,实际是反对直系军阀的宣传机关。名义社长是卢永祥指派的邓汉祥,胡政之任总编辑。1924年10月卢永祥战败后,邓汉祥等离社,胡政之掌握了通讯社全权。该社初期仅每日以邮寄方式向各地报纸发稿,以后陆续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重庆、长

沙、沈阳、哈尔滨、福州、郑州、贵阳、梧州等地设立分社或聘请特邀访员,在日本东京也聘请了通讯员,稿件数量大为增加,每日发稿由一次改为两次,约六七千字。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广告部和英文部,增发商业行情及英文稿。1925年开始用电报传递要闻。该社稿件因广泛、快捷、详实,很受各地报纸欢迎。1924年8月,该社还附出了一份新闻性周刊《国闻周报》,选录并评述每周国内外要闻,评述的撰稿者大多为社会知名专家或人士,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1926年9月,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共同接办天津《大公报》后,国闻通讯社成为《大公报》的附属通讯社,继续存在到1936年5月结束。

远东通讯社,1924年3月30日在上海成立,由莫克明任社长,宗旨是“宣达民意,传播消息”,在一些主要商业城市聘有通讯员。1925年曾在上海举办新闻展览会,组织新闻学演讲会和成立新闻学研究团体“上海新闻学会”,以推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申时电讯社,该社1924年11月成立于上海,是继国闻通讯社之后的又一影响较大的通讯社。创办人是《申报》经理张竹平。该社最初主要是由《申报》、《时事新报》两报的编辑记者组成,将两报所得的中外电讯,集中起来,择要编译,供外地有关系的报纸采用。所发稿件分电讯和邮寄两类。电讯又按字数多少,分为甲种(每日1000字)、乙种(每日约500字)、丙种(每日约100字)、丁种(每日约50字),由用户选订并承担相应的电报费用。邮寄类也再分为平信及快信两种,由用户自选。此外,用户还可以用该地的新闻稿与电讯社交换。这些办法颇受外埠报纸欢迎,用户日增。于是,1928年该社扩充资本,聘任专职人员,添设电讯部、广告部、通讯部、摄影部等机构,成为独立通讯社,正式定名为申时电讯社。以后,陆续在北平、天津、广州、香港、汉口、南京、重庆等地招聘访员。1932年,该社与上海《时事新报》、英文《大陆报》及《大晚报》组成四社集团,张竹平任总经理。四社密切协作,所得专电均汇集于申时电讯社,使申时电讯社的专电极为丰富,

日收发达 6 万余字,并编发英文电讯稿,用户遍及中国国内(包括香港),以及海外马尼拉、新加坡、爪哇等地 110 余家报社。1934 年 2 月,该社正式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组成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竹平、萧同兹等为董事的董事会,并在南京、汉口、天津、香港设立分社,业务范围包括编发中英文新闻稿件和新闻照片,成为当时国内最具规模和力量的民营通讯社。1935 年,四社产权全部被孔祥熙收买,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前停止活动,1946 年一度恢复。

新声通讯社,该社 1930 年 8 月 16 日成立于上海,是一家以报道工商新闻和经济信息而著称的民营通讯社。严谔生创办并任社长,吴中一任副社长。先后设有通讯部、广告部、摄影部、出版部,并在南京设立分社。严谔生曾长期担任上海商会秘书,和上海工商界人士交往密切,吴中一则熟知金融界内幕,故该社信息灵通,常常采集到一些重大的独家经济新闻,受到工商界的重视。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丧,民族通讯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原有的民营通讯社纷纷停办。但是,仍有一批爱国和进步的新闻文化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办了全民通讯社、国际新闻社等宣传抗战的通讯社。

全民通讯社的前身是 1935 年成立的天津中外新闻学社,由吴寄寒、周勉之等青年新闻工作者组成,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新闻通讯方式宣传抗日救亡。以此为基础,1937 年 9 月,在中共支持下,在太原成立全民通讯社。社长李公朴,实际领导是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不久,因日军逼近太原,该社迁至山西临汾。12 月又迁至武汉,由吴寄寒主管全局,周勉之代理社长。当时,该社每天以油印形式发稿,内容以通讯为主,也有些自行采访的消息,主要反映抗日前线军民战斗事迹,揭露日军暴行。1938 年 9 月迁至重庆。1939 年 10 月在成都建立分社,由陈翰伯负责,开始用铅印发送新闻稿。该社在昆明、贵阳聘有特约记者,在各战区聘有通讯员,通联工作搞得十分出

色。1940年3月,因遭到国民党的刁难、迫害,成都分社停止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全民社亦无形中解散。

国际新闻社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又一个民间通讯社。该社简称国新社,1938年10月20日成立于长沙,11月迁往桂林,公开发稿。该社是以新闻界的爱国抗日团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发起人是胡愈之、范长江、孟秋江、邵宗汉等,得到了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指导和帮助。1939年初在上海设立总社,由胡愈之主持。该社用“生产合作社”的原则进行管理,由社员民主选举领导机构。社员分专职和兼职两种,共七八十人,范长江被推选为社长,副社长为孟秋江,编辑主任黄药眠。该社成立后,原上海部分文化界人士在香港创办的国际新闻社成为“国新社”香港分社,负责面向海外的国际宣传。总社和在重庆设立的办事处则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报道工作。该社的主要业务是向国内报纸和海外华侨报纸发新闻通讯与专论,宣传团结抗战。因在国统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通讯网,该社稿源充足。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上海迁往桂林的总社和重庆办事处被迫关闭,香港分社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该社于1946年在香港重建,宣传解放区的建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

大中通讯社,1939年8月成立于上海租界,负责人为吴中一。共产党人恽逸群参与创建。该社是抗战时期上海租界30余家通讯社之一,是一家以宣传抗日为己任、影响极大的通讯社。该社消息灵通,发布了大量日伪暴行和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消息,成为上海“孤岛”时期各抗日报刊的重要新闻来源。在日伪的迫害下,该社曾挂假招牌、多次迁移社址,最后转入地下,一直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土的沦陷,民营通讯社事业遭到极大摧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有所恢复。从1946年4月至1947年7月,仅上海一地即涌现通讯社130多家。

四、国民党的官办通讯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早在清朝末年就开始创办通讯社,进行革命宣传。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一些国民党党员,以及“二次革命”后的中华革命党党员,也曾创办过一些通讯社,进行政治宣传。但在1924年国共合作前,国民党的这些通讯社,大都是少数党员以私人名义创办的,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宣传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不高,影响甚小。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在革命形势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从分散走向集中,在通讯社方面,第一次建立了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的中央通讯社。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窃取大革命果实后,又进一步加强了通讯社的建设,从中央到地方,从党部到军队,创办了一批通讯社。其中,中央通讯社是国民党官办通讯社的中心。

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1924年4月1日成立于广州。该社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创办的。成立后,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务是“调查”、“论述”与“介绍”国民党“中央及各地党务消息”,以及国内外新闻。创办初期,向全国大量编发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广东国民政府的重要文告与消息。北伐开始后,该社派出随军记者,逐日报道北伐战况。1927年5月,该社迁往南京,社址在成贤街沙塘园国民党中央党部内。9月,又随中央党部迁往丁家桥。从此,开始以反共宣传为主要任务。

1932年以前,中央社规模很小,设备也很简陋。全社工作人员只有20余人,没有电讯设备,只利用两台收音机抄收一些外国通讯社的广播稿。此外则照抄一些党政部门的通报和采编一些南京新闻。然后以油印方式免费向南京、上海等地报纸发新闻稿。由于稿件内容贫

乏,各报很少刊用。

1932年4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为了强化国民党的新闻宣传,决定改组并扩充中央社为国家通讯社。原国民党中宣部秘书萧同兹被任命为社长。从此,该社迁出中央党部,开始实行所谓的独立经营。在社长之下,设立编辑、采访、事务、电务等科组,以“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为标榜,极力向名副其实的全国性通讯社发展。先后接收了路透社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电讯设备,建立了南京总社电台和上海、北平、天津、汉口、西安、香港等分社电台,从此开始用自备电台向全国播发新闻电讯。1934年9月,又增设英文编辑科,开始增发以亚洲各国为对象的英文电讯稿。为了保证充足的稿源,该社加强了国内外新闻的采编业务,除部分收回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在中国的直接发稿权,与哈瓦斯社、合众社、塔斯社等订立了交换新闻合约外,还在国内外广设分社、办事处或聘请特约通讯员。至1937年6月,在国内已拥有北平、武汉、上海、天津、西安、南昌、重庆、成都、贵阳、广州、香港等分社,在福州、昆明、张家口、西宁、安庆、兰州、归绥、洛阳、榆林、厦门、长沙、清江浦、保定、郑州、太原、蚌埠、康定、绥德、青岛等地和庐山牯岭设立通讯员办事处。在国外东京、新德里、日内瓦设立了特派员、通讯员办事处。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和扩充,该社基本上具备了全国性通讯社的规模。各地报纸采用该社稿明显增多,许多地方报纸上,中央社稿甚至占一半以上。国民党通过中央社,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国内报纸对国内外新闻的报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社于1937年11月迁至汉口,1938年10月又迁至重庆,业务、规模仍有一定发展。1939年设立总编辑制,首任总编陈博生。在重庆发行英文《中国半月刊》,并播发国内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新闻。在国内外增设分社10余处。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总社迁回南京。1947年冬建成国际发报台,次年春开始对国外欧美国家播发新闻。到1948年春,该社达到全盛时期,国内有

分社、办事处、特派员等分支机构 52 处,国外有 25 处,员工达 2653 人。每日对全国播稿 2 万余字。之后,随着国民党的节节失败,该社于 1949 年 2 月迁至广州,10 月迁重庆,11 月移往台北。

除中央通讯社外,这时期国民党的其他通讯社还主要有:

血光通讯社,该社 1926 年 12 月成立于武昌,社址在阅马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内,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办的通讯社。先后由省党部宣传部长钱介磐、张朗轩、邓初民领导。该社的报道详实、快捷,成为武汉颇有革命权威的通讯社,所发稿件各报争相刊载,日发稿从 160 份增至 200 份,仍不敷需要。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成为反共的宣传工具。

国民通讯社,该社 1927 年 5 月 5 日成立于上海,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主办。社长陈德征,副社长兼编辑主任杨德民,宣传分共、反共。1931 年改组,由杜刚接任社长。

国民新闻社,该社初名国民通讯社,1927 年 6 月 4 日成立于上海,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署主办,是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官方通讯社,社长李才。该社是适应国际宣传的需要而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补救外国记者所发消息的失实与遗漏。1929 年与美国合众社、德国海通社订立合同,以中国国内新闻译稿交换两社的欧美新闻,供国内报社刊用。1934 年 11 月 14 日与海通社合组国民海通社,在南京发稿。

民族革命通讯社,简称民革社。该社 1938 年 4 月 15 日成立于山西吉县古县村,是山西当局官办的新闻机构,隶属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1939 年春迁至陕西宜川县秋林镇。梁继武任社长,曲咏善任总编辑,下设编辑、采访、电务、总务等部门,采编及行政人员最多时达 60 余人。除总社外,先后在山西和重庆、成都、香港设有 12 个分社,还曾计划在武汉、广州设立分社。该社总社、分社均有发报机,发稿以电讯为主,每日两次,此外还航寄通讯稿。各分社也发行新闻稿,供当地报纸采用。抗战初期,不少进步青年参加该社工作,有些地区的分

社就是依托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牺牲救国同盟会组建起来的,因而民革社所发的电讯、通讯稿件,尚能真实地反映山西抗战前线的战争面貌,如实报道八路军、山西新军、游击队对日作战的胜利战绩,起到了抗日宣传鼓动作用。1939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大批进步青年被迫离开民革社,致使该社总社萎缩、分社解体。1942年后该社业务进一步陷于瘫痪状态,名存实亡,1946年宣告结束。

华中通讯社,该社1934年成立于汉口,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平汉和粤汉铁路党部、海员和公路党部等六个党部联合组建创立。因有政治背景,资金雄厚,该社新闻稿比其他通讯社快捷、丰富,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一家地方通讯社。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停止发稿,1946年10月恢复,每日发行16开4页通讯稿5000份,是武汉发稿份数最多的一家通讯社。

军事新闻通讯社,该社简称军闻社,1946年7月7日成立于南京,是国民党军方的通讯社,主要报道国民党军方动态,在重庆、沈阳、北平、兰州、广州等地设立过分社。1949年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溃退迁往台湾。

五、中国共产党的新闻通讯社

由于小型通讯社具有开办费用少、宣传范围广等特点,中国共产党在筹建时期,就创办了一批通讯社。之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通讯事业,克服重重困难,由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革命宣传和舆论战线上的一支极为重要的方面军,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党的纲领主张,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0年至1921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纷纷创办通讯社。如上海的中俄通讯社,湖北的人民通讯社,广

东的爱群通讯社,山东的齐鲁通讯社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通讯社,其中,中俄通讯社是最早的一家。

华俄通讯社(最初名中俄通讯社),1920年6月成立于上海,7月1日正式发稿,是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等帮助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由杨明斋任社长,社址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主要任务是将有关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消息、通讯等译成中文,向上海、北京报社发稿,同时也将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向苏俄报刊发电讯。该社向中国报纸提供的消息和通讯,真实地介绍了苏俄革命政府及其社会变化的现状,用事实驳斥了欧美通讯社对俄国革命的歪曲和污蔑。该社还派出记者采访上海的工人群众,反映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和变革要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该社转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一直活动到1925年8月。

人民通讯社是中共另一创办较早的通讯社,1921年春成立于武汉,是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社长陈潭秋,其任务是传播武汉地区和全国各地工人、学生革命活动的消息,初创时用手抄稿,后改用油印,发稿对象是武汉、湖北各报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大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北京党组织于1923年在京创办了劳动通讯社。负责人刘铭勋,高君宇、邓中夏、杨明斋等均曾参加过采访和编辑工作。该社附属《工人周刊》编委会,主要报道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反映工人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以油印方式发稿,主要供《工人周刊》选用,也发给北京《晨报》、上海《申报》等全国各大报。为保证新闻来源,该社曾向全国各地广泛聘请特约记者和通讯员。该社后期与邵飘萍主持的北京《京报》关系密切,业务上得到邵的指导。1926年4月在奉系军阀的血腥镇压下,该社被迫停止了活动。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通讯社,是1925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国民通讯社。该社是为推动五卅运动设立的,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首任社长是邵季昂。该社编辑部与通讯处均同《热血

日报》在一起,协同《热血日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曾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沈阳、哈尔滨等地聘有通讯员。《热血日报》停刊后,该社负起了中共对外宣传的主要任务,1926年9月被淞沪警察厅查封,邵季昂及多名工作人员被捕。1927年3月,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高潮中,该社恢复活动,何辛味(即何公超)任社长,社址在上海总工会新址闸北湖州会馆。曾积极报道上海工人起义的消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被查封。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仍然创办通讯社进行革命宣传。1931年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工人通讯社(1932年改名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外曾挂过“时间通讯社”的牌子作掩护。该社每周或十天发稿一次,英文稿为打字油印,每期寄发给国内外进步报刊约800份,中文稿则复写数份秘密发给白区党报和工人报刊。稿件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介绍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军战况,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35年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破坏而停止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等地区建立了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江西瑞金诞生了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该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个通讯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通讯社。该社用电台以明码对外播发电讯新闻,呼号为CSR,因通讯社与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属同一机构,所播发的电讯稿,由《红色中华报》的人员编辑,每天约二三千字,油印出版《红中社通讯稿》,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文告、宣言及红军战报、革命根据地建设消息。所播的电讯,全国都可收到,一些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都曾抄收并在报刊上刊载。此外,该社还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少量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编印成油印本《参考消息》,曾用《无线电

材料》、《每日电讯》等名称,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该社停止了对外播发新闻,但仍继续抄收国内外新闻电讯。1935年11月在陕西瓦窑堡恢复广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曾建立西安分社,印发陕北红中社新闻。1937年1月迁至延安,改名新华社。红中社的历任负责人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任质斌等。

红中社改名新华通讯社后,博古任社长,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负责翻译外电)、李柱南(负责中文译电)。每天播发2000字中文电讯稿。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该社规模不断扩大,1937年4月设立了新闻台,七七事变后,每天发稿增加到四五千字,工作人员增至20余人。1938年以后,又相继在主要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分社。这些分社大多与当地日报社组织合一,并配有电台,除抄收总社电讯及向总社供稿外,也自行播发一些本地区新闻和社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社的组织规模和业务建设又有了新的发展,总社的编辑部门有所扩大和充实,并大力加强全国通讯网的建设。到1946年春,在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相继建起9个总分社,40多个分社。解放战争开始后,又在野战军中设立军事分社和支社。《解放日报》停刊后,新华社集通讯社、广播电台、报纸工作于一身,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成功的军事宣传报道,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第二节 广播事业的产生和发展

一、广播事业的发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批广播电台。同近

代报刊、通讯社一样,广播电台是由外国人最先创办的。到1928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出现以前,中国先后出现过外商和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十来座,发射功率一般较小,收听范围只限于广播电台所在城市及其周围地区,还没有一座全国性的中央台。据有关材料估计,这一时期全国约有收音机1万架左右。

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是由美国商人E·G·奥斯邦为了推销收音机而开办的。1922年12月,奥斯邦把一套广播无线电发送设备由美国运到上海,并创办中国无线电公司。奥斯邦与英文《大陆报》合作,租用外滩广东路三号大来洋行的屋顶,开办起“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呼号为XRO,发射功率50瓦。该台于1923年1月23日晚首次播音,播出的内容有来自国内外和上海的新闻报道、音乐演奏和娱乐唱片。其后该台每晚播出1小时,内容除《大陆报》提供的新闻外,大量的则是娱乐节目。星期日设有《布道》、《祈祷》等宗教节目。为了扩大影响,该台还举办过无线电基本常识讲座。

奥斯邦开办的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后,在上海租界的中外听众中引起一阵“无线电热”,据统计,上海当时有收音机500架左右。但是奥斯邦未经中国有关当局批准,私自运进无线电设备并建立广播电台,触犯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有关法令。3月14日,北洋政府交通部通过外交部饬知江苏特派交涉员,严行取缔奥斯邦开办的广播电台。其后几经交涉,大约在4月间,奥斯邦所办电台停止了播音。不久,奥斯邦又拟在永安公司楼上开办另一座广播电台,预定于5月31日开始播音。但因受到交通部的多次干预,未能实现。此外,美商新孚洋行于5月底还办起一座广播电台,不久因经费拮据而停办。

早期外商在上海开办的广播电台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1924年5月开始播音的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所办的广播电台。该台呼号KRC,发射功率初为100瓦,后有所增加。开洛公司与《申报》

馆合作,在报馆安装发音室以利报告新闻。该台每天上午、晚间各播音一次,共两小时,并由《申报》代为预告节目。该台为了吸引中外听众,及时改进节目内容,播出内容除中英语新闻、中外音乐唱片外,还报告气象、商情、时刻、京剧、评弹等,并举办无线电常识演讲,借以推销收音机。开洛公司广播电台的播音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始告结束,前后共存在五年多的时间,是早期外商广播电台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家,其原因除了该台在办好广播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外,与北洋政府改变了严厉取缔无线电广播的法令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自办广播电台是从奉系军阀开始的。1922年9月,奉系军阀收回哈尔滨一座暂时由俄国控制的无线电台,改名为东三省无线电台,作为军事通信之用,后来又在奉天(即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建起分台。1923年5月,奉系当局将奉天无线电台改为东三省无线电台总台,原哈尔滨的东三省无线电台改为哈尔滨分台。这一年,奉系当局在东北各地一共建起无线电台14座。东北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为广播电台的开办创造了必要条件。1926年,哈尔滨分台代台长、我国早期无线电专家刘瀚在奉系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着手筹建广播电台。同年10月1日,哈尔滨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正式播音,呼号XOH,发射功率100瓦,每天播音两小时,内容有新闻、音乐、演讲及物价报告等。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此后,刘瀚又多方筹措资金,购置设备,建设新台址。1928年元旦,新建的哈尔滨广播电台正式启用,发射功率扩大为1千瓦,呼号改为COHB,办有汉语、俄语、日语三种节目。同一天,沈阳广播电台也开始正式播音,发射功率2千瓦,呼号COMK,两台均由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管理。

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建立于1923年,设在奉天(沈阳),是中国最早的地区性无线电管理机构。除上述两台外,1927年3月,该监督处还在北京、天津设立广播无线电办事处,开始在京、津筹建广播电台。同年5月15日,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发射功率

500瓦,呼号COTN。9月1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发射功率初为20瓦,后增至100瓦,呼号COPK。两台均办有新闻、商情、音乐、讲座及戏曲节目。据1928年6月底统计,北京市装设收音机的有1900多户,销售收音机的商店45家。广播电台每月按规定收缴执照费作为日常开支之用,自给有余。

早期中国自办的广播电台除上述4座官办广播电台外,2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民办广播电台。1927年3月,上海新新公司为了推销自己制造的矿石收音机,开办了一座相当简陋的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只有50瓦,主要播送唱片并转播游艺场的南方戏曲。这是中国第一座私营广播电台。同年底,北京也出现了一座民办的燕声广播电台。

二、国民党的广播事业

1927年国民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取得全国政权后,即着手兴办中央新闻事业,作为党营新闻事业的骨干,主要是一报、一社、一台,即《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

首先倡议建立广播电台的是陈果夫,1928年2月,他同国民党中央委员戴季陶、叶楚傖等商定,委托上海无线电机制造厂向美商开洛公司订购广播设备。8月1日,该台举行开幕典礼并开始正式播音。当天,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均前往致词。该台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台”),呼号XKM(X为当时国际有关条例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第一个字母,KM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后由于全国无线电台呼号统一,中央台呼号又改为XGZ),发射功率500瓦。每天下午、晚间各播音一次,共计3小时,内容有演讲节目和新闻节目。所有新闻稿均由中央通讯社提供。

国民党的这座电台由于发射功率较小,且用中波广播,因此收听

效果欠佳,许多地方很难听到。1928年冬,陈果夫等又提出扩充发射功率计划,并向德国订购全套广播设备。新台址定于南京江东门外,于1932年5月完工,同年11月12日正式使用,发射功率扩大为75千瓦,呼号更改为XGOA,这是当时亚洲发射功率最强的广播电台。

中央台设立之初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2年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成立。1936年1月,该处又改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广处)。中广处曾举办了多次收音员培训班,培训的收音员携带收音机分赴各地,负责抄收中央台的广播节目,以扩大中央台的影响。

除了中央广播电台外,国民党还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建立起一批地方性的广播电台,逐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播宣传网。这些地方台,分属中广处、交通部、各省市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地方党部管辖。

中广处管辖的地方台有:福州台、河北台、西安台、长沙台和南京台等。其中南京台是当时国内唯一的短波广播电台,于1936年春开始广播,呼号XGOX,发射功率500瓦,除转播中央台节目外,还办有广州话、厦门话和马来语节目,以供东南亚一带华侨收听。

交通部所属的广播电台有:北平台、成都台和上海台。其中上海台是由上海国际电信局收购外商美灵顿广播电台设备改建而成,1935年3月开始播音,呼号XQHC,发射功率500瓦(后扩充为2千瓦)。该台是上海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

各省市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地方党部办的广播电台中,建台最早的是1928年10月开始播音的浙江省广播电台,也是国民党当局开办的第一座地方台。此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陆续建立起来的还有山西、山东、江西、福建、四川、云南、河北、河南和江苏等省政府广播电台以及广州、汉口等市政府广播电台。另外还有江苏武进、浙江嘉兴县党部办的广播电台。其中以江西和汉口两台发射功率最大,各为

5 千瓦。

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中广处把一座本拟设在洛阳的250瓦发射机移装于蒋介石指挥部所在的南昌，建立南昌广播电台。一年以后，中央红军因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中广处即把南昌台移交江西省政府接办。1935年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当时西北地区尚未设广播电台。国民党当局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宣传，于1935年8月将设在北平的河北广播电台拆卸西迁，筹建西安广播电台。西安台翌年8月开始播音，呼号XGOB，发射功率500瓦。

据1937年6月统计，国民党统治地区共有官办广播电台23座，总发射功率超过116千瓦，其中江苏省（包括南京、上海）最多，为6座，浙江、四川为2座，其余均为1座。东北地区原奉系军阀主持开办的哈尔滨、沈阳两座广播电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入日寇之手，国民党的广播事业遭受到严重挫折。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23日，中央台停止在南京的播音，随后将部分广播设备拆运重庆。1938年3月10日，中央台始在重庆恢复播音，但发射功率由原来的75千瓦锐减为10千瓦。上海、广州等地国民党广播电台的设备先后为日军攫取，改建为日伪广播电台。另外，一部分地方广播电台则由城市迁往偏僻地区播音，如福州台迁往永安改名为福建广播电台，西安台迁往南郑改名为陕西广播电台，长沙台迁往沅陵改名为湖南广播电台，江西广播电台由南昌迁往吉安，浙江广播电台由杭州迁往丽水。据1938年底统计，国民党广播电台仅余六七座，总发射功率不到11千瓦。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得到英美在广播设备方面的多次援助，国民党的广播事业逐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式开办对国外广播。1939年2月6日，国民政府利用英国提供的广播设备在重庆建立的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发射功率为35千瓦，呼号为XGOX、XGOY。1940年1月，该台定名为国际广播电台（英文名称“Voice of China”简称VOC，意为“中国之声”），呼号依旧。该台办有对欧洲、北美、苏联东部及我国东北部、日本、华南及东南亚、苏联6套广播节目，用13个语种播音，每天播音10多个小时。除国际台外，昆明广播电台、贵阳广播电台也办有对国外广播。

第二，注重发展西南、西北地区的广播事业。战前，在中国西部仅有5座广播电台，总发射功率不过10千瓦多。为了适应战时广播宣传需要，国民政府在贵阳、西昌、兰州等地办起新的广播电台。其中以昆明广播电台发射功率最大，有50千瓦，1940年8月开始播音。

第三，为配合前线作战，国民政府于1940年创办战地流动广播电台，1943年起又筹办军中播音总队，并在各战区建立分队。流动电台和军中播音总队均担负前线部队和对敌广播的任务。

经过多年的恢复和重建，至1944年，国民党所办的广播电台已达到23座，发射功率为154千瓦，略超过战前的规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广播事业在接收日伪广播电台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扩大。据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5月的10个月时间里，国民政府一共接收日伪广播电台21座，广播发射机41部，总发射功率274千瓦，包括日伪在南京、上海、北平、台湾和华中地区的全部广播电台以及在东北、华北的大部分广播电台。为进一步扩充广播事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制定了一个“建立庞大而周密的全国广播网”计划，目标是10年内建立55座大中型广播电台，总发射功率达到2257千瓦以上，收音机达到200万架。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据1947年12月底统计，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属广播电台增加到42

座,总发射功率达到 423 千瓦,全国估计有收音机 100 万架左右,比抗战前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1948 年秋冬、194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 10 多座广播电台先后被解放军接管。4 月,渡江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长江以南的国民党官办广播电台也先后被解放军接管。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存在了 20 多年的国民党广播事业宣告终结。

三、共产党的广播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宣传工具主要是报刊和通讯社。但是,由于报刊和通讯社作为宣传工具的局限性,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干扰,使得中共的宣传工作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报刊和通讯社的宣传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需要。为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人民直接听到中共的声音,了解抗日局势的发展,创办自己的广播电台成为迫切需要。

1940 年 3 月,周恩来辗转从莫斯科带回一部由共产国际援助的广播发射机。中共中央随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广播委员会,并着手进行筹建电台的工作。1940 年 12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 XNCR (当时按国际有关规定,我国无线电台呼号的第一个字母为 X,NCR 是英文 New China Radio 的缩写,意为新中国广播)。延安台的播音次数和时间屡有更改,刚开始时每天一次两小时,后增至两次 3 小时和 3 次 4 小时。播音内容有中共中央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时事新闻、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等等。此外,还有音乐戏曲节目,主要内容是演播抗

日歌曲。延安台的播音,由于设备简陋,机器经常发生故障,有时甚至不得不暂时停止播音。延安台时断时续一直坚持播至1943年春,终因无线电器材来源不能保证,广播发射机使用的大型电子管失效而不得不停播。

在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延安台加紧进行恢复播音的工作。1945年9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宣布:“延安广播电台即日起开始中国国语广播”,呼号仍为XNCR。由于设备得到改善,延安台播音逐步走向正轨。南京、上海、重庆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可以收听到它的播音。延安台恢复播音后,对外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内则是新华社编辑科的一个口头广播组,其广播稿由新华社供给。1946年6月,口头广播组扩大为语言广播部,部主任温济泽。

日本投降后,中共先后在关内和东北地区收复了一批中小城市,同时利用接管的日伪广播设备建立起一批新的广播电台。从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陆续在张家口、哈尔滨、大连、长春、安东(今丹东)、鞍山、吉林、齐齐哈尔和承德等地开办了广播电台。这批广播电台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大多数都曾因战局变化频繁,多次更名迁址,间或一度停止播音,直到中国共产党取得重大胜利后,才逐渐稳定下来。有代表性的为: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1945年8月24日开始播音,呼号XGNC,是利用接收的日伪广播设备开办的。张家口台初属新华社冀察支社领导,后改由晋察冀日报社领导。每天以中、短波两部发射机播送早、中、晚3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新闻、评论、时事解说、百科知识、政策法规讲座、广播讲演以及各种文艺节目等。1946年7月15日起,增设英语节目。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张家口台转移到阜平山区,改名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元旦起恢复播音。

哈尔滨广播电台,1945年8月20日开始播音,是利用苏军接管

后移交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日伪广播设备开办的。1946年初,国民政府接收了滨江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中共组织转入地下,但一直掌握着哈尔滨广播电台。5月底,中共东北局决定把哈尔滨广播电台置于东北局宣传部领导之下,5月28日,哈尔滨台停止广播,并将设备拆运至佳木斯,改名为东北新华广播电台,9月23日开始广播。

大连广播电台,1946年1月16日开始播音,是东北解放区唯一既未迁址又未中断广播的广播电台。大连台是在由中共领导的大连市政府接收日伪大连放送局的设备后成立的,该台发射功率1千瓦,因地处海滨,设备较好,覆盖面较广。创办之初,大连台除每日的新闻、文艺节目外,还转播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汉语和俄语节目。不久,大连台又按时转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节目。1947年4月,大连市政府改称关东公署,大连台5月1日改名为关东广播电台继续播音。

抗战胜利后,中共地下组织也曾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地区,以“上海市文化运动促进会”名义开办了一家中联广播电台。该台于1946年3月开始播音,呼号为KGCA,是中共地下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唯一一座广播电台,负责人为钟沛璋,曾邀请中共外围组织和进步人士播讲文艺、学术节目。同年7月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在解放区还陆续创办了新的广播电台,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为邯郸台和东北台。

邯郸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9月1日开始播音,呼号XGHT,由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领导。邯郸台使用两部发射机,有中波、短波两种波长,每天上午、晚上各播音一次。除转播延安台节目外,自办节目有向人民解放军广播、对国民党军广播、国内外新闻、本区新闻报道以及文艺节目等。

东北新华广播电台1946年9月23日开始播音,呼号XNMR,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东北台是利用原哈尔滨广播电台的设备,在佳木斯筹建起来的,发射功率1千瓦(后扩大为3千瓦),每

天早、中、晚播音 3 次,总计 7 个半小时,是当时解放区广播电台中播音时间最长的。自办有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东北新闻、时事述评、名人讲演、人民呼声、解放区介绍等栏目以及文艺节目。

1947 年 3 月 14 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撤出延安,转移到子长县好坪沟村继续播音。21 日起,延安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改装了发射机,加大发射功率,自 3 月 29 日晚上起使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播音,接替了陕北好坪沟的广播。原陕北台的编播技术人员和新华社其他部门的人员辗转千里,分别在 4 月底和 7 月间到达邯郸台所在的河北涉县,组成新的陕北台编辑部(即新华社语言广播部)。1948 年 5 月,陕北台和新华总社随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从 23 日起在平山播音。

至 1947 年 9 月,解放区共有广播电台 11 座,其中华北地区 3 座,即陕北台、晋察冀台和邯郸台。东北地区 8 座,即东北台(佳木斯)、西满台(齐齐哈尔)、哈尔滨台、安东台、牡丹江台、延吉台、临江台和关东台(大连)。陕北台是解放区广播的中心,其他各台除自办节目外,均转播陕北台的主要节目。一个初具规模的解放区广播网正在逐步形成。

陕北台迁平山以后,解放区广播事业新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在东北、华北和西北三大解放区相继建立起本地区的中心广播电台。

1948 年 5 月,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由佳木斯迁回哈尔滨。随着广播条件的改善,东北台的影响逐步扩大。为统一领导、管理全区的广播事业,1948 年 7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东北解放区各电台统一归属东北新华广播电台领导管理,各地方台都要转播东北台节目。

1948 年 12 月 20 日,华东解放区第一座广播电台——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在山东临朐正式播音,呼号 XNEC,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领导。华东台开播后,除转播陕北台的节目外,自办有对华东战场

国民党军广播,对华东人民解放军广播,对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台湾等地的广播节目等。

1949年1月5日,西北解放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正式播音。西北台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领导,是当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一部分。6月西北台迁至西安,改名为西安新华广播电台,7月1日,又改名为西安人民广播电台,但其任务仍为面向西北地区广播。

除上述三座中心台外,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间济南、天津、徐州、北平、郑州等地陆续建立起新华广播电台。据1949年3月初统计,全国各解放区共有广播电台24座,其中华北4座、东北15座、华东3座、西北1座、中原1座。

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中共中央由平山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具有全国中央台的性质,面向全国广播。原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则改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北平市台向全市听众继续广播。

为适应广播事业日趋扩大的需要,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原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全国广播事业。该处与新华总社为平行组织,同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从此,广播事业脱离新华社成为单独的宣传系统,与报社、新华社并列为三大新闻机关。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先后解放了南京、杭州、武汉、上海、南昌等一批大中城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等省的广大地区。在此期间,一批新的人民广播电台相继建立起来。据1949年9月统计,全国各地已有人民广播电台近40座,一个遍布全国的人民广播网开始形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北京新华台作了实况转播,各地广播电台同时转播,这是新

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实况转播。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四、民营广播事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民营广播电台大量出现。形形色色的民营台中以商业性广播电台为最多，分布也较广。除少数商业台的节目偏重于科学知识外，大多数商业台依靠广告收入维持，所播出的戏曲、音乐、弹词等娱乐节目低级庸俗、荒诞不堪，与当时的黄色音乐沆瀣一气，社会影响极坏。抗战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对民营广播电台多方加以迫害，直至使其停止播音，借以达到垄断广播事业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以抗日战争为“非常”时期，不准开设民营广播电台，致使中国民营广播事业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日本投降后，民营台一度有所恢复，但国民党政府公布《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从电台的设置、分布、数量、功率以及内容等多方面限制民营台的发展，加之国统区经济形势的恶化，民营台广告收入难以为继，在挣扎中复苏的民营广播事业每况愈下。

国民政府于1928年12月和1929年8月先后公布《中华民国无线电台条例》和《电信条例》，允许公私团体和个人经营广播电台。国内陆续出现了一批民营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一地。民营台大致可分作3种类型：

第一类是教育性广播电台，由一些地方民众教育馆和大中学校开办。播音内容大都限于文化教育，发射功率不大，收听范围仅限于当地，如无锡的江苏教育学院广播电台、徐州民众教育馆等办的徐州广播电台、南昌的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北平育英中学的育英广播电台、济南的齐鲁大学广播电台、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和厦门的同文中学广播电台等。

第二类是宗教性广播电台,具有代表性的是设于上海的佛音广播电台和福音广播电台。佛音广播电台成立于1934年4月,发射功率500瓦。广播内容均为宣扬佛教伦理道德,劝谕人们“不修今生修来世”。福音广播电台1934年12月开始广播,起初功率150瓦,1936年初扩大为1千瓦,是全国民营台中发射功率最大的。该台使用汉语、广州话及英语播音,每天8小时,设有晨祷、布道、礼拜、晚祷、圣经研究等栏目,并专门办有儿童妇女节目。

第三类是商业性广播电台,这类电台除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外,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中城市均有。抗战爆发前仅上海就有商业性广播电台20余座。商业性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一般为50瓦至500瓦,也有小至7.5瓦的。

随着各类民营台的不断出现,民营台的行业组织应运而生。1934年11月,上海市民营无线电播音业同业公会宣告成立。凡是中国人经营的民营广播电台并经交通部发给执照或注册登记过者,均可为该会会员。该会成立后在维护会员台的正当权益、救灾筹赈、抗日宣传以及配合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整顿民营台、审查播音稿本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该会停止活动。

上海是中国民营广播电台的大本营,上海民营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处境和遭遇,具有代表性。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际,尚存30多座民营台,除亚美、华美等几座广播电台自动拆机停播外,大多数民营台继续播音维持营业。第二年3月,日伪“上海市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成立并勒令民营台限期向该处登记,否则不准继续播音。各民营台不愿接受日伪当局管理,联名致函租界当局要求保护。上海租界的英美当局与日本占领当局几经交涉后,日本同意民营台向租界当局登记,但需严格遵守日方要求,不得有反日宣传及其他政治内容。当时向租界警务处登记而继续播音的民营台共有31家,其中大多数电台大量播出庸俗低级的娱乐节目,有的甚至堕落成汉奸电台。

只有极少数电台间接地作了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广播宣传,如播放爱国歌曲、募捐衣物支援前线等。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地区,尚存的民营台一律被封闭。

战后国民党统治区的民营广播电台并没有多大的发展。据1947年12月统计,全国民营台有87座,在数量上超过国民党的党营广播电台,但发射功率前者总计只37千瓦,而后者却是423千瓦,民营台的发射功率只占国民党统治区总发射功率的8%。战前,全国民营台总数为55座,发射功率不足7千瓦,占总发射功率的5.4%。在频率的使用上,战后的民营台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以上海为例,国民党官办电台1个台可使用3个频率,而民营台20多家却只能使用15个频率,有些民营台三四家合用1个频率,只能轮换播音。1946年9月,上海电信局还一次性封闭54家民营台。由于受到多方限制,加之电台本身经营不善,播音内容日趋低级无聊,民营广播电台逐渐衰落。

五、日伪广播宣传

日本侵略者把控制通信、广播作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抗战时期,先后在中国境内建立起五六十座广播电台。这些广播电台都受侵华的日本军事当局控制,直接配合日军的军事政治攻势,宣传“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日伪当局还强制推销只能收听到当地日伪广播的廉价收音机,严厉取缔短波收音机,借以限制沦陷区人民收听重庆和苏联、欧美的广播。

1925年7月,由“关东州递信局”管辖的大连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为JQAK(当时国际有关条例规定英文字母J为日本无线电台呼号的标志),发射功率500瓦。该台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这座电台的建立距离日本国内开办广播事业仅4个月,当

时日本国内也只有东京、名古屋等两三座广播电台。大连台不同于外国商人洋行在华办的广播电台，它是日本的官办电台。大连台设立之初只有日语节目，完全仿照日本广播电台的模式，以后才开办汉语节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东北仅有的两座中国广播电台，即沈阳广播电台和哈尔滨广播电台先后落入日本人手里。1931年10月26日，日军控制下的沈阳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次年7月，哈尔滨广播电台也在日军占领哈尔滨市停播了6个月后恢复播音。

伪满洲国在新京（即长春）成立后，主管通信、广播的日本关东军特殊通信部在新京电话局内设立演播室，以“奉天放送局新京演奏所”的名义开始播音。1933年4月，在演奏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新京放送局”，呼号MTAY，发射功率1千瓦。该台完全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控制，后又移交伪满洲国交通部管辖。

随着对东北统治的强化，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强对广播宣传的控制。1934年11月，伪“新京放送局”启用100千瓦的大功率发射机广播，可覆盖东北大部分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在东北执行扩充广播事业的五年计划，把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的四座广播电台升格为“中央放送局”，并开始在延吉、通化、黑河、佳木斯、海拉尔、营口、安东等地建立小型广播电台。

在华北地区，“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天津、太原、青岛等地广播电台相继落入日军之手。1940年，日本控制下的“华北广播协会”成立，该会管辖下的广播电台有8座，分布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唐山和徐州等地，总发射功率100多千瓦，以北平台作为日伪华北广播的中心。此外，日军还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办起广播电台，并相应成立了伪“蒙疆广播协会”进行管理。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接管”国民党的两座广播电台,利用其设备建起日伪“大上海广播电台”,作为日本占领军的喉舌。1938年,日本又在南京设立了伪“南京广播电台”。汪伪政权成立后,建立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准备“接收”沦陷区的日军电台“统一管理”。1941年3月26日,日本军方在南京将广播事业“交还”汪伪政权。汪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在“接收”之后,将伪“南京广播电台”改称“中央广播电台”,呼号也定为XGOA,与重庆国民党中央台的台名和呼号完全一样。据1941年统计,该会控制下的广播电台除汪伪“中央台”外,还有上海、汉口、杭州、苏州和蚌埠等地的广播电台。除日伪电台外,汪伪政权规定在其统治范围内“民间不得再有广播电台”。

1938年10月日本侵占广州后,利用原“广州市播音台”的设备,开办了伪“广东放送局”。

1895年《马关条约》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1928年11月,“台湾广播电台”在台北开始使用日语播音。三十年代以后,台南、台中、嘉义、花莲等地先后建立了广播电台。这些电台均由“台湾广播协会”管辖。1938年,该会还在厦门建立了一座广播电台。

抗战胜利后,日伪广播设施除小部分为中国共产党接收外,大部为国民党接收并改建为官办广播电台。

六、外国人在华广播活动

国民政府成立后,多次明文规定严禁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但这类广播电台几乎都办在租界地区,依仗外国势力,对国民政府的规定置若罔闻。加以国民政府对于收回广播主权并没有多少有效措施,所以规定的收效甚微。据1932年10月统计,仅在上海就有外国人所办广播电台6座。1935年3月,设在上海的交通部国

际电信局收购了路透社和美灵顿广告公司合办的美灵顿广播电台，利用其设备建立了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在北平，1935年4月交通部将英商增茂广播电台“收归部办”，建立交通部北平广播无线电台分台。到抗战爆发前夕，上海仍有华美、其美、奇开和法国等4座外商办的广播电台。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为加强在上海的宣传工作，以苏商名义创办了“苏联呼声”广播电台。该台呼号XRVN，1941年8月1日开始播音，使用汉语（包括上海话和广州话）以及俄、英、德语播送节目。主要内容有报道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和评论、苏德战争公报、苏维埃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以及数量众多的文艺节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在日伪统治区所办广播电台均被日伪当局接收。由于日苏之间并未宣战，故“苏联呼声”台仍得以继续存在，但该台的播出内容上大受限制，不再涉及抗日战争、亚洲问题及太平洋战争等。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苏联呼声”台曾遭日军查封，但几天后日本即宣布投降，该台又恢复了播音。

抗战后期，美国军队进入中国。1944年10月，美军在桂林、云南、白市驿三地各建广播电台一座，供美军收听新闻和娱乐。1945年3月，又在成都、陆良、羊街、沾益、泸县增设5座军用广播电台。

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仍有多座外人设立的广播电台。据1946年统计，除美国军用广播电台外，在上海尚有东方（美籍）、大美（美籍）、国泰（法籍）和“苏联呼声”4座广播电台。1946年9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召集有关部门讨论外人在华广播问题，并通过《取缔外人在华设立广播电台决议案》，明文规定：“凡外人在沪设立之广播电台，同时一律取缔（美国军用广播电台不在此限）。”1947年1月6日，“苏联呼声”台被“封闭”，而当时美国人办的广播电台仍在继续播音。直至1947年12月，在南京、天津和青岛仍有美国军用广播电台在播音。

第五章 新闻法规与报案

第一节 新闻法规

一、新闻法萌芽

新闻法是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关于新闻和新闻事业的专门法。新闻法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新闻领域实行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报纸产生后,各王朝对于报纸的内容、传发等都曾有所规定,形成过一定的信息发布制度和传报体制,如宋代的“定本制度”等,对违反制度和体制者,屡屡加以限禁和处罚。但从秦代到清代中叶,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各王朝有关报纸的种种规定和处罚,大都出自皇帝的旨意,并未形成正式的法律条文。“定本制度”等古代有关报纸的一些规定,虽然稍带新闻法规的色彩,但还不是正式的新闻法。

十九世纪中叶,近代报刊在中国出现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清政府没有制定颁布关于报纸的法规,处罚有关报纸的案件时,所援用的是《大清律例》刑律盗贼类中的“造妖言妖书”等条文。其主要规定有:“凡造讖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各省抄房,在京探

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

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报刊引人注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注意和重视。1896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专门就第一份近代官报《官书局报》的出版,制定了一个章程,规定:“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在光绪鼓励办报的情势下,为筹办正式官报,工部尚书孙家鼐遵命拟定了一个《官报章程》。该章程共有三条,其中第二条载:“今新开官报,既得随时进呈,牖陈利弊,将来官书局报亦请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政。”该章程得到光绪的谕准,下诏曰:“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必须亟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这个“开除禁忌”,准予在报刊上议论政事的章程和谕旨,体现了光绪皇帝较为开明的新闻政策,也标志着近代新闻法规的萌芽。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鉴于封建顽固派随意查封维新派报馆,迫害报人的事实,曾向光绪皇帝上呈《请定中国报律折》,提出:“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书译出,凡报章之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康的这份奏折使制定新闻法在历史上第一次被提上了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光绪皇帝批准了康有为的请求,在1898年8月9日的上谕中指出:“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孙家鼐呈览。”但是,由于变法旋即失败,这个报律未能出台。

二、最早的一批新闻法规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外继续创办出版报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展开了积极的报刊宣传活动。清廷无法彻底禁止蓬勃发展的报业,便转而采取钳制的政策。到辛亥革命前,

清廷先后颁布了三个有关报业的专门法,即《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

《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于190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闻立法。由商部、巡警部和学部会同拟订,经朝廷批准颁行。该法令分为“大纲”、“印刷人等”、“记载物件等”、“毁谤”、“教唆”、“时限”6章,共41条。其要点有:(1)设立专门管理报馆的机构——“印刷总局”,隶属于商部、巡警部、学部。各省设相应的机构。(2)实行出版物登记注册制度,凡未经注册的印刷物,均以违法论处。(3)呈请注册时,一律交纳注册费。(4)禁载范围及对违者的处罚办法。

《大清印刷物专律》中分量最重的,是“毁谤”一章,这一章集中反映了清朝统治者颁布这一法令的主要目的。该章将“毁谤”分为普通毁谤、讪谤和诬诈三种。其中对“讪谤”的解释是:“讪谤者,是一种惑世诬民的表揭,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甚或以非法强词,又或使人人有自危自乱之心,甚或使人彼此相仇,不安生业。”对触犯“讪谤”条款者的刑罚很重,罚金可高至五千银元,监禁可至十年,或二者并行。这项法规,给各级官吏以很大权力,在“大纲”中规定:“本律通行各直省,即仰各地方该管官酌量办理。”所谓“酌量办理”,可作各种解释,实际授权他们受理有关案件,随意逮捕被告,随意封闭印刷所。

《大清印刷物专律》适用对象是一般印刷出版物,为了进一步加强报刊出版的控制,1906年清政府又命巡警部专门制定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9条。其中前3条为:一不得诋毁宫廷;二不得妄议朝政;三不得妨害治安。

1907年8月,民政部奏称:“查现今风气渐开,京外报馆日渐增益……京城为根本重地,报章论说动系中外瞻听,稽查约束,刻不容缓。”因此,清政府又制订颁布了《报馆暂行条规》10条,内容与巡警部所订的《报章应守规则》基本相同,但增加了一条出版前要呈报巡

警部,经批准后方能发行。这样,《大清印刷物专律》里规定的报刊出版注册登记制度就变为更严格的批准制度了。

《大清报律》是由商部参考日本报纸法拟定草案,经巡警部修改,于1908年3月14日颁布的。共42条,1910年修订增至45条。它比《大清印刷物专律》对新闻的限制更为严厉。除了将“不得妄议朝政”改为“不得揭载淆乱政体之语”外,1906年所订《报章应守规则》9条几乎全部收入,还增加了保押金制度和事前审查制度。规定报刊发行人应交纳250至500元的押金,所有报刊,应于发行前1日,送交该管巡警察署或地方官署,接受检查。

除中央政府所订报律外,一些地方官府也制订了一些类似条规。如1907年1月8日两广总督周馥自订报律三条:(1)禁毁谤两宫及亲王;(2)禁造谣生事,所有登报之稿须注明访员里居姓名,阅六个月后方准毁弃,否则主笔承担责任;(3)禁碍治安,有违予以重罚。直隶总督袁世凯同年2月27日也发布命令,查禁“悖逆书报”,规定“如再贩运,照原价加罚一百倍”。

清王朝制订的报律,显然不是为了保证言论出版自由,而是为了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覆亡,这些报律也即行废止了。

三、民国初年的新闻法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解体。新成立的鄂州军政府于10月16日颁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这是我国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第一个法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为民国初年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等人,鉴于《大清报律》等前清有关报刊出版的法令已随清政府的垮台而废止,报刊出版发行工作无章可循,特颁布了一个由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草拟的《暂行报律》。规定所有报纸杂志应向政府登记备案,否则不准发行。凡刊载“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其发行人、编辑人”须“坐以应得之罪”。“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予以更正,否则“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这个报律颁布的时候,《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其他法规也多未制定,民国究竟有无必要单独制颁报律,立法机构尚未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部级单位,几个官员,未经临时参议院授权,擅自制颁法律,确属越权和草率。加之该报律中定罪与量刑的标准含混不清,极易被误解和滥用。因此,该报律颁布后,遭到新闻界的大规模抵制,上海中国报界俱进会、长沙报界联合会等致电孙中山,表示“万难承认”。3月7日,上海各报同时刊出章太炎起草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一文,指斥临时政府“欲蹈恶政府之覆辙”,“以政府为无上之尊”,强烈表示“所定报律,绝不承认”。

孙中山得知此事后,当即于3月9日明令内务部撤销《暂行报律》,指出:“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受此影响,湖南、四川两都督府,也将擅自颁发的类似律令悄悄撤销了。

报律风波平息不到20天,南京临时政府便解散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夺。

“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如1913年3月11日,京师警察厅向各报转发了北洋政府陆军部、内务部的命令,以防止泄露外交、军事秘密为借口,宣告自即日起由陆军部派员对各报新闻实行预检,违者军法从事。6月7日,内务部又两次通令全国各报,不得就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进行“漫

骂”及“泄露机密”，否则按《大清报律》议惩。“二次革命”爆发后，袁政府更发布一连串对违禁报刊、印刷品停寄、检扣、严办，以及要求所有报刊重新登记注册等通令。

1914年4月2日，袁政府以清除报界“败类杂种”等理由，以比前清报律“稍严”为主旨，制颁了一部《报纸条例》。该条例共35条，集中了日本等国报律中的限制性条文，明文规定：发行报纸须经该管警察官署许可；禁止25岁以下者、曾受监禁之罪者、军人、官吏、学生等，担任报纸发行人、编辑、印刷人；禁止报纸登载“淆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及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报纸发行前须将报样送警察机关备案；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等等。该条例条文十分苛刻，被北京英文《京报》称为“世界上报律比较之最恶者”。同年12月5日，袁政府又颁布了《出版法》，对所有文字、图画印刷品也做了类似规定。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新闻文化界的压力下，先后废止了袁政府的《报纸条例》和《出版法》。但在限禁和摧残言论自由方面，北洋军阀依然继承着袁世凯的衣钵。为加强对异己报刊的控制，段祺瑞政府自1917年5月起，实行新闻邮电检查。1918年10月17日段政府又重新颁布了一个有33条条文的內容苛细的《报纸条例》。

1922年12月，以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为发端，我国早期的广播事业逐渐发展起来，有关广播的法规也随之出现。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广播法令，是北洋政府1924年8月公布的《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该规则共23条，规定装设广播无线电接收机（即收音机）者，须先呈请交通部核准发给执照；对于装设地点、安装者资格、准许接收的内容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1926年10月，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颁发地方性法规《无线电广播条例》，同时颁发的还有《装设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和

《运销广播无线电收听器规则》，对东三省境内的广播事业做了系统规定。

四、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法规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二十年代后期执掌全国政权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并进而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与各种新闻统治机构。

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制订了《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和《审查刊物条例》，对非国民党系统的报刊的出版与宣传事宜作了明确规定：“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这些条例的颁布，是国民党对新闻界实行审查追惩制度之始。

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又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不属国民党的宣传品，都应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凡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攻击国民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的内容，都要严厉取缔；各地如发现“反动刊物”，应先行扣留，再由国民政府查封该宣传机关，究办负责人。同年，国民党中央还颁布《出版条例原则》，根据这一法令，国民党开始实行出版品登记制度。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将国民党采取的种种新闻统制措施用立法手段固定下来。《出版法》共有6章44条，第一章“总则”规定何为出版品，何为新闻纸、杂志、书籍及其他出版品，发行人、著作人、编辑人的含义。第二章“新闻纸及杂志”规定报纸及杂志的登记发行手续以及登载更正或辩驳书的义务。从法律形式看，该条款对报刊实行的是注册登记制度。第三章“书籍及其他出版品”。第四章“出版品登载事项之限制”，特别规定出版品不得为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之记载。第五章为“行政处分”，第六章为“罚则”。

根据《出版法》有关规定的精神,国民党中央进一步颁布了《日报登记办法》、《出版法实施细则》和《宣传品审查标准》等文件,使国民党对新闻界实行的审查追惩制度愈来愈严。

1933年以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原来实施的审查追惩制度,改而开始推行更为严厉的事前检查制度。1933年1月19日,国民党中央制订了《新闻检查标准》和《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国民党陆续在一些大城市设立归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的新闻检查所,由各地党、政、军三方机关派员组成,对报刊新闻稿件实行严格的原稿检查,对不服检查的报刊,动辄予以停刊1—7天的处分或查封。1934年6月,国民党又公布《图书杂志检查办法》,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将新闻检查制度从报纸扩大到一切出版品。

1928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规定设立广播电台须经特许。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对电信事业的管理进一步强化。1930年7月和1932年11月,先后公布《装设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和《民营广播无线电台暂行取缔规则》,在登记和取缔民营电台、收回外商设立的广播电台、统计收音机和审查广播节目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规定。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公布《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7年4月又公布《民营广播电台违背〈指导播送节目办法〉之处分简则》和《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这三个法令的分布实施,标志着国民党开始以法律手段从节目内容上控制广播电台。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在较大程度上停止了对抗战言论的压制。作为国民党战时基本国策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通过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指出战时新闻界应注意加

强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应注意巩固全国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等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又加强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1939年6月,国民党正式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并连续颁布《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抗战时期报纸通讯社申请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新闻法规,在国统区建立起严密的新闻检查网络。1940年开始,国民党当局又连续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新闻记者法》等文件和法规。1942年7月,国民政府还公布了一个《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报馆及通讯社之设立,报纸通讯稿及其它印刷物之记载,加以限制、停止,或命令其为一定之记载”(第22条),“本法实施后,政府于必要时,得对人民之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加以限制”(第23条)。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国民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要放宽审查尺度”,“保障言论自由”。1944年6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出版品审查办法与禁载标准》,其中对“图书及不以论述军事、政治、外交为目的之杂志”,改原稿审查为“由著作人或发行人自行审查”,但对新闻纸和其他杂志仍实行事前检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闻出版界迫切希望摆脱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的束缚,9月1日,重庆16家杂志发起“拒检运动”,原稿不再送审。这个运动得到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响应,连国民党内一些执政人士也认为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不是一种好办法。内外因素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废除战时新闻检查制度,1945年9月17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办法》,规定“自民国卅四年十月一日起废止战时出版品检查办法及禁载标准”,但规定“收复区”为军事戒严区域,仍施行新闻检查制度。

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发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其中甲项第一条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厂、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按: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受管理。”

在接收了日伪广播电台之后,国民党广播事业的规模较战前有所扩充。为加强管理,1946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公布《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将广播电台分为国营、公营和民营三种,规定必须经交通部核准发给许可证后方可架设电台。还规定“凡外籍机关人民,非华人组织设置之公司、厂商、学校、团体一律不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同年9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讨外人在华广播电台问题,并通过《取缔外人在华设立广播电台决议案》,规定“凡外人在沪设立之广播电台,同时一律取缔(美国军用广播电台不在此限)”。1948年4月交通部又公布《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规则》,规定装设收音机必须申请登记,并随时接受检查。

1947年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这个草案删掉了原有的罚则,规定报刊等出版物违法一律按《刑法》的规定处罚,增加了“出版物不得为妨害本国或友邦元首名誉之记载”等新条款,并把《出版法》第21条“出版品不得为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的言论或宣传之记载”改为不得为“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者”的“言论或宣传之记载”。由于这部修正草案只对原《出版法》作了一些枝节的修补,并没有改变原《出版法》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实质,受到全国舆论界的反对,没有正式实施。

五、沦陷区的新闻法规

193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所占领的沦陷区实行法西斯的新闻

统制政策,操纵伪满洲国和汪伪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闻法规,将沦陷区新闻事业置于其法西斯的军事管制之下。

在东北,伪满洲国政权作为日本操纵的傀儡,出面管制新闻事业。1941年日满当局颁布《通讯社法》、《新闻社法》和《记者法》,时称“弘报三法”,规定通讯社、新闻社(即报馆)、新闻记者的全部活动,都由伪政府严格管制,从而用法律手段强化了伪满新闻事业的国家垄断政策。

1940年,汪伪政权拟定《全国邮电检查办法》,规定“各种新闻报纸、刊物、杂志”,“不论以何种文字,不分发送人之国籍”,“均得实行检查”,凡对日伪不利的“一律扣留”。为防止上海租界内的抗日爱国报刊流入沦陷区,日伪当局还制订了《封锁上海租界中外文字反动报纸之宣传及邮递暂行办法》,规定“由警政、宣传两部并会同沪市最高行政机关及军事机关合组封锁委员会”,共同处理封锁事宜,“不许片纸只字跨越租界一步”。

为了严格统制报业,汪伪政权还颁布了不少法令与条例。1940年10月1日,伪宣传部颁布《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实行新闻检查制度,在所辖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该条例规定禁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和苛刻。

1941年1月24日,汪伪政府颁布了《出版法》,为标榜与原国民政府《出版法》的继承关系,特别写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府公布,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但实际上只有少数条目是在原《出版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该法共7章55条,主要内容有:(1)规定了出版品的登记及变更登记的手续。(2)“国内无住所者”、“禁治产者”、“被判处徒刑或一月以上之拘役在执行中者”、“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不得充任编辑人和发行人。(3)禁止刊登“意图破坏三民主义或违反国策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意图破坏公共秩序”、“经宣传部命令禁止登载者”的文字,还特

别强调“战时或有变乱及其他特殊必要时”，得依“政府命令所定”执行禁载内容，违者视其情况予以不同处罚。该法实际上规定了违反汪伪“和平建国”国策的言论与新闻，以及汪伪宣传部不同意的稿件都一律不准登载。

为加强汪伪中央对报业的直接控制，1941年5月至9月，汪伪宣传部连续颁布了《直属报社管理规则》、《直属报社分区改进委员会组织通则》和《直属报社组织通则》三个条例，对报业宣传和管理各项事务均作了详细规定。《直属报社管理规则》强调：“直属报社在新闻编辑上应以（汪伪）中央电讯社稿件为主体”，根据汪伪宣传部所颁方针撰写社论，必须“绝对服从政府命令，不得为私人利用”。对伪宣传部发交之文字“须即行刊载，不得延迟或遗漏”。《直属报社分区改进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伪宣传部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设立分区改进委员会，监督分区内直属报社的宣传与经营，实行分区管理制度。《直属报社组织通则》规定，各报社之负责人及总编辑由伪宣传部直接委派，各报工作人员不得兼任社外职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根据形势的变化，颁布了一些新的新闻统制法规与条例。1942年6月，汪伪政府行政院颁布实施《修正战时出版法》，进一步强化对报纸杂志及其他出版品、出版机关和出版营业人的审查制度。1943年6月10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规定战时文化宣传政策的方针是：“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并提出要“严厉取缔敌性广播”，要求有关机关派出检查人员，实施广播节目“严格审查”，“采积极指导方针，不仅在消极方面删除违反国策之文字，尤应在积极方面指导符合国策之思想。”

为了堵塞人民从电波中获得消息的渠道，1942年4月，汪伪宣传部制订颁发了《装设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规定凡装设收音机者须先向当地警察机关登记备案。汪伪政权还先后制订和颁布

了《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收听规约》等法令,把短波收音机列为“违禁收音机”严加取缔,勒令持有者限期到指定地点改装,违者给予严厉惩罚。1942年12月,日本侵略者还直接以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中国方面舰队最高指挥官的名义颁发《取缔无线电收报收音机布告》,严禁民间“制造、使用、持有或转让”“七灯以上真空管”或“可收550千周至1550千周以外之周率”的高级收音机,违者“以军法严惩不贷”。日伪当局采取的这些措施,使沦陷区人民只能收听到当地的日伪奴化广播,而听不到任何来自沦陷区外的正义之声。

第二节 报 案

从中国古代报纸问世起,特别是民间小报出现后,报纸和报纸发行者违禁、当局者对报纸和办报人的处罚事件就层出不穷。历史文献中大量的限禁和处罚报纸和报人的谕旨、章奏就是证明。但是,由于这些记载大都出自当局者之口,且甚为简略,故千百年间有具体事由和经过的报案,只有寥寥数起。

近代化报纸在中国出现以后,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们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影响,提出报纸要“代表舆论”、“监督政府”,把报纸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清朝末年反封建的报刊宣传活动中,报纸每每以言论获罪,动辄得咎。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年百日维新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13年内,至少有53家报纸被禁或被处分,报刊工作者被传讯、拘捕或处死的在百人以上。之后的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因言论触犯当权者而报纸被封、报人遇害之事亦屡见不鲜。

随着报业的不断发展,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报案,如侵害名誉、

报道失实、经济纠纷、涉外纠纷等等。

一、古代报案

陈新甲“通敌”案 明朝末年,明军在对清军的战事中一再失利,而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军日益逼近京师。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崇祯皇帝决定同清军议和,以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崇祯皇帝将遣使求和的任务交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并采取严格保密措施,严防泄露机密。但陈新甲却不慎将求和之事泄露出去,朝中大臣得知后接连上疏,劝阻崇祯皇帝与清军议和。崇祯连下手谕给陈新甲,严令其保守秘密。然而不久,陈新甲派遣的议和使者汇报议和进展的密信被陈的家僮误作待发的邸报,交给有关部门传抄,从而使求和之事完全公开,朝野哗然。崇祯皇帝恼恨陈新甲一再泄密,遂以“通敌”为借口将其处死,议和之事亦作罢。

何遇恩等“捏造小抄”案 雍正四年(1726年),一份由民间报房编发的小抄载称:五月初五端午节,诸王及大臣们赴圆明园向雍正皇帝叩贺节日,随后,皇帝出宫乘龙舟游玩,诸王及大臣们乘坐10只船随行,由园内的东海游到西海,至晚方散。这则报道是不真实的。雍正在端午节那天并没有乘舟游玩,仅召集在圆明园居住的诸王10余人,在勤政殿侧的四宜堂就餐,随后各自散去。雍正将这则伪报道与众兄弟反对自己的阴谋联系起来,严令彻查。小抄案很快即破案,捏造小抄的报房报人何遇恩、邵南山被捕。刑部判斩立决,雍正改为应斩,收监秋后处决。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桩有名姓可考的报人被判死刑的事件。

伪传邸报案 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听到乾隆皇帝将要南巡的消息,虑及办差累赔,便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商议,炮制了一个奏稿,列举乾隆南巡有“五不解,十大过”,认为给民

间带来很大的骚扰,应停止南巡。因当时的吏部尚书孙嘉淦有“敢言”的声誉,就假借他的名义,冒充他的奏疏,并伪造了乾隆的“硃批”,交给提塘传抄,并印入《京报》,流传很广。1751年7月,云贵总督硕色发觉后,奏报朝廷,乾隆皇帝立即谕令各省督抚密访严拿,“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在乾隆的亲自督催下,1753年1月该案告破。卢鲁生因在刑讯中受刑过重,乾隆皇帝恐其在刑前病死,乃下令将卢鲁生提前凌迟处死。同年秋,刘时达及卢鲁生的两个儿子被押解至京,经再次审讯后被斩首处死。此案涉及多人,记载中有名有姓者即达50人,因办案不力被革职者又有多人。记载此事的史籍《东华录》,以25段文字详细记载了从发案到结案的全过程。

二、近代报案

郭嵩焘画像案 1878年6月20日,上海《申报》登出一则新闻,题目是《郭星使驻英近事》,内容译成白话文大致是:

英国报纸在谈到中国和朝鲜的驻英大使时,总是带着讽刺的口气。最近英国一家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英国近日举办了一个展览,展厅里展出了一幅人像画,画的是大清国驻英星使(公使)郭嵩焘。据画师顾曼说:“我准备给大人(郭嵩焘)画像时,大人非常犹豫,迟延许久,才表示答应。我又多方劝说,大人才允许就座。我请他把手放正,他却把手藏在袖子里,坚决不拿出来。我坚决要求他把手拿出来,大人神色更加惊慌。好不容易准备好开始画像时,大人又严肃地说:‘画像上必须两耳都有,如果只画上一只,观者不就认为我的一耳已经割去了吗?’大人又要求把官帽上的花翎必须画上,我说翎在脑后,为帽顶所遮,无法画上。大人即把头低到膝部,问我说:‘现在看见翎了吗?’我说:‘大人翎虽看见了,但大人的面目又画在哪里呢?’于是他和我都笑起

来。后来大人表示,自己便服膝坐,将大帽放一旁,一并画上。我请他穿上官服,大人严肃地说:“如果穿上官服,恐怕英国的老百姓一见画像都要向我磕头了。”

这家英国报纸又报道说,郭星使在画像画好后,见画得精妙,又想延请画师为其夫人画像。

这则新闻是失实的,据清政府驻英使馆人员证明,画像是画师顾曼以郭嵩焘的一幅照片为蓝本而作,报道中二人的对话完全是无中生有。郭嵩焘在法国看到这条消息后,立即致信顾曼质询,并致电《申报》诘问消息来源。顾曼回信否认该消息出自他口,并书面声明了画像的真实经过,送往各报发表。《申报》在郭嵩焘连电催问下,于9月复电称消息译自《欧兰美报》,但郭嵩焘查阅该报并无此消息。后郭嵩焘查明该消息源自顾曼之弟顾丹,顾丹自顾曼处得知画像一事,即添枝加叶在其供职的一家英国报纸上撰造了一条消息,上海各外报得此消息后又作了加工润色,《申报》随后译成中文发表。由于上述各报均为外报或外人在华所办报纸,加之中国当时亦无报律可援引,故各报对郭嵩焘的起诉警告有恃无恐。郭嵩焘不久也卸任回国,这个影响一时的画像案亦不了了之。

《苏报》案 1902年以后,陈范主持的上海《苏报》日益倾向革命,和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等革命团体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宣传反清革命的言论阵地。尤其是1903年5月章士钊受聘担任主笔后,连续发表了《哀哉无国之民》、《康有为》、《驳革命驳议》、《呜呼保皇党》、《杀人主义》等放言无忌的革命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鼓动青年学生大胆革命,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批驳康有为等改良派的保皇谬论。清末著名革命家邹容所著《革命军》出版后,《苏报》立即加以介绍,称颂它是主张“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的“雷霆之声”。6月29日,《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要刊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驳斥

康有为“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论调，文中以轻蔑的口吻称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认为光绪跟慈禧没什么区别，都是“汉族的公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清政府联合租界当局，派巡捕包围了苏报馆和爱国学社，章太炎等5人被捕，邹容第二天自动投案，苏报被查封。章、邹被捕后，清政府要求引渡，遭租界当局拒绝。于是，一场以洋人为法官，清政府为原告，章太炎等人为被告的特殊审判活动于7月15日开始。该案先后7次开庭，中外报刊广泛报道，轰动一时。起初，租界当局判章、邹两人永远监禁，其余人开释；后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改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2年，《苏报》永远停刊。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其流风所及，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削弱了清政府对新闻界的控制。

沈荇被害案 1903年，国内外盛传清政府准备与沙俄签订密约，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政税权及其他领土主权。湖南人、新闻记者沈荇探得中俄密约全文，遂在天津一家英文报纸上详细披露了密约的拟定过程及全部内容。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国内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列强也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停止签约。沈荇因此而受到清廷的忌恨，于1903年7月19日在北京寓所内被捕。不久被判斩立决，其时正逢慈禧太后的“万寿(生日)庆典”筹备期间，慈禧恐行刑不利，改判“杖毙”，7月30日沈荇被刽子手轮毆至死。据当时报载：“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横飞，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沈荇遇害后，上海人民曾举行集会表示哀悼，革命派还编印了一本题为《沈荇》的小册子，宣传他的事迹。

卞小吾被害案 1905年春，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大举庆寿，极尽骄奢挥霍之能事。当时主持《重庆日报》的革命党人卞小吾根据其他报纸的报道，以《老妓颐和园之淫行》为题，揭露了这件事，在川东和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四川总督锡良以卞小吾“褻渎圣上，大逆不

道”下令严办。1905年6月1日(一说4月29日)卞小吾被捕,《重庆日报》亦被查封。卞小吾被捕后即解往成都,同盟会多方营救,因当局戒备森严,均告失败。1908年6月13日夜,卞小吾在系狱三年之后,被川督赵尔丰与成都知府高增爵指使狱卒乱刀刺死,刀伤达20余处,死状极为惨烈。辛亥革命胜利后,卞小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京报》与杨翠喜案 1907年,袁世凯的部下、陆军第二镇(师)统制(师长)段芝贵为谋得黑龙江巡抚一职,不惜重金买下天津名伶杨翠喜,进献庆亲王奕劻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不久,段芝贵竟以候补道越级晋升为黑龙江巡抚,政界议论纷起。奕劻和袁世凯的政敌军机大臣瞿鸿禨反对尤力,瞿有意把此事泄露给《京报》。《京报》首先披露这则消息,在京师引起轰动,《京报》因此而一纸风行,销数大增。京津其他报纸亦闻风而动,全力搜集有关事实在报上发表。御史赵启霖因以奏劾奕劻父子,慈禧派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查明。办案人不敢开罪奕劻和袁世凯,以“所参不实”回奏,赵启霖反以“污蔑亲贵重臣”革职。奕劻恐事态扩大,为平息舆论,由载振自请免去御前大臣和农工商部尚书职,段芝贵巡抚职亦被罢。5月间,瞿鸿禨不慎将慈禧拟令奕劻退出军机事泄露给《京报》馆主汪康年,并为外报获知加以登载,引起慈禧不满。奕劻和袁世凯趁机弹劾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慈禧下谕“瞿鸿禨着即开缺回籍,以示薄惩”。7月17日,北京城外巡警总厅奉民政部谕,命京报馆于7月18日停止出版。“杨翠喜案”中反映出的清廷权贵倾轧,史界称之为“丁未政潮”。

《民报》案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5年在东京创刊后,积极宣传革命,反对保皇,引起清政府的忌恨,下令禁止《民报》进入国内。但国内人士仍能通过各种渠道得以阅读,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则根本无法禁止。1907年9月4日,清政府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请他转告日本政府,禁止《民报》出版,但日本政府没有首肯。1908年

10月,奉天巡抚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途经日本,直接与日本政府密谈。唐先以清美结盟对付日本相威胁,又以间岛领土,抚顺、烟台煤矿和新法铁道(新奉至法库)权利相诱。日本政府答应了唐绍仪的要求,由东京警察总监给《民报》主持人章太炎发出命令书,指称《民报》第24期违反新闻纸条例第33条,命令《民报》停止销售发行。章太炎为此三次上书日本内务大臣,指出《民报》六大主义的宣传曾经日本政府认可,揭露日本政府的行为是要“以《民报》之革命宗旨与满洲政府所赠利益交换,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并诉诸日本法庭,但日本法庭于1908年12月12日仍宣布禁止《民报》出版,并罚款115元。主编章太炎因无力交纳罚金,被拘于劳役场,以劳役抵罚金,后经鲁迅、许寿裳等人多方筹措到罚金后,始得释放。

《公益报》私登封奏案 《公益报》是北京主要报纸之一,“杨翠喜案”中曾以精彩报道,销数跃居北京各报之首。杨案后不久,报社收到一匿名密稿,系湖广总督梁鼎芬的封奏,内容是参奏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因涉及亲贵大臣,《公益报》编辑部几经讨论委决不下,后经编辑部主任关天僧力主发表,报社同人乃决心登载。刊出之日,送报及买报人塞满报社大门,《公益报》增印两万多份,仍不能满足需要。几天之后,《公益报》即因私自发表封奏被封闭。

“竖三民”报案 “竖三民”指《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三报都是报头竖排,以“民”字打头,时称“竖三民”,它们的创办者都是于右任。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在上海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该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张旗鼓地鼓吹革命,攻击清政府,痛斥官场腐败。清政府指使陕甘总督诬告该报侵吞救灾公款,租界当局即拘捕于右任,经审讯,尽管查明所谓侵吞灾款纯属诬告,仍然无理判决将于右任逐出租界。《民呼日报》被迫停刊,前后仅出版92天。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又创办《民吁日报》。报名“民吁”意为“民不敢声,唯有吁耳”。1909年10月下旬以后,该报重点报

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火车站的消息,连续发表 20 多篇评论和报道,详细披露事件经过,热烈赞扬安重根的英勇行为。11 月初,日本驻沪总领事松冈以《民吁日报》“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两国邦交”为由,要求上海道蔡乃煌对该报进行惩处。蔡会同租界当局,于 1909 年 11 月 19 日,将《民吁日报》封禁。《民吁日报》前后仅出版 48 号。于右任在资本家沈缙云等人的支持下,1910 年 10 月 11 日又创办《民立报》,报名仍用“民”字打头,以示与“民呼”、“民吁”两报的继承关系,继续宣传革命,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一家革命日报。

《大江报》被封案 1911 年 7 月 17 日,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撰写的短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斥责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是“摧抑民气之怪物”,认为立宪派以和平请愿方式乞求政治改良根本行不通,只有“亟起革命”,才能救国。7 月 26 日,该报又发表署名“奇谈”的短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认为中国已面临亡国,但上上下下仍不知警醒。在此情况下,和平改革已无希望,必须以“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才能“顿易其亡国之观念”,迅速觉醒救国。疾呼“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文中所说“大乱”即指革命。这两篇短评每篇虽只一二百字,但言辞激烈,很有号召力。鄂督瑞澂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和“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于 8 月 1 日派军警包围《大江报》馆,逮捕总编詹大悲,副总编何海鸣闻讯自动投案,报馆也随即被封。第二天,报社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哗然,全国各地纷起指责清政府摧残言论的暴行,声援《大江报》。汉口各界人民团体和报界公会公开集会表示抗议,被封的《大江报》馆门前,贴满了慰问的纸条。瑞澂原拟对詹、何“从重置典”,但慑于民情,不得不从轻处罚罚金 800 元了事,后以二人无钱交付罚款,改判徒刑 18 个月。

《民权报》毁谤案 辛亥革命爆发后,戴季陶在上海创办《民权报》,每天均发表一篇千字左右论说,措词激烈,颇受世人重视。1912年5月20日,《民权报》发表戴季陶的论说《反对外债》。公共租界捕房向会审公廨控告该报“毁谤袁总统、熊希龄、唐绍仪、章炳麟”,由会审公廨发出捕票,于5月22日逮捕了戴季陶。6月13日会审公廨宣判,以《民权报》措词过激,妨碍治安。罚洋30元。戴季陶出狱后,在报馆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此言传诵一时。

“癸丑报灾” 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残酷迫害反袁报刊和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封报杀人之事层出不穷。1913年5月24日,杭州《浙报》被以所谓刊新闻“挑衅军队,激成内乱”的罪名,罚停三周;6月12日,杭州《汉民日报》又被以庇护“乱党”的罪名勒令停版,记者邵振青被捕入狱;5月8日,济南《齐鲁民报》因发表《为宋案敬告北方军界同胞》,宣传“政府而叛国民,军人不应听政府之命令”,被罚洋一百元并查封;8月,福州《群报》等几家报纸以“议论荒谬”被封,广州《震旦报》及《粤东公报》以“言辞激烈”被封;10月,北京《超然报》以“毁坏军人名誉”被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即便政治上相当保守的北京《正宗爱国报》,仅因为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若为个人,可谋生之处甚多,何必从军”等语,就被加上“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社长丁宝臣被捕走,未经审讯即被枪决。上海报纸因办在租界内,袁政府不能直接封闭,就采取禁止邮递的办法,使这些报纸失去销路,自行倒闭。甚至一些本来拥袁的报纸也因偶出冒犯之言而遭封禁。据统计,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与1912年的500家相比,锐减300多家。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世人称袁世凯对报业的这次摧残为“癸丑报灾”。

席子佩向《申报》索赔案 《申报》是解放前我国历史最久、影响

最大的一家报纸,创办于1872年,创办者是英国人美查等。1889年秋,美查等人决定返国,1909年《申报》经理席子佩出资接办。席子佩接办后经营不善,报纸销数下跌,虽多方努力,仍无法打开局面,遂决定出让《申报》。史量才、张季直、应季中、赵竹君、陈景韩五人合议,由张、应、赵三人出资12万元,于1912年10月从席子佩手中购买了《申报》全部产权,由史量才担任总经理,陈景韩担任总主笔,席子佩留任经理。1915年冬,席子佩突然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申报》,称自己当初出让《申报》时,只是出让了产权,并没有出让报名。他认为史量才继续使用《申报》报名属于侵权,应赔偿损失。这场官司一直打了三年,最后《申报》败诉,被判偿还席子佩24.5万两白银。否则,《申报》仍归原主所有。《申报》败诉之后,当年的入股者失去信心,纷纷退股。为保住《申报》,史量才请上海经济界巨子徐静仁担保,向席子佩分期赔款,方使讼案了结。

张敬尧摧残湘报案 1919年,军阀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报馆被封,报人被捕被杀之事连连发生。1919年7月7日,《大公报》和《正义报》报道了常德独立的消息,形成非常不利于张敬尧的舆论,张下令封闭这两家报纸,《正义报》经理杜启荣被逮捕,判处徒刑3年2个月。继之《公言报》因转录不利于张敬尧的汉口新闻,也遭封闭,主持人傅钟英被驱逐出境。同年,湖南举行省议会选举,张敬尧欲直接指定人选,遭到舆论强烈反对。省城各团体发表宣言,不承认这个非法“选举”,并将宣言送登《湖南日报》和复刊的《大公报》。张敬尧见后立即派军警封闭这两家报纸,逮捕记者。各团体推举代表与张敬尧交涉,声明宣言由各团体负责,报馆不应获咎,张方允许两报启封。《大公报》复刊当天,因载文说明停刊原因,当天即再遭查封。创刊不久的《华瀛觉报》借洋行的保护对张敬尧加以抨击,张乃贿嘱被捕的匪徒诬控该报经理为匪,下令将其逮捕并枪决。

《昌言报》事件 《昌言报》1919年3月创刊于山东省济南市,是

安福系在山东的一个喉舌。安福系得名于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设立的安福俱乐部,是一个亲日的政治派系。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的报纸多数都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只有日人办的《济南日报》对运动大加诋毁。《昌言报》也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指责学生“干涉时事”,“荒废学业”,攻击省长沈铭昌“任学生操纵驱使,滋生事端,似应退位让贤”。1919年7月21日,济南群众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约有1000多人参加。小学教员郭丙臣当场演说,痛斥《昌言报》的种种谬论,号召大家誓死不看《昌言报》,得到群众呼应。参加大会的群众随即组成游行队伍奔向《昌言报》馆,把经理张景云、主编薛惠卿等绑成一串,拉到街上游行,并沿途演说,揭露《昌言报》罪状,一时观者如云。游行队伍到达省署后,省长沈铭昌应群众要求,派出卫兵将张景云等人押往审判厅审判。在安福系分子、山东督军张树元等人的干预下,审判厅很快就将张景云等取保释放。《昌言报》报馆被砸后,安福系立即进行报复。督军张树元7月22日召开军警首脑会议,布置反扑,会后逮捕并杀害了群众领袖朱春涛、朱春祥、马春生。

周恩来诉《时事纪实》案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为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专门创办一份报纸《时事纪实》,因杨以德绰号“杨梆子”,人们就称这份报纸为“杨梆子报”。该报品格低下,版面充满了泼妇骂街式的话语。出版27天中,就有14天刊登诽谤学生的文章。1919年11月7日,该报竟登出一篇题为《好一对爱国鸳鸯》的文章,对天津学生运动领袖马骏、刘清扬大肆造谣中伤,又借此污辱天津女师学生。周恩来当时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并且是由学生运动骨干组成的觉悟社的领导成员,因马骏、刘清扬不便出面反击,便由周恩来准备了起诉材料,将“杨梆子报”送上法庭。利用法庭调查的间隙,周恩来又把材料副本送呈直隶省长曹锐。曹锐也觉得“杨梆子报”闹得不像话,帮了倒忙,当即派兵查封。法院得讯,顺水推舟,传讯该报其他文痞,商界也闻风而动,派人清查该报侵吞商会公

款一事。这个流氓报纸就这样被周恩来一状告倒了。

邵飘萍、林白水被杀案 1926年,北京有两个著名的报人先后在天桥被军阀杀害,一是邵飘萍,一是林白水。由于他们的名字最后一个字分别是“萍”和“水”,时人称他们的遇害是“萍水相逢”。邵飘萍是民初著名记者,各军阀都想拉拢他以为己用。奉系军阀张作霖以30万元收买邵飘萍,为邵所拒,邵飘萍还在报纸上连续不断地抨击奉系军阀的倒行逆施。1926年奉军入关前召开会议,商定了进京后要逮捕的人员名单,邵飘萍被列在第一位。奉军进京后,邵飘萍即避往外国人开办的六国饭店。奉军不敢入内抓人,便买通北京《大陆报》社长、邵飘萍的熟友张翰举实施诱捕。张找到邵飘萍,称奉军已解除对他的通缉。邵挂念报社工作,遂走出东交民巷,即被埋伏在附近的奉军捕获。北京报界得知邵飘萍被捕后,曾进行营救,未果。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枪决于北京天桥。林白水是因讥刺北洋政府的官僚而遇害的。林经常在其创办的《社会日报》撰文抨击官僚,一次林白水在社论中骂政客潘复为“肾囊”,迹近人身攻击。潘阅后向张宗昌哭诉,张令宪兵司令王琦逮捕林白水,略加审问,即押赴天桥刑场枪决。这是1926年8月6日的事。

《公论报》“落日”案 1926年,直系军阀孙传芳在和北伐军的交战中连吃败仗,统治岌岌可危。这时上海英文《公论报》刊登了一幅孙传芳的照片,并写了“The Setting Sun”的题解。这句英文翻译过来是“落日”的意思,毫无特殊意味。但实际上英文“太阳”(Sun)的音译即为“孙”,所以这句英文的本意是“崩溃的孙传芳”。孙传芳手下有人专门负责检查英文报纸,《公论报》的这幅照片及题解马上就被翻译给孙传芳。孙立即下令逮捕《公论报》主持人谢福生,因该报设在公共租界,孙传芳不能直接进入租界抓人,便派出便衣队绑架了谢福生,押到孙传芳的龙华护军使署,并判处死刑。消息传出后,上海日报公会主席史量才等人代表上海新闻界来到龙华,经百般求情,谢福生才免

一死。

《新闻报》股权风波 二十年代末,上海资产阶级民营报业有了较大发展。实力雄厚的《申报》老板史量才欲仿效西方报业集团老板,成为中国的“报业大王”。1927年上海大报《时事新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史乘机买下该报相当一部分股份,从而对该报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28年底,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的美国老板福开森欲卖掉股份回国,史闻讯后,即派人与福开森秘密接洽,于1929年1月以70万元买下了福开森所拥有的《新闻报》65%的股权,成为该报的新老板。但当史量才派人前往接收《新闻报》时,却遭到了该报原主持人汪伯奇、汪仲韦兄弟的极力抗拒。汪氏兄弟组织股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干事会代行董事会职权。全社职工也担心报纸易主后的人事变动,支持汪氏兄弟,他们设置警戒线,拒绝史量才接收。《新闻报》自1月16日起的十多天内,刊登全国商界函电130多件,声援《新闻报》收回股权。当时国民党当局也不希望史量才一人掌握全国最大的三家报纸,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新闻报》上发表公开信,警告《新闻报》“不得将福开森股份售于反动分子”,并声称将严厉处置。国民党所办《民国日报》连日刊文,提出要给报业托拉斯“一个严厉的制裁”,国民党中宣部也公开站出来压史量才。在各方压力下,史量才经过同《新闻报》代表的多次谈判,被迫作出让步,让出300股由他人认购,使其股份不超过50%,《新闻报》一切不变,史量才放弃接收,只按股票分享红利。

《民国日报》被封案 1932年1月20日,上海的日本浪人借端烧毁引翔港三友实业社工厂,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次日详细报道了这件事。22日下午5点,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派人来到报社,递交了陆战队的抗议信件,称该报“‘日浪人借陆战队掩护’之纪事,与事实完全相违背”,并提出四项要求:“(1)主笔来队提出公文陈谢;(2)掲載半张大的谢罪文;(3)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种事情;(4)

罢免直接责任记者。”并限《民国日报》次日答复。《民国日报》立即报告了报馆所在的公共租界当局和有关方面，并采取了严密的警戒措施。次日日侨（实为侵华别动队）召开大会，会后暴徒涌向《民国日报》报馆，但因警戒严密，报馆没有被捣毁。但是公共租界当局却屈从日本人的压力，“劝告”《民国日报》停刊，随即又派出武装巡捕封闭了该报的营业、编辑、印刷等部，《民国日报》被迫停刊。上海淞沪抗战结束后，公共租界允许《民国日报》启用房子财产，但不能复刊报纸。于是，这张颇有历史的国民党机关报就永远停刊了。

刘煜生被杀案 1933年1月21日，江苏省省会镇江市《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因揭露政府官吏卖鸦片及吸毒的内幕，被江苏省政府以“共党”和“共党报纸”，“蓄意煽起阶级斗争，鼓动红色恐怖”等罪名，援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予以枪决，《江声日报》停刊。这一事件引起社会各方强烈抗议。1933年2月初，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发表中英文宣言，指出刘煜生之死的真实原因在在于为民众呼吁抗拒烟毒，而招致政府大员挟私报复。邹韬奋在上海《生活》周刊连写两篇“小言论”，指出刘案从法律程序和罪名内容来看，显然都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要求最高当局彻底追究真相。上海各报239位记者联名发表宣言，详尽列举事实为刘案辩诬，伸张正义。全国律师协会要求对刘案制造者提起控诉。迫于各界压力，国民政府发布了“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及“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

《民生报》案 1934年，民族通讯社记者陈云阁从监察院参事室获悉，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极力庇护铁道部向国外购买建筑材料中的贪污舞弊行为，而监察院长于右任坚持举劾，二人为此争执不下。蒋介石当时正在南昌指挥“围剿”红军，担心汪、于二人之争会影响江西的军事及华北对日交涉，因而分电汪、于，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争吵。陈云阁认为这是一条独家消息，立即写成稿件交编辑部发

表,南京许多大报都登了这条消息。南京《民生报》老板、报业资本家成舍我把这条消息加上《蒋电汪于勿走极端》的标题,在《民生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汪精卫亲信、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彭学沛因《民生报》曾揭露其贪污,一直寻机报复,看到《民生报》这则消息后,向汪精卫密告说《民生报》借机扩大事态,打击汪精卫。汪即致电蒋介石要求严办,蒋电令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严究发出此消息的民族社。谷正伦接电后派兵查封了《民生报》和民族社,逮捕了成舍我及民族社的有关人员。这个案子直接牵涉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的新闻检查所和中央组织部所属的民族通讯社,故中宣部和中组部亦多方疏通,试图缓解案情。但由于汪精卫施加压力,蒋介石毫不松口。成舍我也多方活动,并取得了汪精卫另一个重要亲信、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的同情。唐在随汪精卫去庐山见蒋介石的途中说服了汪,汪见到蒋介石后表示可以从轻发落,蒋即电令南京有关方面释放了成舍我等人。

史量才被刺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在政治态度上明显表现出抗日、进步的倾向。《申报》公开刊登了宋庆龄的《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宣言,指出“宁粤(指蒋介石和汪精卫)双方”“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并连续报道了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宋庆龄曾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谴责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申报》虽没有发表,却通过史量才的关系在一家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申报》副刊“自由谈”也进行了改革,登载鲁迅和陶行知等人的文章,反对蒋介石政权,甚至发表《剿匪评论》专栏,反对蒋军围攻红军。《申报》还多次因报道学潮与国民党当局发生冲突。这一切引起国民党当局强烈不满,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杀害史量才。1934年10月间,史量才赴杭州休养,军统局华东区行动组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下手,事先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11月13

日,史量才乘坐汽车由杭返沪,同车的有夫人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侄女沈丽娟及司机黄锦才等共6人。汽车行至翁家埠附近时,突然遭到伏击。司机黄锦才和邓祖询当即身亡,沈丽娟、沈秋水中弹负伤,史量才和史咏赓下车奔逃。史量才被追上枪杀于一个水塘旁,史咏赓负伤逃脱。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蒋介石一面“电唁”史量才家人,“严令”缉凶,一面却给进行暗杀的特务5000元以示犒赏。

《新生》事件 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发表署名“易水”(即艾寒松)的随笔《闲话皇帝》,泛论了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也涉及了日本裕仁天皇:

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作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不得不作。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如他不是做着皇帝,常用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的东西。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

文章发表后,日本驻沪总领事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日方提出了五项要求:(1)没收全部载有《闲话皇帝》的这一期刊物,封闭《新生》周刊社;(2)逮捕《新生》周刊负责人和文章作者易水;(3)惩办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4)撤换上海市长吴铁城;(5)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宣部向日本道

歉。为扩大事态,日本军舰不断开进吴淞口,日文报纸大肆进行威胁性宣传,日本军人和侨民在上海游行、闹事。迫于日方压力,南京政府特派萧同兹、齐世英处理此案。萧、齐二人抵沪后,向《新生》周刊提出几条要求:(1)起诉后,《新生》周刊的代表在法庭上不得说出《闲话皇帝》一文经过了审查;(2)《新生》周刊把这一期的审查证交还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3)《新生》周刊要请的律师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4)立即通知在江西办实业的负责人杜重远回沪出庭。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驳回杜重远律师的辩护,判处杜重远徒刑一年零二个月,《新生》周刊二卷十五期没收。判决宣布后,杜重远当即被押送漕河泾,后移送苏州监狱。直至刑满方出狱。

《开明日报》事件 《开明日报》1939年创刊于湖南茶陵,次年迁衡阳出版。在中共地下党员黎澍、骆何民等与民主人士刘岳厚的主持下,以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榜样,言论进步,坚持团结抗战。国民党当局非常仇视这张报纸,多方予以打击。1941年1月14日夜,国民党当局派出十几名特务,企图以登广告为由,闯进报社制造事端。总编辑骆何民察觉有异,以登广告时间已过为由,坚决阻止这些“广告户”进入报馆。16日夜,国民党当局直接派出几十名特务冲入《开明日报》报馆,大肆搜查,并抓走骆何民等12名报馆工作人员。事件发生后,《开明日报》社长,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第九战区少将参议刘岳厚积极组织营救,《开明日报》也发表社论《为本部被害向全国呼吁》等文章,要求释放被捕人员。经多方营救,被捕人员陆续出狱,但骆何民却一直被关在耒阳监狱,后设法越狱逃跑。刘岳厚因受报案影响,被停止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

《大刚报》揭露“湘北大捷”案 1941年秋,日军在湖南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渡过了汨罗江,但随即后撤,只有数百人的部队逼近长沙,也很快撤回。当时驻节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薛岳闻知日军逼近,迅速弃城而逃。不久薛发现日军并没进占长沙,便把自己的逃跑

说成是湘北会战大捷,但“湘北大捷”真相却被衡阳《大刚报》的一篇报道公之于众。《大刚报》是一家有影响的民办报纸,薛岳弃城而逃时,该报记者王淮冰正在前线采访。为探明实际情况,王淮冰迎着撤退的人群,独自一人走到长沙。王淮冰在长沙城里经过反复调查,确信日军没有到过长沙,也没有进攻长沙的迹象,便写下通讯《奔赴长沙》,对沿途见闻如实作了报道,迅速在《大刚报》发表。这篇通讯证明了薛岳不但没有打出个“湘北大捷”,相反是个望风奔窜的逃将。薛岳阅报后马上下令逮捕王淮冰,后由《大刚报》负责人亲赴长沙向薛岳“道歉”,才算了结。

昆明四记者失踪案 抗战后期,蒋介石嫡系部队杜聿明、邱清泉兵团开进云南,准备对付云南地方军事集团——龙云集团。为达到这一目的,杜、邱委托老报人李诚毅创办了昆明《扫荡报》以为己宣传。李诚毅聘请著名记者高天任总编辑。高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对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和杜、邱兵团的消息,采用删改或署名的办法,尽量减少《扫荡报》的反共宣传。高天还以“本报专电”的方式,改写发表了很多新华社的报道。报纸副刊也经常刊登田汉、闻一多等著名民主人士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这引起了杜、邱等人的不满和警惕,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高天等人的监视。由于李诚毅还想倚重高天办好报纸,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高天争取过来。1945年8月30日,李诚毅以高天的名义刊登了一篇题为《拥护政府统一建国》的专论,公开指责朱德关于受降问题的电报是“荒谬词句”,“中共过去的政策是错误的”等等。为使这种陷害不攻自破,高天悄悄离开《扫荡报》,秘密出走香港。高天出走后,该报记者、中共地下人员张兆麟、吕剑也秘密转移。编辑杨人鸿因被怀疑知晓内情,被军统特务逮捕。四记者突然失踪,在昆明及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证实杨人鸿被特务逮捕后,人们怀疑其他三人也落到了军统特务手里。闻一多代表文化界人士向云南省主席龙云表示,昆明人人自危,希望龙云采取切实措施制止特务

的胡作非为。龙云得知此事后命令军统特务立即交出四名记者。军统向龙云报告,实实在在只抓了一个杨人鸿,其他三人均不知去向。龙云命令马上释放杨人鸿,其他三人也不许再抓。吕剑后来辗转到达香港,参加《华商报》工作。张兆麟到了重庆,向《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报到。

羊枣被迫害案 羊枣本名杨潮,是四十年代著名新闻记者、军事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1945年,羊枣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为国民党第三战区察觉。7月13日,第三战区司令部企图以开会为由诱捕羊枣,被羊枣发觉并设法逃脱。第三战区遂派兵包围了羊枣供职的美国新闻处,强令美国新闻处交出羊枣并予以逮捕。抗战胜利后,羊枣被转囚于杭州监狱,受到人身迫害并身患重病。1946年1月11日,羊枣离开人世,时年46岁。羊枣死后,上海文化新闻界举行盛大追悼会,悼念羊枣并联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要求彻查羊枣死因,逮捕凶手。上海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著文指出:“当没有新闻自由的时候,即使检查制度已经废除,中国记者们的命运还是与羊枣相同。”

《解放》报“查户口”事件 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北平创办《解放》报,弥补了中共在北方大城市没有党报的空白。该报创刊后发行量很快达到5万份,是北平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一家。1946年4月3日深夜,二百余名武装军警包围《解放》报社,借口该报漏报户口,捕走报社工作人员30多人。事件发生第二天,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和质问。4月5日,《解放》坚持出版,发表通讯详细报道了“查户口”事件,并配发了社论《我们的控诉和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接连发表文章表示抗议。为平息事态,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全部被捕人员。但被捕人员拒不出狱,并提出出狱的三个条件:追究责任,惩凶道歉,保证安全。经过谈判,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全部条件,由北平警察局长当众向被捕

人员道歉,《解放》报被捕人员方决定出狱。

《新华日报》“侮辱元首”案 1946年4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的长篇社论《驳蒋介石》,抨击蒋介石破坏东北停战协定,发动内战,实施独裁,山城重庆一时为之轰动。国民党以“侮辱元首”为由,指使一些团体在柳州等地法院提出控告。柳州把这一控告案转到重庆,经《新华日报》严词驳斥和律师界的帮助,重庆法院判决:查我国法律并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诽谤,须本人起诉。但蒋介石不便出面对质公堂,此案遂不了了之。

《文萃》报人被害案 《文萃》周刊1945年10月9日创办于上海,郭沫若、茅盾、田汉、许广平等许多知名人士经常为该刊写稿。由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不能及时地发行到上海,《文萃》便经常转载《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使上海、南京等地的群众能及时了解中共的立场、主张。《文萃》还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参加征答的有6个省市的300余人。测验的主要内容及结果是:(1)我们需要怎样的和平?主张彻底摧毁国民党政权,实现彻底的持久和平的为299人,占总数的98.6%;(2)怎样达到你所需要的和平?主张强迫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的为291人,占总数的96%;(3)怎样保障真正永久民主的和平?保障和平的力量在哪里?对于破坏和平者应如何处理?有294人认为保障和平的力量在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手里。主张摧毁一党独裁,没收“四大家族”财产,驱逐驻华美军,公审战犯和特务头子并处以极刑。这次测验的结果被新华社以“陕北电”为电头向国内外播发,为许多报刊转载。国民党当局很痛恨《文萃》的宣传。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特务于1947年7月23日逮捕了《文萃》工作人员骆何民、陈子涛、吴承德,1948年12月27日将三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上海解放以后,新闻出版界为三人举行隆重悼念仪式并出版了纪念特刊,中共上海市委根据骆何民的生前愿望,追认其为中共党员。

第六章 新闻学研究

第一节 新闻学著述

研究新闻事业规律及其社会影响的新闻学著述,既是新闻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的产物,又是新闻研究不断拓展和成熟的标志。

一、新闻著述的发轫

中国古代的新闻活动由于处于简单地传知朝政的程度,行业规模很小,没有产生新闻学著述。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代曾产生过新闻舆论学思想的萌芽,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毁乡校”等。先秦诸子十分重视的“诚、信、实、公”等也都具有新闻伦理观念的意义。

中国的新闻学著述,萌生于近代报刊在中国产生之后,最早是从对近代报刊功能和作用的介绍开始的,肇始者当推魏源。鸦片战争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阐述了他对西方报纸的认识,如“所谓新闻纸者,初出于意大利国,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

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英国“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揭示了报纸的社会政治功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导人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还提出了创办近代报纸的建议,如“设新闻馆”,“准卖新闻篇”,主张各省设“新闻官”,准许“富民”集资办报,“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等等。

中国的近代化报纸,是由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这些报纸所宣扬的办报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启发了中国人对近代报刊功能的思索。中国领土上的第一个中文近代化报刊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该刊1833年12月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简介了报纸的产生,当前状况和出版自由问题,是中文报刊上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中有重要影响的《申报》,创刊初期发表了一批新闻学专文,如《邸报别于新报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论各国新报之设》、《论本馆作报本意》等,宣扬西方新闻学观点,力言在中国创办“新报”即近代化报纸的好处。《申报》在这方面的论述,对于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改良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提出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办报主张,中国的新闻学著述进入了发表专门文章的阶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日报》、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陈炽的《庸书·报馆》等。

这些文章高度评价了近代报刊促进国家强盛的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肯定近代报刊“工作兴”、“商途辟”、“敌情得”、“公道彰”等功用的同时,着重强调了近代报刊“通民隐,达民情”的功用。这些文章中说,中国古代圣人都“唯恐下情之壅于上闻也”,但自秦以后,“舆情终抑”。从唐宋到清代,虽然采取了设言官等措施,却始终未能消除上下壅弊的状况,现实情况依然是“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昔有其语,

今无其事”，“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因此，“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只有广设日报，朝廷才能博采輿情，“知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国家才能兴旺。

这些文章其次较为强调的，是近代报刊传播新闻与知识的功能，认为，“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卓为有用之才，自有日报，足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此有功于学业也。”近代报刊可以使人“广见闻而资考证”。因此，不仅要办综合性报刊，还应该向西方那样，“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各有报”，大办专业报刊。

这些文章对报刊通民隐、达民情、广见闻、助学业等功能的阐述，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报刊有益于国家。由此，有的文章还难能可贵地提出了报纸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的观点，初步涉及到对报刊的政治斗争工具、特别是国际政治斗争工具的性质认识。有的文章揭露了外报的“抑中而扬外”的实质，明确主张不能让“外人操笔削之权”，应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办中文报刊，而中国人应自办外文报刊，开展对外宣传，在遇有中外纷争时，“备述其颠末，而曲直自见”，使外国入侵者不能“逞其鬼域”。王韬的文章，还提出了通过报刊，为“强中以攘外”而立言的主张。

此外，这些文章还对报刊文风，报人素质等问题发表了一些见解，认为报刊上的文章应该“直抒胸臆”，使读者人人都能明白文章“命意之所在”，应注重内容而不必过分拘泥于词章文法，报人应该有较高的学问和操守。

在多方面阐述报刊利国的作用之后，这些文章强烈呼吁清政府改变在办报方面“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的政策，鼓励本国“有体面之绅士”自由办报，允许报刊“上自朝廷之措置，下及闾阎之善恶，耳闻目见，莫不兼收并论”，“直陈时事，举其利弊”，“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初步提出了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要求。

戊戌变法时期,随着维新思想的发展和办报实践的增多,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吴恒炜等维新志士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和推介近代报刊的功能和作用。如《强学会报序》、《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国闻报缘起》、《湘报后叙》、《湘报序》、《知新报缘起》等等。这些文章对报刊的认识,在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着重宣传的,仍然是报刊有益于国家的多种积极作用,但已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概括为“通”,认为“得之则通,通之则明”,并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种功能:

1. 通上下、通中外的功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说:“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2. 开民智的功能。《湘报后叙》等文章认为,报刊可以“阐新理,纪新事”,在开民智方面,报刊比学校、学会受众广、见效快,盛赞报刊是“师范之嘴矢”、“师者之师”。

3. 开风气的功能。《知新报缘起》等文章认为,“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中国今日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阅报之多寡,与受力之多寡有正比例,与阻力之多寡有反比例”,“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在对报刊性质的认识上,这些文章形象地把报刊称为国家的“耳目喉舌”,“万民之喉舌”或“民口”、“民史”,认为有了报刊,民众将再也不会“暗之”,“哑之”如禽兽。这些主张已经把办报视为民众的天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重要体现,已经意识到近代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

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文章对报刊的阐述,属于感性认识的成分居多,还缺乏依据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理论性阐述。相反,在论证办报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与合理性时,还往往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武库中寻找理论依据,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宣德达情”、“谏鼓谤木”等。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报业的发展,许多报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宣传家们,在报刊上发表了更多的新闻学专文,如梁启超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国风报叙例》,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等。由于这时期的报人和宣传家们大都有在国外生活和学习的经历,接触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这些文章对报刊的论述,已摒弃了“宣德达情”等陈腐观念,而带有较多的资产阶级学说成分。

在报纸的职能、作用方面,《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两大天职”说,即:“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并以资产阶级民权观为基础,对此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即认为报纸所以有权监督政府,是因为“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以全权,则事因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亦不免于滥用其权。”而“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至于为何要“向导国民”,该文则未多解释,而是解释了应该怎样“向导”,即“鉴即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国风报叙例》等文章还就舆论问题和报纸与舆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而且,“凡能成为舆论者,必然论其忠于正理而适合于时势者也”,舆论一旦形成,就是“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之者”,“虽有淫威无等之专制政府,苟欲攫积极的舆论之锋,未有不败绩失据。”文章还认为,舆论有健全与非健全两种,要形成健全舆论,要具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等五个条件。在报纸与舆论的关

系上,认为报纸是舆论机关,“舆论之所出,虽不一涂,而报馆则其造之之机关之最有力者”,“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还提出了判断报纸“良否”的四个标准,即“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并热情礼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认为“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些文明之母”。

《民报发刊词》等革命党人论述报刊的文章,除赞同上述观点外,则更加强调报刊制造舆论的作用,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主张用报刊宣传革命的纲领和主义,报刊应把“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这些文章所阐述的观点,如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代表舆论、制造舆论等,一经发表,迅即引起了当时报界的广泛注意和响应。这些观点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对推动中国报界反封建专制的斗争和提高报界自身素质,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这些文章的观点中,有不少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如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等。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这些文章的发表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逐渐受到关注,一些西方新闻学著作开始被引入中国。190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1913年,上海广学会又出版了美国记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这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批新闻学专著,对资产阶级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一书,出版后销路甚好,曾有多人专门撰文加以推介。

二、近代新闻理论著述

1919年,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的徐宝璜的专著《新闻

学》为标志,中国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正规的阶段,即新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和开始出版新闻学专著的阶段。据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国内公开出版和内部刊行的新闻学专著、教材、论文集、资料汇编、参考工具书等共400余部。这些书籍按内容可大致分为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三个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洲的战事,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间隙,报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报刊的品种、数量和新闻从业人员迅速增多。报业急需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业务培训,新闻教育事业逐渐展开,一些大学相继设立了新闻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新闻学科的研究和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总结。

我国国人自撰的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是《新闻学》。这部著作的基础,是徐宝璜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授课的讲稿,1919年12月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1930年该书增补了徐宝璜所著的几篇新闻学文章,改名《新闻学纲要》重新出版。

《新闻学》共14章约6万字,内容包括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等新闻学的各个方面。该书理论色彩较强,但却写得条理清晰,深入浅出。作者在写作中尽可能地考虑到中国新闻工作实际,书中除少数几个章节为了说明问题,引用了美国的一些书刊资料外,绝大多数事例取自中国。

《新闻学》对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如新闻的定义与价值,报纸的性质与作用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关于新闻的定义,书中提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一则新闻必须包括“事实”、“最近”、“多数阅者”,三者缺一不可。衡量新闻价值也有三条标准:重要性、时效性和距离。书中还提出报纸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而不是代表一人一党的意见。此外,对于编辑、采访、评论、广告、印刷和发行等方面,该书也有精当的论述。

1924年6月,北京京报馆出版了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该书是作者对整个新闻事业研究的全面系统性著作。全书共10章,尚有附录若干节。它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事业的特质,新闻记者的地位与资格,新闻社的组织,新闻纸的表里,世界通讯事业,新闻纸的发展史,新闻纸的法律,以及当时我国新闻事业的状况和将来。

《新闻学总论》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但该书并不满足于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研究和发挥,有不少独到之处。如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新闻报道第一信条;强调报纸的指导性,反对所谓的“有闻必录”和“趣味至上”;认为在资本家垄断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事业只能随人俯仰,并不是“理想的事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学总论》还围绕新闻纸的法律问题,阐述了具有民主思想的新闻法制观点。该书从欧美、日本等国历史出发,评述了世界各国新闻法的历史即是压迫新闻事业的历史。书中作者希望将新闻压迫法改变为新闻保护法,运用资产阶级法律这一武器,使新闻纸享有在“法律上充分自由”,把言论自由、言论独立这一资产阶级思想巩固下来。

继《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之后,国内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新闻事业、新闻工作和新闻学概论的著作,其中主要有:

《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1930年9月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全书共分7章,系统论述了新闻事业的起源、变迁、勃兴、现状和将来。书中对新闻事业的论述受到西方新闻学影响,强调新闻事业具有公共性,是社会公共机关,新闻纸应以公众利益为准则,主张新闻事业应代表民众的舆论,作国民之喉舌等。书末附有全国报馆调查录、国民政府出版条例、新闻界近百年大事记等珍贵资料。

《新闻学》,曹用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出版。本书首先简述新闻学的定义与范围、报纸的性质与价值、新闻事业的特

性、新闻记者的地位及其训练,然后分别论述新闻业务的各个方面及新闻法、通信社等。书末附录《全国主要日报调查》和《全国外人刊行各主要日报表》。

《现代新闻学概论》,储玉坤著,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曾两次再版。全书共分15章,以欧美新闻学理论为主,结合作者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写成。书中借鉴西方新闻学观点,并加以发挥,提出了新闻的八要素,对舆论和宣传的性质和作用也作了详尽的阐述。在论及新闻自由时,作者指出这种自由也和其他的自由权一样,并非绝对不受限制。对新闻业务、报业经营管理,该书也有所涉及。

《新闻知识入门》,叶之知著,桂林实学书局1942年12月出版。全书分15章,分别讲述了中国报纸的历史,报社组织,报纸的编辑、营业、出版、印刷工作,通讯社,地方报纸,军队报纸,壁报等。全书叙述具体实际,并结合中国情况收入许多有关的资料。

《新闻学》,鲁风著,上海新中国报社1944年9月出版。本书系作者应“新中国自修学院”之约,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编写的一部新闻学入门书。全书分上、下二篇,上篇讲述什么是新闻学,什么叫报纸,新闻的来源及其写作等;下篇讲述报纸的经营管理。

截至1949年,国内先后出版了50余部理论新闻学著作,其中还包括一批新闻译著如开乐凯著、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安杰尔著、张友松译的《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杉村广太郎著、王文萱译的《新闻学概论》等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使西方的新闻学观点得以在中国进一步传播。

三、新闻业务著述

民国初年的新闻传播事业,还处于北洋军阀的残酷统治下。这一时期的报纸编者深恐以言论贾祸,大都不在言论上下功夫,而报纸作

为新闻纸的观念在报界日益突出,新闻成了报纸的主角,各报都争聘得力记者常驻北京,采写政治新闻和通讯,以满足读者对不断变化的政局的关注,个别大报还派出驻外特派记者采写国际新闻。各报记者之间也均以深入采访,获得独家新闻为真本事,并且认真研究写作,争取写出好的新闻通讯,以取悦读者,战胜同行。这些都促使专业采访写作活动得到加强,并由此涌现了一批以新闻采访为职业的专业新闻记者。报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对新闻业务工作作出理论上的总结,以具体指导新闻实践。最早的一批新闻业务论著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任白涛所著《应用新闻学》,这是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实用新闻学著作。全书共分总论、搜材、制稿、编辑4编。其中搜材编讲述采访业务,制稿编讲述新闻写作、言论写作,编辑编讲述编辑部的组织和编辑业务。该书问世后深受欢迎,曾三次再版。

1923年9月,邵飘萍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由京报馆正式出版。这本著作主要论述了新闻采访活动,因而被称为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新闻采访学专著。该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是作者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后又作为平民大学新闻系的教材。

《实际应用新闻学》是邵飘萍的最高研究成果,全书共分14章,5万5千字。该书的写作“立足本于国情,举例由于实践”,书中除了援引外国一些著名的新闻记者的采访经验外,还充实了作者的大量亲身实地采访体会。书中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1)记者在新闻事业中的地位。邵飘萍认为报纸有三项任务即采访、编辑和经营,而采访尤为主要,因为构成一张报纸的重要原料是新闻,新闻的取得靠采访,采访则“全赖记者之活动”。(2)记者的业务素质培养。“记者品性为第一要素”,强调记者品德修养和职业道德的锻炼,邵飘萍还把记

者的外观风度言谈也作为一种业务素质修养的内容。(3)具体的采访艺术。书中就采访前的准备工作,探索新闻的具体方法,采访对象的心理研究,社会新闻的采访,不同新闻的不同采访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探讨。(4)从新闻价值观念出发,论述如何培养新闻敏感。书中列出了新闻价值的四条标准:爱读者之人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兴味之集中与变迁。

继邵飘萍之后,新闻业务研究逐渐开展起来,至1949年,国内共出版新闻业务论著40余种,涉及采访、写作、编辑、摄影等新闻业务的各个门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编辑与评论》,郭步陶著,1933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主要讲述编辑的准备,编辑工作和方法,评论在报纸中的地位,评论文的基础条件、种类及变迁,评论记者应有的条件及评论的写法等。

《采访讲话》,王文彬著,上海三江书店1938年5月出版。全书包括“新闻采访法”和“七年来杂文选辑”两部分。前者分8章,首先简述外勤记者的修养和采访常识,然后分别讲述教育、体育、社会、法律、政治、地方、战事等类新闻的采访法。后者收入有关采访活动的文章及通讯报道18篇。书末附外国记者写的斯大林、毛泽东及蒋介石访问记4篇。

《新闻评论学》,程仲文著,上海力生文化出版公司1947年9月出版。本书是作为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教材编写的,详细论述了评论的机能,评论记者的政治和道德修养,新闻评论的三要素(见解、资料及作法),新闻评论的革新等。

四、新闻史著述

报刊史研究是新闻事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国新闻

学研究的开拓者们除了对新闻理论和新闻采访、编辑等业务方面进行了总结外,还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进行了总结。在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问世以前,中国对报刊史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研究地方史的阶段。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7 年出版了姚公鹤所著《上海报纸小史》,这部书的出版被称为中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开端。

中国较早系统论述中国报刊发展史的专著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此书写于 1925 至 1926 年,1927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中国报学史》的出版首次确立报刊史的研究是一门学问,该书提出了这门学问的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从而划定了新闻学的分支科学——报刊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为报刊史乃至整个新闻业史的研究打开了思路,拓宽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

《中国报学史》以其丰富、系统的史料而著称于世。戈公振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描绘出自汉唐邸报始,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报刊发展的历史概貌。该书第二章至第五章依次记载了整个封建时代报刊的历史概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创办中外文报刊的最初情况;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及双方的论战;袁世凯统治时期报界的黑暗。第六章泛论中国当时新闻业的现状,包括出版技术与广告发行以及与报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通讯社、报业教育、邮电、报律、报业团体等。尤为可贵的是,书中保存了许多报刊的发刊词和叙例,清朝有关报刊的公文和奏折,新闻出版法律,新闻团体章程等珍贵史料的原文。

《中国报学史》写作态度严肃认真,敢于正视某些历史事实,它代表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报业史的最高成就。该书把中国报刊史划分为官报独占、外报创始、民报勃兴、报纸成为营业性企业等四个历史时期,比较接近中国报刊史的实际,比西方学者把报纸发展史简

单地划分为口头新闻、手写报纸、印刷报纸三个时期要深刻。该书认为,近代中国报纸发展历史的主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言论禁锢。这一认识抓住了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线索。书中还对阻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封建制度、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该书所体现出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政治倾向,为当时有影响的新闻学论著难以企及。

1949年以前,国内陆续出版了30余部有关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但在学术价值上都难以和《中国报学史》相比。在众多的新闻史著述中,比较重要的有:

《中国报刊和舆论史》,林语堂著,1936年由上海英商凯利和威尔士有限公司出版。该书是我国较早概述中国舆论演变过程的专著,共13章,分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部分。古代部分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从周朝到明代社会公众舆论的产生、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历史和古代报纸的出现;近现代部分概述中国鸦片战争前夕至1936年近现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以及报界与清廷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冲突和对立。

《中国近代之报业》,赵君豪著,1938年9月上海申报馆出版。全书共11章,论及评论、编辑、采访、通讯社、广播、地方报纸、小报、印刷及新闻法制等方面,并特增“战时之采访”一章。该书所论多从作者的工作经验出发,比较切合实际,是当时比较完善的新闻著作之一。

《新闻史上的新时代》,胡道静著,1946年11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分图片、论文和“报坛逸话”三部分,图片部分收录了一些重要报刊的创刊号,有纪念意义的专页、增刊等20余幅照片。论文部分包括《新闻史上的新时代》、《新闻史的先遣工作》、《中国国民党党报溯源》、《国际社在沪港东京》、《战时东南亚报业遭遇的实际困难问题》等5篇文章。“报坛逸话”包括胡道静所著的38篇文章,内容是关于报业发展历史、现状的记述。书末附录申报66年纪事。

除了对中国报业发展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者对国外新闻事业历史、现状以及外国人在华新闻业也有所涉及。1925年上海时报馆出版李昭实所著《世界报纸大观》,选录世界著名报纸155种,并附以各报小史。此后陆续出版了十余种这方面的著述。中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叙述外国人在华新闻事业的著作,是赵敏恒所著《外人在华新闻事业》,该书于1932年8月由“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发行。全书共7章,分别概述了日、英、美、法、德、俄等国在华创办的本国文字报刊以及通讯社的情况。由于得到有关国家在华新闻机构的帮助,该书背景介绍清楚,许多资料十分珍贵。

五、新闻学刊物

我国有关新闻学研究的第一个刊物,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4月20日创刊的《新闻周刊》,该刊还是国内首先采用横排版的刊物。在发刊词中,该刊称其发行目的有三个:第一,“便会员之练习”,“有此周刊之发行,则会员于研究学理之余,复可得采集新闻,撰著社论种种之实地经验。”第二,“便新闻学识之传播”,“本报同人,愿竭绵薄,每期登论文一篇,将研究结果,一一公之于世。”第三,“便同志之商榷,有此周刊,国内同志可自由投函,提出新闻界之问题,互相商榷。”

《新闻周刊》还不能算作纯学术性的新闻学刊物,其内容以一周内的国内外大事为主,每期也刊登新闻学论文一篇。它主要是供新闻学研究会学员实习之用,实际上是一份综合性的时政小报。

我国最早的新闻学专门刊物,是1927年1月创刊的《新闻学刊》,该刊也是当时唯一的新闻学期刊。《新闻学刊》由北京新闻学会出版,黄天鹏主持。该刊以4期为1卷,共出2卷8期,又增刊4号,1928年底停刊。

《新闻学刊》的质量很高,为它撰稿的多为报界名流,有徐宝璜、顾红叶、戈公振、徐彬彬、鲍振青、周孝庵、李昭实、黄天鹏等,并选登过邵飘萍遗作。他们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新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内容涉及中外新闻学理论,中外新闻事业、新闻史、报人生平介绍、报纸编辑、新闻写作和广告术等。1930年3月黄天鹏选取其中部分文章,及《新闻学刊》创刊后一年,由黄天鹏创办的另一刊物——《新闻周刊》上的一些文章共70篇,编为《新闻学刊全集》一书出版。

从三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创办的新闻学刊物主要有:

1930年4月,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的《记者周刊》创刊,由戈公振、周孝庵、李子宽编辑。

1934年1月,中国左翼记者联盟创办《集纳批判》。

1934年8月3日,上海《大美晚报》的专刊《记者座谈》创刊。

1938年4月1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新闻记者》创刊。

1938年9月1日,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的《战时记者》创刊。

1939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研究会创办《新闻学季刊》。

1941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重庆分会出版《新闻战线》。

1946年6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报学》双周刊。

1948年9月1日,《中央日报》出版《报学杂志》。

以上所列刊物中,比较重要的有《集纳批判》、《记者座谈》、《新闻记者》、《新闻战线》、《报学杂志》。

《集纳批判》是中国第一个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新闻学研究的刊物。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使命》一文,宣布“要统一中心目标与意志来阐扬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集纳主义”(集纳主义即新闻学)。强调新闻的阶级性,提出新闻是“鼓动大众组织大众之武器”。主张建立探讨无产阶级新闻学和依于大众利益上的新闻事业,实现被

压迫阶级的新闻解放。该刊只出4期就被迫停刊了。

《记者座谈》除评论形势、讨论抗日救亡问题外,着重报道新闻界的活动,交流工作经验,探讨新闻业务问题,介绍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和海外新闻界情况。出至1936年6月停刊,共出90期。

《新闻记者》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会刊,该会是共产党在抗战初期为团结全国新闻界中的进步力量而组织的一个新闻团体,在抗战初期的新闻界有很大影响。《新闻记者》是一份影响较大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刊物,主要用来研究新闻学术、反映国内外新闻界情况,传播有关新闻学理论和经验。

《新闻战线》的内容主要是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工作经验,讨论新闻工作,评介新闻界人物、新闻学论著。该刊设有“新闻界经验谈”、“报业实际问题”、“各地报业动态”、“新闻学术研究”、“新闻界人物志”等栏目。

《报学杂志》也是一份大型的新闻学刊物,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主办的新闻业务刊物。该刊系半月刊,每期篇幅固定在32页左右,近10万字。设有“报坛清议”、“报学论著”、“新闻教育”、“新闻界新闻”、“新闻资料”、“报人传记”等专栏。该刊连同试刊号共出版10期便停刊了,目前见到的最后一期是1949年1月16日出版的第1卷第10期。

六、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著述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除党内文件对报刊宣传工作做了一些规定外,还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介绍和阐述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观点,主要是列宁的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如1929年9月1日《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10期刊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以“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为小标题,

初步阐释了列宁的办报思想,引用了列宁“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论断。1930年3月26日《红旗》第87期上,发表了《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对列宁的这一论断作了具体解释。1933年8月10日,瑞金《红色中华》发表了《〈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李富春)、《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博古)、《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邓颖超)等一批纪念文章,这些文章都引用了列宁的名言,要求《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发刊词《我们的任务》还写道:“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以明确的语言提出报刊具有阶级性,党报是党用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的观点。

三十年代,革命根据地的党报事业不断发展,党报工作者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发表了一些论述党报工作的文章,主要有《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李卓然)、《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瞿秋白)、《论目前〈红中〉的任务》(李一氓)、《关于我们的报纸》(张闻天)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党报是党实现领导作用的工具,批评把党报工作看成单纯“文字工作”的错误思想,强调党报应该发挥“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认为“读党报、替党报作文章、帮助党报的发行”,是每个党员特别是实际领导工作者,“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如果放弃这一责任,就是“消极地反对了党报集体的领导作用”。批评有些人不善于利用自己的报纸,“以为利用自己的机关报,就是利用它来登载自己油印的文件,关于如何经过报纸来进行活的领导,却是不了解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还阐述了真实性原则,“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我们需要我们的报纸,如实地反映出苏维埃的实际,真正为党与苏维埃政府所提出的具体任务而斗争。”党报要“把不好的现象揭发出来”,同时“赞扬在军事、政治、经济、劳动各个战线上的英雄”。

在四十年代初进行的解放区新闻事业整风改革中,《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博古、陆定一、胡乔木等撰写的有关新闻工作的文章和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许多新闻工作的重大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和社论有:

社论《党与党报》,发表于1942年9月22日。该文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全党办报的思想,对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这一著名论断中的“集体”进行了阐释,指出这个集体“决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此外,“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的工作”,党的各级机关、组织,以至于每个党员,都要利用党报,向党报供给消息,而且要阅读、讨论党报,推销党报。

《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一文提出要树立“人民公仆”的思想,反对“无冕之王”的资产阶级记者观。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的公仆,是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做人民的公仆,是很自由的,也是很光荣的。这就要求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密切与工农兵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

社论《政治与技术》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原则,反对“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观点。指出技术的作用和可贵,就在于好的技术能把正确的政治内容完善地表达出来,而坏的技术就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如果政治立场坚定了,技术的进步是可以求得的,也是必须求得的。

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该文是对这次解放区新闻整风改革的一个基本总结,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专文。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中一些根本性

的问题。文中主要谈了两个问题：(1)关于新闻的本源问题，“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2)关于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几十年来，这个定义在新闻界一直被广泛使用。

此外，《宣布党八股的死刑》、《展开宣传工作上的新阵容》、《致读者》、《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本报创刊一千期》、《提高一步》等文，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风、党报作风、新闻真实性等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先后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这两篇讲话标志着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成熟，是中国新闻史上两篇重要的文献。

毛泽东的谈话发表于1948年4月2日，谈话在总结分析《晋绥日报》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阐明了无产阶级报纸的作用与任务，以及办报的路线、方针、风格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因此，“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关于办报方针，毛泽东强调要办好报纸必须实行群众路线，“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毛泽东还提出报纸文风“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以取得实际经验。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着重阐述了新闻工作对于党的事业的重大作用，指出新闻工作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党依靠它“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又依靠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动、情绪反映上来，帮助党了解情况。刘少奇还提出了无产阶级记者应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即要有马列主义修养、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要有正确的态度以及

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刘少奇明确地鼓励记者开展批评,甚至中央的政策有了问题,也允许批评,“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闻学专著,是张忱虞(即张友渔)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该书1936年6月1日由太原中外语文学学会出版,共收入有关新闻理论、新闻政策及新闻事业的著述和译文27篇。在书中,作者首先指出,新闻“具有二种本质,一方面,是‘政治斗争的武器’,他方面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批评那种“超乎阶级、超乎党派”的新闻观是“无益有害”的。作者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一切从来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阐述,全面论述了新闻“是在阶级对立之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之武器”的观点,指出“当时中国的报纸,虽然还没有达到很显著地发挥其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性质之程度,但决不能说牠(它)不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因而从事新闻事业或准备从事新闻事业的人们,便也不得不抱着斗争的精神”。书中还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新闻政策,认为苏联对新闻的“统制”,并不像德、意法西斯国家那样“毫无理由地压迫一切言论”,而是在一定的标准和范围内,积极地扶助新闻、利用新闻。关于言论自由,作者联系“列宁政府”的实际,指出“世界上只要有政治存在,便没有什么绝对的言论自由”,“统制言论(即统制报纸)的本身无可反对,问题是统治阶级的自身,是否应该反对?以及统制言论的方法,是否妥善?”关于舆论、机关报、社论、白话文、评论等问题,书中也有精辟的论述。

解放战争时期,各个解放区陆续编辑出版了一批关于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著述,大多涉及新闻业务实践,如《为什么要当工农通讯员》(冀鲁豫书店编辑部编,冀鲁豫书店1947年7月发行)、《工农通讯经验》(黄海大众通讯部编,黄海书店1947年发行)、《人民新闻的

采访、写作和编辑》(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委会编印,1949年7月发行)、《大众化编辑工作》(宫达非编写,鲁中大众社1947年3月发行)、《大众化编写工作》(宫达非编著,大众书店1948年6月发行)、《编辑写作怎样群众化》(冀鲁豫书店编辑部编,冀鲁豫书店1947年8月发行)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论述怎样办好黑板报的著作,有关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资料汇编等。

在这些新闻学书籍中,恽逸群的《新闻学讲话》影响较大。该书1948年12月由华中新华书店发行,曾为好几个解放区的新华书店翻印出版。全书共分6章,详细介绍了新闻的采集、写作、传递和编辑,以及报纸怎样指导社会,新闻机关的组织等。作者在书中批驳了“超政治、纯客观的立场”和“超然、独立的态度”,详细阐述了“新闻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任何新闻机关,不论是报纸或通讯社,都有它的政治立场。”并反驳了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新闻自由”的责难,指出只有符合真理的自由才是真自由,是人民大众所拥护的自由,对于反动派的“杀人自由”则应该而且必须加以限制。

第二节 新闻教育

一、新闻教育的发端

中国的新闻教育,发端于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成立。该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中研究新闻学的团体,是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其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最初,由导师徐宝璜每周一、三、五晚上为学员主讲新闻学基本知识,内容从新闻定义到报纸的性质、任务,报纸的编辑、采访、评论、发行等方面的理论和业务知识。

1918年10月底,《京报》社长邵飘萍被聘为研究会导师。从此直到1919年9月,除寒暑假和五四运动期间,每周星期天上午10至11时邵飘萍到会讲授新闻采访经验和其他办报实际问题。

由于会员不断增加,该会于1919年2月19日进行了改组,将原名“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重新规定宗旨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徐宝璜被推为副会长。

1919年10月16日,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蔡元培亲临讲话并颁发证书。获得证书的有55人,其中得听讲满一年证书的23人,得听讲满半年证书的32人。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是获得听讲满半年证书的会员之一。

五四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邵飘萍流亡日本,徐宝璜也已就任民国大学代理校长,新闻学研究会遂名存实亡,约于1920年底停止活动。该会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时间,但在提倡新闻学理的研究,培养新闻人才,促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方面,起到了拓荒的作用。

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闻教育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新闻教育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从1920年至1927年,先后成立的高校新闻系科,约有12所之多,1927年至1937年又出现过9个,初步形成系统。这些新闻校系,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

(一) 上海地区的新闻院系

192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了新闻系。该系是我国第一个大学新闻系,由美籍教授卜惠廉(W. A. S. Pott)提议创办,附于普通文科内。初创时,聘《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D. D. Patterson)又译

柏德逊)主持并授课,故授课都在晚间。当时选读该系课程者达四五十人,并出版英文《约大周刊》。1924年,美国学者武道(M. E. Votaw)来华任系主任,课程渐趋完备,主要有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新闻采写、社论、编校、广告等,均以英语讲授,每学期选读者有五六十人。1925年该系曾一度停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近6年,1947年恢复。

1925年春,上海南方大学创立报学系,由《申报》协理汪英宾兼任系主任。学制分报学系、报学专修科和报学特别班三种。学校规定,报学系学生修完必修选修课程,满80学分,经毕业考试及格,授予“学士”学位;报业专修科学生修完必修选修课程,满220学分,经考试及格,给予毕业证书;报学特别班学员所选课程考试及格,给予修业证书。新闻学必修课有三门,由汪英宾讲授报学原理、广告原理,戈公振讲授访事学。1925年因闹学潮反对校长,南方大学报学系停办,以后也没再恢复。

1925年,南方大学报学系停办后,部分师生在上海国民大学设立报学系,由戈公振任系主任并讲授《中国报学史》与《新闻学》。此外,还聘请《商报》编辑潘公展讲授《编辑法》,《时事新报》总编潘公弼讲授《报馆管理》,《商报》主笔陈布雷讲授《社论写作》。学生专科者6人,选读者30余人。

1926年,上海沪江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也都增设报学系。在戈公振指导下,南方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三校报学系学生联合组成“上海报学社”,内则提倡读书,外则参观报馆。另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在邵力子主持下,也曾开设新闻学课程。

1929年,复旦大学正式设立新闻学系。在此之前,1924年秋,复旦大学国文部已附设“新闻学讲座”,1926年又扩大为“新闻学组”。复旦新闻学系由文学家谢六逸任系主任,先后聘请戈公振、陈布雷、黄天鹏、潘公弼、冯列山、杨炳勋、周孝庵等人为兼职教授。该系以“养

成本国报纸编辑与经营人才”为目标,初期课程主要分为五类:一为基础知识;二为专门知识,包括报学概论,编辑采访,报馆组织管理、广告学、发行、照相、绘画、印刷术等课程;三为辅助知识;四为写作技能,包括评论,通讯,新闻写作,速记术,校对术;五为实习与考察。该系设有新闻研究室,分陈列部、图书部、学术部、实习部、调查部,由黄天鹏主持。1935年10月,院系还举办过一次“世界报纸展览会”,影响颇大。

除以上大学的新闻系科外,1928年冬,顾执中在上海创办上海民治新闻学院。1932年改称民治新闻专门学校,1937年又改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初创时只设夜班,后来添办日班,开设的课程有采访、编辑、新闻写作、管理、印刷、摄影等。

(二) 北京地区的新闻院系

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首设新闻系,由徐宝璜任系主任,邵飘萍与北京新闻通信社社长吴天生为教授。该系学制4年,加两年预科,共6年。该系曾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并于1924年出版《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级刊》。该系课程设置完备,新闻学知识与文史哲及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并重、新闻学课程主要有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经营、新闻评论、新闻摄影、广告学及有关实习课程。文史哲及其他社会科学课程主要有文学概论、近代小说、近代戏剧、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民法、出版法、战时国际公法、现行法令、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现代各国政治外交史等。应该说,平民大学新闻系是国人自办正规新闻教育的开始。

继平民大学新闻系之后,1924年,北京民国大学与国际大学创办报学系,但不久均停办。

1924年,北京燕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系。该系由美国新闻界发起创办,系主任是白瑞华(Roswell S. Brittan),教授有纳什(Vernon Nash)等。最初学生仅有9人,内有女生1人,专习者仅二三人,但无

论专习或选习,均须大学三年或四年级学生。1927年该系一度停办,1929年9月又恢复,梁士纯出任系主任,此后设施与体制渐趋完备,发展较快。1932年,创办燕京通讯社与《新闻学研究》杂志,1941年又出版《报学》杂志。1933至1938年期间,埃德加·斯诺曾任该院教授。

1933年2月,《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在北平创办新闻专科学校,并自任校长,教员有张友渔、左笑鸿、萨空了、赵家骅、原景信等。北平新专宣称“本校目的,在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并用之新闻人才”。该校先办初级职业班,1935年9月,又办了高级职业班,1937年6月,国民政府批准新专校董会立案,并令将校名改为“北平新闻学专科学校”,决定招收本科生,由于卢沟桥事变,没有实现,学校也于8月宣布停办。

(三) 其他地区的新闻院系

除上海、北京二地外,其他一些地区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新闻院系。如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曾开设“新闻科”或“新闻学概论”课程,广州新闻记者联合会附设了“新闻专科学院”,香港报界人士创立了“生活新闻学院”,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厦门大学报学科,广州中国新闻学校等。

1921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该校开设了报学科。初创时,该科仅有一个学生,次年增至6人。1922年聘请对报学颇有研究的孙贵定为主任,办学渐有起色。1923年厦门大学发生学潮反对校长,报学科因此停办。厦门大学报学科是国人在大专院校自己开办的第一个新闻系科。

1928年秋,谢伯英在广州创办中国新闻学校,该校初创时,曾名中国新闻学院,后改此名。这是目前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一所专业新闻学校,停办时间不详。

1934年,国民党系统的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在外交系内开设“新

闻学概论”课程,由马星野主讲。次年正式设立新闻系,程天放任系主任,后由刘振东继任,实际则由马星野主持。该系课程,着重语文及一般社会科学训练,实习分为两种,一为校内编印《中外月刊》为主,二为校外利用寒假参观《申报》与《新闻报》两周为辅。该系毕业生在抗战期间多数任职于国民政府宣传机构,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处、新闻检查机关等。

这批新闻校系的建立,固然为国民党培养了一批党政宣传官员和新闻检查人员,但同时也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人才,促进了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新闻学研究的开展,为我国的新闻教育奠定了基础。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教育

(一) 抗日战争时期已有新闻院系的内迁或停办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北方各大学相继南迁,南方学府亦纷纷西撤,各大学新闻系科也均随校迁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和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迁往重庆,燕京大学新闻系迁往成都,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迁往桂林。

复旦大学新闻系 1937年淞沪抗战,复旦大学毁于炮火,秋季开学时,迁往庐山,年底又迁往重庆,在北碚复校,新闻系设于化龙桥,仍由谢六逸任系主任,1938年,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接任系主任,1942年后,又改由陈望道主持,直至1950年离任。重庆期间,曹亨闻、舒宗侨、王研石、祝秀侠、赵君豪、冯列山、刘光炎、王文彬都曾先后在该系教授新闻学专业课程。在学生实习方面,该系办有校刊《复旦新闻》,并创办“复新通讯社”,向报纸发稿。1944年4月,该系“新闻馆”落成,设有图书资料室、印刷室、收音广播室等,规模较该系在上海所设之“新闻研究室”为大。重庆期间,陈望道提出

“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办系指导原则,以“好学力行”作为“系铭”。虽然当时重庆经过“五三”、“五四”两次大轰炸后,生活异常艰难,但复旦新闻系仍为我国培养了不少新闻人才。

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 抗战期间,该系自1937年8月开始西迁,迁移途中,曾在江西牯岭开课,1938年3月又迁至湘西芷江。政校新闻系原来每届只招生8人,芷江期间,学校发生风潮,学生纷纷离校,新闻系人数更少。这期间,在马星野、俞颂华指导下,新闻系接办了当地《芷江日报》。1938年,新闻系始迁至重庆南温泉,因迁校及人数少,1937年与1938年该校新闻系均没招生;1939年秋才开办新闻专修班,由潘公展主持,马星野副之。专修班分甲、乙两组,甲组主要调训新闻机构在职人员、修业半年,计办两期,乙组招考大学毕业或大学肄业三年的学生,修业一年,仅办一期。课程方面两组大致相同,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科目有曾虚白、董显光主讲的“舆论学”,潘公展主讲的“社论写作”,赵敏恒主讲的“采访学”,刘光炎主讲的“编辑学”等,此外,担任专业课程教师的还有俞颂华、马星野、黄天鹏、刘觉民、顾执中、钱沧硕等。1940年秋,政校新闻系又开办新闻专修科,由马星野主持,新闻专修科招考高中毕业生,修业两年,计办两期,开办课程有公共科目、社科科目与新闻专业科目。1942年,由于马星野另有他任,由《中央日报》社总经理詹文浒继任系主任,1943年,政校新闻系恢复招生。抗战期间,该系学生实习,校内有《中外月刊》与《南温泉》周刊,1939年11月20日,又创办《新闻学季刊》进行新闻学术研究;校外主要于毕业前在《中央日报》、《大公报》、中央通讯社、《时事新报》等实习三个月。

燕京大学新闻系 燕京大学在北平沦陷后仍继续上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校长司徒雷登及美籍教授均为日方逮捕,校务被迫停顿。1942年,经过长途迁徙后,燕大在成都复校。由于《大公报》经理胡政之的努力,燕大新闻系从《大公报》“张季鸾纪念奖金基

金”中获得拨款 10 万元,得以迅速恢复。系主任由《大公报》桂林版编辑部主任蒋荫恩担任,聘请张琴南、张明炜、冯列山等任专业课程教师。燕大新闻系注重英文教学,实习方面,恢复《燕京新闻》,出中文版与英文版。毕业学生在对外新闻机构中工作的很多。以重庆时期中央通讯社英文部为例,其工作人员与驻外记者,几乎全部是燕大新闻系校友。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抗战初期,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租界内继续上课。1940 年,顾执中遭日伪特务枪击负伤,逃往香港,学校被迫停办。1942 年,顾执中回到重庆,经过一番筹备,于 1943 年春恢复新闻专科学校,第一期学员 59 人,晚上上课,每年分为三个学期。顾执中、舒舍予、冯玉祥、陈翰伯、陆诒、彭乐善等先后担任过专业课程教师。1944 年,顾执中离开重庆,前往加尔各答任《印度日报》总编辑,重庆民治新专以投票方式公推陆诒为代理校长,陈翰伯为教务长。与此同时,顾执中又在印度加尔各答办了 1 个民治新专短期班,为期仅 3 个月。

北平新闻专科学校 抗战期间,成舍我一度在桂林恢复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并自任校长,教务主任为虞肆三。1944 年 3 月,开办初级职业班,招生 40 名,后又招试读生 10 名。原定秋季开办高级职业班及本科各一班,因桂林沦陷,学校停办,没有实现。师生多撤往重庆,这些学生后来成为《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的印刷班底。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自此以后再没有恢复。

圣约翰大学报学系 抗战初期,圣约翰大学仍继续上课,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学系被迫停办。

(二)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香港新办的新闻教育机构

抗战期间,除了内迁的新闻系科,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新办了几个新闻教育机构,主要有:

重庆新闻学院 1943 年 10 月由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与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合作创办,该院隶属于中央政治学校。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兼任院长,副处长曾虚白兼任副院长,教务主任一职,第一年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克罗斯(H. Cross)担任,第二年由《纽约前锋论坛报》主笔吉尔伯特(R. Gilbert)继任。该院开有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写作、广播学、印刷学、新闻摄影、新闻史、新闻法、新闻伦理等课程,主要由美籍教师讲授,因此概用英文。学生从笔记、考试到写稿也均用英文。用中文讲授的中国教师仅3人:马星野讲《新闻学概论》,潘公展讲《党义》、即三民主义,甘乃光讲《比较政府》。该院出版了4开4页的英文报纸《重庆新闻》周刊(*The Chong King Reporter*),作为学生实习园地,这是战时重庆唯一的英文报。该院的创办,目的是为国民党培养国际宣传和新闻方面的人才,到1946年7月停办为止,一共办了两期,每期招收学生30人,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

军委政治部新闻研究班 1938年5月,国民党在武汉大学创办“留日归国训练班”,由康泽任主任。该班设“新闻组”,由谢然之主讲,这是国民党军队中新闻教育的开始。1940年,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中央训练团开办“新闻研究班”,由政治部副部长张厉生兼任班主任。后来训练团改为“军中文化工作人员训练班”,内部仍设新闻系,由易君左主持。毕业学生,大部分至《扫荡报》、《阵中日报》及《扫荡简报》工作。

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 1942年广州国民大学创办新闻学系,由文学院院长黄軼球兼系主任,第二年随学校迁往广东曲江,由袁昶超继任系主任。

除上述新闻系科外,当时在进步新闻工作者云集的香港,诞生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主办的香港新闻学院。从1939年4月开办第一届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共办了3届。该院首届院长是《申报》总编辑郭步陶,副院长是《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

教务主任是《珠江日报》编辑谭思文。中国新闻学院授课时间在晚上,学制约半年左右,在教学过程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晚上授课,白天实习。1939年冬,中国新闻学院第一届同学毕业后,学院还创办了中国新闻通讯社,以便同学继续学习与工作,社长梁若尘,总编辑叶广良。

(三)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新闻教育

1945年8月15日,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投降后,战时内迁的各院校新闻系,立即进行复员,迁回原址。其中,燕京大学新闻系1945年从成都迁回北平,系主任仍为蒋荫恩;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也于1945年从重庆迁回上海,校长顾执中,学校分正科、预科、设有日班、夜班,便于在职人员业余学习;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于1946年由重庆迁返南京,1948年4月,该校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为国立政治大学,仍设新闻系,由马星野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系于1946年6月从重庆迁回上海,系主任仍为陈望道;广州国民大学新闻系也从曲江迁回广州。此外,抗战中停办的一批新闻系科也纷纷复课。1947年,圣约翰大学报学系恢复,武道再度担任系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于1946年5月恢复,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共办了5届,1946年9月和1948年10月,还办了函授班和函授学院。

抗战胜利后,除各新闻系科纷纷回迁或复课外,各地还新创办了一批新闻院系,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学系 该系由位于四川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1945年8月增设,俞颂华为系主任。1946年夏,该院迁往苏州。从1945至1948年,新闻系招收了四期学生,每期三四十人,先后担任专业课程的教师,有李凌飞、葛思恩、马荫良、曹聚仁、许杰、方秋苇、王文萱、顾昂若、古敦复、谢东平等。1947年俞颂华病逝后,由马荫良继任系主任。

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 该校成立于1945年,以训练新闻专业人才为目的,校长陈高庸。

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 上海暨南大学文法学院原有“新闻研究会”,1946年,正式成立新闻系,由冯列山主持,一年后由詹文滂继任。

西南学院新闻系 在重庆,一些新闻系科迁走后,1947年创建的西南学院设有新闻系,还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该系从1947年春季开办,至1949年12月停办。另外,重庆还办过一所建国新闻专科学校,招过两期学生,近百人。

此外,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由邓文仪任局长。1946年秋,曾举办两期“新闻人员训练班”,每期约百余人,一律讲习三个月。后来“新闻人员训练班”改由中央训练团举办,前后共办6期。

四、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闻教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教育事业,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9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办过新闻班。1940年6月,在太岳解放区也出现过新闻训练班。1945年春,华中建设大队设有新闻队,它实际上是新华社华中分社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新闻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陆续开办了一些短期训练班和新闻学校,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与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由范长江主持筹建。1946年2月9日正式成立开学,校长范长江,副校长包之静,教务长谢冰岩,另有专职工作人员三四名。第一期从建设大学挑选了100多名学员。讲课任务主要由《新华日报》(华中版)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工作人员承担。学员首

先学习共同课,有范长江讲授的《人民的报纸》、恽逸群讲授的《新闻学概论》等,然后分为编辑、电务、经理三个科。编辑科的课程有:编辑工作概论、编辑业务、通联工作、采访工作、校对工作等;电务科的课程有:电学、抄发报、英文和政治常识等;经理科的业务课有:管理、会计、广告、发行、印刷等。第一期学习时间半年,校址在江苏淮阴。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只好中途停办,直到1948年春,华中解放区形势好转,才恢复办学。中共华中工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徐进,分别兼任正、副校长,罗列任专职教育长。1948年6月,第二期开学,学员70余人,校址在江苏射阳。淮海战役结束后,迁回淮安。同年12月,开办第3期,学员120人。1949年5月,学校迁无锡,7月开办第4期,学员220人,学校改名为苏南新闻专科学校,1950年3月停办。

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于1946年3月开办,由《晋察冀日报》编辑科科长罗夫任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全系学生只有27人。课程分公共课和专业课,专业课有新闻学概论、编辑、采访等课程,主要由《晋察冀日报》各级负责人讲授。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并于10月占领张家口,学校因之停办,新闻系学员分别去报社或军队工作。

其他解放区,也创办了新闻教育事业。1946年4月,山东大学开办新闻训练班,学习期限为4个月,教学168学时,主要课程有:《人民日报》、《记者修养》、《记者业务》、《编辑业务》、《通讯业务》、《壁报编辑》及政策、时事等。1947年春,延安大学设新闻班,学习期限为一年半至二年。同年2月,华东新闻干部学校在山东建校,校长恽逸群,设有编采、出版、电务三科。1948年,中原大学开办新闻班,学员62人,学习期限3个月。在东北解放区,西满新闻干部学校于1947年6月至9月开班,嫩江新闻专科学校于1948年开班。另外,1948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设立新华社训练班,北京郊区西山也设立了新闻干

部训练班。这些新闻学校和新闻班,均属短训班性质,大多数只办过一两期。此外,各解放区报纸和新华社分支机构,也办过不少短训班,为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新闻人才。

建国前夕,在解放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两所新型的新闻学校,即华东新闻学院和北京新闻学校。华东新闻学院1949年7月创办于上海,院长恽逸群,教务长王中,该校招收过3期学员,于1952年10月停办。北京新闻学校是1949年10月创办的,其前身是新华总社附设的新闻训练班。范长江任校长,陈翰伯任副校长,该校以培养采访、编译、资料人才为主要目标,先后招收过3期学生,共有270人毕业。1950年10月停办。这两所学校采取理论与业务并重的教育方针,为解放初新闻战线的大改革培养和准备了大批新闻干部。

第七章 新闻界人物

本章介绍的新闻界人物按出生年月先后编排。

王 韬 1828年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1897年在上海病逝。王韬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香港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报刊之一——《循环日报》,他的办报思想和他所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着较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编。王韬主持该报笔政10年,先后撰文数百篇,宣传变法维新和评论时政,其体裁被后人称为报刊政论文体。王韬以“强中以攘外,讴远以师长”为立论宗旨,在论说中鼓吹向西方国家学习,变法自强,抵御外侮。其文章思想和学识水平在当时均堪称一流,经常被内地报刊转载,产生过一定影响。《循环日报》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纸,王韬是我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83年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文章被选辑成书,名为《弢园文录外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是我国近代较早具有办报思想的人,他专门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王韬处处以“立言”为办报目的,他这种办报立言的思想,不仅是我国近代报刊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在我国新闻史上形成的“政论时代”。王韬还主张仿效西方办报方法,允许各省创办新报,这

种要求开放言禁的办报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王韬十分重视报纸的职能和作用,他认为报纸能使国家军政大事迅速地“上行而下达,朝会而夕颁”,能反映人心民意,影响社会舆论。王韬的办报思想对我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陈霭亭 生年不详,广东新会人,1905年逝世。陈霭亭是晚清著名报人,1857年,香港英文报纸《德臣报》创刊,有“西学巨擘”之称的陈霭亭担任了该报的翻译兼副主笔。当时香港已受英国殖民统治,他感慨那里的中国人多以买办为荣,于是想办一份报纸以开通民智。1871年,陈霭亭以《德臣报》中文版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闻七日报》并亲任主笔。该报每逢星期六出版,约在1872年4月改名《华字日报》,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二家中文报纸。陈霭亭曾发表《创设华字日报说略》一文,倡导中国人自办报纸。《华字日报》初为周三刊,不久改为日刊。它的内容主要是商业广告和新闻。1878年陈霭亭出任驻美使馆参赞和驻古巴使馆总领事,《华字日报》遂由其子陈斗坦接办。

严复 1854年生于福建侯官,1921年在家乡去世。戊戌变法期间,严复办报纸,写文章,在译介西方学术著作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影响了一代人。严复的报刊活动是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开始的,中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严复对洋务派新政丧失信心,他接连在《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5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专制政体,宣传民权思想,鼓吹变法自强,提出了一整套政治改良主张,对当时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在维新派办报高潮的推动下,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并在报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百日维新期间,《国闻报》共发表本馆论说42篇,其中至少有23篇为严复所作。严复的最大贡献是在《国闻汇编》上翻译发表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呼吁国人奋起救亡,在思想界引起轰动,成为变法维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裘可桴 1857年出生,1943年去世。裘可桴是戊戌变法时期的著名白话报人和白话文的热心倡导者。中国人自办的最早一批白话文报刊是在戊戌维新时期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裘可桴1898年创办的《无锡白话报》,该报自第五期起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裘可桴创办此报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其内容初期大多为介绍西事、西政、西艺,改为《中国官音白话报》后,宣传内容和宣传方式都有所改进,不再限于对西方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介绍,而是以大量的篇幅直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诞生发展的历史。更值得一提的是,裘可桴在《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合刊上发表了《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对文言文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历数文言的多种危害,又从八个方面阐明了白话之益。裘可桴和他的《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时务报》的宣传,互相呼应,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陈范 1860年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1913年病逝。陈范是清末民初著名报人,他的名字是与《苏报》案连在一起的。1898年陈范买下上海《苏报》,初期他力倡保皇立宪,支持维新变法。随着形势的发展,陈范的思想开始转变,开始挥笔作文,鼓吹革命。1902年以后,《苏报》在陈范主持下先后报道了上海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和上海人民的“拒俄运动”,由此《苏报》名声大振,成为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报刊。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立以后,陈范积极参与活动,经常在革命团体的集会上进行采写和组稿工作,并约请革命派人士蔡元培、章士钊、章太炎等为《苏报》撰写评论。1903年5月底,陈范聘请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革命派借《苏报》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不久“《苏报》案”发生,租界当局和清政府以陈范“大逆不道,污蔑今上”前来缉捕,陈范被迫流亡日本。陈范在辛亥革命后还积极活动于报界,先后任北京《太平洋报》、上海《民生报》主笔,以饱

满的爱国热情写了许多论文。

汪康年 1860年生于浙江杭州,1911年去世。汪康年曾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筹办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其后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报业活动。汪康年先后办有《时务日报》、《中外日报》、《京报》和《刍言报》,他在报刊业务改革上有不少建树和创新,是近代一位对经营报业成效显著、多所贡献的职业报人。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后,汪康年任经理。因办报方针不合,汪康年与梁启超时有争论,在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支持下,汪康年逐渐将梁启超排挤出《时务报》。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支持下欲夺回《时务报》,但汪康年抗旨不交,并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汪康年创办《时务日报》时,首创“版面分栏,新闻分类”的编辑方法(即每版分4栏,新闻分4类)。题文的字号有别,大小眉目一新。打破了以往四字标题的模式,或以新闻分类题作标题,或从新闻稿内容出发另拟标题。这些在当时都是一种创新,为报界所纷纷仿效。汪康年主持《京报》期间,还卷入了清朝末年的“丁未政潮”,导致报纸被封。1910年,汪康年51岁时还创办了《刍言报》,该报有两大特点,一是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志”;二是汪康年独资经营,不对外筹款,不招揽广告。

彭翼仲 1864年生于江苏苏州,1921年在北京逝世。彭翼仲是近代著名报人,他一生办过三个报,即《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都在北京出版,其中以《京话日报》声誉最高,影响最大。《京话日报》创办于1904年,是当时北京第一家销数超万份的报纸。彭翼仲自述创办该报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开发民智”,二是为了从洋人手里“争回这说话的权柄”。该报积极鼓吹反帝爱国,御侮图强,抨击官场的腐败黑暗,反映底层群众的疾苦,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赞许。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僚和权贵。至1906年,该报终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而遭查封,彭翼仲亦被流放新疆长达10年之久。彭翼

仲被押解离京时,沿途“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此后《京话日报》曾两度复刊,一次是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放回北京以后,这次复刊的时间很短,不久即因触怒袁世凯而再度被封;第二次是在袁死以后再度复刊,到1922年最终停刊。

谭嗣同 字复生,号壮飞,1865年生于湖南浏阳一官僚地主家庭,1898年戊戌政变中在北京被害。谭嗣同是戊戌时期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曾支持和参与过《时务报》、《湘学报》、《农学报》等的编撰工作,还计议在汉口、南京等地筹办《民听报》和《矿学报》,因经费困难未果。湖南维新派机关报《湘报》创刊后,谭嗣同是报纸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方面论文二十余篇,大大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关于报纸的职能以及如何办报,谭嗣同有不少精当的论述。他强调日报在于“日新”,每天都应有新的内容;主张“报纸即民史”,要向西方学习公平论事,使报纸所记叙的事实成为国民的历史;他还主张以报纸推动现实工作,用报纸推动各种学会团体的建立,推动实业的发展,促进变法维新。

英敛之 名华,字敛之,号安蹇,1867年生于北京,1926年逝世。英敛之是《大公报》的创办人,《大公报》是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在绅、商、学界有广泛影响的一份时事政治性日报。1902年《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后,英敛之一人兼任总理、撰述、编辑等数职10年。英敛之自言办报目的是为了“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在他主持《大公报》期间,该报以“敢言”、报风严肃见重一时,报誉日隆,英敛之也成为“北方清议之望”。1906年,英敛之曾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首倡组织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报馆俱乐部”。英敛之生前曾将所撰报刊文论汇印为《也是集》、《敝帚千金》等,流行颇广。

唐才常 1867年生于湖南浏阳,1900年遇害。唐才常是戊戌时

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他主编过《湘学报》、《湘报》,担任过《亚东时报》的主笔,还给《大陆》、《清议报》等报刊写过文章。《湘学报》创刊后,唐才常主持编务,出力最多,并且是“史学”、“时务”、“交涉”三栏的主要撰稿人,他以洪辘子的笔名发表了十几篇政论文,呼吁变法图强,批判封建专制,他的文章材料丰富,洋洋洒洒,是《湘学报》上最有战斗性的文字。《湘报》创刊后,唐才常又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民权思想,疾呼国民奋起改变中国的现状。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联络会党,密谋发动自立军武装勤王,被张之洞捕杀。

蔡元培 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病逝于香港。蔡元培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长,1901年他曾与人在上海合办《外交报》,常为该刊撰写翻译稿件,这是他从事新闻事业之开始。1903年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蔡元培在上海创办和主编了《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著文抨击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主权,并进行反清革命宣传。蔡元培是我国早期新闻学研究活动的倡导者,在他的支持下,1918年中国最早的新闻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会在北大成立,由蔡元培任会长。

章炳麟 1869年生于浙江余杭,1936年在苏州逝世。章炳麟是清末民初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报刊政论家。他在《国民报》上发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驳了梁启超保皇立宪的主张,是中国近代报刊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的《序〈革命军〉》、《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政论文章,放言反清革命,批驳保皇派的论调,从而引发了“《苏报》案”。章炳麟被捕入狱,成为举国闻名的革命志士。刑满出狱后,章炳麟赴日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先后为《民报》撰文58篇,其中论说和时评42篇,与保皇派展开论战,大力宣传反清和保存国粹,是《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和革命宣传家。章炳麟的政论以渊博的古文知识作基础,典雅古朴,词句精炼,不尚浮华,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他“文必法古”,所著文章

常艰涩难懂,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读者范围。章炳麟为了争得言论自由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的精神,对新闻界有重大影响。他在“《苏报》案”中与清政府对簿公堂,在“《民报》案”中向日本政府据理力争,表现了革命者的铮铮铁骨,历来为人称颂。但辛亥革命后,章炳麟创办《大共和日报》,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与立宪党人共同拥护袁世凯。后来他又反袁,一度被软禁。章炳麟早年主编过《经世报》、《译书会公报》、《昌言报》、《亚东时报》等,晚年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创办过《教育今语杂志》、《国学商兑》、《制言》等刊物。

陈少白 1869年生于广东新会,1934年病逝于北平。陈少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机关报《中国日报》的发起人和创办人,他作为《中国日报》的第一任社长兼总编,从1900年创刊到1906年,举凡经营管理和编辑撰稿,事必躬亲,领导报纸渡过一次次难关。他才思敏捷,政治见解新颖,在与《商报》、《岭海报》等保皇派报纸的论战中每每挫败对方。陈少白对诗词、书画、戏剧均有造诣,《中国日报》及其附刊《中国旬报》上,曾发表过他不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漫画。1903年,《中国日报》因起义善后工作用款较多,入不敷出,并入文裕堂印务公司,陈少白为经理之一,分管报务。在他的努力和孙中山的支持下,虽然《中国日报》处境艰辛,但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刘少少 1870年生于湖南善化,1929年在北京去世。刘少少是民国初年北京著名记者,有“怪杰”之称。他原名肅和,1909年应邀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时,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义,以“少少”为笔名,撰写政论,鼓吹宪政,开始在新闻界崭露头角。民国成立后,刘少少曾担任《湖南公报》、《公言》、《中华》、《亚细亚日报》等报刊的编辑、记者、主笔。他的文章总是独辟旨趣,不与人同,庄谐杂出,时有新意,因此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有“京国咸知刘少少”之誉。

孙翼中 1872年生于浙江杭州,卒年不详。孙翼中在日本留学

期间,参加了革命团体青年会,并主编浙江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开始他的革命办报工作。1903年回国后,孙翼中主持《杭州白话报》工作,使该报由原来的支持和宣传维新改良,转变为宣传革命的舆论机关,报纸的销量也由原来的800份猛增到2000份。在孙翼中的主持下,该报猛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朝政和腐败吏治,多次揭露慈禧太后向帝国主义巴结献媚的丑态。《杭州白话报》还是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杭辛斋 生年不详,1924年病逝于上海。光绪年间,杭辛斋曾在北京办白话报,光绪帝曾赠以“言满天下”的称号。后来因文章触怒慈禧太后,杭辛斋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后,仍办白话报。杭辛斋先后参与创办过《国闻报》、《中华报》、《京话日报》、《白话新报》、《浙江白话新报》、《汉民日报》等。1913年《汉民日报》因揭发贪官污吏,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查封,杭辛斋也被捕入狱,直到1916年袁垮台方获释。

徐勤 1873年生于广东三水,1945年去世。徐勤是近代著名维新派报人,戊戌变法前后,他曾主持过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和澳门《知新报》,积极宣传变法维新。徐勤撰写并连载于《知新报》前20册的《地球大势公论》,是一篇较有影响的长篇论文。徐勤在文中从古今中外的事物变化,各国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谈维新变法的必要。他的文章明快流畅,感情充沛,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戊戌变法失败后,徐勤流亡海外,先后创办旧金山保皇党机关报《文兴日报》和香港《商报》,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在主持新加坡《南洋总汇报》期间,徐勤还与《中国日报》、《中兴日报》进行过革命与保皇问题的论战。

狄葆贤 字楚青,号平子,1873年生于江苏溧阳,1921年去世。1904年6月,戊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时报》在上海创刊后,狄葆贤主持该报工作达17年。狄葆贤在该报创刊时宣

布：“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该报在舆论方面的成就不大，却在报刊业务改革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是首先将“时评”这种短小精悍的新闻文体移植于日报；二是首创“周刊”这种版面形式；三是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印标题和内容；四是彻底摆脱书册式，将报纸改为四个版面。这些改革为各报所效法，使报界面目一新。除《时报》外，狄葆贤还开设有正书局，发行《余兴》杂志、《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佛学丛报》等杂志。

梁启超 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1929年病逝于北平。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新闻思想家。梁启超前后创办和领导的报刊有17种，所撰文字约1400万言。1896年，维新派机关报上海《时务报》创刊后，梁启超出任总撰述，在该报发表《变法通议》等数十篇论说，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文字畅达，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共鸣。梁启超名声大噪，《时务报》也因之一纸风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问世不久即风行全国的近代报刊。《时务报》最高发行1.7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报刊。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的报刊活动，对变法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为维新变法的具体实施奠定了舆论基础，并推动了全国维新报刊的发展。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主持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期间，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使得该刊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慎严、印刷之精美，为“中国报界前所未有”。梁启超曾在该报发表了许多谈革命、谈共和、谈暴动的“危险激烈之言”，很受读者欢迎，他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但1903年后梁启超宣布与共和“告别”，言论日趋保守。1905年以后经过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一场保皇和革命的论战，梁启超理屈词穷，《新民丛报》也被迫停刊。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学论文有30多篇，其中重要的有《论

报馆有益于国事》、《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敬告我同业诸君》、《国风报叙例》、《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等。他在这些文章中对报刊的性质、作用、功能与宣传策略上都有所阐发,对当时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新闻界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还对新闻文体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他充分利用当时出现的时务文体宣传变法维新和启蒙教育,他的政论热情奔放,感情饱满,后世的评论家一致认为梁启超是运用时务文体的典范。

林白水 原名林獬,1874年生于福建侯官,1926年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枪杀。林白水清末曾创办和编辑过《杭州白话报》、《学生世界》、《俄事警闻》、《中国白话报》等,宣传民主革命。林白水是我国用白话文办报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主编《中国白话报》期间,坚持用白话去启发、教育社会基层群众,大力宣传反帝爱国,疾呼民族危亡,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主张建立共和政府。林白水是我国最早学习新闻的留学生之一,1906年他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兼修新闻。民国初年,林白水先后创办《公言报》、《新社会报》(后改名《社会日报》)。林白水注意面向市民群众办报,注重社会新闻,对直奉系军阀和依附他们的政客敢于揭露和攻击。他写的新闻和评论夹叙夹议,每每使一些官僚政客声名扫地。他的文字通俗浅显,很少用典故,往往从一些小事中以小见大反映政局,颇能吸引读者,为不少记者所仿效,曾经风行一时。1926年8月6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撰写时评《官僚之运气》,讥讽国务总理潘复,触犯北洋政府,第二天即被奉系军阀张宗昌枪杀。

包天笑 1876年生于江苏苏州,1973年病逝。包天笑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和作家,他创办的《苏州白话报》是维新时期比较著名的白话报刊之一。该报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宣传君主立宪和变法新政,揭露时弊。报纸文字通俗易懂,每一句在该停顿的地方,都空出一格,对难解的名词还加以注释。1905年至1919年,包天笑

长期担任上海《时报》新闻编辑及附刊《余兴》编辑，并兼任有正书局所出《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编辑。离开《时报》以后，包天笑先后编辑过《小说大观》、《小说画报》、《星期》、《女学生》等杂志，1935年他主编《立报》副刊《花果山》。包天笑所创作的小说和编辑的文学杂志，在社会上及文学界较有影响。

陈独秀 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又号仲子、由己。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反清革命。1903年8月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报》。1904年在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文笔泼辣生动，开风气之先。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提倡科学与民主，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倡导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全部版面报道运动情况，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宣言》等。1918年和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9月1日起，《新青年》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织的刊物，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等。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当选为书记。大革命后期，因右倾投降主义，致使革命在国民党右派突然袭击下遭到失败。1927年7月12日陈被停职。后组织反党小集团，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后去四川江津，以著述为生，并靠亲友接济。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去世。

于右任 1879年生于陕西三原，1964年在台湾去世。辛亥革命前，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是同盟会在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言论机关。《神州日报》是革命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张大型报纸，于右任为社长。1909年于又创办《民呼日报》，主持该报大造“官逼民反”的舆论，集中揭露和抨击西北地区的弊政，因此遭到陕甘当局和上海一些官员的忌恨。陕甘总督向租界当局诬告于右任侵吞赈灾捐款和“毁坏名誉”，《民呼日

报》被迫停刊,于右任也被租界当局无理逐出租界。两个月后,他又创办《民吁日报》,不久又因盛赞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被日方勾结上海当局将报纸查封。一年后,于右任又创办《民立报》,该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

秋瑾 1879年生于浙江绍兴,1907年被清政府杀害。秋瑾是清末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革命宣传家。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月刊,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目的在于发动妇女参加反清革命斗争。《中国女报》只出版两期,绝大部分文章由秋瑾所写,她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痛斥清政府的腐败卖国,抨击束缚妇女的封建纲常和买卖婚姻,提倡女权,号召妇女既作争取解放的先锋,又作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在妇女界引起很大反响。可惜不久秋瑾在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被捕就义,《中国女报》停刊。

史量才 1880年生于上海松江,1934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于浙江。史量才是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和报业主,他除了一度担任过《时报》主笔外,毕生致力于经营《申报》。1912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后,坚持走报纸企业化的道路,一方面靠广告增加收入,一方面努力开拓发行业务。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史量才不仅偿还前馆主席子佩巨额赔款,收买其他股东股权独资经营,而且更新设备,建造馆舍,使《申报》成为拥有资本数百万,日销近15万份的企业化大报,史量才本人也成为当时最大的报业资本家。“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及其主持的《申报》打破当时报刊保守拘谨的常规,积极支持抗日运动,反对妥协退让,并且对报纸进行了改革。联络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改组了报社委员会和副刊《自由谈》,发表大量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推行不抵抗政策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史量才在经营《申报》期间,积累了不少办报经验,如他认为办好一张有影响的综合性报纸,必须“放眼世界,洞察国情”;不仅要有详尽的报道,而且要有

正确的言论,指导读者获得正确的认识;报纸要指导和反映舆论,记者要在深入民众的基础上,集中民众的意见写成时评,反映民众的呼声;史量才还主张报纸要公正不偏,有“独立之精神”。

郑贯公 1880年生于广东香山,1906年在香港病逝。郑贯公的办报生涯很短,但为革命报刊宣传作出了杰出贡献,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为数不多的卓越报刊宣传家之一。从20岁创办《开智录》到26岁时辞世,郑贯公6年编辑了6个报刊,其中4个是他艰苦创办和主编的。为了唤起民众,他特别注意加强报纸的群众性,注意面向市民和劳动群众,一改《中国日报》把谐部作为报尾副刊的作法,在办《广东日报》时,单出一个谐部附刊。后来,又开创性地创办了庄谐并重的《有所谓》报,使之成为融雅俗为一体、独具特色的时事性报纸,一跃而为当时港粤报纸中读者最广泛、发行数字最高的报纸。在郑贯公的主持下,《有所谓》坚决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显示了宣传工作的巨大威力。郑贯公非常重视报刊在民主革命中的“笔枪”作用,认为报纸“能笔战舌争,何异军人”,他撰写了大量庄谐兼具、笔锋犀利、富有战斗力的文章和作品,风行一时,赢得了广泛赞颂。郑贯公对新闻事业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独到的报学主张,他注重报纸的社会作用,认为报纸应是服务社会的工具;他强调报纸的政治作用,将报纸比之为侦探、警察、律师、军人;他还认为新闻工作者应有较高的修养,认为“无学问则见理不真”;他指出报纸要受到群众的欢迎,必须要调查周密、文字浅白、报价低廉等。这些颇有见地的主张,和严肃认真的办报态度,是当时多数报人所不及的。

胡石庵 1880年生于湖北天门,1926年病逝。辛亥革命前,胡石庵积极为上海、武汉报刊撰稿并主编文学期刊《扬子江小说报》,发表了一系列短中篇连载小说和散文,成为当时武汉地区知名的报刊小说家。武昌起义后,胡石庵在汉口创办了《大汉报》并自任主编,该报是起义后第一家支持新政权报纸,以其激动人心的消息和充满信

心的革命宣传而一纸风行,不少地区的报刊或转载《大汉报》新闻,或翻印全报,或摘录为传单秘密散发。海外华侨报纸及欧美通讯社也抢先大量转载该报新闻及言论。《大汉报》不仅积极为起义鼓吹,还在清军攻打武汉时积极支前,供应茶水,收容散兵。并坚持出版报刊,胡石庵和记者一起亲上火线,采写了许多生动具体的新闻报道,极大地稳定了民心。民国成立后,黎元洪曾以副总统名义亲题“赤手回澜”匾额相赠,并电请最高当局颁发给胡石庵“一等嘉禾勋章”。

章士钊 1881年生于湖南长沙,1973年病逝于香港。章士钊是清末民初著名革命派报人,1903年5月他22岁即以“英年能文”被聘为《苏报》主笔,他主持该报的40余天,是《苏报》最为辉煌的时期。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慷慨激越鼓吹革命的文章发表,章士钊也撰写了《汉奸辩》、《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章,宣传民主革命,公开鼓吹推翻清朝统治。不久“《苏报》案”发,报纸被封,章士钊又创办并主编《国民日报》,详细报道了“《苏报》案”的经过,声援章太炎、邹容的狱中斗争,因而风行一时,被人们称为“《苏报》第二”。民国成立后,章士钊曾创办并主编了《独立周报》、《甲寅》杂志,从事反袁世凯的斗争。

宋教仁 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1913年被袁世凯在上海暗杀。宋教仁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早年曾在长沙创办《长沙俚语日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宣传,风行一时,后因经费不足停刊。宋教仁参与过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办和撰稿工作,在《民报》上用“犟斋”的笔名发表了《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译文和时评,介绍了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国际历史。在担任上海《民立报》主笔期间,宋教仁以“桃源渔父”、“渔父”的笔名撰写了大量政论,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抨击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和立宪派的谬论。他的文章显示了作者的丰富知识和宣传鼓动的才能,在读者中有

很大影响,宋教仁也因此而名噪一时。宋教仁还在北京创办过《亚东新报》,鼓吹政党政治。

朱执信 1885年生于广东番禺,1920年在广东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朱执信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同盟会,在《民报》发表10余篇政论文章,阐发三民主义,与改良派论战,主张“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朱执信初步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辛亥革命后,朱执信在报刊上宣传孙中山的思想,抨击袁世凯,积极策动反袁斗争,在《民国》杂志上发表许多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文章。五四运动后朱执信在上海创办了《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歌颂十月革命,支持新文化运动。

黄远生 1885年生于江西德化(今九江),1915年在旧金山被革命党人误作袁世凯党羽而暗杀。黄远生是民国初年新闻记者的巨擘,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盛名的记者。辛亥革命后,黄远生辞官不就,先后主编《少年中国》和《庸言》等刊物,受聘任《申报》、《时报》驻京记者,并为《东方杂志》、《国民公报》、《亚细亚报》等撰稿。民国以前的杰出新闻工作者大多以撰写政论、时评而闻名,黄远生则以撰写新闻通讯见长。黄远生的新闻通讯条理清楚,文字流畅,夹叙夹议,对民国初年政局的黑暗、民国新贵的丑行,予以绘声绘色的揭露和嘲讽,且多属重大政治新闻和独家内幕新闻,颇受各界瞩目,成为我国报刊新闻通讯文体的开拓者,被称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在新闻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他提出了为国为民的办报目的,认为报纸、报人要为人民奔走呼号;主张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反对面壁虚构和随便演绎推理;主张言论自由,批评袁世凯统治下新闻自由得不到保障的现状;他还特别提出记者应具有“四能”素质,即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并作了具体阐释,这是我国较早、较完整的记者经验谈。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时,为利用黄远

生的影响,强令他担任袁氏御用报纸上海《亚细亚日报》总撰述,黄远生被迫出走美国,不幸被刺。黄远生所写通讯由友人辑为《远生遗著》出版,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材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通讯文集。

邵飘萍 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1926年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邵飘萍是民国初年的名记者,他办过报纸和通讯社,当过记者、编辑、主笔和社长,善于写各种新闻体裁的文章,既有丰富的编辑、采访经验,又有经营管理报业的才能,在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他是民初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在中国新闻史上,邵飘萍是第一个重视通讯社,并以通讯社为依托成功开展新闻采访和报道活动的著名记者,他先后创办过东京通信社、北京新闻编译社,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邵飘萍还创办过杭州《汉民日报》、北京《京报》,担任过《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报的主笔,以及《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两年间为《申报》采写大量专电和250余篇通讯,经常能采写到令同行惊羨的重大新闻和独家新闻。邵飘萍还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学学者,1918年以前,我国新闻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而邵飘萍所著《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则是我国第一批新闻学专著。这两部专著,前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新闻学的性质和任务等,后者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新闻采访的规律。邵飘萍也是我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邵飘萍曾应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之聘,为该会学员讲授采访学,并在北京平民大学、法政大学担任过新闻学教授。邵飘萍在采写大量通讯的同时,还写了很多时评,他的时评篇幅短小,尖锐泼辣,战斗性强,在当时的新闻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胡文虎 著名华侨报业资本家,祖籍福建永安,1882年生于缅甸。1973年病逝于檀香山。从1928年创办《星报》,到1951年创办《星泰晚报》,胡文虎先后创办了15家中、英文报纸。这些报纸的报名

多用“星”字开头,故被称为“星系报纸”。这些报纸分布于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各大城市,并在香港设总管理处,胡文虎自任董事长。胡文虎宣称“星系报纸”的办报宗旨是不偏不倚,不受任何津贴,不畏强暴,不阿权贵,为民作喉舌。胡文虎很少过问报纸的言论,一切由主编决定,这使得各报在立场上不十分统一。

陈景韩 中国近代有重要影响的报人,1877年出生于上海松江县,1965年病逝于上海。陈景韩从1901年入上海《大陆报》任记者起,从事新闻工作前后达40余年。在主持《时报》笔政期间,陈景韩首创了报纸“时评”,配合时事,抒发议论,文章短小活泼,使大部分文化水准低,又不甚明了时事的读者一目了然,知其大意,得到广大读者和新闻界的推崇,各报竞相效仿,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新闻改革。1913年,陈景韩受《申报》老板史量才之聘,担任《申报》总主笔,主持该报笔政达16年之久。后一度赴江西经商,抗战胜利后,陈景韩复入《申报》,先后任报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常务董事兼发行人,直至1949年5月《申报》停刊。

张竹平 中国近代报业经营家,1886年生于江苏太仓县,1944年在香港病逝。1914年张竹平受聘担任《申报》经理后,悉心改进广告、发行业务,是《申报》兴旺发达的有功之臣,史量才的得力帮手。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张竹平将他主持的或他参股的三报一社糅合到一起,成立了“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社联合办事处”,由张竹平任总经理,使三报一社在经营、通讯上互通有无,进行合作,促进了三报一社的发展。申时电讯社逐渐发展成国内有影响的通讯社,《大晚报》也成为上海晚报销数之冠。尽管四社的联合只是业务上的部分联合,不是资本的联合,但四社已经具有报团的雏形,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不多见的。1935年初,四社为孔祥熙低价强行购买。张竹平改任联合广告公司董事长、协丰矿行经理。不久,张竹平离沪赴香港经商。

詹大悲 1887年生于湖北蕲春县,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胡宗铎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的罪名枪杀。辛亥革命前,詹大悲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先后与人创办《商务日报》、《大江白话报》和《大江报》,并担任主笔,是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地区革命派的宣传主将。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是当时武汉地区知名度最高的报纸。1911年7月,《大江报》先后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时评,号召推翻清政府,触怒了湖北当局,詹大悲被捕入狱,报纸亦被封。不久武昌起义爆发,詹大悲获释出狱,继续主持《大江报》。南北议和期间,詹大悲拟创办《亚东日报》以“唤起愚众”,因经费短缺未能实现。

柳亚子 近代著名报人、诗人和社会活动家,1887年生于江苏吴江,1958年病逝于北京。从1903年起,柳亚子就在上海《苏报》、《警钟日报》和《二十世纪大舞台》等报刊上发表评论、诗词等作品,进行反清宣传。1909年,柳亚子与人合办《复报》,以“发扬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想”为宗旨,在当时颇有影响。武昌起义后,柳亚子又与人合办《警报》并担任主编,积极报道各地起义活动。民国后,柳亚子历任上海《天铎报》、《民声报》、《太平洋报》主笔,以时评和诗词等形式,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维护辛亥革命成果。

董显光 1887年生于浙江宁波,1971年在美国病逝。董显光22岁时赴美留学,先后在巴克学院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后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深造。学习期间董显光即在《独立》杂志撰写书评,并在当地报纸兼作记者,曾采访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13年董显光回国,经孙中山介绍,担任了英文日报《中国共和报》副总编辑,后受孙中山派遣,任上海几家国民党报纸的驻北京记者,进行反对袁世凯的宣传。其后董显光先后担任过英文《北京日报》主笔、《密勒氏评论报》副总编辑、上海《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等职。其间董显光还于1926年6月在天津创办《庸报》,自

任发行人、主笔、编辑、记者兼广告经理。1935年冬,董显光步入政界,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持检查外国新闻电讯。之后董显光陆续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新闻局局长等职。

张季鸾 近代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刊评论家,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一小官僚家庭,1941年在重庆病逝。张季鸾的一生,除了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及教过两年书外,其余时间都在办报。张季鸾早年留学日本,即以文笔出众,被推担任留日学生刊物《夏声》编辑。1910年张季鸾协助于右任办《民立报》,三年后在北京创办另一份《民立报》,自任主编,后因透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而被捕。出狱后张季鸾转赴上海办报,先后担任《大共和日报》日文翻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张季鸾应上海《新闻报》之聘再度赴京,任该报驻京记者,他所撰写的《特约通信》,与《申报》的“飘萍通信”、《时报》的“彬彬通信”齐名,广受读者欢迎。张季鸾还先后担任过北京《中华新报》和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在中国新闻界享有盛名,是在1926年他担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之后。在主持该报笔政的15年间,张季鸾对国民党统治“小骂大帮忙”,颇受蒋介石赏识。他还借鉴日本报纸经验,首创综合编辑法,并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办报方针,使《大公报》在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之中生存下来。

徐凌霄 民初著名记者,1888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一士大夫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病逝于北京。徐凌霄长期担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他的通讯富于趣味又文笔流畅,由于他熟悉民国初年一些政界要员的身世经历,故所写通讯常能运用有趣的内幕材料,颇受读者欢迎,徐凌霄也成为民初最负盛名的记者之一。1918年《京报》创刊后,徐凌霄应约担任特约编辑,主编副刊并撰写剧评。徐凌霄对京剧等传统戏曲颇有研究,所写剧评多有创

见,受到读者的喜爱。徐凌霄还曾与其弟一士合撰《凌霄一士随笔》在《国闻周报》上连载,从1927年起一直连载10年,透露了不少新闻界的掌故。三十年代后,徐凌霄担任天津《大公报》、《戏剧周刊》和《小公园》主编,设立《凌霄随笔》、《凌霄汉阁随笔》等栏目,自撰文史方面的短文,成为历史掌故方面的名家。

李大钊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9年生于河北乐亭,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在北京杀害。从1913年起到1927年止的14年中,李大钊先后主编或指导编辑出版的报刊近20种,撰写政论、时评、通讯、诗歌300余篇。李大钊的办报活动始于1913年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创办的《言治》杂志,李大钊在该刊上发表的一些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文章经常为国内报刊转载。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还主编过《神州学刊》和《民彝》杂志,并积极为国内的《甲寅》月刊、《新青年》写稿。1916年回国后到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除积极参与《新青年》编撰工作,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外,曾先后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主任等,还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刊物《国民》杂志社导师和《新潮》杂志社顾问,并指导北京《晨报》副刊改革,使副刊成为介绍新知识、新文化、新修养的园地。李大钊是在中国报刊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十月革命后,他在《言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演讲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和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李大钊和陈独秀领导形成了以《每周评论》为首的,包括北京、上海等地进步报刊的舆论统一战线,一致声援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抨击军阀政府。二十年代后期李大钊还指导创办了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刊物,如《劳动音》周刊、《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还指导出版北京的国民党左派报纸《国民新报》。

胡政之 近代著名新闻工作者,188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旧官

僚家庭,1949年病逝于上海。胡政之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记者、编辑、总经理、总编辑等各项工作,能采写新闻、摄影、译电,并能撰写评论文章,还精通报社的经营管理,是旧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中的一个“全才”。在担任王郅隆的《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期间,胡政之曾赴法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唯一的中国记者,也是中国最早派往国外采访的记者。巴黎和会后,胡政之又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在报界名噪一时。回国后不久,胡政之脱离《大公报》,与林白水合办《新社会报》并担任总编辑。1921年,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出版《国闻周报》,在他的悉心经营下,该社成为当时我国最先进的一家通讯社。1926年,胡政之与吴鼎昌、张季鸾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国闻通讯社也并入《大公报》。胡政之充分发挥经营报业的才能,使《大公报》发展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报。

严独鹤 上海报界早期著名报人,1888年出生于上海一职员家庭,1968年去世。严独鹤1914年进入上海《新闻报》,一干就是30多年,被提升为该报副总编辑。严独鹤一直为《新闻报》主编副刊《快活林》和《新园林》,每天为副刊写一篇短文,并率先以文言与白话相结合的体裁写文章。严独鹤所撰短论、杂感、小说甚丰,作品通俗活泼,深受市民喜爱。在副刊编辑中,严独鹤坚持“新旧折中、雅俗共赏、不事攻讦、不涉秽褻”的方针,《新闻报》的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

戈公振 近代著名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拓荒者和新闻学教育家。戈公振原名绍发,号公振,1890年生于江苏东台,1935年病逝于上海。1912年戈公振入《东台日报》任图画编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后戈公振进入上海《时报》工作,从校对员干到总编辑,对《时报》编辑业务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戈公振于1927年1月赴欧美、日本考察新闻事业,并参加了在瑞士召开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回国后戈公振参加《申报》工作,任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兼《申

报》星期画刊主编。1933年戈公振赴苏联考察采访3年,向国内发回大量有关苏联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通讯报道,后来辑成《从东北到庶联》一书出版。戈公振一生除了做编辑、记者工作外,还致力于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工作。他曾先后在上海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并出版过《中国报学史》、《新闻学撮要》、《新闻学》等著作,发表过许多新闻学论文和新闻事业考察报告。其中《中国报学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报刊发展史的著作,一直是新闻史学界的必读书。

任白涛 近代著名新闻学者,1890年生于河南南阳,1952年病逝于上海。任白涛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就参加了大日本新闻学会,是该学会首届会员,开始从事新闻学研究。1922年,任白涛在上海自费出版《应用新闻学》,这是国人自撰的第一本实用新闻学著作。1935年到1937年,任白涛又完成了4册130万字的《综合新闻学》一书,其后陆续著有《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国际通讯机构及其它》、《日本对华宣传政策》等。1941年任白涛曾在恩施担任《新湖北日报》总编辑,历时9个月。抗战胜利后,任白涛即定居上海,从事新闻学研究。

何海鸣 1890年生于湖南衡阳,1944年在香港去世。辛亥革命前,何海鸣积极投身反清革命宣传,先后参加湖北地区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机关报《商务日报》、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的工作。1911年7月17日,何海鸣在《大江报》发表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鼓吹民主革命,号召推翻清政府,触怒了湖北当局,在随后发生的《大江报》一案中逮捕判刑,武昌起义后获释。此后,何海鸣曾担任过北京《又新日报》主编,上海《民权报》主笔。同时为上海各报写了大量连载小说,成为鸳鸯蝴蝶派作家之一。

陈布雷 1890年生于浙江慈溪,1948年11月在南京服药自尽。他担任过上海《天铎报》主笔、宁波《四明日报》撰述、上海《商报》编辑

主任、《时事新报》总主笔、《申报》常务董事等，撰写的社论、短评通畅晓利。陈布雷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办有“戊辰通讯社”和《新生命》月刊。

李达 1890年生于湖南零陵，1966年逝世，二十年代初，李达即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介绍和宣传，他与陈独秀等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担任发起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和改组后的《新青年》的编辑，同时为《劳动界》、《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妇女声》等撰稿，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达当选为党中央宣传局主任，主持创办了中共第一个秘密出版机关——人民出版社。李达在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期间，还亲自主编该大学校刊《新时代》，宣传中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陈博生 1891年生于福建闽侯，1957年在台北逝世。陈博生1918年进入新闻界，在北京《晨钟报》任编辑。其后担任过北京《晨报》总编辑、中央通讯社驻东京特派员。抗战爆发后，陈博生回国，不久被任命为中央社总编辑，直至1950年在台北才辞去总编辑一职，其间陈博生一度改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重庆版社长兼总主笔。

戴季陶 1891年生于浙江吴兴，1949年2月服药自尽。辛亥革命前，戴季陶先后担任《中外日报》、《天铎报》主编，以“天仇”为笔名撰写文章，抨击清廷，鼓动力极强。为此他遭到清政府指名缉捕，后走避马来亚，任《光华报》编辑，继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武昌起义后戴季陶回国，与他人上海创办《民权报》，该报以言论激烈出名。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戴季陶提出“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1912年4月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袁世凯罪状》，这篇讨袁檄文是我国新闻界首次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文章。反袁斗争失败后，戴季陶被迫逃亡日本，留日期间还编辑过《民国

杂志》。五四运动爆发后,戴季陶在上海创办并主编了《星期评论》。1924年,戴季陶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他公开从事反共活动,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鼓吹“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重要头目。他的言行受到《向导》等革命报刊的严厉批判。

胡适 1891年生于安徽绩溪,1962年在台湾病逝。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参与过《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打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炮。他提倡写白话文、白话诗、演白话剧,在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在世界观方面,胡适坚持实用主义哲学,在掌握了《每周评论》编辑权后,他曾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此李大钊与胡适进行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胡适所主办的《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周刊和《独立评论》周刊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支持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胡适还曾编辑、主持过《竞业旬刊》、《中国留美学生季报》、《国学季刊》、《新月》月刊等。

萧楚女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1893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27年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捕遇害。五四前后,萧楚女曾任汉口《崇德报》主笔、《大汉报》主笔,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在担任中共驻四川特派员期间,萧楚女两度出任重庆《新蜀报》主笔,两年半中为该报撰写社论、时评、通讯近千篇,宣传民主科学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在1925年,萧楚女被四川军阀迫令离川,随即赴上海协助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同时积极为《向导》、《新建设》、《学生杂志》、《教育与人生》、《民国日报》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教育广大青年。萧楚女的文章情理交融,分析深刻,在青年读者中有广泛影响,被称为“真理的战士”、“革命的煽动家”。萧楚女还主编、

编辑过《中州评论》、《政治周报》、《黄埔日刊》等革命刊物。

俞颂华 近代著名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1893年生于江苏太仓,1947年病逝。1920年,俞颂华与瞿秋白、李仲武以《时事新报》和北平《晨报》特派员身份,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采访,成为十月革命后首批赴苏采访的中国记者。俞颂华在苏联采访所著《赤俄闻见记》,是我国关于苏联革命胜利后的最早通讯集之一。1937年,俞颂华还以《申报》记者身份赴延安采访,所写通讯在《申报》周刊上发表,向全国读者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抗战期间,俞颂华历任《星洲日报》、《光明报》、《广西日报》、《大刚报》和《国讯》杂志等报刊总编辑。俞颂华主编、编辑过的报刊还有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解放与改造》杂志、《东方杂志》、《新社会》半月刊、《申报》月刊、《申报》周刊等。俞颂华热心新闻教育,曾任教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

潘梓年 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893年生于江苏宜兴,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潘梓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主编过《北新》、《洪荒》等进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第一张公开机关报《新华日报》时,潘梓年被任命为社长。皖南事变发生后,潘梓年组织报社职工巧妙地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检查,在《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透露了事变的真相。全面内战开始后,潘梓年率报社全体工作人员撤回延安。

徐宝璜 著名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家,他1894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930年在北京病逝。徐宝璜毕生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被誉为“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新闻教育第一位大师”。徐宝璜早年留学美国,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学成回国后,徐宝璜一度在北京《晨报》任编辑,不久即回北京大学任教,在文法科系开设新闻学讲座。1918年,徐宝璜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了北

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徐宝璜任副会长、新闻学导师,并主编学会会刊《新闻周刊》,这是我国学校正规新闻学教育的发端。徐宝璜还担任过平民大学新闻系主任,并积极筹建北大新闻系。徐宝璜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授课的讲稿以《新闻学大意》为题,先后在《东方杂志》、《北京大学日刊》、《新中国》等刊物上发表,经多次修改后,于1919年以《新闻学》的书名由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出版,这是我国学者自著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

邓中夏 著名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1894年生于湖南宜章,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在南京杀害。邓中夏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就编辑过《国民》杂志,以“大壑”为笔名撰写时评。20年代,邓中夏积极投身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宣传,先后主编、编辑《劳动音》周刊、《工人周刊》、《青年工人》、《中国工人》、《工人之路特号》等工人刊物。他还参与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撰写有关中国工人、农民运动及倡导革命文学的文章。

萧同兹 1894年生于湖南常宁,1974年病逝于台北。萧同兹自1932年起担任中央通讯社社长,直至1964年退休。萧同兹主持中央通讯社期间,以“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为目标对中央社进行改组和扩充,建立了专用无线电新闻电台,向全国播发新闻电讯;并建立了全国性新闻通讯网,保证了充足的稿源;中央社还部分收回了外国通讯社在中国的直接发稿权。

孙伏园 著名报纸副刊编辑,1894年生于浙江绍兴,1966年在北京逝世。孙伏园的新闻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他曾先后主编过《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镌》、《京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新民报》副刊等。孙伏园与鲁迅过从甚密,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就是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孙伏园还主编、编辑过《贡献》旬刊、《当代》月刊、《民间》杂志等。

潘公展 1894年生于浙江吴兴,1975年病逝于美国。潘公展早

年任过《商报》编辑部主任和《申报》要闻编辑。从1932年起,潘公展在上海连续创办了《晨报》、《新夜报》、《儿童晨报》等报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前往重庆,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处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并一度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抗战胜利后,潘公展又赴沪接办《申报》,任该报董事长,并担任《商报》副董事长。1949年以后,潘公展一度在香港创办国际编译社,后赴美定居,并办有《华美日报》。

恽代英 1895年生于江苏常州,1931年在南京遇害。恽代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卓越的无产阶级报刊宣传活动家。他一生从事报刊宣传活动16年,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刊有10余种,撰写报刊文章500余篇。他具有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并注意理论的探索和总结,对早期中共党报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五四时期,恽代英就为《新青年》、《妇女时报》、《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等刊物撰写数十篇论文,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五四运动到中共成立前,恽代英参与指导编辑武汉《学生周刊》、《新生》半月刊、《武汉星期评论》和《我们的》等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潮。在他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部长时,主编了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恽代英为《中国青年》付出大量心血,在该刊发表130多篇文章和30多封通信,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恽代英还编辑、指导过《新建设》月刊、《民国日报》副刊、《少年先锋》杂志、《黄埔月刊》、《群众》周刊等。

蔡和森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活动家,1895年生于湖南湘乡,1931年在广州遇害。蔡和森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十分关心国内新思想的宣传,在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信中,蔡和森深感国内缺少“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他还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应该“组织一个审查会,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回国后不久,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从事宣传

工作,一度负责编辑《先驱》半月刊。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创刊后,蔡和森长期担任主编,为《向导》写了大量政论,仅署名和森的就有130多篇,使中共“打倒帝国主义”、“驱除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向导》的发行量也从几千份迅速增加到四五万份,最高达十万份。蔡和森在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还经常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文章,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宣传。

向警予 著名妇女报刊活动家,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1928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向警予就积极为《少年中国》等国内外报刊写稿,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妇女问题,还曾计划组织通讯社“以通全国女界之声气”。回国后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发动和领导妇女运动,并在中共刊物《前锋》、《向导》以及《妇女杂志》、《民国日报·觉悟》等刊物上发表了大批有关女权和妇女解放的演讲和文章,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的妇女运动。向警予曾主编过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中共湖北省委刊物《长江》。

邹韬奋 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1944年病逝于上海。邹韬奋一生主办过多种报刊,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全国拥有56处总分支店。1926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编,使该刊从单纯讲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变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成为全国著名的抗日救国刊物,销量增至15万多份,创当时杂志发行量最高纪录。从主编《生活》周刊开始,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不是办报纸,就是办刊物,一个被禁,再办一个。在他主持下,先后出版的报刊有《生活》、《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及《生活日报星期刊》、《生活周刊》、《抗战》、香港《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和

他的事业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邹韬奋还著有《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记录了他在英、法、德、苏、美等国考察期间的耳闻目睹,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新闻事业。

周瘦鹃 1895年生于江苏吴县,1968年去世。周瘦鹃早年开始创作小说,不断向《小说月报》、《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刊物投稿,《中华小说界》、《女子世界》等均刊有其文章。1920年,周瘦鹃受聘担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历时12年,直至1932年《申报》改组,改任《申报》另一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还主编过《新申报》副刊《自由新语》和《小申报》、《礼拜六》、《良友》等,并参加创办《半月》、《紫罗兰》、《紫兰花生》、《新家庭》等杂志,兼编先施公司的《乐园日报》。1939年,周瘦鹃辞去《申报》编务,致力于园艺。

高君宇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宣传活动家,1896年生于山西静乐,1925年在北京病逝。五四运动前后,高君宇投身新文化运动,加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参与编辑《国民》、《新潮》杂志,为《北京大学日刊》、《民国日报》、《晨报》、《新青年》撰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君宇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宣传工作,担任《向导》周刊编辑,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生周刊》及以后出版的《政治生活》编辑,参与《劳动音》周刊、《先驱》半月刊、《工人周刊》的工作,为《向导》撰写过政论和北京通信近30篇。

胡愈之 中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先驱者和杰出的海外报刊活动家,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86年在北京逝世。五四运动期间,胡愈之就在《东方杂志》连续撰文提倡民主和科学。在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胡愈之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成为指导运动的舆论工具。“九一八”事变后,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支持和帮助邹韬奋办好《生活》周刊,创办并亲自主编了我国最早的通俗国际问题刊物《世界知识》。全面抗战爆发后,胡愈之担任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出版《团结》、

《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到武汉,担任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这期间,他还和千家驹等人出版了《国民公论》,并与范长江等一起筹建了国际新闻社。40年代,胡愈之受中共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抗日宣传阵地。胡愈之主编新加坡《南洋商报》后,该报从内容到版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跃成为南洋最畅销的报纸。抗战胜利后,胡愈之又在新加坡创办了《南侨日报》、《风下》周刊和《新妇女》杂志,在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胡愈之创办了我国第一张反映知识分子要求的《光明日报》,并在担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期间,创建了一整套新型的社会主义出版机构。

陈铭德 著名报业发行人,1897年生于四川长寿,1989年在北京逝世。陈铭德早年在成都法政专科学校教授新闻学,并担任过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1929年9月,陈铭德和刘正华、吴竹似等人在南京创办《新民报》,由陈铭德任社长。《新民报》以广大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在陈铭德的悉心经营下,该报很快成为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抗战胜利后,该报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地都出版有日刊或晚刊,号称5社8刊,由总管理处负责统筹,陈铭德任总管理处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铭德担任过上海《新民晚报》副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

谢六逸 新闻教育家和报刊主编,1898年生于贵州贵阳,1945年在贵阳病逝。谢六逸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新闻教育和研究工作,担任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在确定教学指导思想、课程体系,以及建立学生实习基地等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谢六逸还著有《实用新闻学》、《通讯练习》、《新闻储藏研究》、《国外新闻事业》、《什么是报章文学》等新闻学著作。谢六逸参加编辑过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和中华书局的刊物《儿童文学》,并主编过上海《立报》副刊《言林》、《国民周刊》,与他人组织出版了《每周文艺》、《文讯》

杂志。

顾执中 新闻记者和新闻教育家,1898年生于上海。顾执中早年在《上海时报》、上海《新闻报》任记者,抗战期间赴印度加尔各答任华侨报纸《印度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二十年代,顾执中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因时局动荡,民治新专曾两度停办,屡迁校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执中曾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顾执中还著有《西行记》、《到青海去》、《报人生涯》等。

成舍我 著名资产阶级报人和新闻教育家,1898年生于湖南湘乡,1991年在台北去世。成舍我15岁即与新闻工作结缘,被安庆《民暑报》聘为外勤记者,经常为报纸投稿。担任过沈阳《健报》、上海《民国日报》编辑及北京《益世报》主笔、总编辑。20年代中期,成舍我在北京接连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统称为“北京世界日晚报”,后改称“北平世界日报”,是北京历史上唯一同时出三份报纸的报社。北京《世界日报》前后共出版17年,是华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报纸。1928年和1935年,成舍我又先后创办了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均是当时很有特色的小型报。《民生报》是南京第一份小型报,成舍我采取“小报大办”、“精选精编”的方针,使该报迅速打开销路,一度发行3万份,超过南京《中央日报》的销数。上海《立报》坚持报纸大众化的方向,发行量曾突破20万份,居全国报纸发行之首位。成舍我还创办过北京新闻专科学校,为北平《世界日报》培养人材。五十年代在台湾又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改制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并一直任该校校长。1988年台湾当局解除“报禁”后,成舍我还申请登记了他的新报《台湾立报》,于同年创刊。

瞿秋白 早期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1935年在福建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党报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领导和主编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报刊,

先后有《新社会》、《人道》、《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实话》、《红色中华》等十几种。瞿秋白还领导过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记者联盟等团体,并曾任中共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宣部长。瞿秋白是我国最早派驻国外采访的新闻记者之一,1920年10月至1923年1月,他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特派员前往苏联采访,为国内报刊撰写了大量通讯,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真实情况,这些通讯后来编辑成《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部著名的通讯集。瞿秋白从苏联带回列宁的办报学说和无产阶级报刊工作的经验,结合自己长期办报实践的体会,提出一系列党报工作主张,是我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新闻理论的雏型。

张友渔 中国共产党著名新闻工作者、新闻学家,1899年生于山西灵石,1992年在北京逝世。张友渔早年求学期间,就经常为报纸投稿,撰写新闻、评论、诗词等,以后历任北京《大同晚报》总编辑、《国民晚报》社长、天津《泰晤士晚报》总编辑、北京《世界日报》主笔、上海《时事新报》总主笔、香港《华商报》总主笔、《新华日报》代理总编辑、社长等职。张友渔曾数赴日本攻读新闻学及考察日本新闻事业,回国后在北平燕京大学等4所大学担任新闻学教授,并著有《日本新闻发达史》、《新闻之理论与现象》、《报人生涯三十年》等新闻学著作。

朱惺公 著名的爱国记者,1900年生于江苏丹阳。朱惺公1928年进入新闻界,曾任《浙江商报》副刊编辑、《时代日报》特约编辑。上海沦陷后,朱惺公在人称“孤岛”的租界中主编《大美晚报》中文版副刊《夜光》,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编发了许多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痛斥汉奸的稿件,成为孤岛著名的爱国报人。1939年6月,朱惺公接到日伪特工总部一封附有子弹的恐吓信,他毫不屈服,反而在《夜光》副刊上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公开揭露日伪的恐怖活动。不久,朱惺公惨遭暗杀。

羊枣 原名杨潮,著名记者、国际问题评论家和军事评论家,1900年生于湖北沔阳。羊枣擅长写军事与国际政治评论,四十年代在香港《星岛日报》任职期间,为该报及《华商报》、《世界知识》等报刊撰写论文及译文近百万字,其文章分析精当,笔锋锐利,具有独创见解,常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影响广泛。羊枣还主编、编辑过《光明报》、《民主报》、《大刚报》等,他主编的《民主报》“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是东南沿海读者最多的刊物。此外,羊枣曾先后供职于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1945年,羊枣因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一年后在杭州监狱被害。

王芸生 著名报人、报刊评论家,1901年生于天津静海,1980年在北京病逝。王芸生于1926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在天津《商报》任总编辑,因在《商报》上与张季鸾笔战而为张所赏识,被引入《大公报》工作。在张季鸾的培养重用下,王芸生成为新记《大公报》的第二代言论主持人,历任该报编辑、主笔、总编辑。“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受张季鸾委托,搜集并编纂有关史料,写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续发表于《大公报》,因而名声大振。抗战期间,王芸生曾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孔祥熙的二小姐用飞机运洋狗事件,为此《大公报》遭到停刊三天的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芸生继续主持《大公报》工作,长期担任社长,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新闻学会顾问。

李公朴 新闻出版家,1902年生于江苏常州,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毕生致力于新闻出版工作,曾编辑过《读书生活》半月刊、《全民》周刊、《全民抗战》三日刊、《民主》周刊、《民主教育》等刊物,以及环球通讯社、全民通讯社。1939年6月,李公朴率抗战救国教学团赴华北敌后考察,历时半年走访15个县500多个乡村,撰写出版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李公朴著有《怒涛集》、《读书与问答集》等。

何云 1904年出生于浙江上虞,1942年在山西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何云早年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回国,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曾任《中国论坛》、《金陵日报》编辑以及汉口《新华日报》国际版编辑。《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后,何云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并兼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领导报社转战太行山,坚持出版报纸,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发展华北敌后新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何云还担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主任、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新闻界参议员。

赵敏恒 著名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190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61年在江西去世。赵敏恒早年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读书,获硕士学位。求学期间,赵敏恒担任过美国丹佛城快报记者、纽约寰球通讯社编辑和《中国留学生》月刊总编辑。回国后,赵敏恒一度任英文《北京导报》副总主笔,后参加英国路透社,历任该社驻南京汉口特派员、南京分社社长、重庆分社社长。在路透社期间,赵敏恒最早向世界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东北秘密调查报告、西安事变和开罗会议的消息,成为国际报坛的知名记者。1944年秋,赵敏恒在重庆《新民报》和《新闻天地》上发表二十多篇系列通讯《伦敦去来》,披露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高压政策,受到路透社领导的责难而被迫辞去路透社的一切职务。其后赵敏恒担任过重庆《世界日报》、上海《新闻报》总编辑,并办有《星期快报》。赵敏恒还先后兼任过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并著有《外人在华新闻事业》、《采访十五年》、《伦敦去来》、《新闻圈外》。

张友鸾 新闻活动家,1904年生于安徽安庆,1990年在北京去世。张友鸾早年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受教于邵飘萍。张友鸾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历任北京《世界日报》总编辑、《国民晚报》社长、南京《民生报》和《新民报》总编辑、上海《立报》总编辑、重庆《新民

报》经理等,并创办了《南京早报》和《南京人报》。1952年,《南京人报》停刊后张友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整理和编辑工作。

杨刚 著名女记者,1905年生于湖北沔阳,1957年在北京逝世。杨刚的新闻生涯大部分在《大公报》工作,1939年至1943年,杨刚历任香港、桂林、重庆《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并作为战地记者赴福建、浙江、江西前线采访。杨刚还担任过《大公报》驻美记者、香港版《大公报》社评委员。1949年,杨刚参加天津版、上海版《大公报》的改造工作,任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副总编辑及上海《大公报》军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刚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章汉夫 著名报刊活动家,1906年生于江苏武进,死于1972年。三十年代,章汉夫曾在上海与艾思奇等创办《读书生活》杂志,在该刊及《世界知识》、《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发表大量的国际述评与政论。1938年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后,章汉夫任该报编辑部主任,武汉沦陷前夕,章汉夫奉命率少数职工坚持出版报纸,直至城破才撤出,是武汉诸大报中最晚撤离武汉的。《新华日报》迁重庆出版后,章汉夫相继担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抗战胜利后,章汉夫赴上海筹办上海《新华日报》总馆及南京分馆,因国民党当局阻挠未能实现。章汉夫还担任过上海、香港《群众》杂志主编及香港《华商报》社长等职。

恽逸群 中共新闻机构的领导人、报刊活动家,1905年生于江苏武进,1978年在南京病逝。恽逸群三十年代初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上海《立报》总编辑。上海沦陷期间,恽逸群在“孤岛”租界内担任中共领导的《译报》、《导报》总编辑,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救国的宣传。此外,恽逸群曾与范长江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担任秘书长,参与创办国际新闻社并负责

国新社香港分社工作。抗战胜利后,恽逸群进入华中解放区领导新闻工作,历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编委、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济南《新民主报》社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恽逸群担任过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5年恽逸群受潘汉年案牵连,从此离开新闻界。恽逸群著有《新闻学讲话》。

陆定一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领导人,190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96年在北京逝世。陆定一长期担任中共党报工作的领导,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并兼任过《中国青年》、《青年实话》报主编,红军长征时陆定一接替邓小平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40年代,陆定一担任了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总编辑,领导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并撰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等著名文章,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党报史上有深远影响。

博古 中共新闻机构领导人,1907年生于江苏无锡,1946年在山西因飞机失事遇难。博古在三十年代领导出版了《中国工人》、《劳工报》、《工人报》、《赤色海员》等一批工人报刊,但在指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报刊的出版宣传中,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期间,博古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整风改革、业务发展和解放区新闻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博古还担任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中央出版局局长等职。

杨松 报刊活动家,1907年生于湖北黄安一教师家庭,1942年在延安病逝。杨松早在1926年就从事过新闻工作,北伐战争期间,他任武汉“血光通讯社”编辑和记者,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积极参加革命,为宣传北伐战争做了不少工作。三十年代,杨松先后主编过海

参葺《太平洋工人》杂志、莫斯科《全民》杂志,并经常向巴黎发行的《救国时报》投稿,其中不少文章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办后,杨松任第一任总编辑,他勤于笔耕,创刊一个月就撰写社论 20 余篇,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

萨空了 著名少数民族报刊活动家和新闻学家,他原籍内蒙古翁牛特旗,1907 年生于四川成都,1988 年在北京逝世。萨空了二十年代即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世界日报》、《北京晚报》编辑、记者和天津《北洋画报》特约通讯员。萨空了三十年代主持上海《立报》期间,实行精编主义,使该报以版面新颖、内容丰富、言论进步、定价低廉而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一度达 20 万份,为当时国内报纸发行量最大的一家。萨空了还主持过《新疆日报》、重庆《新蜀报》、香港《华商报》和《光明报》、北京《光明日报》的工作。萨空了早年曾在北京中国大学、民国学院新闻系、北京新闻专科学校和河北高中讲授新闻学课程,并著有《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宣传心理研究》。

徐铸成 著名记者和新闻学者,1907 年生于江苏宜兴,1991 年在上海病逝。徐铸成一生中共写作社论、专论、通讯特写 2000 篇,300 余万字。求学期间,徐铸成就利用课余为天津《庸报》和几家通讯社撰稿。徐铸成新闻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公报》和《文汇报》工作,先后主持过天津、香港、桂林、重庆、上海《大公报》的工作,并担任过上海、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总编辑。晚年徐铸成从事新闻学研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兼职教授,八十年代还出版了《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新闻丛谈》、《新闻艺术》等新闻学专著。

廖承志 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领导人之一,1908 年生于广东惠阳,1983 年在北京病逝。廖承志长期担任新闻机构领导工作,担任过新华社社长、延安《解放日报》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在新华社工作期间,廖承志曾负责翻译新华社全

部外电,并兼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党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廖承志还创办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香港爱国统一战线报纸《华商报》,并领导创建了第二个“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黄天鹏 中国近代著名新闻学者,1909年生于广东普宁,1982年在台北去世。黄天鹏毕生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主编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专门刊物,如《新闻学刊》、《新闻周刊》、《报学》杂志等,黄天鹏著述甚丰,先后编写30多种新闻学著作,主要有《新闻与新闻记者》、《新闻学概要》、《现代新闻学》、《新闻文学概论》、《新闻学入门》、《中国新闻事业》等,还有《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演讲集》、《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刊全集》、《报学丛刊》等一批新闻学论文集,汇集了二十至三十年代散见于当时报刊上的新闻学论文,对了解新闻思想发展史有重要参考价值。黄天鹏还先后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沪江大学新闻系及中央大学、政治大学、中国文化学院、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等多所院校教授新闻学。黄天鹏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长,一度兼任过《申报》、《时报》、台湾《宪政时代》主编,抗战时期任过重庆《时事新报》、《重庆各报联合版》经理。

范长江 著名记者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领导人,1909年生于四川内江,1970年死于河南确山。在《大公报》工作期间,范长江曾行程4000余里,历时10个月,考察了川、陕、青、甘、内蒙等广大西北地区,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大量旅行通讯,披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并首次公开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轰动,范长江也一举成名。后来报馆曾将这些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连出7版仍然畅销。范长江新闻通讯的另一本代表作是《塞上行》,辑了他在内蒙、宁夏写的旅行通讯,其中《陕北之行》一文是范长江在西安事变之后赴西安、延安采访周恩来、毛泽东后所写,向全国人民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全国报界有很大影响。范长江领导创办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香港《华商

报》，致力于团结抗战的宣传。范长江长期担任中共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新闻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四十年代以后曾历任新华社华中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

浦熙修 著名女记者，1910年生于上海嘉定，1970年逝世。浦熙修1937年进入南京民办报纸《新民报》，八年间深受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影响，采写大量新闻和通讯，鼓舞人民团结抗战。重庆“较场口事件”发生后，浦熙修协同《新华日报》发动新闻界同业42人联合发表公开信，据实反驳中央社的有关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浦熙修担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曾3次赴朝鲜战场采访，并写作出版了《朝鲜纪行》、《新疆纪行》报告集。

赵超构 著名的专栏作家，1910年生于浙江文成县，1992年在上海逝世。赵超构擅长写作专栏小言论，30年代末他就开始为重庆《新民报》“今日论语”专栏撰写文章，引起社会注意。因为《人世间》杂志撰写专栏文章分析时局，抨击时政，赵超构曾不断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刁难，一度走避香港。上海解放后，赵超构长期主持《新民晚报》工作，以“林放”为笔名撰写大量专栏评论和杂文，其文章善于从街谈巷议中选取材料，切中时弊，深受读者欢迎。抗战后期赵超构曾参加中外记者团去延安访问，撰写了系列通讯《延安一月》在重庆《新民报》发表，被认为是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在长期的晚报工作实践中，赵超构提出晚报要办得“广些、短些、软些”的主张，并写下《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等文章，引起新闻界的重视。

向仲华 新华通讯社的早期领导人，1911年生于湖南溆浦，1981年在广州病逝。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社创办之初，向仲华负责编辑油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并负责红中社国内报道工作。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改名新华社和《新中华报》后，向仲华继续负责编辑《新中华报》和主持新华社工作。1939年

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立,向仲华出任新华社社长,直至1941年调离。向仲华还担任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理事,并参加筹建延安广播电台,任广播委员会委员。

邓拓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和报刊评论家,1912年生于福建闽侯,1966年在北京去世。邓拓长期担任中共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在创办和主持《晋察冀日报》的10年间,邓拓首倡“八匹骡子办报”的游击办报精神,一手拿枪,一手握笔,既是战斗的指挥员,又是报纸的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邓拓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机关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使《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喉舌和联系群众的桥梁。邓拓博学多闻,才华出众,他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燕山夜话》和在《前线》杂志发表的《三家村札记》,融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为一体,深受读者喜爱。

沙飞 著名新闻摄影记者,1912年生于广东开平,1950年去世。他早年在上海求学时,就因在《良友》画报等刊物上发表鲁迅与青年谈话和鲁迅遗容等照片而触怒校方,被勒令退学。抗战爆发后,沙飞一度任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后参加八路军,任晋察冀军区编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新闻摄影科科长,曾举办过以根据地生活为题材的街头摄影展。沙飞还长期担任《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在主持画报社工作期间,为部队培训了大批摄影人才。

胡乔木 中共新闻事业领导人之一,1912年生于江苏盐城,1992年病逝。胡乔木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曾主编过革命小报,并且是革命刊物《北方青年》的撰稿人。在延安期间,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并主编《中国青年》,为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华社撰写过一系列评论和新闻。

1948至1949年,胡乔木历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建国后,胡乔木长期任职中共中央,并分管新闻宣传工作,为新华社、《人民日报》撰写评论文章。胡乔木还发表过《短些,再短些!》、《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等新闻学论文。

乔冠华 著名报刊评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1913年生于江苏盐城,1983年在北京病逝。乔冠华擅长写作报纸评论和国际述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乔冠华曾为香港《时事晚报》撰写社论,为《世界知识》杂志、重庆《新华日报》撰写国际述评。乔冠华还担任过《大众生活》周刊编委、《华商报》社论委员、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冠华曾出任国家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后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乔冠华著有《争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国际》、《从战争到和平》、《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钱毅 新闻记者,1925年生于安徽芜湖,1947年在淮安被国民党军队杀害。钱毅16岁就奔赴苏北解放区,协助著名作家、其父钱杏邨(阿英)编辑《新知识》杂志。钱毅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编采业务,而且对报纸的大众化、通俗化作了深入研究。在担任《盐阜大众》报副主编期间,钱毅力求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积极培养工农通讯员。他主张学习“庄稼话”,收集了两万多条民间谚语,撰写了《怎样写稿》、《庄稼话》等书。1947年,钱毅调任新华社盐阜分社记者,在一次采访中被国民党军队包围逮捕,次日遇害。

参 考 文 献

-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7 年版。
- 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3 年版。
-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杂出版社 1953 年版。
-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
-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
- 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 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7 年版。

后 记

本书共分七章,谷长岭主撰,王建新、林木参加了部分章节初稿的写作工作,张涛提供了不少报案资料。宁树藩先生审校了本书导言,第二章,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一、二目和结束语;徐培汀先生审校了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姚福申审校了本书第一章和第四章;黄瑚先生审校了本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四、五目和第五章。

本志当有不少缺漏和舛误,敬请批评指正。